

中國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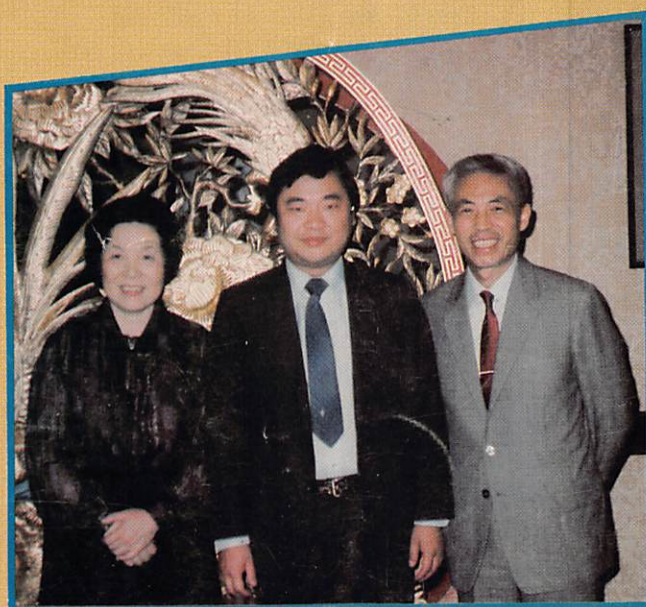
CHINA SPRING

No. 41 NOV. 1986

獨家重要採訪 / 一位退休將軍說：

「老將反對胡耀邦掌軍」

中國之春日文版出刊・英文版將面世



民聯成員黃奔先生
訪問大陸談感受

黃奔先生(中)與中國駐美大使韓叙夫婦

11月號

總41期

1986

獨家專訪政治學教授

黃默、田弘茂談政治多元化

徵文啓事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我是華盛頓地區的一名僑商，一直向往祖國走上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最近，我訪問了闊別多年的大陸故鄉。我深感到，維系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支柱已經崩潰，急需樹立新信仰和價值觀念。在此情況下，中國之春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觀點，可謂正逢其時。

為表示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我再捐助貳千美元，掀起中國之春月刊新的徵文活動，獎勵自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六期上的優秀文章，以鼓勵投稿，提高中國之春的質量。獎金為：一等獎——壹千美元；二等獎——陸百美元；三等獎——肆百美元（編輯部另付正常稿酬）。要求：文字內容與中國民主之前途有關，體裁不限，但力求有新的創意，徵文截稿日期為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美國華盛頓僑商 艾 奔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五日

本刊徵稿* 稿酬從優

中國正處於大變革之中，十五年內，必有巨變。新一代的留學生，將影响着中國未來的命運。請大家拿起筆，加入到探討和變革中國命運的運動中來。

本刊近期擬組如下專題，請大家撰稿

-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預測與建言；
- ▲ 民主內涵的探討；
- ▲ 孫中山先生誕辰一二〇周年；
- ▲ 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
- ▲ 民運策略的研討。進入共產黨內部從事改革與群眾運動的關係；
- ▲ 如何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凡探討中西方政治、文化、經濟、思想及報導中國現狀內幕的稿件，本刊均表歡迎。



亡羊不補牢，遲也！

評中共拖延政治改革

一八六二年，俾斯麥出任普魯士王國首相。當時，中日兩國為富國強兵，都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了留學生。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多派科技生，專學「船堅炮利」；日本則全面派遣，重視西方人文科學。更令西方驚異的是，滿清政府還派出孔學儒師，不斷「輔導」留學人員，以防中國原有的政體和意識形態被留學生們所改變。俾斯麥見此情景，曾做了一個有名的預言：雖然中國疆域數倍於日本，但卅年後，中國將敗於日本之手。卅多年之後，即一八九四年，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潰不成軍。俾斯麥的預言應驗了。

有人認為，滿清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改革失去平衡。當時，工商業在經濟改革之後，年增值率為百分之十左右。因此，應該說，滿清末年的經濟改革成績斐然。然而，滿清政府却僵守其陳腐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遲遲不予改革，以至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之間，矛盾越拉越大，終於導致了滿清政權的瓦解。

社會的發展是需要平衡的。經濟這條腿向前跨進時，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條腿應當跟上，否則，失衡現象必然發生。經濟、政治、意識

形態、法律的改革必須協調並進，這是中國之春運動一貫的基本主張。國內青年民主派所呼籲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配套改革的觀點，與我們的主張完全吻合。

在經濟改革觸礁、幾乎陷於停頓之後，中共高層改革派中的某些有識之士，終於接受了民主運動的上述觀點，自今年三、四月份開始，逐步造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

亡羊補牢，未為遲也。海內外人士立刻為這一進展歡呼雀躍。可是，沒高興幾天，九月初，鄧小平和胡啓立突然向外宣佈，政治體制改革，要推遲一年才能進行。這猶如一盆冷水澆到海內外各方人士頭上，人們頓時寒顫連連，熱氣頓消。

眼看著輿論已經騰起的政治改革被强行推遲，大家不禁哀嘆：亡羊而不補牢，遲也！遲也！我們不禁又想起滿清末年清廷推遲政治體制改革的慘痛教訓。

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看到政治改革勢在必行，決意維新變法，改革政治體制。不幸的是，這場戊戌變法遭到以慈禧和榮祿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殘酷鎮壓。保守派儘管得勢一時，終不能阻止社會逐漸崩解的趨勢。為垂死掙扎

，一九〇一年，即戊戌政變後三年，親手廢掉新法的慈禧，不得不捨起光緒和康、梁一手倡導的新政，立憲法，開議會，被迫進行政體改革。然而，為時已晚，清廷信譽喪失殆盡，沒幾年，滿清政權便垮于辛亥革命的浪濤之中。

雖然歷史的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重複，但社會演進必須遵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協調並進的路綫，乃是帶有一定規律性的。不同的是，今日世界發展節奏之快，已非昔比。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在數十小時之內分崩離析，即為最近的一例。專制腐敗的馬可仕政權，置人民民主呼聲於不顧，將政治改革一拖再拖。最後，當他接受美國的警告而着手改革時，等待他的，只能是「垂淚對宮娥」的悲哀結局。

中共高層改革派倘若不能識時務、把時機、順潮流，中國大陸的社會危機必將日益深化，等到不可救藥之時，再像慈禧和馬可仕一樣，急迫推行政治改革，恐怕已經悔之晚矣！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不鎮壓西單民主牆，反而借助民主運動之勢，將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改革配套推進，城市經濟改革或許不會遭遇到今天如此巨大的挫折。

最近，趙紫陽、萬里、胡啓立等，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都在不同場合表示了無力感。力量的源泉在哪裏？我們的看法是，力量的源泉在人民，在民主運動。在此，我們仍希望中共高層改革派們，能夠審勢度時，不失時機地開放民主，聯合民主派的力量，沖垮中共官僚體系的一個個頑固堡壘，將改革推向前進。否則，貽誤良機的結果，中共高層改革派可能會同保守派一起，被歷史發展的無情潮流所淹沒。

切記：亡羊而不補牢，必定遲也！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總四十一期·十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總四十一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 亡羊不補牢，遲也！

——評中共拖延政治改革

●讀者●作者●編者

6 ■ 「民族尊嚴」與「國際正義」·何來聲明？等

(香港留學生) 陳宏、陳不知等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54 ■ 關於第三和第六優先

(中國大陸留學生) 魏中民

●登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9 ■ 老將反對胡耀邦掌軍

(北京) 柳平

慶祝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

14 ■ 慶祝「中國之春日文版選集」(創刊號)在東京出版

(中國之春駐日記者) 黎晉

15 ■ 「中國之春日文版選集」發刊祝辭

(中國民聯主席) 王炳章

16 ■ 「中國之春」日文版的意義

(日本社會評論家) 龜田侯治

16 ■ 中國民聯日本支援會宗旨

(日本) 日本支援會全體同仁

●特稿專欄●

18 ■ 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下)

(政論家·香港) 李玉

26 ■ 辨別中共密件是門學問

(政論家·美國) 司馬璐

28 ■ 「笑忘書」與中共密件

(中國大陸訪美學界) 徐凡

本期專題 關於多元論的探討

29 ■ 專訪田弘茂教授：論中國政治多元化與社會多元化(本刊記者) 馳遠

33 ■ 專訪黃默教授：多元理論及中國多元化的展望 (本刊記者) 秦俠

37 ■ 從哲學角度看多元

——訪青年哲學家方舟先生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41 ■ 什麼是多元論？

(中國大陸研究生) 張洪林

45 ■ 試論多元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連續專題 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三)

48 ■ 「五一六」之謎

(中國大陸新移民) 柯奇

51 ■ 重新評價四人幫問題

(法國) 黃毅

40 ■ 當心毛廠的現成帽子

(美國) 商北雁

編者的話

多元已成為一個對中國大陸有吸引力的概念，甚至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也主張多元。那麼，什麼是目前政治學界所公認的多元觀念呢？為闡明這一問題，本刊特專訪了黃默和田弘茂這兩位知名的政治學教授。

鄧小平的權力轉移、尤其是軍權轉移問題，一直纏磨着鄧小平本人及中共領導人。本期發表的一篇退休將軍訪問錄，可幫助理解中共的這一難題。像這樣的訪問記、北大民運資料、民運人士獄中手記等，都是透析中國大陸問題的第一手資料，本刊經常獲得。我們也希望讀者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中國民聯成員黃奔先生的歸國觀感，樸實無華，很值得一讀。

喜訊傳來：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已出版發行，英文版也很快面世。請您——我們的讀者將英文版即將出版的消息告訴您的外國教授和朋友，并鼓勵他們訂閱。

下期預告

下期將有重要內容：中國之春在美國控告人民日報案。在中共保守派大將鄧力群任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其主管的人民日報，曾在一九八四年底發表文章，惡毒攻擊和誹謗中國之春。其內容之捏造，語言之惡毒，已構成誹謗罪，并對中國之春造成傷害。由于人民日報在美國有出版和發行的業務，故也觸犯了美國法律。中國之春為正視聽，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法院控告了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我們認為，這是對中共宣傳部門中以鄧力群為首的保守派的一大打擊。

我們原來不打算向新聞界披露此案，因這是一樁嚴肅的法律案件，不是新聞事件。但我們不得不佩服西方的新聞自由和新聞記者的能量，他們終於把這件事挖了出來，在香港和美國都進行了報導。因此，我們決定公佈全案。

人物專訪

55 ■專訪黃奔先生談歸國觀感：我對民運更加充滿信心（本刊記者）馬臻燕
60 ■專訪司馬璐先生：實行民主，振興中華！（大陸新移民）李目

報導

63 ■千家駒說：經濟改革已告停頓！（本刊責任編輯）馳遠
25 ■萬里感嘆經濟改革已經失敗（中國大陸研究生、澳洲）易水霞
94 ■杜克大學舉辦「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討論會（本刊編輯部）

民運報導

64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68 ■中國之春香港成員在反核風潮中的活動及意見（香港）中國之春成員
76 ■駁駐西德大使館胡參贊對中國民聯的誹謗（中國大陸留學生·西德）林榆瓊

國內快訊·時評

70 ■從具體的政治改革做起（本刊責任編輯）張森
74 ■一黨專政及其它（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朱彩章
13 ■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中國大陸留學生）白紅

台灣專欄

80 ■維護台灣人的尊嚴（台灣旅美作家）劉添財
82 ■司法真的死了嗎？（台灣研究生）凌天鳳
84 ■從林正杰到康寧祥——也談林正杰案（中國之春經理）林樵清
86 ■關於台灣民主化的兩個問題（台灣旅美學者）楊雲

香港專欄

88 ■香港的燈火和命運（作家·香港）寒山碧

經濟論壇

91 ■中國按人口計算的平均國民收入（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

文藝園地

17 ■海吟（詩）（澳洲）陳紓塵 36 ■我是不朽的（詩）（國內）林島
44 ■恐懼（雜文）（國內）孤子 62 ■玉之歌（詩）（國內）余青
69 ■美國月亮和中國月亮（詩）（中國大陸留學生）穆望華
73 ■畫夢的夜訴（詩）（中國大陸旅歐詩人）嵐之凝
77 ■阿城在紐約「砍大山」——哥大與阿城談話會記（本刊記者）秦俠
95 ■在美加旅遊的感觸（雜文）（華僑）周立仁
96 ■中鋒在黎明前離去（續編）（小說）（中國大陸旅美作家）韓秋霞

讀者·作者·編者

兩點意見

一、在國外的各界人士、留學生對國內各種具體制度（如幼兒教學、公費送禮、住房分配、人事管理、科研體制等等）都有各種看法，也不乏切實可行的具體改革方案，但限于水平、時間、精力又寫不出面面俱到的長篇論述文章。故我建議中春開闢一個專欄，發動大家踴躍投稿來提各種合理化的建議，多則數千字，少則一、兩句，無任歡迎。若專欄內所提各種意見能為國內當局採納、參考當然最好。退一步講，也可作為留學生、出國人員交流具體管理措施的園地。不可否認，將來大家回去後，不少人是當官的，或許這些留在頭腦中的方法能用得上。

二、比起政論及其他園地來，中春的文藝專欄令人不能滿意。我總覺得作品的真實感不夠。有些作者不是深入發掘生活，而憑想像虛構。我更喜歡看國內近年的文藝刊物，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或藝術性都非常好，毫無違命文學或「為中心服務」的味道，值得海外的作家

學習。另外，建議作家對自己不太懂的專業知識，在必需涉及的時候，多請教內行。例如卅二期的短篇小說《老處女》，裏面一段搶救垂危腦外傷病人的描寫就錯誤百出（昏迷的顱內血腫是必需開顱手術的，耳垂採血也絕不夠輸血之用，等等）。

大陸留學生李申

要客觀地去瞭解國民黨

我是台灣來美的留學生，也是中春長期訂戶，我覺得許多大陸學者（包括貴刊編者在內），對台灣當局的瞭解和批評常犯——而非每次都犯——「絕對與主觀」的錯誤。我們對一個政黨與政府的瞭解與批評，必須建立在它過去的背景，及現在表現之上。許多人對台灣的國民黨的瞭解是由中共灌輸的，或者所瞭解的是三十年代，一個囊括性政權的政黨，其腐敗性是可知。從歷史上看，滿清末年的腐敗吏治與封建思想，加上民國初年的內亂，大大地降低了民族的素質，人民的道德觀與政治觀均沒落。一旦皇權不存，大家都想加入獨大的國民黨，以分享政治利益（除了有理想、有血性的人不加入，反而去反對它）。在這種人民素質低落，入黨觀念不正的時代裡，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怎麼能不腐敗？它的丟掉大陸也是必然的，因為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反它，惟有小人有官僚思想的人才去加入。這正像戴季陶先生早年所說的，「共產黨內的人才多於國民黨」。

但三、四十年代的國民黨的腐敗，並不表示今天的國民黨還是一樣，如果一樣，何以國民黨三年內丟掉大陸江山，而在台灣却屹立三十年？如果今日的國民黨仍是如四十年前的一

樣腐敗，何以區區台灣外匯儲備大超大陸？若硬說一樣，我們是否能說五十、六十年代毛澤東所統治的中國大陸與七十、八十年代鄧小平所統治的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也許有人說早期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腐敗不是時代的現象，而是個本質。試看，接替國民政府的中共政權，又將中國治理得如何？

總結地說，我希望海外的知識分子，不論出身何政權，在批評時，要避免「家醜不外揚」的心理和「二分法」的意識型態。更要把批評建在時代與歷史背景的分析上，這樣批評才不致流於主觀與絕對。

台灣留學生陳天虹於密州

勿牢騷滿腹

我有一個人意見，與貴刊協議。讀遍一些刊在貴刊上的有關評毛及大陸政見、政況的文章，覺得有些偏激。個人認為評毛仍應從歷史、哲學、政治的基點出發，如某些歷史錯誤，也並非毛一人能造成。毛是一個政治人物，並非一個大魔頭。功過多少，歷史評定。我是不喜歡那種一邊風的文章。另些文章牢騷太甚，大多仍纏於文革浩劫之中。今天的中國人更關心今天的變化和明天的命運，而無暇回顧昨天。昨天的教訓抓得太牢，恐怕今天會錯過前進的大好時光。我原也是牢騷滿腹，怨這、罵那的人，但今天得知這並沒有前途。而關鍵則在於如何去改、去改變它。中國是蒼老、貧窮、落後、愚昧、夜郎自大，可它就像我們年邁而守舊、糊塗而頑固的老祖母。你有時怨她、恨她，但你更多的仍是愛她。我真心希望能讀到一些積極、懇切、給人啟發與振奮的好文章，而不總是牢騷滿腹！

直言不諱，請包涵！讀者 子王問

為他們聲討

徐文立，因為「中春」發表「獄中申辯」，處境更為困難。希望你們能聯絡一些有法律知識的人，或者有名的律師，從「法制」觀點，也可以用中共制訂的「刑法」，批判中共對民運人士的迫害。總之，應為在獄中受難的民運人士製造有利的聲勢！為他們聲討！

滬民於南美

看了「戮嬰」一文的感想

看了卅七期中春鮑福的「中國大陸的強迫墮胎和戮嬰」一文，真感到傷心，遠比聽到中國前些時的反精神污染及滅罪運動更傷心。

中國共產黨或世界各地共產黨雖然以殘酷專橫出名（西歐的例外），但同樣以尊重女性出名，因一般人類學家公認父系制和私有制是同期出現，若提倡社會主義而不尊重女性便矛盾。尊重女性其中一大要素是「婦女生育自由」如墮胎及避孕合法化，國家或丈夫不能把她們視為生育機器——因孩子是「她們的」，她們自有權決定要或不要。共產黨因提倡女權出名，在落後右派軍人專政國家便往往被少女視為童話中救她們的騎士。但羅馬教皇和伊拉克把墮胎和避孕列為非法，要求女性為國家生育。我懷疑，共產黨是否在表面上叫女權至上，但是其實和羅馬天主教及伊斯蘭教一般壓迫婦女。

中共把婦女視為機器或「可蘭經」上的「耕地」，以前要她們大量生產，現在要減產；婦女還有什麼尊嚴。要她們生便生，不生便不

生，形同兒戲！

琳 姆於香港

「民族尊嚴」與「國際正義」

看了貴刊三十八期介柳先生與袁大戈先生有關韓戰的論戰，文中提到了「民族尊嚴」和「國際正義」。我認為「民族尊嚴」必須以是非正義為標準。袁文中的「志願軍消耗過鉅不得不停戰」及介柳文中的「志願軍過江後，在軍事上迅速地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戰爭三年，美軍多次組織反撲，但均成效不大」等語，均不是有關「民族尊嚴」的斷語。中共的參與韓戰，是否真的為了「民族尊嚴」而自衛？是否真的為了「國際正義」？如果這二個問題的答案均是肯定的，那麼中共不是侵略者，聯合國的譴責中國（共）的決議也就不值一提。

再談，中共是否為了自衛而參戰？這要看中共是否先秘密派軍入韓而定。若中共在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官方宣告作戰前已派有軍隊入韓，而引起美軍的進攻東北，在中朝邊界的駐軍，那麼中共的正式、公開的參戰並不是民族禦侮戰爭。試想，有甲、乙兩方在爭鬥中，我們在暗中資助一方，踢另一方一腳、打一拳，惱了對方公開的打我們，那麼我們的公開反擊是否是自衛呢？不是，這是咎尤自取，怪不得他方。若說中國是基於「國際正義」而出兵？這要以「被支持的一方是否好」而定，若中共支持的北韓政權的確優於南韓，那麼中共的支助北韓以統一全韓，亦可謂是出於「國際正義」，而三十多年來，事實證明南韓是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南韓的國民生活水準超過了北韓的人民。如果這些事實不能證明南韓優於北韓的共產政權，而讀者硬是基於「民族尊嚴

」而認定共產政權與制度是優於其他形式的政權與制度，那麼，南北越統一後，中共的懲越戰爭作何解釋？

我希望海峽兩岸來美的知識份子都能客觀的了解，分析過去的、現在的、及將來的中國問題，不要感情式的為自己出身地的政權辯護，自己出身地的政權是好是壞，並不是我們出身高低的標準。「英雄不怕出身低」。身在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擁有太多的自由，若選不能理性地、客觀地了解過去，分析歷史，又怎能為未來建立一個有理性，有正義，有尊嚴的中國？

香港留學生陳宏

我們的困境與窘狀

我來美近半年（自費公派），感受太多。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處在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環境中，常常顯出一種特別的窘態。從經濟上看，公費每月四百餘元，還爭取買幾大件回去，即使較寬裕的資助獲得者，也時時想到此地每日工資相當於國內每月工資，因而省吃儉用，顯得過於寒酸。從語言上看，大多數進修訪問學者都有困難，因為在中學與大學階段學校裏只教俄文，因此與外界接觸甚少，囿於中國人的小圈子裏。而今，又由於國內停辦件讀，這些四十歲上下的人，只能過着孤單的生活，不時掛牽家中的親人，妻兒不在身邊，使精神上添加了重負，增加了窘態。總之，日子不好過。

前二個困境暫且不提，那不是一時能解決的。值得探討的是後一因素造成的困境。今年五月停辦件讀的原因，人人皆知是怕出了國的人不回去。希望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合乎情理，

但不准家屬隨却大悖情理。在美的留學生來自東南亞、非洲和南美洲的不少，由于生活工作條件的差距，在部份人中會產生想留在美國工作的願望。但這些國家並未採取扣留家屬、逼迫他們的留學生返國的做法，可能的原因是：想在美國工作生活並不是都能做到的；扣留家屬更涉及到人權與人道問題。爲什麼唯獨我國，却在五月份作出這一不明智的停辦伴讀的決定呢？這反映了對人權與人道主義的漠視，反映了政策隨時多變。想不通的是，放家屬伴讀，一不花國家的錢，又使學者在生疏環境中緊張學習工作之餘，能在家庭中享受基本天倫之樂，恢復精神，與人與國有利，何樂而不爲。即使少數人本不想回國只是由于家屬扣留而迫使回國，他們回國心服不服，能否盡力服務？更不要提少數人由于反感而「反迫使留在美國」了。這一比例數值得作一民意測驗。再從道義、政治上造成的損失，更不是多了幾個回國的人能補償的。

大陸研究生明志於美國

何來聲明？

編者先生：貴刊第卅九期九月號第七頁講到有關外蒙古的問題：「外蒙於一九二一年在蘇俄卵翼下宣布獨立，當時蔣介石曾公開聲明不承認外蒙獨立，表示國民黨政府態度……」查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是北洋政府時代皖系直系當政，蔣介石那時大概還在上海交易所作經紀，何來乎發表聲明？俄國侵略外蒙從康熙年間就已開始，其間錯綜複雜一言難盡，如果我們把失去外蒙的責任一切全怪在毛、蔣、袁或甚至慈禧太后一個人的身上，那是宣傳戰馬街的辦法。共產黨顛倒黑白指鹿爲馬；貴刊編者大部

在大陸成長受到蒙蔽情有可原，但是現在既然已經身在國外就不妨乘此機會多多瞭解歷史真相。

陳不知於密西根

× × × × × × × ×

外蒙於一九二一年在蘇俄卵翼下宣佈獨立。蔣介石則在南京政府成立後的一九二七年發表聲明不承認其獨立。

中春卅九期對此未能明察，以致引起誤會，在此向讀者致歉，並向陳不知先生的指正致以謝意。

——編者——

察其言 觀其行

看到中春第三十八期社論及中共改革派關於發揚民主的論點，如「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改革如不同時伴隨政治改革，經濟就難以發展下去」，認爲目前「傳統的理論在束縛着人們的手腳」，「壓抑着創造力的發揮」等，想發點議論。

如果你這樣公開表達對共產思想抱懷疑態度的論點，在八〇年前會被當權派判成什麼反革命份子，給送進監獄。民運份子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等不是由於說了類似的話到現在仍然被關在黑暗的牢房裏嗎？

看來，關鍵不是發表論點的先後問題，而是發表的身份問題，就像遇羅錦女士出國難感上說的，把她批鬥投進監獄的是這些人，而把她批准出國的還是這些人，他們做的事說的話又怎麼能信得過呢？

現在的問題不僅只是製造輿論的問題，而

是行的問題。如果改革派有了輿論的基礎，而仍然毫無釋放魏京生等民運人士的誠意，或仍然禁止講求理性的民主刊物如「中春」、「爭鳴」、「九十年代」、「百姓」、「新天」等在海外發行的刊物不准許在國內發刊或流通，那麼他們就不易使中國人民信服。過去老毛之所以把中國帶進前所未有的專制獨裁的死胡同，就是說的跟做的是循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才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文革災難，現在已經覺醒的人民，可不能再隨便盲從了。

中國有句俗諺「察其言而觀其行」，如果言行不符，那就證明這個政權仍然不足以信賴。

美國華僑 唐山於美國

同意你們的觀點

我們是七月份從大陸來美國留學的公費學生，在舊金山下機時，一個美國人曾向我們散發了你們的刊物，但馬上被領事館的人強行要走了。儘管這樣，依舊有些人保留了你們的刊物。我們來到本市後，曾在中文書店斷斷續續買到幾期，但書店說，這類刊物賣得很快，加之我們沒時間去書店，所以很難看到其它幾期。

總的來說，我們同意你們的觀點，支持和贊賞你們爲中國的民主運動所做出的行動和貢獻。從你們的刊物中，我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們也願意爲中國的政治民主、經濟的繁榮、昌盛而奮鬥。

——你們的同志於美西

我們懷念毛主席

我們反對胡掌軍

——一位退休將軍的情懷與牢騷

(北京) 韓思強

採訪者按：一九八六年八一建軍節這天，我有機會與一位退休將軍進行了一次直率的交談，涉及胡耀邦接班等一系列問題。雖談得不深入，但該位將軍的言論頗具代表性，故邊談邊記，並整理成此文。文中有誤，由本人負責。我要提請注意的是，該位老將軍思想有些混亂，我儘量整理出一個頭緒。他的談話有幾點值得思考：

- 一、對胡耀邦接管軍權表示憂慮；
 - 二、對鄧小平的改革有很多不理解之處；
 - 三、對社會現狀不滿；
 - 四、對毛澤東愚忠之情不改，等。
- 雖然這位退休將軍滿腦子漿糊，但就是這批人，是恢復派存在的基礎，值得我們深思，也值得高層改革派們的深思。中國的改革，說難的確很難，有這麼一批難以推動的老傢伙；說容易也容易，有一代對原有腐朽價值觀破滅而尋找新出路的青年。如何利用新一代的力量，值得高層改革派深思。我願此篇膚淺的採訪，能使改革派們頭腦清楚一些（但願他們能看到这篇東西）。

懷念毛主席

▲問：今天是八一建軍節，下月九月九日是毛主席逝世紀念日，您有何感觸？

▲答：感觸很多，一言難盡，不知從何談起。

▲問：先談談您對毛主席的看法吧。

▲答：我十九歲參加紅軍，可以說，一生追隨毛主席。沒有毛主席號召窮人鬧革命，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們家今天的一切。和我一道參加革命的，都是農民，有廿多個。他們多半在戰爭歲月中犧牲了，搞革命，總要有人流血犧牲。我們幾位幸運地留了下來，後來，最低的也當了師級幹部。現在老了，孩子們都大學畢業，我也有了孫子。幾位老戰友，都有幸福的晚年。不愁吃、不愁住，出入還有汽車。這些，在我逃出村參加革命時，是不敢想像的。要是不跟着毛主席南征北伐，我說不定早就餓了野狼了。你們年輕人，能上大學，有好工作，生在福中不知福。你想想，沒有毛主席，哪有我們的今天，哪有你們的今天？

你們沒有受過苦，不理解這一點。

▲問：有人說，中國不出毛澤東，也會出「毛澤西」，反正總要有人領頭幹，能把一切都歸功於毛澤東嗎？

▲答：當然大家——我是指參加革命的，都有功。但是，有能力領頭的，却不多。王明會打仗嗎？陳獨秀會打仗嗎？劉少奇會打仗嗎？只有毛主席才會打仗，他是真正的軍事家。你們沒打過仗，體會不到毛主席的英明。在毛主席指揮下，我們很少打敗仗。

▲問：鄧小平不會打仗嗎？他俗稱小諸葛。

▲答：他是二流的，而且是在毛澤東和劉帥（劉伯承）的指揮下。

▲問：您對毛主席真有感情。

▲答：當然。老同志們大多對他有感情，我仍然懷念毛主席。你們年輕人恐怕體會不到，沒挨過餓的人是不知五穀香的。

▲問：毛澤東也犯過大錯誤，他也整了不少跟隨他多年的老同志。

▲答：毛主席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誰沒犯過錯誤？他的確冤枉了一些老同志。但是，這事想開了也就沒什麼。哪個家長沒冤枉過自己的孩子，沒打過自己的孩子？毛主席最後還是把大部份老同志保了下來。

▲問：那您認為毛澤東犯了什麼錯？

▲答：最大的錯是重用江青。他娶江青無所謂，誰不愛女人？但女人不能干政，尤其不能明目張膽地干政。天下最毒婦人心，江青這個人腦子裡充滿了對老幹部的仇恨，野心又大，想做武則天。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但話又說回來，毛主席的錯誤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他。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把主席包圍了、隔絕了，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些人與主席不同，他們是真正的人。

仇恨四人幫

▲問：所以，你主張打倒四人幫？

△答：不但要打倒，還要千刀萬剮，我們打下的江山，讓他們糟塌成什麼樣子？

▲問：你的老戰友、老同事們，都恨四人幫嗎？

△答：都恨。沒有江青，毛主席的晚年會好得多。你看，我的老伴多賢慧。

▲問：你看四人幫還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嗎？

△答：沒有。他們再當權，我豁着老命也和他們拼了。

對華國鋒感情複雜

▲問：你對華國鋒怎麼看，他是打倒四人幫的功臣。

△答：打倒四人幫主要是葉帥（葉劍英）的功勞，華國鋒、汪東興只是執行者。華國鋒這個人嘛，人是老實忠厚，但搞軍事、搞政治恐怕不行。他手太軟，在中國搞政治手軟了不行。我記得抗戰時，我們營有個參謀，我們懷疑他是國民黨的釘子，我剛有懷疑，就把他斃了。後來，我們的一個兄弟營神秘轉移時，受到偽軍（可能是國民黨軍）的阻擊，損失很大。他們那裡肯定有好細。我們營從未出現這種事。所以，政治是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的問題。華國鋒不懂這

套，眼看着鄧小平站起來，又強起來，眼睜睜地被鄧小平打倒。華國鋒大權在握時，一狠心把鄧小平除了，也就沒事了。

▲問：那你擁護華國鋒做主席嗎？

△答：四人幫剛垮台時，我擁護，真心地擁護，而不是像鄧小平那樣的假擁護。現在嘛，難說。華做名義上的主席可以，但實權要交給一批懂政治、懂軍事的人。

▲問：你認為，華國鋒有可能復辟嗎？

△答：難說。在中國，什麼事都有可能，什麼事好像又都沒有可能。我和華不認識，我有一個好朋友和他認識。聽說，華很不服氣。但我可以說，華再次恢復到黨主席的位置，可能性比當前鄧小平的復出，要困難得多。

對鄧小平不滿

▲問：看來，你對鄧小平挺有看法，你和你的老朋友們擁護他嗎？

△答：我參加革命時，只知道擁護共產黨。抗戰以後，我擁護毛主席。我一生中，就擁護過這麼一個人。鄧小平本事不小，但他比起毛主席來，就好像星星比月亮。毛主席雖然犯過錯誤，但這些錯誤就像太陽上的黑子。鄧小平全部功勞加起來，不及毛主席一個功勞的一點點。另外，毛主席一貫表裡如一，他要整人，也要告訴你他要整你。鄧小平這個人，我猜不透。

▲問：鄧小平打仗還是有一套吧？劉鄧大軍的幾個硬仗聽說都是出於鄧小平的策劃。

△答：真正的策劃家和軍事家，還是數毛主席



鄧小平：政策能否延續，整千胡耀邦能否當軍！

。劉鄧大軍，只不過是毛主席棋盤上的一個棋子。除了毛主席外，另一個能打仗的是林彪。林彪的「奔襲」、「阻擊」戰術，是很傑出的。但林彪還不能算是戰略家，鄧小平更算不上戰略家。劉鄧大軍的主要戰役，是毛主席部署、劉鄧親自指揮的。劉伯承是與林彪不相上下的軍事家。現在，劉帥臥床不起，鄧小平坐在龍椅上，就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是不能服人的。

▲問：那你不贊成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

△答：我還是贊成他當。數數老一輩的人，還是鄧有資格。如果五幾年授軍銜時，再多一個元帥，那就是鄧小平，他是元

帥級的。但他不是毛主席那一級的戰略軍事家。

看不起胡耀邦

▲問：鄧小平有意將軍委主席一職傳給胡耀邦，你的意見如何？

△答：胡耀邦？他怎麼配？他有什麼資格？軍委主席是海陸空三軍統帥，不是鬧着玩的。當這個統帥，要非常有城府，要胸中自有雄兵百萬。你看過一幅畫叫「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嗎？畫的是毛主席在密洞裡，手中捏着煙卷，目光凝視地圖，整個中國就是一個棋盤，完全裝在他的胸中。胡耀邦有那個勁頭嗎？他抽起煙來，都像個小醜。聽幾個老戰友講，他每次出國都出幾次洋相，把中國人的臉都丟光了。如果鄧小平讓他做軍委主席，那將是鄧的最大錯誤，不能拿幾百萬軍隊開玩笑嘛！

▲問：胡耀邦的思想蠻開放的，說不定能開創出新局面。

△答：做軍委主席是指揮全軍打仗的，要的是軍事才能。講思想開放，我的孩子們比他思想還開放。講軍事才能，我大孩子是軍校畢業，戰略戰術理論很有一套，他還參加過中越戰爭。那麼，我的兒子是否有能力做軍委主席呢？我看也沒有，頂多做個師長。軍委主席要戰略家，大戰略家。

▲問：那你反對鄧小平現在卸任軍委主席？

△答：鄧小平做軍委主席，正符合中國的一句老話：矮子裡面拔將軍。他畢竟是個將才。鄧小平明白，他生前要把軍權合法

地交出來，以防身後的奪權之亂。但是，交權要找對人才行，交錯了人，反而導致混亂。我們要對黨和國家的命運負責，鄧小平也應對黨和國家的命運負責。我和一幫老同志的看法是，暫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就不要隨便交，先由鄧小平頂着。等鄧百年之後，再開軍委會議，大家自然地推舉出一位掌兵的人，這樣可能會更穩些。如果鄧小平硬傳給胡耀邦，下面不服，必成隱患。到時，下面硬逼着胡耀邦下台，交出軍權，這樣會出亂子的。我們要為黨負責，為國家負責，而不是為鄧小平負責，為胡耀邦負責。毛主席帶領大家打下江山，成功來之不易。

▲問：胡耀邦前些日子重走了一段長征路，也頻頻出席一些軍事會議，看來他接任軍委主席一職，已經底定。人無完人，胡耀邦也不是個完人。但他畢竟是個老紅軍，有過多年的戎馬經驗。

△答：要講戎馬生涯，我和我的很多位老戰友，都比他資歷雄厚。我也不是主張論資排輩，我主要講軍事才能。統領三軍，要有大將之風，要有「氣吞萬里如虎」的氣質，胡耀邦有這種氣質嗎？

對胡耀邦的幹部政策不滿

▲問：胡耀邦這幾年很注意在軍中培養人才，他好像已在軍中建立了一定基礎吧？

△答：他是提拔了一些人，這正是他遭到很多老將軍們抵制和反對的原因之一。舉一個例子吧！瀋陽軍區司令員劉精松是胡耀邦提拔的，胡耀邦有意把他樹為軍中

第三梯隊的樣板。劉精松憑什麼當上大軍區司令員？他有什麼戰功？他有什麼戰略水平？他有什麼服眾之處？劉精松憑過去是胡耀邦的軍中下屬。胡耀邦被鄧小平硬行安排當上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央秘書長時，劉精松不過是個瀋陽軍區的師級幹部。劉每次到北京，都給胡耀邦送禮，什麼好大米、香油、高級香烟、淞花江鱸魚、人參，凡東北的特產，他都送。他在東北到處吹噓他曾是胡耀邦的軍中下屬。果然，拍馬屁有效，很快提為軍長，又一升成為瀋陽軍區司令員，取代了李德生，神氣得不得了。請問，東北駐軍有哪個軍長服氣他？當司令的，不讓人服，怎麼指揮打仗？只憑拍馬，就能上升，這成什麼體統？中國有句話：無功不受祿。歷史上，凡不論功排位行賞的，都會鬧出亂子。你知道毛主席當年怎麼用人？許世友反過毛主席，還打過毛主席嘴巴子，可毛主席不計較，重用他。許世友在延安對毛主席說，給我幾十人，我去開闢一個根據地。主席答道，人少了不行，我給你一千人。許世友真能打仗，他立了不少戰功。你看看主席的氣魄！他是集四方豪傑為我用。胡耀邦就知道用劉精松這樣的人，那怎麼行？

▲問：那你心目中，誰有資格接任軍委主席？

△答：我沒有仔細思考過，反正我們這班老朋友都感覺胡耀邦不合適。建國後，我們也打過幾仗。抗美援朝，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珍寶島，懲越戰爭，有不少有戰功的人，何愁沒有人才？我主要反對任人唯親，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教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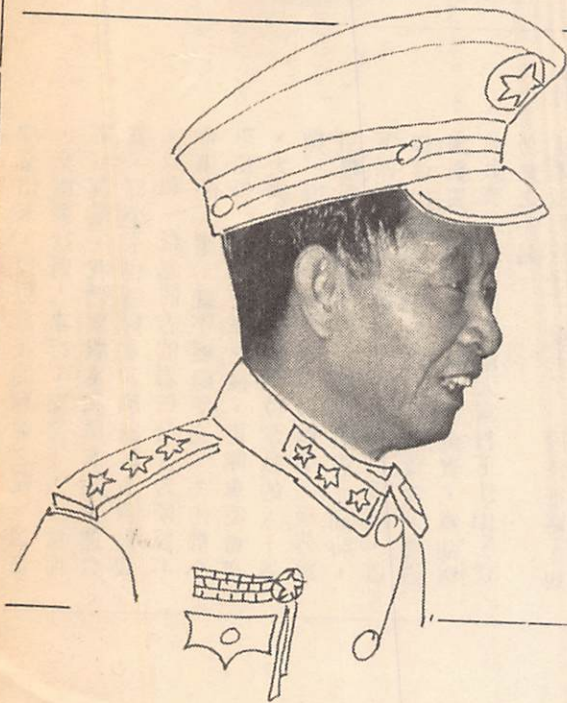
對經濟改革認識糊塗

- ▲問：那你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怎麼看？
▲答：改是好的，但看怎麼改法。首先，我覺得不能否定過去毛主席帶領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舊中國，我們連個洋釘子、手電筒都進口，現在我們能造飛機大砲，能造原子彈，這不簡單。你鄧小平領導三十年，能有這麼大成就嗎？恐怕不一定。當然，我們的經濟發展有缺點，因此，要改掉這些缺點。所以我說，改還是好的。
- ▲問：你覺得哪些方面改得好？
▲答：農村改得不錯。去年，我回老家看了看，鄉親們說，吃穿比以前強了。但也改出了很多問題。比如，一些農民不安心種地，成天搞投機倒把，只知道抓錢。農民的本份是種地嘛，大家都去跑買賣，誰來種糧食？所以，應該有新措施，這樣改下去，不計後果是不行的。
- ▲問：城市經濟改革呢？
▲答：聽一位在銀行工作的老朋友講，城市經濟改革搞得夠亂的。
- ▲問：城市經濟改革後，您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嗎？
▲答：我兒子家添了電冰箱，是日本貨。我和老伴沒添置什麼東西。但我老伴總是抱怨，現在吃的東西貴得出奇，買斤牛肉要兩塊多。
- ▲問：現在中央又提政治改革，您怎麼看？
▲答：先搞好經濟改革再說吧！鄧小平像狗熊掰棒子，掰了第二個，丟掉第一個。經濟改革搞得亂哄哄的，局面沒搞好，還急着搞什麼政治改革？

對第三梯隊不放心

- ▲問：您對胡啓立有什麼看法？
▲答：不了解這個人，只知道是胡耀邦提上來的。既然是胡耀邦的人，他接權和胡耀邦掌權會有什麼兩樣？
- ▲問：李鵬呢？
▲答：我也不認識這個人，只是電視上看而已。聽說他是周總理的養子，去蘇聯留過學，人挺穩重。
- ▲問：您那些老朋友對李鵬有好印象？
▲答：談不上什麼好印象。大家有時在一起喝酒、聊天，議論議論而已。我們總對這

立此存照：總書記穿上新軍裝。



懷念五十年代

- 幫人不怎麼放心，他們治不好國家。
- ▲問：那您怎麼看趙紫陽這個人？
▲答：他嘛……，這個人很聰明，比胡耀邦穩重。
- ▲問：您擁護陳雲，還是擁護鄧小平？
▲答：我說過，我這輩子就擁護過毛主席。
- ▲問：您對形勢有什麼總的看法？您對未來樂觀嗎？您參加革命時，是懷着革命理想投奔紅軍的。您認為，您當初的理想實現了嗎？
▲答：當初的革命理想嘛，有些已經實現了，我剛才說過，現在比舊社會富強多了。我覺得，革命成功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最好的時期。那時，大家一條心建設國家，鞏固國防。文革後，奸臣當道，他們上瞞毛主席，下欺老百姓，搞得國不成國，家不成家。就拿我家來說，我的每個孩子都有一套自己的哲學，我說的話，簡直沒人聽。中央的指示、號召，他們更不聽。我們像他們這麼大的時候，滿腦子的革命和理想，他們是滿腦子的小算盤：有的想發財，有的想出國。像你這樣關心國家，和我談談正經事的年輕人，可真不多。我的幾個孩子，從來不和我談這些。他們嫌我們老了，有時還諷刺我們兩句，說我們老糊塗，好像要專我們的政。我和幾個老戰友聚在一起就抱怨，國家好像沒了個體統，誰說都不靈。解放初，毛主席說句話，全國執行，全軍執行，全國一盤棋，生龍活虎，幹什麼都有奔頭。現

在，全國似乎沒有一個主心骨。大家像一群無頭蒼蠅，橫衝直撞。我不常出門，出門怕被車撞着。到軍區招待所，服務員們也是吹鬍子瞪眼，不知哪來那麼多的氣。我回想一下，以前解放區不是這個樣子呀！解放初期也不是這個樣子呀！咳！世道怎麼變的呢？

▲問：那您想過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嗎？

▲答：都怪一幫奸臣！一幫奸臣！

▲問：四人幫是奸臣，鄧小平不是吧？他是受四人幫害的。

「鄧是赫魯曉夫」

▲答：四人幫，鄧小平，都是一路貨。鄧小平不是奸臣嗎？他就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主席以前說過，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身邊，這句話沒有錯。他把毛主席的東西都改了，今天改這個，明天改那個。你還記得毛主席六七年（還是六六年？）的一封信嗎？毛主席在信中说，他死後，右派是一定翻案的。毛主席是真英明，他真是神機妙算。現在不都是統統翻案了嗎？可是，毛主席在信中也說，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短命的。

「牢騷滿腹」

▲問：您的意思是要推翻鄧小平了？

▲答：你不要上綱上線，我是牢騷話。鄧小平做軍委主席，我沒說不同意，總比胡耀邦強。

▲問：那您覺得應該怎樣才能振奮人們的精神

，把人們的精神面貌恢復到解放初期？

▲答：我已退休，這是鄧小平他們的事。反正我認爲，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統一的思想，要有個權威，要有統一的政令，要有一致的步伐。國家這樣鬆鬆垮垮地下去，是不行的。

▲問：您退休在家，都幹些什麼？

▲答：我現在成了「四看」將軍：看書、看電視、看醫生、看朋友。

▲問：如果國家需要時，來征召您，您會重返

政壇或軍界嗎？

▲答：退休了，挺清閒。不願再費那麼多心思了。但如果國家有戰事，我還願出征。我打仗出身，只會打仗。我沒有什麼復出的問題，我還保留着軍籍。我願穿軍裝就穿軍裝，願穿老百姓的衣服就穿老百姓的衣服，我覺得這樣很自在。

▲問：您對兒女們還有什麼寄望？

▲答：他們都有了工作，不愁吃不愁穿的，我不再掛那麼多的心了。

●時事評論●

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白紅

八月五日，中國大陸廣東省公安廳負責人發表談話，對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僑胞重申，凡過去有反對過中共言行的人，一律既往不究。只要回國後在探親訪友、遊覽觀光、貿易經商過程中不搞間諜破壞活動，一律表示歡迎。這一政策和態度值得讚賞，對中國大陸來說確是一大進步。

以往毛澤東不僅在國內把人民劃分爲「左、中、右」，而且擴大到國外，把國際上大大小小的國家、海外僑胞、港澳同胞也依其對中共的態度劃分爲「左、中、右」，這種以「階級論」爲出發點，以自我爲標準的形而上學的劃線政策，把不少國家推向自己的「敵人」一邊，把海外千千萬萬人民拒於國門之外，不能重返故土，瞻覽祖國的錦綉山河，與親人團聚，使海外人民、僑胞成了海外孤兒，造成天怒人怨，殊爲不智。

海外人民、僑胞都是炎黃子孫，都具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他們愛祖國愛人民，他們儘管反對過中共及中共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特別是在土改中，中共傷害了不少華僑家庭，把華僑在國外做牛當馬積賺的一點財富統統當地主的財產沒收了，把華僑家屬當地主進行殘酷的鬥爭，僑胞表示不滿，這是理所當然的。華僑反對中共不等於他們不愛國，中共把黨和國家混爲一談，認爲反對中共就是反對祖國，這是極端錯誤的。台灣國民黨人和台灣人民同樣是愛國者，不能認爲由於他們和中共敵對就認爲他們是「叛國」，這些人同樣應該受到歡迎。

中共不是一條「要團結和自己不同意見的人」嗎？希望中共把這一條對所有的人都實施，不僅對中國人、對外國人亦應如此對待，再不要人爲地劃分什麼「左、中、右」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慶祝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

●日本各界友人舉行祝賀酒會●

中國之春日日本語版選集創刊號

在東京出版發行

報導

(中國之春駐日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黎音

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籌劃和準備，「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創刊號)已於九月十六日在東京出版發行。

「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是為方便日本讀者閱讀和研究「中國之春」雜誌而專門出版的不定期日文刊物。每期選集中將翻譯、選編一些有重要參考、研究、保留價值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的文章，它將成為日本民眾瞭解中國問題必不可缺的媒介與益友。

是經日本友人籌集經費並主持進行的，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參與了籌備工作。

「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刊行會之事務局長為日本政治評論家龜田候治先生、編輯局長為政治評論家中島辰次郎先生，由大阪府堺市大湊書房印製、發行；同時，有數十位日本友好人士組成中國之春日文版後援會。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六

時，在橫濱中華街的華都飯店舉行了「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出版祝賀酒會。出席酒會的有日本作家、記者、評論家、政治家及其他各界人士五十多人。中國民聯總部常委姚月謙在會上宣讀了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的賀信。王炳章主席在賀信中指出：「過去，在我國的辛亥革命過程中，日本人民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正義鬥爭給予積極的支援。對此，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今天，當中國的新一代接過民主的火炬繼續向前的時候，日本人民又挺身而出，與我們並肩奮進。我們感到，中國歷史的新轉機已經來臨。」接着，他又在賀信中強調：「日本只有幫助中國走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與多元』的道路，日中兩國人民才能在未來達成持久的合作與團結，才能建立一個和平、獨立而對世界局勢穩定做出貢獻的新亞洲。」

會上，中國大陸留日學生高今航代表日本分部致了賀詞。日本友人對王炳章博士的賀信

及日本分部的賀詞，均報以熱烈的掌聲。

龜田候治先生和一些來賓也在酒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日本朋友認為：中國民聯幾年來從理論到實踐，都表明了他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他們代表了中國新的覺醒一代的意志，表達了絕大多數民眾的心聲。今天，日本國民如若期望中國走上民主化、自由化的光明道路，就應當支援像中國民聯這樣的民主運動力量。只有中國實現了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才會真正做到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才能對亞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會中，姚月謙還就中國民聯的宗旨，運作方針等問題，回答了來賓的提問。

日本友人和中國民聯代表一致表示，要共同竭力將「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堅持辦好，使它成為日本人民瞭解中國社會真實現狀，研究中國現存的實際問題，及時獲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最新信息的重要工具，努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上：在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慶祝酒會上。
 右二：龜田 候治先生（中日日文版事務局長）
 右三：中島辰次郎先生（中日日文版編輯局長）



下：在慶祝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的酒會上，出版事務局長龜田致辭（站立者）



慶祝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

中國之春日本語版選集

發刊祝辭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

《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發行後援會
 《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編輯委員會

值此《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之際，我謹代表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向對此項工作做出貢獻的日本各界友人表示感謝，并祝賀日中兩國人民在為建立自由、民主、和平、強盛和獨立的新亞洲的共同努力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過去，在我國的辛亥革命過程中，日本人民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正義鬥爭，給予積極的支援。對此，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今天，當中國的新一代接過民主的火炬繼續向前的時候，日本人民又挺身而出，與我們肩奮奮進。我們感到，中國歷史進程的新轉機已經來臨。

日本在戰後成功的經驗表明：只有建立民主政體，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富足幸福。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亞洲多數國家還是專制政體，亞洲的局勢並不穩定。已經享受到自由、人權的人民，只有協助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民建立民主政體，亞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才能實現，當今少數民主國家才能獲得根本安全保障。具有這一戰略眼光及正義感的日本人士均已體認到，如果貪圖經濟上的一點蠅頭小利，而寬容一個專制政權，終將得不償失，釀成惡果。只有支援目前力量雖弱，但具有巨大潛力的中國民主運動，只有幫助中國走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道路，日中兩國人民才能在未來達成持久的合作與團結，才能建立一個和平、獨立而對世界局勢穩定做出貢獻的新亞洲。

讓我再一次祝賀《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的出版和發行，祝賀日中人民友誼發展的新成果！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王炳章

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五日於紐約

中國之春

日文版的意義

(日本社會評論家) 龜田侯治

日中關係百年的歷史乃是悲劇之歷史。孫文先生爲了建立一個作爲日中團結之自由土地的泛亞洲共同體而獻出了他苦鬥的一生。孫文先生在神戶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有如下之敘述：

「日本是亞洲唯一的具備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之獨立國家。中國由于清朝之統治，國力脆弱而已淪爲半殖民地國家。我們要打倒清朝，建立新中國。

「新中國能否成立則取決于日本的作法。即是說，究竟日本是效仿白色帝國主義而採取霸權主義政策呢，抑或拋棄帝國主義政策：：：呢？日本如效仿白色帝國主義，與亞歐各國一同走上侵略中國的道路，則日中將不得不面臨一場生死之戰鬥。如若不然，則日中將 兩敗俱傷。

慶祝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

中國民聯日本支援會宗旨

(日本支援會全體同仁)

孫中山先生去世時，對祖國的前途滿懷憂慮，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

其後，中國經歷了動亂的歲月。不幸的中日戰爭結束後，終於導致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其專制制度剝奪了中國十億人民的自由和民權。

或許結局是日本戰敗，中國則淪爲帝國主義的餌食。」

上述意義深遠之演說，是孫文臨終之前在日本神戶向當時日本政府發出的。

然而，當時的日本政府却忽視了孫文的忠告，走上了侵略中國本土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之後，違背誓言，將農民的土地沒收，黨官僚掌握了經濟、政治、司法的一切權力。因此而抹殺了中國人原有的工作熱情，使之生活水準貧困至只有台灣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民衆喪失一切自由，淪爲中共政府的奴隸。

今天的日本政府及在野黨對此現狀視而不見，與中共專制者爲友。如此，日中兩國人民的和平共處及真正友好則難以實現。正是「中國之春」明確地提出了如何才能打破今日中國之現狀的方針。

「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不實行民主化及尊重人權。中國的現存專制制度必須改變。」

這就是「中國之春」的主張。我們完全贊成這個宗旨。我們作爲日本人，希望通過中國之春日文版的發行來協助中國的民主化，認真改善日中人民的關係，爲打破十億中國人民的困境而助一臂之力，也是對於上次戰爭，日本侵略中國之罪行的抵贖。

讓我們再回到孫文先生的論點。我相信，認真地改善日中人民的關係，將會給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帶來光明。

我們注意到，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現正挺身而出，掀起了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來建設中國新制度之浪潮。我們特此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國民聯主辦的刊物「中國之春」可比之爲今日之「民報」。其宗

旨亦是爲了大多數中國人民爭取自由。

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會歷經重重困難之磨煉。在中國革命時期，以孫中山先生爲首，黃興先生、宋教仁先生、李烈鈞先生等很多先覺志士曾流亡日本，與在日留學生等一同推進革命運動。

曾支援過這些中華志士的日本人土中，有頭山滿、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萱野長知、山田良政、純三郎兄弟、宮崎滔天兄弟、北一輝等很多人。

上述日國志士們不顧自身安危，相互支援之舉動已爲日華兩民族立下友好之碑。

中國民聯爲自由民權之戰鬥才剛剛開始。此戰實甚嚴酷，只可進不可退。因而，我們要像以往的援華志士們那樣，通過支援中國民聯，支援中國自由民主運動，來實現日華兩民族的真正友好，這也是祖先父輩多年的希望。

日中兩國同文同種，負有爲亞洲做出貢獻之任務。

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如今這個亞洲人的亞洲却受到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利害關係的擺佈。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之日本已成爲西洋霸道的守門犬。

要使今日之日本成爲亞洲的自由土地，首先要覺悟到日本自己也是亞洲的一員。要覺悟到日本也是亞洲的一員，則我們應挺身而出，顯示日本的真貌，恢復傳統美德。

要建設自由亞洲，首先中國要獲得自由。獲得了自由的中國與恢復了傳統美德、覺悟到自己是亞洲一員的維新日本成爲一體，才能對亞洲做出貢獻。

如今的亞洲正處於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瓜分世界的陰影之下。民主中國和維新日本應打破此瓜分世界的統治體制，從超越東西二陣營的立場出發，建設一個抑制戰爭危機的自由亞洲。

正是爲此目的，使中國獲得自由，日本再度維新乃是當務之急。在此，我們正是爲了整個亞洲人的自由才來支援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謹以此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支援會同仁識，田中健之執筆）

● 文藝園地 ●

我穿着海色的長裙
我漾着海的瀟瀟的風情

我懷着愛
我懷着愛

任長風舞弄着長髮
與齋虹嬌着娉婷

婆娑 婆娑

塵間的足印，只一雙
沒有麗顏，僅嚼着楚楚的才情

我噙着淚
我噙着淚

任海濤撞擊着睡靈
與碎思爭奪着理智

零丁 零丁

海聲和人生，全都枉然
最是那幻滅的苦楚

我呻吟着
我呻吟着

看殘霞痛得發紫
聽碎浪無力衰落

低哦 低哦

海啊，沒洗掉人間的齷齪
却自命心胸非凡的寬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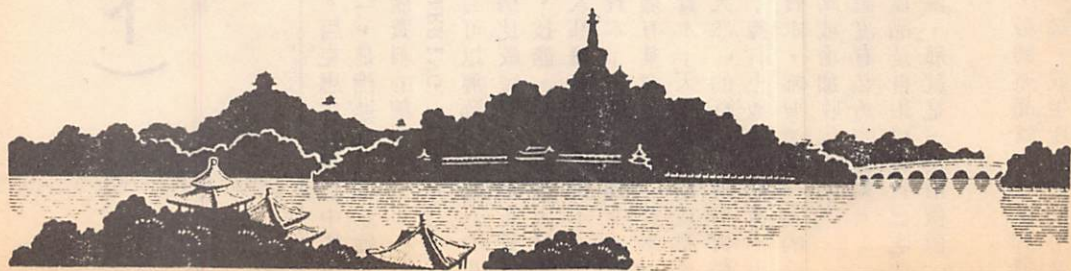
我怨恨着
我怨恨着

任狂沙摧殘着小小的我
任惡浪吞噬着從容的我

蹉跎 蹉跎

海 吟

（澳洲）陳紓塵



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下)

中國政論作家(香港) 李玉

六、共產主義基本理論的錯誤

(1) 階級鬥爭的動力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筆下的「文明史」，是指階級產生後的歷史。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只有階級鬥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顯然又是一個階級偏見。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類一直在進行着人和大自然的鬥爭、人和人的鬥爭。這兩種鬥爭是同步的，不可分割的。階級社會產生之後，階級鬥爭只是人與人鬥爭的一種表現，並不是人與人鬥爭的全部。

就我國的歷史而言，所謂「儒法鬥爭」，完全是子虛烏有，是某些人依據現實的政治鬥爭需要捏造出來的。試問：孔子、老子、墨子、商鞅、荀子、韓非、孟子的學術之爭，各代表哪一個階級？春秋戰國時的齊、楚、燕、韓、趙、魏、秦的七國爭雄，又代表哪一個階級？三國時劉備、孫權、曹操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他們又代表哪一個階級？唐、宋、元、

明、清的改朝換代，他們又代表哪一個階級？首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能解釋這些歷史現象。

第二，階級鬥爭只有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起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激烈的鬥爭往往造成社會大倒退，這在我國歷史上屢屢可見。

第三，更多時候，是統治者調和了階級鬥爭和各階級的利益，於是社會才進步發展。各階級利益不平衡，引起階級鬥爭，這時社會往往是停滯。

只有社會協調了各階級利益，人類才能更好地向大自然鬥爭和創造新的生產力，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毛澤東一股勁地推進階級鬥爭，以為那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結果反而使社會大倒退。

所以說，用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規律，不能說明歷史。

(2) 剩餘價值理論之荒謬

首先，馬克思的「資產」或「資本」定義

，與一般的概念不同。馬克思主義概念中的所謂「資本」或「資產」，是指進行放債或僱工賺取利潤的貨幣和生產資料的總稱。

但依費雪教授 (IRVING FISHER 1867-

1947) 的定義：所有可以導致增加收入的東西都是資本。這是一個比較廣泛而且是正確的概念，這裡包括知識、技能、勞力甚至天資和長相在內。也即每個人都擁有一種資本。知識份子擁有「知識」資本；一般工人擁有「勞力」資本；高級工人擁有某種「技術」資本；運動員擁有「體技」資本；天生聰明的或漂亮的女孩子，則擁有「天然」的資本；擁有貨幣的則有「貨幣」資本；擁有土地的，則有「土地」資本，不論什麼資本，都要通過一定的交換形式，才能賺取利潤或增加收入。

第二，勞動與價值沒有必然的聯繫。

除非你所勞動的產品是自用或者自己吃的，才和價值有必然聯繫，那就是「使用價值」。

但在商品社會中，勞動產品就不一定和價值有聯繫了。如投資不當，或生產的東西不合格，產品賣不出去，這種勞動就沒有價值。即使農業社會，勞動和價值也不一定有聯繫，如

糧食作物將要成熟時，突遇大風災或大水災，顆粒無收，農民的勞動就白費，就不能產生價值。

在現代企業中，要使勞動有價值，首先決定於企業的管理階層，然後才談得上勞動工人。

第三，剩餘價值是一個系統。首先，資本家要投資購置廠房、購置設備，要聘請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要組織原材料的來源，技術人員要設計產品樣式，等等。只有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了，工人才能進行勞動生產。單純的工人是不可能生產的。即使如此，生產出來的產品，還要轉化為商品，要有批發商來承購，批發商再通過零售商拿到市場上去賣，還要有消費者購買。賣得出，就有價值，賣價超過成本，有利潤可賺，才有剩餘價值。可見，剩餘價值是資本家、行政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勞動工人、商人、消費者共同創造的，怎麼能單歸勞動工人呢？

而有沒有剩餘價值的關鍵，是上層管理人員的投資方向和管理方法。一旦投資不當或經營管理不善，所有的勞動全部白費。如果說勞動和價值有必然聯繫的話，那就不能說明企業的虧本或倒閉。

馬克思是以勞動產品必定能賣得出去並且有利潤可賺這個假設為前提的。而這一點就和他的「週期性過剩危機」理論有矛盾。在「過剩危機」理論裡，他承認工廠有大批倒閉現象，廠主破產後，勞動和價值就沒有必然的聯繫了。

第四，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我們所說的是利潤。就拿馬克思所舉的例子來說：一個工人勞動六小時，物化為貨幣之後值三先令。資本家要他勞動十二小時，值六先令。另

十二先令是原材料和機器的損耗，因此產品賣十八先令，資本家暫時賺了三先令——之所以說暫時，因這三先令還得交稅、交廠租或銀行的貸款利息，這些也許要付出一先令或二先令去，資本家實際賺利潤也許僅是一先令。

任何投資都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資本家不能獲取利潤，為什麼還要冒險去投資？

古典經濟學派奠基人亞當·斯密曾正確地指出：利潤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一部份，同時也是企業主服務的報酬。但馬克思說：不對，資本家的「服務」不算勞動。若依此標準：不事生產的共產黨幹部也不是勞動者，而是剝削者。

所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即使在當時也不一定站得住腳。它只是屬於一種「煽動性」的理論而已。

第五，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今天，知識價值越來越重要，單純體力勞動的價值大大減小。

第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是以平均的勞動量——即所付出的平均勞動時間來計算的。但畢卡索只需幾分鐘時間大筆一揮的畫，就價值連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能解釋這種現象嗎？

鄧麗君在台上表演幾小時，就有上百萬的收入，是鄧麗君「剝削」聽眾的「剩餘價值」嗎？

這一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完全不能解釋。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反映的是低層次的勞動，即體力勞動。這說明他的理論受到勞力密集時代的局限。

中國某些學者說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受時代的局限，這顯然是荒唐的。

(3) 週期性危機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週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理論，倒還有一定的正確性，並且至今依然有效。

我之所以稱為「有一定的正確性」，是因為還不夠全面。他只看到一面，而沒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有「危機」的一面，也有「再生」的一面。正如老子所說：「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

大機器普遍進入生產後，生產發展特別迅速，商品很快就超過了消費者的需求，因此常常出現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但這除說明了事物是波浪式的前進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幾乎每一次的「危機」，同時也孕育了「再生」的機會。一切新技術的準備，以及設備的更新或者新產品領域的開拓，都是在這個時期準備好的。在「危機時期」，一切「不適應」的企業，自然地被淘汰了。同時新的企業却接踵而生。待「危機」一過，又會生氣勃勃，這些新企業將更快地擴大生產。甚至人們會在市場上發現從未見過的新產品，使人面目一新，使整個社會日新月異。

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這次危機並不是由於生產過剩，也不是由於市場運作失誤所造成的，而是人為的——即石油輸出國組織把石油價格大大提高，從原先每桶四美元，突然提高到二十幾美元，最高時每桶竟達三十餘美元。這一人為的提價，極大地打亂了整個世界市場，使各工業國家的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但却促進了新能源的開發以及新的省油機器、省油汽車等新技術的出現。難道這不是「再生」的事實嗎？

坦克在維護共產主義制度上，作用非凡。
圖為蘇聯坦克在布拉格。



中國馬克思主義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許瀚新先生，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週期縮短的現實說，危機以前是七年為週期，現在是三年，而「危機持續時間則在延長」。他列舉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八三年為止的危機次數：「美國出現了八次；日本出現了八次；聯邦德國出現了七次。」並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經濟危機來臨之前，經常有一個比前一個週期較繁榮的時期，但是，這種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可以說是消失了。」（見八六年第七期「紅旗」）可惜許瀚新先生忘記了，或者不願意看到：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才

空前地繁榮起來。日本正是在這「八次危機」的短短幾十年裏，成為世界上第一等經濟強國。西德亦是在「七次危機」的情況下，成為西歐最大的經濟強國。

中國世界經濟著名專家錢俊瑞，倒是說了實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恢復和整頓，在五十年六十年代，經歷了一段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那時，日本、西德等國，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的最高紀錄。」（錢俊瑞：「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第五十一頁）

自十九世紀初自動機器使用以來，發達的工業國家不知經歷了多少次的經濟危機，但總的來看，社會倒是大大進步了，從來也未出現因「危機」而使大批的工人餓死。倒是社會各階級隨着整個社會的進步而大大地改善了生活水平。

可以說，「週期性」有兩面性，而其主要功能還是給發達國家一個壓力：迫使其進行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的革新調整。——西方的福利社會以及民主法制，主要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完善起來的。週期性「危機」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新產品、新技術的「助產婆」，也是改革政治結構的「助產婆」。

(4) 關於最後一代剝削階級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代的剝削階級。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人類就不存在剝削了。

首先，馬克思主義的「剝削者」概念，大體是指如下一些人：

① 利用出租固定資產為生活來源者，如農田的出租或者房產的出租；前者指地主，後者

指房產主或店主、廠主。

② 利用生產資料僱用工人賺取「剩餘勞動」者，如城市的資本家僱用工人，農村的富農僱用農工。

③ 利用貨幣通過買賣獲取利潤者，如商人轉手買賣，共產黨稱之為「中間剝削」，馬克思稱之為「商業資本家」。

④ 利用貨幣在銀行收取利息為生者或者放高利貸者。

⑤ 一切以非體力勞動服務於資本家者，如廠長、經理階層，不管他們本身是資本家或者被僱用者，共產黨統統把他們劃入「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剝削」缺乏明確的概念。上述所列舉的「剝削」類型實際上全屬於投資形式和交易形式問題，如地主首先要投資購買土地，才能進行土地出租，房主廠主亦是如此。資本家則要投資辦企業，才能僱工，通過產品轉化為商品之後賺取利潤。商人對城鄉物資流通、促進社會繁榮作出貢獻，他投資買賣貨物，也是為了利潤。所有這些投資都要冒風險。即使剝削性質較明顯的高利貸者，入息甚豐，但風險也很大，若對方還不起，連老本也要蝕光。

按照「投資風險」理論，只要交易雙方遵守交易契約，一般來說，就不構成剝削，至多屬於「不等價的交換」（馬爾薩斯語）。

人類歷史上真正稱得上剝削的，是不投分文而謀利者，那就是權力剝削。

權力剝削最 先出現在原始社會後期，酋長們利用權力佔有他人的勞動成果，私有制也即由此逐漸產生。這種權力剝削是人類歷史上最原也是最早也是最初最原始的剝削。權力剝削的進一步發展是霸權剝削。

霸權剝削反映在古代豪強的爭霸中，誰打勝誰就可以稱王，把戰敗的部落捉來做奴隸。而奴隸對主人的奉獻，是無限的（不是無償，奴隸主要供給奴隸衣、食、住）。

霸權剝削也反映在近代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爭霸中，即通過強權掠奪他國的土地、財富和人力資源。

權力剝削在封建專制時代的延伸反映在按官職大小分封不同面積的土地，而且世襲，由該土地的耕種者無償地提供生活資料，或者用出租土地的形式收取地租。

如前所述，民間地主的土地出租或者資本家的僱工，只能說是「不等價的交換」。

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發現，那些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地方如蘇聯、中國、越南等地，却有歷史回潮的現象，掌權者借「公有制」之便對廣大勞動者進行權力剝削。

社會主義的權力剝削有以下表現：

① 高積累

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都是高積累，這些積累除用於軍事及廣大某些「基本建設」外，其很大部份是維持龐大無比的官僚機構。

② 按權分配

社會主義國家在理論上，叫「按勞分配」，但實際是「按權分配」。就中國來說，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期間，實行的是按權力等級分配的制度。官位越高，不僅薪金越多，而且享受的公款支付的特殊待遇也越多，如汽車、司機、勤務員、炊事員、醫務員、保姆等等，住的房子也越大越高級，甚至看書、看電影、吸香煙也分等級。在困難時期，中共進而規定十三級（局長或師長級）以上的幹部都有「特殊照顧」，不論糧食、食油、肉類、魚類、蛋品、茶葉、香煙、食糖、肥皂

、布票等都有特殊票證。而十四級和十二級之間，十二級和十級之間，十級和八級之間，八級和六級之間又各有所分別，四級以上則「實報實銷」，不加限制。而十四級以下至廿五級的幹部，則各地各部門自行安排，結果地方上的科（局）長、股長與一般幹部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特別待遇，唯老百姓沒人理睬。至於掌管物資實權的幹部，更可隨意分配，如物資局長、商業局長以及公社書記，甚至生產大隊書記之類，都可以隨意多佔勞動者的產品。

我之所以不說「按官分配」而是說「按權分配」，還在於：

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以後，社會上刮起了「走後門」的歪風。起初僅僅表現於物質上的「走後門」，但發展到六、七十年代，就不僅限於物資了，而是連入黨、參軍、上學、求職、調動工作等等，幾乎無事不走後門，無處不走後門，否則就什麼事也辦不成。

這時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就不僅限於幹部了，幾乎所有沾「權」的都以「權」去謀利。微小者如售貨員，由於掌握了「售貨」的權力，就利用這個權力把高檔商品、緊俏商品留下，對親友、上司、關係戶、或者頭面人物作「賒底交易」，以換取自己的額外好處。汽車站、火車站的售票員，也利用「售票」的權力，作各種對自己有額外好處的交易。甚至連理髮員也有權力可利用，對不認識的顧客，如果你不奉送上一支高級香煙，往往是一久等不理。一向清水衙門的學校教師，也有權力可利用，那就是在考試、入學、升學、轉學上做工夫。醫生，更有權力可利用了，對熟人開免費補藥，開「病假條」。至於專政機關如公安局、法院，則對遷移戶口者，「農轉非」者，申請赴港出國者，或欲求減免刑者，或明或暗地敲

榨勒索。從這時起幾乎任何沾「權」的人都利用手中的「權」為自己謀取額外的利益。

這種以權謀私現象至今仍在不斷發展。自開放之後更是驚人，利用公款套購外匯、走私、投機、經商，獲利往往十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寫張批條或蓋個章也往往能撈到數千至數萬元的額外好處。

如此充分利用權力謀私，這是社會主義公有的獨有現象，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決不能產生。

③ 公有制的寄生蟲

英國艾克頓勳爵有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這是適用於古今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由於共產黨壟斷了全國的各種權力，無下台之憂，不管誰下來誰上去，都是共產黨員，把封建專制時代的家族世襲制改成了「黨」的世襲制。這樣，握有絕對權力的共產黨，也就必然走向絕對腐化的地步。不論蘇聯、中國、越南等都是如此。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龐大無比的官僚體系中，充斥着懶官、閒官、貪官、不學無術的弄權者、屍位素餐的當權者、不理公事只想掌權者、空喊「革命」口號的政治官僚等等，這些人實際上是寄生於公有制上的新一代剝削者。

如果說，資本家與工人的「不平等交易」算是剝削，那末，權力剝削者就比資本家要壞上千百倍。資本家所賺的利潤，除極小部份用於豪華的生活享受外，更大部份是用於擴大生產規模和技術革新，這對解決就業和發展社會生產多少是有好處的。

上述事實充分證明：消滅了資產階級「剝削」之後，並不等於最後消滅了剝削階級，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仍然產生着新的剝削者，而且

竟把最原始的權力剝削用於現代世界中，這真使人大開眼界。

(5) 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是指在某一歷史階段由資產階級支配社會的制度，無疑是要消滅的。但不是工人階級去消滅，因為工人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同時也就消滅了自己本身。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種類型的既統一又對立的兩大階級如奴隸社會，存在着奴隸主和奴隸兩大階級。他們也首先是互相依存的關係，然後才是對抗關係。但不論如何對抗，他們之間任何一方都不能消滅另一方，而只有兩者同時被消滅。

能夠消滅奴隸制度的，只能是超出於奴隸主、奴隸兩大階級之外的代表更先進生產關係的地主階級。

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着貴族（或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他們也首先是互相依存的關係，然後才是對抗關係。但不論如何對抗，他們之間同樣也是誰也不能消滅誰。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農民成功地推翻舊政權的事例，一次是劉邦，一次是朱元璋。但他們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者之後，他們自己只能成爲新的封建統治者，封建制度並沒有消滅。

能夠消滅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超出於封建貴族（或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之外的代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的新興資產階級。

必須說明，不論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除兩大階級一又對抗的階級外，尚有中間階級。奴隸社會的中間階級是自由民，封建社會的中間階級是自由農民、手工業者 and 商人及自由職業或工業家。

在資產階級支配的社會中，存在着資本家、工人兩大階級一又對抗的階級。如前所述，他們首先是互相依存的關係，然後才是對抗關係。他們之間任何一方都不能消滅另一方，而只有兩者同時被消滅。

能夠消滅這種制度的同樣只能是超出於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之外的代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的新興階級。這個新興階級是誰呢？那是處於這兩大階級之中的中產階級——知識階級。

知識份子從古就有，但不能獨自成爲階級，他們不是依附於統治階級，就是爲被統治階級爭取權益。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在發達國家中，已出現了獨立的知識資本，知識份子逐漸成獨立的階級。他們不再需要「依附」資產階級，也不需要「依附」無產階級。反過來，今天的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倒要依附知識階級。任何工業、農業、商業或服務行業的進一步發展，不依靠知識階級都不可想像。

知識階級消滅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不需要再依靠暴力，也根本無須消滅他們的肉體。他們不靠刀槍，而是靠知識和科學技術。

資本家若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學知識，就將在現代的信息社會中站不住腳，就要被淘汰；工人若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學知識，同樣也要被淘汰。

馬克思從「資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代剝削階級」的錯誤前題出發，推論出它的對立面工人階級是「最革命」和「最先進」的階級，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馬克思在褒揚工人階級的同時，又把農民等中間階級說成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階級。他何以要這樣說呢？據說是「因爲他們力圖使歷史車輪倒轉」，以「維護他們這

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滅亡。」如果說他們還有「革命性」，那是指他們即將破產而「轉入無產階級隊伍」。

現在，這種情況輪到工人階級了。

知識階級所創造的新科學技術，如電腦、機器人的出現，以及第五代電腦——智能電腦的將出現，必將取代大批傳統的產業工人。日本、美國工人都在反對機器人投入生產行列，英國工人更保守，連報館的電腦排版、電腦印刷也拼命反對，致使英國報業成爲先進國家中最落後的報業。工會爲什麼要起勁地反對呢？因爲要維持工人的生存，就要保持勞力密集的狀態。

所以說，馬克思主義鼓吹工人是「最先進」的階級，是沒有根據的。

傳統的工人階級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必需學習和掌握文化科學知識。但是一旦掌握了文化科學知識，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了，因爲他們已經變成了知識階級。

今天的文員、統計員、資料員、電腦操作員、教師、律師、醫生、社會工作者等等越來越多，就說明知識階級不斷擴大。而傳統的產業工人，越來越少。工業發達國家在勞力密集時代，產業工人普遍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一如農業社會農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一一樣。工業社會使農業人口減少到百分之十幾（美國才百分之三），但却生產了更多的糧食。信息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也必將大大減少產業工人。

傳統的產業工人被新科技一步一步地消滅，馬克思所依賴的產業工人革命，愈來愈渺茫了。

知識階級將成爲今後支配社會的階級，這是必然的。

七、落後國家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後果

從大工業產生的並以大工業國家為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和大工業國家結合，倒是和封建的、落後的、貧窮的國家結合起來了。這一事實產生的後果是什麼呢？

(1) 首先是「解放者」以大恩人自居。因為這些國家貧窮落後，極需要別人來扶助，於是，一旦分到土地，無不感恩戴德。「解放者」也就以拯救人類的身份自居，對人民宣揚說：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是壓迫剝削窮人的，只有他們才能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國際歌」中雖然有「世界上從來沒有救世主」，但實際上他們是把自己擺到救世主的地位。這樣，從俄國起的「列寧萬歲」、「斯大林萬歲」，一直唱到中國，唱到任何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到了中國當然更變本加厲，「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之類的肉麻歌詞，絕不是偶然的。「大救星」的歌從延安一直唱到全國。如果毛澤東有意制止，絕對不會傳播。就因為毛澤東自視為「大救星」，才能傳播。

這樣，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就蒙上了一層封建屬系——父母官。因此被統治下的人民，也就只能依附父母官，失去了獨立人格。

(2) 封建的、落後的國家一旦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就必然把馬克思主義引向封建專制的體系中去。列寧就是如此做的，他首先把「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強化，把馬克思主義中所有有關「思想絕對自由」和「民選」的論述，全都丟棄一旁。馬克思是贊成「全民投票」的，政府應「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

但列寧却抓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統治」這一個字眼，把階級統治加上「通過共產黨」一詞，變成共產黨統治。於是工人階級就只能靠邊站了。列寧還宣稱說：「民主共和制、立憲會議、公民選舉等等實際是資產階級專政」。(「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七一二頁)。馬克思雖然批判過中央集權制，列寧又重新建了起來(馬克思說「中央集權國家機器，最初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創造出來的」，見「馬克思選集」第二卷第四〇九頁)。不僅如此，列寧還發明了「老年政治」，認為應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人來充當領袖，「最有經驗」者，當然是七八九十歲的老傢伙了。

(3) 必然將馬克思主義引向宗教地位。在共產黨國家裏有一個現象：誰掌握最高領導權，誰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化身，同時也就有馬克思



四十年來世界上發生的戰爭，都與共產主義有關。
圖為南越處決越共軍人(一九六八年)

主義的最高解釋權。這是從列寧開始的。首先是誰領導革命取得勝利，誰就是最高權威，只要能爭得政權，不管用的是什麼手段和方法，都符合馬克思主義或者叫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然後是只要保住政權，也不管採用什麼方法都算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如列寧與德帝國主義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是個由德帝國提出先決條件，要俄國賠款割地的屈辱條約，當年派去談判的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反對，但列寧把他撤了職，自己簽了這個和約。之後，多次向黨的會議解釋：只有這樣才能保住蘇維埃政權。第三，列寧一方面抓住恩格斯的一句話「共產主義學說不是教條」，肆意塞進自己的封建獨裁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宣稱馬克思的學說是「萬能的」，不許別人有絲毫的懷疑。毛澤東學著列寧的腔調，口頭上說「馬克思主義是批評不倒的」，但實際上根本不容許人們批評，只要略有不同看法，即與當權者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理解，立即就以「反馬克思主義」罪名追究治罪。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劉少奇等等都是如此下場。嚴格說來，共產黨國家裏並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家，因為能解釋理論的只有掌握最高權力者。這樣就造成兩種結果：一是最高掌權者成了「神」；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蒙上一層聖光，置馬克思主義於宗教地位。

(4) 在落後國家，除在政治上建立了新的封建專制制度外，在經濟上則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大體上初期經濟增長較快，貧窮者生活較過去有所提高。但因為完全排除了競爭和追求利潤，生產設備無法更新，而對人口的節制又認為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結果隨著人口的增加，計劃與市場脫節，貧困重新抬頭。

八、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 幾個問題

(1) 關於國家消亡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念，是單純的階級觀念。認為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就會自行消亡，作為階級專政的軍隊、警察、法庭也隨著消亡，民族、宗教也一概消亡。

奇妙的是：

①首先毛澤東就不信邪，毛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法庭一萬年都要。因為階級消滅之後，還會有先進和落後的矛盾，人們之間還會有鬥爭，還會有打架的，還可能出各種亂子，你不設一個法庭怎麼行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三一九頁）

這裏，毛不僅斷言「一萬年」都不能實行馬克思想像的共產主義，也否定了馬克思所說的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時「人和人之間」再也沒有矛盾的幻想。

毛澤東的在階級消滅之後人們還會有各種鬥爭、還會有各種矛盾的觀點是正確的。地球是一個生存競爭的場所，自有人類以來，人就一直在和大自然作鬥爭的同時進行著人和人的鬥爭，階級鬥爭只是人與人鬥爭的一部份。人與人的鬥爭及人與大自然的鬥爭是不可分割的，永遠會存在。一旦停止，人類也即滅亡了。

②恩格斯也承認國家有超階級的職能，他指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保持平衡」；至於俾斯麥政府，前面已經說過了，也使「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見『馬克思選集』第四卷第一

六八頁）。

③其實，國家並不單是階級職能，重要的還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政治也不是單一的階級政治，孫中山先生就曾指出過「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

如果眞的國家消亡，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多大範圍來組成「經濟共同體」呢？如果以很大的範圍組成「經濟共同體」，就必須有強制性的機關；如果以一個個小區組成「經濟共同體」，那么就什麼大事都辦不成。

(2) 分工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階級的產生是由於分工，分工又妨礙了人的「全面發展」，故要通過「教育」使他們掌握全部生產系統，既能做工，又能種田。可惜他沒有說明這些既能做工又能種田的人，會不會設計輪船或飛機？

對於分工，早於馬克思出生一百零六年的亞當·斯密有如下論述：「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它是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這種傾向緩慢而逐步發展的必然結果……人如果沒有交換和交易傾向，那麼，每個人就會不得不親自生產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消費品。一切人都將不得不做同樣的正常工作，那麼，唯一能夠造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別和職業上的巨大差別的事就不會存在。」他還指出分工能夠最省時間和最省費用，生產出最多最好的產品。（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消失」論，令人驚訝。太空技術、探測宇宙的奧秘要不要有專門人才去做？也許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些都不必要了，都過原始生活，大家有吃有穿有住就行。或者，屆時每個人都「全面發展

」得似神仙，既會種田生產糧食，又會做工生產衣服，又能從事藝術創作，又能設計太空飛行機器，或者，還可以隻身飛到月球上去。那真是上帝自愧不如了。

(3) 各盡所能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屆時「生存鬥爭停止了」，也即每個人都有吃有穿，那麼，誰還去把勞動當作「第一需要」呢？享樂第一不是更好？又沒有強制性的國家機關和法庭，人性中的「自私」的一面，必定會充分暴露出來，「各盡所能」也就成爲一句空話。

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實驗：

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吃「大鍋飯」，大家只能變爲懶人。

英美等國的福利太好，同樣也可變爲懶人。

馬克思根本就沒有把人性中的「自私」本能計算在內。

(4) 按需分配問題

首先是如何界定人們的「需」？你辦公務要一架飛機，這是「需」；我要去玩樂，也要一架飛機，算不算「需」？如果這個不算需，那麼，是指基本衣、食、住的「需」嗎？如果這樣，不啻是社會大倒退。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新產品也就不斷地湧現，因此人們的「需」也就永無止境。如果人們滿足於既取得的「需」，社會就會立即停止前進。因此說，人們的「需」是無法界定的。

萬里感慨經濟改革已經失敗

(中國大陸研究生·澳洲)易水霞

再一個又有誰去「分配」呢？是選出一個有權威的人來「分配」給大家嗎？這樣，就意味著仍然有權威，人不是又不平等、不自由了嗎？如果由大伙來「合議」，則必定相爭最好的物質而吵嘴打架。

結論

我們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設想，都是百分之百的幻想。

我在前面說過：自然界是天生不平等的，競爭才是本質，才是自然規律，也是經濟規律。不論現成物質如何豐富，但只要停止競爭，大家拉平，就立即坐吃山空。對於「不適者」，只能作理性道德的照顧。但道德不是科學，對經濟發展無濟於事。

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經濟理論，可以概括為六個字：「道德經濟觀念」。

馬克思的善心，比上帝還好，要全球人類一齊過共產主義生活。但現實是：

美國太空總署於八四年三月廿一日向全世界宣佈：將在二十一世紀開拓月球殖民地，並開發火星。

今年五月廿三日，美國太空總署又再次宣佈：二〇〇五年之前，實現月球上先設一個大約二十人居住的小殖民地；再準備於二〇一五年之前，在火星上也設一個人口相若的小殖民地。

也許屆時地球上仍然有人類在為基本衣食爭扎，或者在剛剛進入努力密集的起步階段，但地球上的另一部份人類，已經遷往另外的星球上去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今年九月五日，國務院副總理萬里飛抵堪培拉，對澳大利亞進行訪問。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提早告訴我們留學生：萬里副總理來澳期間，要接見在堪培拉的全體留學生，並做指示。大使館官員還告訴我們，如有什麼問題，也可向萬里率領的代表團提出。

我們留學生接到通知後，和知己的同學議論了一下。我們真想像儘快見一見萬里，聽一聽國內改革的近況和留學生政策的新精神。因為，我們雖然身處海外，但還是關懷着祖國，對留學生政策收緊的情況，尤其關心。

九月六日下午四點多，我們在堪培拉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被召到大使館恭候，在料峭的寒風中等了一、二十分鐘，夾道歡迎萬里副總理下車步入使館。

坐定之後，大家洗耳靜聽。

沒想到，萬里劈頭就說：「聶大使讓我給大家講講。有什麼好講的？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很好嘛！」接着，萬里很感慨地說：「我到澳大利亞看了看，我們的國家確實缺乏民主和法治，但我們國家太大，問題太多。有些地方的人，你給他民主也不會用，有的地方還處地很落後的社會，我看，我們的經濟建設下個世紀也趕不上人家。」

接着，萬里談到了國內的改革，他的感慨更深了。他的話不多，但流露出深切的無奈情緒，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說：「至於國內的改革，我是沒有辦法了。就看你們的了，有什麼錦囊妙計，獻出來，下個世紀就看你們

的了。」

萬里寥寥數語之後，接着說了聲「散會」，起身要走，甚至沒有側身問陪坐的聶功成大使還有什麼話沒有。聶大使沒想到萬里副總理講了這麼幾句話就要急切地離開。他匆匆起來，做了結束語，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散會了，同學們議論紛紛。有的說：「萬里怎麼是這樣的作風？他不是改革派嗎？」有的說：「萬里好像挺不高興的，搞得聶大使真窩囊。」總之，留學生們對萬里的草率講話都很失望。

聽着大家的議論，我在想：萬里是國內聞名的開明派，一向敢說敢幹。據說，中央八月份在北戴河開會時，萬里開始挺活躍，後來，他發現阻撓改革的保守派力量太強，把原先擬訂的改革計劃，一一加以封殺。後來，他就不太愛講話了。從萬里講的「國內的改革，我是沒有辦法了」這句話，可以看出，國內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已遭到保守派的封殺。

幾天後，我從一位大使館的官員那裡聽到，萬里在私下曾對其屬下表示，改革的阻力太大，他對改革的前途非常悲觀。

我認為，中國歷代的改良都沒有成功過，原因之一，是守舊勢力太強而改良派又不敢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今天，中共改革派（改良派）碰到了同樣的問題。其實，民主運動是衝擊保守派的重要生力軍，萬里等改革派，為什麼不敢發動民主運動的力量呢？

有一種「凡是派」認為，「凡是」中共公開承認的文件才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可是，很多曾經被懷疑過的文件，事後都被證實是真的！

辨別中共密件是門學問

(政論作家·美國)司馬璐

編者按：

自「中國之春」於去年十月發表了「中共中央對台統戰密件」之後(見「中春」28期)，餘波蕩漾至今未息。有一些人至今仍不肯相信，而且在編號的有無，語氣及時間方面大做文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從各方面來證明這個文件是假的。

但這些人士忘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密件的原件仍然在我們手上。而且「中國之春」也再三宣稱，任何時候，它都可以公諸於衆，而且也可以上法庭接受最嚴格的考驗。既然如此，那就在法庭上見真章吧！就像跳高一樣，有人說張三能跳過兩公尺，有人說張三跳不過兩公尺，並且證明：無論從身材、速度和經驗看，張三都跳不過兩公尺。兩派爭得不可開交。要解決這個爭端最好的辦法就是豎起標竿，請張三跳就是了！如果張三已死，或張三不願意跳，那還有得爭論；但今天張三

沒死，而且也願意跳，那還爭論些什麼呢？

同樣的，假如今天密件的原件不在我們手上，或我們不願意拿出來，那還可以爭論一番。但今天密件的原件在我們手上，而且我們也願意上法庭，那還爭些什麼呢？海內外研究中共的學者專家那麼多，「中國之春」怎麼能一手遮天？奉勸對此密件有懷疑的各位人士，還是想辦法敦促此案的「受害者」——(中共)，控告我們為要，這才是解決爭端的最佳辦法，才是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其他枝節方面的爭論，那是大可不必了！

由司馬璐先生所寫的這篇「辨別中共密件是門學問」相信能有助於讀者了解中共文件，甚至中共本身的本質。

司馬璐先生曾是三十年代入黨的中共黨員，為研究中共黨史專家，其生平簡介見中春廿九期及本期六十頁李目的專訪。

黨內鬭爭與密件

有人懷疑某個中共文件是偽造的，我老實說，懷疑的人是有道理的；我甚至可以說，懷疑的人是很有學問的。因為懷疑中共文件的可靠性，在中共黨內已是門學問。

為什麼中共黨內也懷疑中共文件的可靠性呢？理由有：

一、中共在鬥爭技巧上，講求公開與秘密的結合。公開的鬥爭是為黨公開發表的路線政策直接服務的，而秘密鬥爭則是另外一套。「秘密鬥爭」最重要的是隱藏自己的政治目的，以便於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分化敵人。這「另外一套」的文件，往往是需要時間的證明才能使人相信。

二、由於中共內部權力的轉移，某些當權者或者追隨者任意改動了中共文件的本來面目。

三、很多中共早期的文件，是以俄文起草的。換句話說，實際上是俄國人的「指示」，中共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再作一些補充。美國有一位著名學者，編印過一部有關中共歷史文件的書，和筆者所接觸過的中共歷史文件出入很大。原因就是，那位美國學者的資料是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的。

四、中共的可疑文件，有一些是出於黨內不同派系互相揭發對方，打擊對方的需要。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段史實：

1. 江西蘇區時期，中共當時有一個文件，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中共說這個文件是假的。我以前也懷疑這個文件是假的。可是彭德懷被迫害致死時，他的罪名中有一條却

仍與這件事有關。

2. 中共清算羅明路線時，周恩來曾組織人力集中打擊所謂羅明路線在紅軍中的代表蕭勁光，蕭勁光受過公審，坐過周恩來定案的冤獄，這事也有中共的文件可考。以前中共也說這個文件是假的，可是最近蕭勁光却有一篇文章，記述這段冤獄的經過。文章祇是把「周恩來」三個字改為「王明路線者」。(蕭氏的文章見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革命回憶錄」第十一輯)

3. 王明派在中共當「不久，以何孟雄為代表的反對王明派，在上海東方飯店開會，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當時中共有個文件說這是王明派向國民黨告的密；王明派的中共中央說這個文件是假的，後來毛派為清算王明派，又說這個文件是真的。

4. 三十年代左翼文壇有過一場激烈的論戰，一方以魯迅為首，另一方以周揚為首。當時魯迅被稱為左翼文化大師，而周揚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正式代表。雙方的論戰發展到互以惡言相加，這時有一份油印材料在左翼人士中流傳，說魯迅與日本特務過往甚密，中共也說這個材料是假的。但是後來中共有關人士回憶魯迅的文章却說，當年日本特務機關在上海虹口海寧路開有一間咖啡室，魯迅是那裏的常客。

5. 很多著名的中共領導，都在國民黨時代發表過反共聲明，如現在還活著的薄一波即其中之一。中共有個文件指責薄一波等人是叛徒；但中共另一派又指責上述文件的內容是假的。劉少奇平反後，中共又說「假投降」是當年黨中央保存黨的領導幹部的重要決策。這就是說，當年中共黨員奉命發表反共聲明，騙取出獄，確有其事。

6. 上海解放初期，有一個文件指責外貿部

副部長盧緒章是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的爪牙，由於他的告密而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不計其數。中共起初說這是敵人故意造謠，文件是假的。後來陳毅却又為盧緒章辯護說，盧緒章做國民黨特務是遵照周恩來的戰略佈署。這等於承認確有其事。

中共文件的真偽

中共是個紀律嚴明的政黨。中共文件分為普通學習文件、一般傳達文件與機密文件。機密文件一定編號，以備洩漏時追究責任。中共機密文件不僅編號，甚至規定X級以下幹部，限於「口頭傳達」，不得出示文件，所以這些X級以下的幹部根本看不到文件的原本。

由於中共的下級幹部根本看不到機密文件的原件，僅靠上級「口頭傳達」，因此也往往發生許多流弊。例如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史稱「閩變」)，與紅軍訂有互助協定。結果由於中共坐視不救，「閩變」迅即覆滅。中共內部資料中有內容絕對相反的兩種文件，一種是毛派指責王明派阻撓援閩；另一種是王明派指責毛派阻撓援閩。

中共黨內，葉劍英對製造假文件頗有研究，葉長期是解放軍的參謀長，他可能認為製造假文件是戰略的需要。例如，長征時毛澤東與張國燾鬥爭激烈，當時毛派的軍事力量祇有一、四兩個方面軍總兵力的八分之一。毛派要擺脫劣勢，必須逃出張派控制地區，因此乃有葉劍英握有張國燾要殺毛澤東密電之說。毛澤東死時，有所謂毛澤東遺詔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這也是葉劍英的「傑作」。陶鑄也是製造假文件的專家。他與毛澤東、林彪三人的合照，他站在正中，是一張偽照，他因過份突出自己遭忌，成為他遭致殺身之禍的原因之

編號：

機密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

关于抓紧新形势加强对台工作和对台宣传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台办：
中央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月召开的对台工作和对台宣传工作

千奇百怪的密件

中共原始文件中有許多批毛批周的文件，措詞嚴厲，後來中共對於這些史料，或是避免提及，或是代之以X X。

抗戰時的中共密件，有的在前面有一段蔣委員長語錄，如：「蔣委員長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在當時，國民黨檢查人員一看到蔣委員長語錄，以下的內容就不看了，其實下文正是中共的密件。

解放戰爭期間，有一個中共密件，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本數學教材，其實是一個題為「怎樣做瓦解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工作」的密件。還有些中共密件的前面是中國古老的通書、天

專訪田弘茂教授



田弘茂教授

論中國的政治多元化 與社會多元化

(本刊記者)

馳 遼

西方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記：為促進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本刊擬就多元化理論作一專題討論，誠請田教授談談多元化理論的來龍去脈和運作過程。

田：多元論在西方思想史上源遠流長。但我是研究政治學的，對這一問題的興趣主要在多元理論與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關係，以及社會多元化的政治運作程序。

提到多元，就不能不提民主。民主有許多涵義，馬克思主義也講一套民主。我們通稱的民主是多元化民主（PLURALISTIC DEMOCRACY），它是以歐美民主經驗為主體的一種民主社會型態。多元論是西方政治學探討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理論架構，在概念上它認為，一個民主政體的權力結構必然是多元化的。在民主的政治架構下，決策程序不能是集中的、單元的，而應是分散的、分層的。廣大的社會成員，以及各種團體可直接參與政治，甚或決策。政治制度也開放各種參與的管道。例如，美國的政治就是多元化的民主政治

，而且被認為是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從政治結構和政治制度來講，聯邦政府或政府中的任何權力機構是無法壟斷政治權力的。政黨、壓力團體以及經濟企業單位也都有相當獨立的權力基礎，可以影響到政治的運作，也可以影響決策。但政黨並不壟斷政治權力，壓力團體如工會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所以在美國，再優秀的政治精英，也無法壟斷政治權力。我們評斷一個政治制度，不可只看其政體的體制架構是怎樣建立的，也不可光憑憲法的文字去研判，而應注意整個制度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領域之間的權力關係。

記：是的，就拿菲律賓來說，戰後從政體到憲法都是美國模式的翻版，然馬可仕及軍方實際上控制了國家的一切權力。您能舉些美國政治中多元化運作的實例嗎？

社會各層次利益團體的全面參與

田：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說，美國最近對稅法的修改就表現了權力分殊的運作現象。雷

編者按：田弘茂教授，現年四十七歲，祖籍台灣台南。早年畢業於東海大學，主修外交和政治。後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威斯康辛大學系統政治學教授。田教授專攻國際政治與比較政府，近年研究多涉及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現實政治問題。

田教授的著作包括：「一九二七—三七年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斯坦福大學出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黨權與派系政治」；「政治結構與社會變遷：論中共整體改革的發展與影響」；「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政府」（將出）等。田教授近年曾應邀到中國大陸訪問。

文中記代表本刊記者馳遼，田代表田弘茂教授。

本文發表前，已經田教授過目。

根總統首先提出報告，闡述白宮的看法，但國會參眾兩院作出的稅法草案，與白宮的原意大相逕庭。因為稅法涉及到全體公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國家財富的分配情況，國會之外還有很多由選民組成的利益團體，透過遊說活動（JO BRYING）而影響稅法的草案內容。這些團體透過代表、某某遊說客、或大眾資訊系統向政府施加壓力。到目前為止，草案尚未正式通過，通過後雷根還要最後簽字。這個過程顯示，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權力單元可以獨立完成稅法的決定，而是社會的全面參與。民主程序是一種廣面討價還價的過程，而不靠少數幾個人下決定，發號施令。

其它西方國家的民主運作，未必與美國相同。美國是聯邦制的分權制，國會的力量比較強。但西歐與美國的政治運作仍然大同小異，如政黨、工會、商會、醫師會等社會團體都有自主權，都不受政府支配。他們的經費來源，也絕對不靠政府資助，社團的領導也不是官方指派的，他們對政策能有獨立意見而不是執政黨或政府的傳聲筒。

記：西方國家的多元政治是無可否認的，但東方國家是否也有自己的多元運作特色？中國的情況可否接受西方實行多元化的經驗？

社會團體的獨立性最為重要

田：話說回來，我們再看中國的狀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中國大陸所倡言的政治改革，並沒有考慮到政治多元化的層面。最近看到費孝通先生寫的一篇文章，他的論點基本上希望在目前建制下作一些小幅度的調整。比如說他沒有提到自主性多黨制的問題。政協各黨派需有更多發言權，但應在中共的領導下，

協助中共搞好國家建設，這種協商性的權威體制，再怎樣改革，與我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是完全不一樣的。按照我們的標準看中國，目前所提的一些改革芻議，尚不能言之為民主改革。儘管中共目前有改革之意，也允許政協中各黨派存在，但把政協與美國的上院來比喻是不倫不類的。關鍵的一點是，這些民主黨派都是官方支持的，成員是官方決定的。其次，它們沒有獨立的政治活動。第三，它們沒有自己的候選人，來與共產黨競爭政府公職。

我認爲民主政治的建立必須以多元政治爲依托，先決條件是社會要分殊化、多元化。中國要走向一個我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整個社會結構必先呈現出多元化的自主團體。社會上的黨派組織、各種利益團體和專業社團，都必須脫離執政黨和政府的控制，包括人事、財源、活動等各方面，使它們有真正的自主性，對國家決策可以提出他們獨立的想法，且不致受到懲罰。我認爲這樣的政治改革方向才有長期意義。

記：中共與海外的看法相距很遠。比如說，中共書記處書記王兆國最近講：「政治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除此之外，您認爲中共的政治改革可能向有利於確立多元狀態的方向走嗎？

田：我最近看中國的報紙，還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還沒見到具體的行動措施，還看不出明確的變動趨勢。我認爲要討論政治改革和多元化的關係問題，必然要涉及國家、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的相互關係。這幾方面的機構或團體，存在著各自的利益，應當有它們各別的獨立性，這樣社會才能正常運轉。邁向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必須承認不同的價值系統、開放經濟、降低或消除政府對企業與社會活

動的干涉。中國大陸要做到這些是很難的，其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也就很有限。

組合論與輸送帶的概念

與多元論相反的另外一種模式，是組合論（COOPERATION）。三十年代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執政時期，很相信這一套。列寧對群眾社團和國家關係的理論，也是建立在這種架構上面。組合論是什麼呢？即執政黨控制政府，並把很多社會組織都變成執政黨運作的輸送帶（TRANSMISSION BELT）。根據這種理論的運作，則共青團、全國婦聯、工會、作家協會、學生會等等，實際上都成爲執政黨的意志和政策得以貫徹落實的工具。他們輸送執政黨的意志，替執政黨和政府服務，實際等於執政黨的外圍團體。這些輸送帶組織同時爲執政黨動員群眾，鞏固其統治基礎。這種模式，把政府、國家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視爲有機體的組合，因而把社會團體變成了黨和政府的輸送工具，缺乏其自主性。社會處在這樣的狀態中，民主政治是開展不起來的。因爲民主最強調制衡的概念。必須在政府與執政黨之外有參與政策制定的獨立政治力量。如果人民既沒有投票權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議士和官員，又沒有權力進行結社來影響政策，那民主又在何方呢？社會主義國家中，南斯拉夫的工會，在經濟體系裏面，還能發揮相當程度的經濟民主，工人可以參與生產、分配和人事的決策。但在政治領域裏的參政權力，也極有限。

我們在海外閱報所瞭解的中共政治改革係指現行體制的改善、行政效率的提高、削減特權現象等等。當然，這些方面能有作爲也不錯了。但這種改革與政治的民主化沒有必然的關

連，問題的層面與概念均非雷同。要真正邁向民主化，就不能把黨之外的一切團體，都當作執政黨意志的輸送帶，讓人民在社會與經濟生活領域發揮自主性，才是正確的方向。

記：請問台灣的情況有何特色？是否因同一文化傳統，而與大陸無甚差別？

田：台灣的情況也有類似之處，但因國民黨容許私人企業，而且長期不斷的經濟發展，使社會上出現了各種社團和利益團體，就社會多元化取向而言，情況比大陸要好得多。國民黨政權的建制，至少在理論上也是想把這些社團視為政權的輸送帶，目前也有一些社團的確已形同輸送帶。比如說青年救國團、農會、漁會、婦女會等。但有些社團已經發展若干自主性，政府也沒有力量去完全控制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執政黨之外也產生黨外力量。社會上的一些著名的社團，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比較法學會、台灣人權協會、扶輪社、青商會等，都已經逐漸發揮了一些獨立自主權，不直接受制於國民黨。我感覺台灣這幾年來民主化的推進，一方面反映在選舉和黨外勢力的興起，另一方面則是在社會上的各種團體慢慢能夠在功能上擺脫組合式和輸送帶的情況，而呈現出局部多元化的現象。儘管如此，控制資源較多的社團，如農會、工會、商會等仍然掌握在國民黨手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部，就是經常地監督這些社團的人事關係和功能活動。依此觀之，台灣的情況與大陸有別，這不是文化傳統的關係，而是制度結構和私人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結果。

關於政府與民衆之間的

中間地帶

記：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的否沒有條件形成

多元政治？

田：我認爲無論什麼樣的制度和政體，要實行民主，必須在政府與人民大眾之間產生一個中介力量，包括具有自主性的多元化社團、大眾傳播系統和反對黨。沒有這樣一個自主性的中介力量，一個國家要邁向民主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中國五千年的專制獨裁以及權威性的傳統文化，顯然是實行民主的主要障礙。正因爲如此，統治者、甚至一些知識份子拿它們當藉口，常常在所謂「中國式的民主」概念上拐彎抹角。我認爲民主政治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理念一樣，只是運作的方法不盡相同而已。儘管各民主國家中也有不同的體制結構和運作方式，如日本、西歐與美國的民主制度就不完全一樣，但其據守的基本民主原則則是雷同的：如政治權力結構的多元民主化，政黨、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尊重自由與人權等。

政治文化的傳統理當改變

至於政治文化，我認爲是可以變的，可從改變意識形態和教育內涵下手。日本傳統文化與中國一樣專制，天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不是也改變過來了嗎？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德國，獨裁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戰後也形成了民主文化。在希特勒之前，卑斯麥首相也實行鐵血專制，且根深蒂固。經過工業化的發展，社會的開放，政治變遷，以及戰後獨裁頑固派的沒落，民主政治在演化中已經成熟化。社會與經濟發展，加上掌權者觀念之改變，權威文化的影響也沖淡了。

故中介力量的形成，不一定要受制於文化因素。文化宿命論容易使人悲觀，我個人不接受這種觀點。天下沒有不可改變的事情，只有

不願改變的頭腦才是進步的阻礙。中國要實行民主，不全然要抄襲美國、日本或西歐各國的程式，作起來也不可能完全一樣，但在一些基本的觀念上，中國各界人士要先接受其普遍性。我不認爲尊重人權和自由，容許人民結社與選舉官吏，讓社團自由形成、自主活動是若干國家專有，而中國沒有也不應有的。即使在北美、西歐和日本之外，像印度、菲律賓也都能採取一些多元民主的作法，中國人爲何不能做？中共如欲真正實行民主，就要接受這些原則，放棄一黨專制，容許社會上中介力量的形成。

所以我想強調的一個具有民主價值的觀點就是：政府應當讓人民在政治以及其它領域有較大的活動範圍。政協各民主黨派，如果還是要拿共產黨的活動經費，人事照樣聽共產黨的安排，不同黨派怎麼能堅持自己的原則？怎樣能站在反對者立場協助執政黨避免錯誤？這些限制存在一天，政協實際上就起不到什麼作用。任何黨派（如九三學社、致公黨等）或一些社團（如作協等），若能一步一步地擺脫共產黨的控制，擴大自主性活動，將有助於中介力量的演進。我認爲這是中國大陸應走的改革方向。否則，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實同天方夜譚。

社會多元化不會危及

中共執政地位

記：共產黨人總有這麼一個擺脫不掉的思想負擔，認爲真的搞起多黨政治的民主，共產黨就有可能被推翻。其實民主就是包容，公平競爭。您認爲在現實條件下，如何讓共產黨消除顧慮，向民主方面做些努力？

田：我必須指出，社會多元化只是民主的必要條件，還不是充分條件。多元化的「化」指的是形勢演變的過程，使不同職業的人，不同想法的人去形成不同的利益團體，這離威脅共產黨的統治地位還相去甚遠，你提到的顧慮可謂杞人憂天。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講，將政治多元化與社會多元化比較來看，前者是將政治權力分層化，和分散化，讓社會上的團體和民衆廣泛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這樣可以反映民意，使政府的計劃更適應客觀實際，對國家是相當有益的事情。第三個層次的發展，才是多黨政治的形成。不同黨派，與共產黨競爭國家職位，這也算不上什麼威脅。共產黨長期執政，掌握國家社會資源，控制軍隊和公安力量，還怕被推翻嗎？多元化在不同層次的發展，未必能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形成挑戰。當然，從根本上說，要求多元化就是要求共產黨放棄一黨專制，專制與多元化是兩個完全不能相互妥協的概念。但是，在一黨專制下面，政治多元化雖不可行，却可能因開放社會經濟與文化活動而出現社會多元化的現象。社會出現多元化以後，累積一些趨進效果，慢慢會對政治發生影響。也就是說社會多元化，可能成爲促進政治多元化的動力和形成政治多元化的基礎，長此下去，才會對共產黨的壟斷地位產生某種挑戰。即使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的遠景是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同治的局面，而很難導致其他黨派推翻共產黨的結局。要社會進步，又不讓這些進步對中共產生嚴重挑戰，以免導致它乾脆嚴禁之，最現實的步驟就是先進行社會的多元化。現階段要求中共搞多黨政治是不可能的。從古至今任何統治者都不會自動放棄既得權益，中共領導者不願分配權力給他人，是很自然的一種政治態度。

無產階級從來未專政過

記：您認爲目前的改革是否會使中共的極權有鬆動的可能？

田：中國的情況是不變不行了，鄧小平似乎也認識到這一點，但却又堅持阻礙與革的「四個堅持」。我一直搞不清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什麼概念，無產階級從來就不曾專政過，專政的人都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都是黨的政治精英，黨的領袖，絕不是無產階級。這些人大都是職業政治家和政客，如果國家沒有完整的制度，規定統治者到期後就要把權力交出來，限制統治者的權力，他們就不可不繼續搞獨裁。

中共自七九年到現在，搞了多年經濟改革，現在又搞政治改革，但改革之深度，無非修補補，都屬節制官僚主義的問題。大陸的言論近年略開放，但還一直由官方限制，即不容許向一黨專制挑戰，也不能鼓吹人民直接參與政治。中國大陸就是這樣，因爲無法形成我剛才說的中介力量，也沒有財力自主的中產階級，所以，要推動政治民主化，目前還得靠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啓蒙和觀念輸送。

民主的過程與宿命論

記：知識份子畢竟只是一個高層次的知識階層，不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此看來，中國的民主化是要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了。

田：我先說明：民主化是一個過程，不能說那個國家的民主就是完整的模式。八十年代的美國，不論從那個方面講，都和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不同。三十年代，沒有幾個黑人可以投票，更不用說黑人可以當市長了。再往遠看

，黑人做人的權利都沒有。其它少數民族也有此類問題。不用說華人、日本人，就是波蘭人、義大利人、甚至猶太人，早期也受到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歧視和排斥。可是美國在不斷變化著，以致有了今天的民主境界。這說明美國社會制度的彈性很大。

中國大陸儘管現行制度很僵化，但還是可變的，因有你們這些人在不斷地努力鼓吹。知識份子不斷地爭自由、鼓吹民主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影響面的確是有限。中國要變，這是時代的壓力，也是客觀形勢的要求。不改革終會產生革命的動力。台灣也是在大家長期努力下，才有了今天這種程度的變化。以前國會議員是不能選的，黨外是不能批評執政黨國策的，很多人像大陸現在一樣，因批評時政而被關了起來。二十年前黨外人士有今天的言論，不被槍斃才怪呢！我不是說台灣已經很民主，事實上距理想還差得遠呢！大家應該看到社會總在轉化。看不到轉化，悲觀失望，什麼都別幹了。宿命論是要不得的。海外人應當不斷去批評去督促。你變，我就提出建議，你不聽我就批評，當權者有一天總會改變觀念。話說回來，中國的民主化的確是一段漫長的路途，客觀條件欠缺，當權者的理念又極不民主。我從多元化的角度提出一些「應行」的方向，却不認爲在本世紀內可以辦到。中國大陸在轉化的過程中，多元化是一個可以走的轉化目標。先促進社會多元化，再推動政治多元化。發展具有多黨的民主社會，則是最後一個政治發展的階段。以中國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簡直是烏托邦了。中國的政治要真的上軌道，這條漫長的路却不能不試著去走。

記：就談到此，謝謝田教授接受我們的採訪。

多元理論及中國多元化的展望

黃默教授訪問錄

●本刊記者●秦 俠



黃默教授

多元論的萌芽與發展

記：首先請黃教授從理論方面作一個概述，談談多元觀念的產生與歷史發展。

黃：多元化是政治科學一個新的概念，在本世紀初期才明確提出。它的最淺顯的說法是：科學地分析或研究社會情況，要從多個方面的因素著手，而不是從一個因素著手，也即肯定社會中存在不同的關係架構和利益團體。這些不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團體互相運作，影響所及，決定了政治體系的情況，決定權力分配及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進一步說，多元觀念同運作過程具有等同的意義。也就是說，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力量，通過政治運作的過程，完成權力的分配和政策的制定。值得強調的是，多元與均勢和平衡的觀念密切相關。在一個社會中，諸多利益團體共存，互相運作、抗衡與競爭，達成一種平衡穩定的狀態。這樣的政治體系傾向於平衡的共存，而不是由一個力量、一個階級或一個團體控制全局。這是一些淺顯的概念，從這些概念可推論出一整套的多元理論。

從多元理論來看：政府在一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十分重要，政府只負責溝通或裁判各個社會力量、利益團體互相間的競爭，

本身不構成決定性的力量。同時，政治的演變是漸進的、有步驟的從各方面來改變，而不是革命的、激烈的改變。

多元理論在美國政治學界是影響最大的理論。從本世紀初開始，到五十年代發展到最高潮，多元理論構成了美國政治的主導思想。在此過程中，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本論著是阿瑟·班特立(A. BENTLEY)的「政府運作過程」(PROCESS OF GOVERNMENT)，出版於一九〇八年，書中提出多元理論，來探討美國的政治體系。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杜魯門(D. TRUMAN)在一九五一年又寫了一本書也叫「政府運作過程」(GOVERNMENTAL PROCESS)與班特立的書名相近，只是兩個詞前後調換了一下。可見多元化的觀念與過程是同義的。尤其是耶魯大學羅伯特·戴爾(ROBERT DAHL)及查理·林伯朗(C. E. LINDBLOM)兩位著名教授，三十年來，對美國的多元民主觀念的建立貢獻很大，著作很多。此外，還有許多學者持同樣的理論和態度。由此可見，多元民主理論是美國政治的主導思想。

到七十年代後期，戴爾和林伯朗會對自己早期的理論略做修正。早期的理論是非常樂觀的，即社會諸多利益集團的競爭和共存，導致

編者按：黃默教授，一九三五年生。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來美後先後獲得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黃教授現任紐約州立大學奧斯維加(OSWEGO, N. Y.)分校政治學教授。黃教授對中國人權問題有獨特研究，曾發表「中國人權狀況的分析」(一九七一年)、「七三年台灣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改革運動」等專著。

黃教授近年曾兩度到中國大陸訪問講學，對中國大陸情況有實地了解。文中黃代表黃默教授，記代表本刊記者。本文發表前，已經黃教授過目。

了社會的民主化和經濟繁榮。修正後的理論認為，在社會的許多利益集團之間，企業的權力和影響遠勝過其它利益團體的權力和影響。也就是說，美國是一個企業界與政府共同統治的局面。然而，多年來社會上種種問題如能源問題、種族歧視問題、財富的平均分配問題，都未得到實際解決。所以他們已不如早年樂觀，主張進行進一步的社會改革，主張財富的收入應當有一個較平等的分配，否則會形成權力的懸殊差距，對民主政體的運作是不利的。

當然，多元化政治體系的弊端，其他許多學者也都看到了。譬如說，康乃爾大學教授羅維（THEODORE LOWI）在六十年代末期即已提到多元化政治體系運作停滯的困局。一九八二年哈佛大學教授比爾（SAMUEL H. BEER）也一反早年對英國政治體系的樂觀評價，把近二十年來英國政局的混亂及經濟的衰退歸咎於政治多元化，和各個利益團體追求自己利益而不能自制的局勢。今年史多曼（DAVID STOCKMAN）新書論雷根政府供方經濟改革方案之失敗，也持同一論點。在他看來，雷根總統並沒有體會供方經濟革命的意義。這一個反福利國家的革命，必須在減稅與削減政府預算並進下，才能成功。然而雷根新政府各部門各自為政，不肯削減經費，國會及社會上利益團體也不顧全局，供方經濟革命只有失敗一途了。

馬克思挑戰多元論

讓我們再回到多元理論取向的問題上
大體上，多元論早期就受到另外兩個學派

的挑戰：一是馬克思學派，他們認為多元政治理論沒有把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作用表達出來，

故本質上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一九八三年六月，「美國政治學會」發行的學報上有一篇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曼里（JOHN MANLEY）所寫的文章，就是從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批評戴爾和林伯朗的理論，對他們二位七十年代後期的理論修正還不满意。戴爾和林伯朗在該學報上答覆曼里時指出，馬克思學派的學者，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在現今世界上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度裏，那一個算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歷年來它們的政治制度弊害大家都很清楚。另一個問題是怎樣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是否應用暴力消滅階級？這些都是難以解答的問題。

精英學派挑戰多元論

另外一個向多元理論挑戰的學派是精英（ELITE）研究學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密爾斯（C. WRIGHT MILLS），他寫了一本書叫「權力精英」（POWER ELITE）。在他們看來，現實上的美國政治與多元理論所描繪的圖畫並不一樣。政治權力是集中在精英階層中，並不是如多元理論所說的那樣，社會的各利益集團都能參與政治的運作過程。繼密爾斯五十年代出版此書後，許多學者也從這個角度批評多元理論。

多元政治運作的實例

記：可否請黃教授舉些例子，來表達多元政治的運作情況？

黃：前幾天美國國會參院，為雷根總統提名林奎斯特大法官做最高法院院長，舉辦了一

個聽證會。各方面爭論很多。這一個過程，便相當出色地體現了多元政治在美國社會的運用。根據憲法，總統享有提名國家最高法院的權利，但其任命要得到國會同意。林奎斯特學識淵博，但他對憲法解釋，十分保守，尤其對個人及少數民族權益，不太同情，因之他的提名受到國會參院民主黨及社會上自由派人士的反對。這次聽證會上，陣容分明，支持與反對的意見，相持不下。其中一位律師，六十年代初期在亞利桑那州擔任助理檢察官，作證林奎斯特確曾在一偽投票所，恐嚇威脅黑人及西班牙裔選民；另一位不利於林奎斯特的證人說，他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受他子女的影響，他子女對他說：「你如不把這事實說出來，就沒有盡到公民的職責。」從這件事，我們對多元政治的運用，也許能得到較具體的認識。

大法官林奎斯特



我再另舉一例。多年來，美國政府及社會上許多人士都想修改美國稅法，使它簡單些，公平些。但各個力量，各個利益團體互相抵制，從來沒能成功。這次改革方案總算得到政府中各部門，總統與國會，國會中參院與眾院，民主黨與共和黨以及社會中各利益團體的同意

，可說得來不易。當然，這改革案只能是個大妥協，各個利益團體雖然都有所得，但也都做了些讓步，沒有一個力量，一個利益團體能獨斷獨行，不顧他人利益。這就是政治多元化的體現。

我舉這兩個例子，只想說明政治多元化的運行，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台灣，政策的制定顯然是與美國情況很不同的。

「定於一尊」的為害

記：近來大陸政治改革輿論中提到了多元化，本刊也在今年強調多元的觀念，您認為這會否成爲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思想趨勢？

黃：貴刊最近在提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之後，又提出多元的目標，我同意這也是中國社會目前所缺少的政治規範，從而也是應該努力的長期政治目標。我認為政治多元化與前面四個觀念是密切相關的，可以說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一個方向的問題，也即如何逐步使中國社會達到具有民主的認識與現實。它涉及到個人、社群與國家的關係，涉及到政府權力的分配與運用等一系列問題。你們把這些觀念做爲一種社會價值來追求，但也要意識到，就中國的現況，這些價值的確立是相當艱難的，絕不是短期內能達到的目標。

記：要在中國實現政治多元化，還是相當不易的事情。您能就中國大陸現實來談談這問題嗎？

黃：從中國大一統的傳統，尤其是思想上求定於一尊，以及本世紀屢次革命，國共兩黨一黨獨斷的局面來看，想使中國政治達成多元運作極爲困難。當前，海外對中共在大陸提倡的政治改革，寄予一定的希望，如黨政分開，

官車



方成

企業擁有自主權，消除官僚主義，提高經濟效益等。但在我看來，改革可分兩種，一是提高現行政治運作的效率，消除行政上種種弊端；一是從基本的政治架構的改變著手，把中國社會導向多元政治的方向，導致社會上各種團體都有一定程度的權力，能參與政治的決策。從後一種角度來看改革的內涵，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長遠方向。而前一種改革的內涵，並不見得與多元化有何關係，我希望在一段不太長的時期內，中國社會能夠出現各類利益團體，比如說工會、企業團體、農民團體、文教團體、青年團體、宗教團體，讓這些團體能逐步在政治上起到一定的獨立作用，進而引導出政黨的

治的運用。當然，這些只是我個人的希望，能否實現，很難預斷。

記：台灣的情況如何呢？

黃：相對於大陸，台灣的情形，具備了比較多的、向多元社會發展的政治與經濟體系。目前大家都很關心國民黨和黨外的溝通，這是最近幾年台灣政治的重要進展。當然，我也不敢斷言將來會往政黨政治及多元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最低限度可以說，在台灣獨立於國民黨之外的黨外力量，已經得到了社會及國民黨的確認，這是沒有疑問的。

記：請教黃教授，中國沒有形成多元政治局面，主要的障礙在那裏？另一方面，中國是否缺少一些多元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比如說中產階級、全民教育程度、言論自由等。

黃：中國的一統文化傳統是一種障礙。國共兩黨，都是一黨獨裁，不願意與其它政黨共享政權的，這是最大的，也是關鍵性的障礙。但隨著政治、經濟的改革，教育水準的提高，以及進一步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社會結構不可能不改變。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國家從一黨專政變爲多元政治的，還沒有先例。中國能否做到，有待時間來回答。

海峽兩岸與多元化政治

記：海外人士就促進中國走向多元民主的演變，可否做些事情？

黃：我們在海外的力量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力量，頂多只能促進海峽兩岸社會及政府的認識與發展。同時我們應該了解，我們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做出很多的成績來。基於這些對現實的了解，我們才能冷靜地考慮問題，真正做些實事。

一般地說，我們目前可能做的事情有兩點：一是澄清和宣傳一些多元民主的政治觀念，使執政者和知識界對此有較深入的了解；同時也做一些更具體的事情，敦促國內改變一些具體的政策，如人權保障、官僚制度的改革等。但我要強調，我們要對各種問題有確實的了解，不能隔靴搔癢。從貴刊知道，從中國來的年輕的經濟學家和國際政治學家，已經組織起來，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比我們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們，要多得多，深得多。他們今後必能對中國許多具體政策的制定，提出很多有價值的意見。

另一方面，對若干個別事件和案件，比如說，人權方面的案件，我想我們在海外的華人，應該出來呼籲批評，施于中國政府某種壓力，希望政府能夠讓步，遵守法制的約束力。

多黨政治與政治多元化

記：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多黨政治與政治多元化是否有某種關係在裏面？也即沒有多黨政治，中國能否轉變成多元的民主社會？

黃：當然，兩黨或多黨政治有助於多元民主政治的實施。從英美兩國經濟來看，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政黨確實是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不過，近二十年的情形，政治高度多元化，利益團體群起各自為政，政黨組織反而顯得衰微，沒有早年的勢力。當然，中國從沒實行過政黨政治。近來國內不少人主張黨政分開，強調政治協商會議、民主黨派的監督功能，可說是對政黨政治作用的一種了解。台灣黨外組織的努力，更說明對政黨政治的期待與追求，企圖以組黨來突破多年來來的僵局。今後幾年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中共對地方分權的限制

記：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是否中央向地方分權，會有助於多元社會的形成？比如美國的例子，各州都有自己的旗幟和法律，聯邦政府權力有限。

黃：中央向地方分權，是有助於多元化，但也要看是否在法律上，在制度上有保障；同時，當代社會複雜，傾向中央集權，美國也不例外。二十世紀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權力日增，地方權力相對減弱。我們中國的政治傳統及共產黨組織，在可預見的將來，對地方的權力仍然會給予很多限制。

從意識型態到落實

記：對於一個社會的多元化，是否應從意識型態方面作起？允許各種政治學派同時並存，使人首先從觀念上多元化，才可能在實踐上多元化？

黃：允許各種政治學派共存，提倡教育人民容忍異己，對民主有共識，當有助政治多元化。但根本上只有許多利益團體在政治過程中獨立運作，多元政治才能實現。這幾年來，國內學術界十分活躍，開始討論人的價值問題，討論革命的人道主義問題等等，這當然是一個突破，只是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傾向，常過份強調文化、思想的層面，以為掌握了文化、思想層面，改革就成功了。我看恐怕不是這麼簡單。一次大的變革，既涉及文化、思想，也必牽涉到制度、法律，更必須體現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上。

我是不朽的

(國內) 林島

1 幻夜，我
幾隻游魂，幾處夢
去拾撿水中的云，
沙裡的柔軟。
而來的，却是壓倒小草的風
吹成銅臭色
凡是水就混濁，
是沙就粗礫。
游魂不歸，我為空的軀壳
於是，我編織
痛苦的繭，將自己纏縛

2 孕育，把時間拖得好累呀
聽不到墮下的哭聲
而我為先知，觸見微細的胎動
我恍然，水也是母親
孕育着，她用美瞳說
混濁沉澱，我為清澈
光不息，我必永恒

3 當編織憂傷的手
重新雕塑太陽
衆彩匯聚，我是其中的一束
賦花的翠綠
賦草的水紅
土地，不是畸形的
該毀的必毀
以新為不朽。
你，脫開軀壳的纏裹
却是一只袒露的、跳動的心
那濺起的濕潤，是血、還是玫瑰
問我，我也不知

● 文藝園地 ●

從哲學角度看多元

專訪青年哲學家方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編者按：方舟先生為中國大陸青年訪問學者，對東西方哲學均有較深的造詣和獨立見解，文中楊代表楊漫克，方代表方舟，本文發表前，未經方舟先生過目。由本刊負起文責。

楊：方舟先生，多元論和多元化雖然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概念，但其在哲學上的基礎和淵源還是很長久的。您是搞哲學的，可否請您談談人類對世界的多元認識和多元思想的發展過程？

方：一般說，哲學是追求世界最終原本的學問，這種任務產生了一種一元論的傾向，這就是就西方哲學而言。在中國古代，並沒有非常發達的、獨立的哲學，而是涉及多方面的內容(DISCURSIVE)。

在西方，希臘人最早尋找萬物的根本，如泰勒斯(公元前六世紀)認為水是萬物之本。但哲學家立刻就遇到這麼一個問題：存在和思維哪個是第一性的。人的思想必須有對象，這麼看，存在是第一性的；但人若不想，就無從談起存在與不存在，這樣，好像思維是第一性的。這個疑難問題就產生了二元的傾向。希

臘的巴門尼德(公元前五世紀)就提出了思維和存在同一的說法，但他並沒有尋找更原本的東西。至於中世紀的歷史，我就不講了，再從近代哲學講起。

近代哲學是從笛卡爾重新開始的。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題，把思想放在存在的前面。但笛卡爾本人也是自然科學家，在研究自然界時，他又明顯地把存在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他的哲學實踐，實質上是二元論的，但他本人却強調自己是一元論者。

西方哲學史中，康德很重要，他也被後世認為是二元論者，他的情形與笛卡爾頗為相似。康德的名言是「理性為自然立法」，這樣就把理性放到了絕對的位置上。但康德遇到了以往哲學上的同樣問題。他說，一切事物必須經過感覺，才能被我們認識，那麼，在感覺之外的事情我們就無法知道。這話是同義反覆，即我們不知道的我們就不知道。康德因此承認，我們的感覺必定有一種來源，雖然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樣子，但是它必定有。康德把這種來源稱作「物自身」。故康德哲學被後世看成二元論。同時，康德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二律背反」定律，它包括四項：(一)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有限的，同時又是無限的；(二)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都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同時又是複雜的、可分割的；(三)世界上存在着自由，同時又不存在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四)世界有始因，又無始因。我們可以把它看做二元認識的一種規律。

繼康德之後，就是黑格爾。他提出了用「絕對精神」的概念來統一切，即統一邏輯、自然和精神的理想。這樣黑格爾就成了德國古典哲學中重要的一元論者。再往後就是馬克思了。馬克思也是一元論者，一般都這麼認為。馬克思反對精神一元，提出物質一元。他特別提出了社會經濟基礎 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在哲學意義上就是物質決定精神。不過，在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他相當強調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也把這種看法加以強化。故後世的評論家中，有人認為，馬、恩的學說說到底，也是二元論。

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統一問題

可見，哲學家都有這麼一個傾向，即在尋求最終原本時，都認為自己是一元論者，但同時又避免不了二元論的思想方法。你確認了A，就等於承認有B存在，這是一種哲學上的似是而非(PARADOX)。你說一切都存在，下一句就是，不存在的是什麼？或者說無是什麼？一切都在宇宙之中，那麼宇宙之外是什麼？故一元論有它天生的難點，這在中國老子的哲學中體現得很清楚。老子認為元到底是什麼東西，實際上是不能說的。老子的「道」，就是一種不可道出的「道」，這樣才能是一元，你只要一給「道」下定義，就等於把某種東西排除在道之外。故老子是這樣對待一元論的內在矛盾的。

楊：二元論是否有多元論的傾向？

方：從哲學意義上講，二元論並不傾向於多元論，而只是一元論的補充。事實上持二元論的人，也非常想將其哲學弄成一元論。實際上，反而是非教條的一元論本身，包含着多元論的因素，黑格爾、薩特都是例子。

從認識論的角度講，我們認識一件事物，常用另一種形式來證明，把二者同一化。如用B來解釋A，加深對A的理解。理解就是同一的過程。但同一要採取許多不同的方式，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認識是具體的、客觀的，我們不能用哲學推理出一個世界來，儘管我們有統一的精神。從這種意義上說，一元的認識論不排除內在的多元認識論。

二元論是一元論難點的反映與擴充。是否有另外一種方法克服一元論的矛盾而又堅持一元論呢？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比如說，本世紀最走紅的存在主義哲學，就是在做這種嘗試。存在主義始於海德格爾，他是從「存在的統一」的意義」這個命題着手的，這就說明，他也堅持了一元論的方向。但在他的研究旅途上，仍舊遇到了老矛盾，即無論你怎麼規定存在，都給不存在留下了餘地。於是他尋求兩者的統一。到了薩特的階段，薩氏便開始說，講一元論並不是講肯定的（POSITIVE）東西。所以存在主義哲學，很崇尚中國的老子哲學。薩特對存在不作硬性的規定，他認為一元的統一是在散佈在現象下面的，而一切現象都應被人們從現象本身的價值中去認識。涉及行動時，就是按處境的本身性質去行動。他是一種承認多元的一元，是一種統一的精神，而不是教條。因此，薩特在他的政治學著作中，儘管反對資本主義但又特別強調社會主義本身沒有共同模式。如果社會主義找到了共同模式，社會

主義就死了。他認為恰恰是因為社會主義有各種模式，它才有精神上的統一。如果大家都堅持自己的模式是唯一正確的，統一也就消失了。這是一種一元與多元的辯證問題。其實，所有大哲學家都反對建立教條式的統一，只是沒有薩特敘述得明顯。馬克思、黑格爾都是如此。馬克思儘管教條些，但他並沒有規定社會主義的統一模式，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馬、恩兩人一生在工人運動中尋找了各種各樣的革命途徑。

多元治國與分權問題

楊：西方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直接現實性，下面請您談談，二元論或多元論對現實生活和現實政治的影響。

方：這方面我想首先要提到洛克，他的學說，對整個西方分權政治的影響巨大。國內學者一般認為洛克是二元論者。洛克是康德的先驅，他的學說後來被康德所發展。康德自己說，他的思想是被休謨喚醒的，休謨是洛克的直接繼承人。所以，近代哲學從英國轉移到了德國。洛克、貝克萊、休謨之後，英國再沒出大哲學家。

洛克從未認為自己是二元論者，但他認為一元論的思想與其政治分權說並不矛盾。他認為國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這個整體恰恰只有通過不同的環節，才能統一起來。如果只有一個君主來統治一切，只能把這個國家搞得分崩離析，故才有中世紀的封建割據狀態。而現代的國家（也即洛克的理想模式）中，不同的利益階層、集團，都有它在政權中的代表，使各種利益得到反映和協調，才構成國家和政體的統一。這種統一不是集權，不是「一元化領



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洛克

導」，而是一個指導原則，並且與集權恰恰相反。歷史證明，集權政治的統一總是維持不長的，它不是根據社會的客觀存在建立起來的，而是以個人意志強加給社會的。中國是個例子。中國的政工幹部什麼都要管，包攬一切，事實上什麼都幹不了；而在美國，權力好像是被分掉了，但每個行政官員，就他所能施行的權力範圍來說，是擁有相當絕對的權力的。比如說，在行政機構，如果哪位部長發表了與總統政策意見相悖的看法，他立刻就會被解職，這是行政機關有效運轉的條件。但在國會這種立法機構中，就要盡最大的努力讓不同觀點提出來，這是各機構的職能不同，並不是說，這裡統一多，那裡統一少。

儒道思想中的多元傾向

楊：中國的政治受儒道兩家影響很大，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否是由於這兩家思想的政治化所致？

方：中國古代是集權社會，認為中國古代

是封建主義的說法並不確切，無論在政治學和歷史學上，都是講不通的。但是，中國的極權主義維持了很多年，與歐洲相比顯得非常突出。原因之一，就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對政權的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老子的道是「大一統」，但又不是事事都管的大一統，而是「無為而治」，事事不管，讓每件事情都按照其本來的規律去自己發展這麼一種大一統。

對儒家思想，後人有曲解，好像孔子事事都要管。其實，這不是孔夫子的思想，只是後世統治者的一種運用。莊子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問。」大一統的事情，聖人是不關心的，只能就事論事。孔子也講：「大道不器。」即我們要按照事情的原樣去做，不要固定於一種模式。中國的帝國統治之所以能夠延續幾千年而不衰，與歐洲的封建狀態不同，就在於在大一統下，對下面的事情干涉並不很多。當然，也有許多人的印象與此相反。事實上，正如俗話所說：「日子好過不見官」、「天高皇帝遠」。做官的也有這麼一句話：「民不舉，官不究」。這種情況與農業自然經濟是吻合的，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於我何有哉！」

中國古時的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是結合在一起的。行政也沒多少事，而是通過司法來執行的。

產生多元文化的幾個因素

楊：我想您講的只注意到了自然經濟的自由方面，但就整個國家來說，對其它方面的控制還是相當集中的。比如鹽鐵貿易，完全由中央政府獨攬，民間不得經營。對海外貿易也是這樣。故倫理上重農不重商。剪伯贊在他的「

中國通史簡編」中認為，明代廣東和蘇、杭一帶已經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有些手工坊達到上萬人的規模，後來由於中央集權的嚴格控制，才無法發展起來。

方：我的看法如下：首先，社會五大型態的劃分法，我是不同意的。第一、中國古代劃為封建社會就不通；第二、資本主義與商業的關係也不能完全吻合，比如說，古希臘、羅馬的商業是非常發達的，但那時顯然不能算做資本主義。商業在中國，是通過帝國的協調進行的。不是靠商業本身來拓展的。歐洲的國家都很少，地理變化又很大，這才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馬克思提出過，海洋能促進貿易發展，大陸則對貿易起着封鎖作用。海洋永遠是溝通民族的。黑格爾也說：「有為的民族總是面向海洋的。」歐洲的南部有地中海，東部有黑海，北部有波羅的海。可以這麼講：中國沒有商業可以維持（並非控制）；歐洲沒有商業就不能維持。商業精神可促進社會的不斷改變，從而帶來了近代的資本主義。

楊：中國古代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區。從地理環境來說，長江以北的海岸線是沙質結構，很平直，沒有天然港；而長江以南的海岸線是岩石質結構，却不是文化中心。可見地緣作用對歷史影響之大，它限制了中國人面向海洋。另外，文化上，東西差別也很明顯吧？

方：就文化差別來說，中國是講教化，歐洲是靠宗教。加上前面的因素，可以說，歐洲天然就有一種多元狀態和思想。

楊：不過宗教好像不利多元思想的發展，宗教追求最高身外崇拜，即上帝或神的崇拜。方：早期歷史還是沒有一元宗教的，希臘、羅馬、西亞和埃及，都各有各的教。只是到了公元六世紀，才形成統一的基督教。但到了

十五世紀，各種新教又興起，只是中間的一千年形成宗教的統一，而在這前後的宗教都不是統一的。此外，歐洲的印地歐羅巴系人種非常多，且居住集中，而中國的人種則較為單純（主要指中原地區）。

同時，我還想談談殖民問題。內陸的殖民總是要被同化。歐洲希臘時代便向海島和北非殖民。中世紀末，這種殖民精神迅即重新滋生。而中國的明清兩朝，就沒有向外尋找出路。殖民精神同樣可以帶來多元化狀態。子邦與母邦的關係是既獨立、又統一的關係，這也是中國政治中所沒有的。

總之，人種、地理、文化、商業、殖民等相互作用，形成歐洲政治、經濟的天然多元傾向。而宗教在中世紀形成了一種教條的一統，但前後也是多元的。中國沒有這些因素，但教化的統一包含了無為式的和諧，只是一種軟性的統一，也不能說沒有多元內容。因為教化只提供一種統一的理論或倫理，並不提供一種統一的組織，這就不同於宗教的組織，後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統一作用比教化要強大得多。故教化更符合社會的自然，中國也就形成了統一，沒有歐洲那種封建的中世紀黑暗和分裂。中國的儒道兩家形成了一種非常高明的統一之術，遂有中國古代秦以來的盛勢。直至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才停止了延續。

中國現實的多元問題

楊：提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我想問問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勢，而西方民主政治不能在中國得勢？是否有某種內在的類同，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統一術中？

方：在講歷史的必然性時，也要同時講偶

然性。我想首先與北方的蘇聯出現了社會主義政治實體有關。其次，與孫中山聯俄政策有關，否則共產黨不會在幾年內形成全國規模。再者，與抗日戰爭有關，否則共產黨不能發展強大的武裝力量。當然，我不能肯定地判斷歷史的必然與偶然，更不敢說一系列因素都是必然或偶然。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勢的必然性也缺乏足夠的論據，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更不清楚。

楊：從中國文化與中國現實諸多方面看，您認為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前景如何？

方：概括地說，從哲學的意義講，一元論和多元論並不直接對立，而比較偉大的哲學家，都能對不同的情況加以承認。集權主義從一元理論尋找統治的根據，純屬對哲學的褻瀆。至於現實問題，我不願談及。公平地說，就中國人的智力和文化創造力而言，建國三十年的局面是比較令人失望的，問題之關鍵是中國人根本還沒有弄懂現代政治，而要學習現代政治，多元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從任何一個國家抄來一個樣本或模式，無論蘇聯的、還是西方的，抑或南斯拉夫、匈牙利的。中國是一個原始文化的國家，與南韓、新加坡等小國不同。中國肯定要發展一種自己的獨特的東西，只要有效，哪種模式都可借鑒，無論叫什麼都行。走自己的道路，本身已經是多元化的態度，它意味着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不同利益集團，都應被允許走自己的道路。國家的任務只是去協調。

對政治而言，中國出現第二個獨立的政黨，長時期內不大可能。但要把中國社會引入正軌，又不能不採取多元的態度。最好的辦法是避開政治，使一個有財經力量的獨立集團先出現。這樣，第一個好處是造成實質的多元局面

；第二個好處是淡化政治，有利於國家之穩定。因為經濟集團的發展非常需要國家的穩定，不允許國家政治顛三倒四。他們會成為與政府協調的、但非同等的力量。這是部分開明的共產黨領導可能允許的。

楊：前一段官商的出現，很可能使一部分政治僵勢轉為經濟動力，也構成了政治以外的一元。無奈被打擊下去了。我看投機並不可怕，中國人誰都沒有資本，而沒有資本的迅速集中，就沒有經濟的迅速發展，投機的破壞力是

……連續專題……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三)

當心毛廠的現成帽子

(美國)商北雁

「天安門事件」人們踴躍喧嘩推崇周恩來，其目的是為了貶低毛澤東；人們歡呼鄧小平復出，也是為了反擊毛澤東。人們盼望在鄧小平領導下，來一次徹底的反毛運動，而鄧小平却仍舊舉起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人們的希望破滅了，但巨大的怨氣、冤氣在壓抑著、鬱結著，等待爆發。

鄧小平沒有把握時機，徹底批判毛澤東，一是因有葉劍英、陳雲、許世友等人的反對；二是他沒有更高明的理論取代毛澤東思想。改良主義只能是過渡階段。

沒有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毒害，給了鄧小平為首的革新派以很大的困擾。而今反對鄧小平的人，在用毛澤東的教條棍子，來教訓、約束、懲戒、鞭打革新派了，修正主義、走資派、無產階級叛徒，這幾項帽子都是毛記帽廠出品，現成的。鄧小平也有自知之明，他所實行的一套，和毛澤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革新派也

由於立法不夠造成的。

方：投機是有好處。一方面，可刺激人們發財的要求和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立法的嚴謹。立法永遠是需要刺激才能出現。沒有商業，就不需要商法。從外國搬法，中國沒有對象。只有中國本身的經濟活動提出要求，才會出現相應的立法。

先有社會的多元，再謀求政治的多元，政黨的多元，權力體制的多元，這樣的發展是有些可能性的。

發覺這些帽子扣下來的危險，已經意識到只有徹底批判清除毛澤東的影響，才能更有力地摧毀那些保守堡壘，他們的改革才有希望，才能向前推進。在切身利害攸關的情況下，改革派必然要聯合廣大群眾、文革受害者、知識份子來一次反毛運動。也許運動開始時是和風細雨的，但終會形成燎原之勢(不會像文革那樣)。

「不破不立」這句話對批判毛澤東來說也很適用。

通過批判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以樹立全面正確的辯證法；通過批判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培養幹部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通過批判毛澤東的特權行為，以振興法制，消除特權。

批毛運動是革新派擺脫束縛大步前進的起點！

什麼是多元論？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張鴻林

一、多元論的思想特徵

什麼是多元論？如果用這個問題去問一百個人，你很有可能得到一百個不同的回答。這或許正是「多元論」這個名詞所蘊含着的思想的根本特質。

一個哲學家會說多元論表示人們獲得真理的途徑，甚至真理本身就是多種多樣的，沒有定於一尊的真理。一個歷史學家會說多元論表示歷史的發展不存在一種必然的命運或規律性，歷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的一種創造過程。一個政治家會說多元論表示每個人都有權利表明自己對一件事物的看法，並且能夠在涉及本人利益的時候維護這些利益，誰也不能使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一個經濟學家會說多元論表示自由市場經濟概念。而一個同性戀者則或許會說多元論表示他有權利成爲他自己 (TO BE WHO HE IS)。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背後，我們很難歸納出一個多元論的定義。但是，如果我們說多元論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多樣化，我們不會失之太遠。今天的西方社會本身就是多元論的極好例證。在美國政壇上，有多少種政治力量在爲

多少種政治利益和主張而競爭？在思想界，無論是哲學、歷史、經濟、法律和文學藝術，又有多少種流派在湧現？在新聞界，又有代表不同觀點的多少報刊雜誌？要知道什麼是多元論，我們從現今中國這個反面例子中也可以學到很多。中國全國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唯一並且沒有對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一份具有最高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等等。毛澤東本人在這方面也教給了我們很多東西。如果說有一個多元論的逆定義的話，毛澤東則繪出了最準確的圖案：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在今天的西方民主社會，多元論早已不再成爲一種思想潮流，而是作爲一種廣潤而無形的文化背景，滲透於民主社會的各個層面之中。但從歷史角度看，多元論在西方的產生、發展並取得今天這樣的地位，也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

二、教會與一元論

在歐洲的中世紀時代，無論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都是與多元論相對立的一元

論佔統治地位。教會作爲上帝在塵世的代表，控制了整個社會。教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不可動搖的權威。教皇壟斷了對聖經的解釋，在西歐中世紀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因而也就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這些很明顯的歷史事實我們就不多敘述了。我們現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會出現這種一元論壟斷的歷史現象？

下面四個相互聯繫的情況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由於歷史的原因，教會在中世紀開始時，即羅馬帝國滅亡之日起，就佔有了歐洲大部分土地，這使教會成爲當時社會中最重要經濟力量。與此相對照，作爲僱農和農奴的農民則既軟弱無力而又分散。至於皇帝和國王們，則在經濟利益上同教會緊密相連的，他們本人就是教徒，更要依靠教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沒有與這種強大的經濟力量相抗衡的另一種力量，是一元論在中世紀稱霸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必然相伴隨另一種情況：教會在政治上的強力統治。在中世紀，教會的各層次機構直接就是政治統治的形式。從神父、主教、紅衣主教一直到教皇，掌握著政治、軍事領域的幾乎一切權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與之較量。

從多元論作爲一種文化思潮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對自身、對世界的認識程度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是接受多元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在羅馬帝國被蠻族滅亡以後，西方歷史上曾出現了一個所謂「文明的中斷」。在當時的文化沙漠裏，只有教會保存著歷史上傳留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在當時，知

識分子與神職人員是同義詞。一方面是由於科學處於停頓或被遺忘的狀態，另一方面由於宗教這種文化現象的特有本質，獨斷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一切知識，一切答案都可以在聖經裏找到，這就是教會最基本的教義。而對聖經的任何解釋，又唯一掌握在教皇和宗教裁判所手裏。對當時的廣大人民來說，他們除了聖經，也確實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文化源泉。教會在思想上為他們建立了一種穩固不變的秩序，他們在這種秩序中獲得了安全感與人生的意義。在沒有任何新的知識來衝擊這種秩序的情況下，他們的頭腦也已完全失去了敏感，他們已安於這種秩序。

產生上述三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人對自身的權利、對自身的尊嚴、對自身的自由，被剝奪了。用一個哲學術語來說，那麼人就是處於一種徹底「異化」的狀態之中。人將自身的一切權利、尊嚴與自由轉到了他所創造的上帝身上。人在上帝面前，顯得無比的渺小，放棄了自身的一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處於這種異化的狀態中。對統治者來說，上帝的意志與他們的利益合為一體，與整個現有制度合為一體，他們自身也成為這整個一體化的一個身不由己的部分。對被統治者來說，他們身上所重負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枷鎖使他們的眼光極為狹窄，他們看不到任何別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作不出任何別的選擇。沒有權利、尊嚴和自由的人，就是無個性的人，這種人只能構成一個同一化的群體。

上述四種相互作用的情況，可以為中世紀的大一統歷史提供一個簡單而概括的解釋。

三、多元論產生的歷史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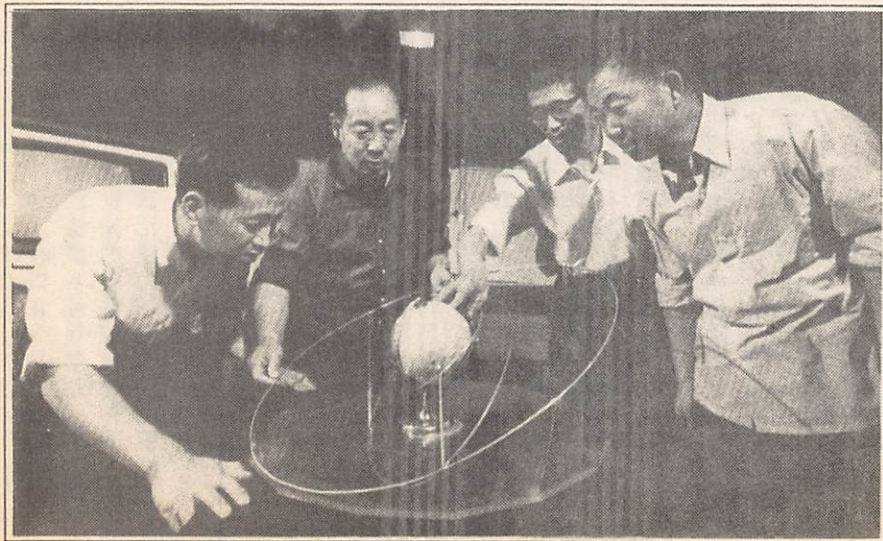
那麼，這種沉默的獨斷局面是怎樣被打破的呢？換句話說，產生多元論的條件是什麼呢？答案是：新的經濟力量的產生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社會階層和他們的不斷壯大；科學的產生與發展及其給人類帶來的一個新的世界；人對自身的重新估價和對自身權利、尊嚴和自由的重新佔有；最後是整個社會政治制度的徹底改變，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反過來又保障和促進了這一整個新的局面。

從歷史上看，中世紀大一統局面的瓦解是從所謂「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文藝復興」這個詞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似乎它僅僅是一種文化運動，並且是一種回歸於古代文明的文藝運動。但這個詞所代表的幾百年的歷史都是一個極為複雜和豐富的歷史過程。在這一歷史時期裏，整個西方社會經歷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劇烈變動。

本文不想敘述這一歷史過程的具體細節。概括來說，首先要有人感到有一種明確意識到的現實要求來維護和發展他們的利益。這批人就是在當時越來越強大的市民階級。主要是他們的經濟利益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政治權力，與當時的封建制度不相容，他們要求打破這一獨斷的局面。在這個鬥爭中，他們首先要打破中世紀思想上的專制。他們急需一種新的思想武器，用來解釋和證明他們所帶來的整個新的經濟活動、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科學在這個時候便應運而生。科學在本質上是站在多元論這一邊的。首先，科學根本不承認有一種一成不變的權威、萬世不移的真理。科學承認自己所由以出發的前提具有假設性質，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任何一種假設都有可能被推翻。當哥白尼宣稱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時，當伽利略用實驗證明亞里士多德關於物體

垂直下落的論斷為錯誤的，多元論的興起已是必不可免了。獨斷論在思想上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有一種不可改變的真理，這種真理是由最高權威來保障的。科學本身駁斥了這一點。而科學在這樣做的時候，依靠的不是任何別的東西，而僅僅是事實。對獨斷論的擁護者來說，他們也可能建立一整套理論依據來證明



在科學的研究過程中，任何一種假設都有可能被推翻。

他們那種獨斷的教義。但僅僅當科學宣佈它願意站在同等的地位對這些理論本身進行檢驗證實時，獨斷論也立刻破產了。科學的第二個重大的作用就是給人們展現了一種無限的可能性。對獨斷論來說，當人們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行星，並且這種新發現似乎沒有窮盡時，宣稱我們對宇宙已獲得了一個完美終極的認識就顯得頗為可笑了。在過去，獨斷論正是以它的獨斷獲得人們的尊重，而現在，這種獨斷却使人產生滿腹的狐疑。科學使現代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成了懷疑主義者，這些人不可能再成為獨斷論的銷售市場。

多元論產生的另一個最重要前提是個人對自身個性的肯定和尊重。當歷史把人從一種完全抹煞個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中解放出來時，人的個性就開始得到肯定和尊重。西方文明對歷史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它所提出的人道主義思想。在今天的中國，在經歷了共產黨幾十年的專制統治之後，與世界重新接觸時，人們重新舉起了人道主義的旗幟。但是，就是在中國頗為激進的人道主義者，對人道主義的理人在某些方面也帶有獨斷論的色彩。當他們對人的本性是什麼這個問題進行激烈爭論時，却正在把人限定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中，仍然以群體的觀念來理解人。在某些人的頭腦中，人道主義與「仁政」相去不遠，這種情況是令人悲哀的。那麼人道主義到底是什麼呢？人道主義不是按照某種特定構想的「人的全面發展」，不是讓人生活在某種天國裏的夢想，不是由一部分人去解放另一部分人，不是由一部分人來實行它，而由另一部分人接受它，不會帶來感恩戴德的結果。人道主義是什麼？人道主義就是每一個人自身明確意識到對自己的自由的肯定。人道主義的核心就是個體主義。人道主義

的歸結點不在於某種理想化的圖式，而在於每一個人。馬克思所理解的人道主義就是建立一種理想社會。他把這點看作一種歷史的必然，人類的命運。這樣理解的人道主義只能帶來專制與不人道。當把人道主義同一種歷史規律和普遍準則固定起來時，這種人道主義就變成了一種獨斷論，而獨斷論與人道主義是格格不入的。

作為個體主義的人道主義同多元論的關係是很明顯的。沒有每個人對自身權利的肯定，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不可想像的。沒有每個人對自身權利的肯定，科學仍然不能把人從愚昧中解放出來，因為科學對人的一個首先的要求就是每個人作出獨立的判斷。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一個多元論的社會對個人有著很高的要求。成爲一個個體、成爲一個獨立判斷、自由思想的人是多元社會人的特點。很多人口頭上追求自由，但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真正的自由同時又是一種怎樣的重擔。一個多元論社會的建立發展與穩固，都需要有大批能夠勝任這種重負的人的存在。在今天的西方社會，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通訊廣播事業的普及，大工業生產的要求，人們又再度面臨著一體化的危險。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西方文化現象中各種先鋒流派的出現實際上起著抵消這種一體化趨向的作用。

總之，多元論並不僅僅是「多」，它有一個不變的「一」，這就是對個人的權利、自由的肯定。這一點是多元論的最根本的基礎。

四、實用主義哲學體現了

多元論的精神

從思想方面來說，實用主義哲學真正體現了這種多元論的精神。「實用主義」這個詞容

易使人產生誤解。破除這種誤解的一個方法之一是要問：「實用」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或問：我們可以在什麼場合之下使用「實用」這個詞？對這個問題稍加思索，就會發現我們達到了一種無限可能性的境地。我們發現我們絕對找不出使用這個詞的統一標準，我們找不出這個詞的定義。在一些場合下關於「實用」這個詞的定義適用，在另一些場合下便變得不適用了。這種情況表明了什麼？它表明了實用主義並沒有爲此規定了一種絕對的思想方法和行動準則，相反，實用主義給予人以一種平等的行動和思考的自由。實用主義並不預先爲人們規劃面對各種情況時的反應模式，相反，它要求人們在各種場景下發揮自身獨立的創造力。對不能擔負這種重擔的人來說，實用主義會激起他的反感，因為他發覺實用主義給予他的這種自由使他無所適從。在這時候，批評實用主義是一種純粹的主觀主義，否認了客觀真理的存在。這種說法便是一種絕好的擋箭牌了。但從歷史上看，恰恰是「客觀真理」和「歷史必然性」這類字眼成了獨斷論和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所最欣賞的東西。事實上，對個人的肯定和個人之間的合作並不總是相互衝突的。問題在於，使得人們之間有效的合作的基礎是什麼？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這正是實用主義所最終依靠的對象，也是多元論真正的基礎。

五、當前中國如何

實現多元論？

在今天的中國，多元論要求什麼？

首先，它要求建立一個政治上民主的制度。它要求破除那種一個政黨、一種思想獨霸的局面。它要求給予每個人在政治上自由選擇的

權利。因為只有在這種制度下，多元論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建立與發展。

在經濟上，多元論要求提供給每個人為自己而工作的權利，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從今天來看，自由經濟制度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反過來，也只有這種制度下，多元論的基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夠得到真正的保障。

在思想上，多元論要求打破那種「萬馬齊瘠」的窒息。確實，千千萬萬人用同一種準則思想，以同一種方式生活，它的最終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的消失。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論是多元論的命脈。

要使多元論的這些要求得到實現，並不能依靠任何人的恩賜——這是與多元論的精神絕對相反的。既然多元論的基礎是那些獨立判斷、自由行動的人，那麼，要在中國建立政治、經濟和思想上的多元性，就需要這樣一些人的存在和他們的努力。這些人有過，也曾經努力過，但他們為數甚少。可是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在今日的中國，在真正知道了獨斷論會帶來些什麼後果之後，這些人的隊伍正越來越壯大。我們的希望就在於此。

多元論本身以及它的這些要求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們以歷史和現實的事實為依據。無論是從中國歷史還是從世界歷史看，無論是從中國的現實還是從世界各地的現實看，我們都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獨斷論盛行的時候，歷史就倒退，人民就遭殃，文明就衰敗；反之，當多元論進入舞台，歷史就進步，人民就幸福，文明就昌盛。

進步、幸福、昌盛相信是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只要我們把這種願望化作實際的行動，多元論在中國的盛行是大有希望的。■

● 文藝園地 ●

恐懼

深秋寒夜，在燈下與知朋密友暢談文學大家、古往今來的各大宗流，不能不算是一件雅事。

可說來說去，不過還是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等，說多了倒也乏味，何況今人無法與昔聖相比，這個時代本不是輩出文學大家的時代。談到最後不只相視枯坐，望着昏暗中彼此有些變形的臉。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朋友悠悠地說：

「昨天，我做了一個夢，似乎有些奇特。不知道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做的！也不知道是在工作時、還是在休息時做的，哎！其實這都無關緊要，關鍵這夢有些蹊蹺。我講給你聽。」

他呷下一口茶，似乎鎮定了一下心神繼續說：

「我走進一幢房子，裏面空蕩蕩的只有幾件傢俱。四週的牆是白色的，傢俱也是白色的，甚至連鋪着的地毯也是白色的。只有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堆各色各樣的畫框。」

「看！他們在朝着我移動。」他眼睛直直地盯住我房子的一個角落說。

「他們在向我說話，說什麼我似乎聽不清楚。噢，聽清楚了！」

粉紅色的在說：「選擇我吧！看我多麼多情，會使所有的痴男怨女們流淚。」

白色的說：「看我多麼高雅、清心，準會博得雅士們的贊賞。」

(國內) 孤子

黑的說：「瞧我，一派的老成持重，元老院的人一定會誇獎你重視傳統。」

最後金色的驕傲起來，「我便是太陽，如果你永恒，你想光耀，必要歌頌陽光。」

他們擁擠着向我逼進，爭着要將我裝進去。

我在一步步地後退，已經退到了牆角。

「不！」

我大聲嚷着。

「不，不……我不願意掛在牆上看着少女們在下面流淚；我不願意讓雅士們稱頌我聖潔；我不願意讓元老們回予希望的一笑，在臨終前；我不願意讓愚蠢的人們為這輝煌而無用的陽光而膜拜。我是人！我不是掛在你們大廳裏的畫！」

我感到恐懼，使勁地把軀體貼在牆上。猛然間，回頭一看，才發現自己已被鑲嵌在一個無色無形的框架中了！……

我已開始凝固……

我不願意再往下聽他的故事，閉上眼，似乎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正刺透昏暗侵入我的薄衣。

下意識地，我把頭扭向一邊，彷彿要迴避什麼似的，微微地睜開眼。

寒冷的月光從高高的窗欄外射進斗室。兩個畸形的、黑乎乎的影子平平坦坦地掛在牆上好冷！

試論多元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中國之春」新近提出「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和多元」的主張，將「多元」作為民主運動的奮鬥目標之一，是一個理性正確的作法，在民主運動的思想認識和實際運作兩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試從哲學、歷史和現實政治幾個方面，探討一下多元的概念和內容。

一、歷史上的多元觀念的發展

脈絡及對政治的影響

在中外哲學史上，歷來存在著一元論與二元論及多元論之爭。從廣義上講，二元論亦可納入多元論的範疇。

追溯到人類文明的初始階段再縱觀下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大致的來龍去脈，就是由多元思想演進成一元思想；再從一元思想演進成多元思想。西方文化的這樣一個過程已經基本完成，而東方文化正在為重新進入多元階段分化和演變著。下面就中、西兩種文化這一演變過程作一簡略的比較。

中國：多元——一元——強化一元

中國的華夏文明之初對世界原本構成的認識，是主張多元論的。中國古代有五行說，把

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說成是世界之原本，從觀念上認為世界是多元的，並且把這些原本運用於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特別是當時國家的重要政治生活內容——巫術裏。與這種思想相並存的還有陰陽、道德等各種二元思想。這樣的哲學觀念，與當時中原地方各民族雜居的社會現實和後來的戰國七雄並存的政治局面是相適應的。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遂形成後來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這種五行學說的樸素多元思想在秦漢時代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更巨大的影響，成了中國古代著名「禪讓制度」的思想基礎。史料記載皇權的繼承要根據五行循環來決定。例如漢平帝時，人們就「土得」還是「火得」展開了爭論，遂導致了漢代當換新朝的結論，於是王莽便在一部分大臣的要求下出來篡位，建立「新朝」，滅了西漢。後東漢末漢獻帝把朝廷「禪讓」予魏，亦是有五行變換的依據。

雖然秦代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不是封建制），但由於只是以武力統一，一元論的思想和文化仍未被整個民族接受，才導致了二世而亡，各地舊貴族遺民紛紛起來造反。直至漢代武帝時期「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經學大師董仲舒才把「天」的觀念突出出來，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和「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一元一統思想，作為當時中央集權政治的理論依據

。這樣的一元思想歷經唐、宋、明各個朝代御用文人們的強化，才逐漸取代了以「禪讓制」為政治結構的多元文化，「天下一家，萬世一系」的皇權世襲觀念，最終得到鞏固，「大一統」的一元觀念在中國歷史上便佔據了統治地位。到了今天，這種一元一統的文化，便成爲一元論色彩最濃厚的馬克思主義根植於中國的深層文化土壤。

歐洲：多元——一元——多元

在歐洲，作為歐洲文明發祥地的希臘，也是多元論佔主導地位的。希臘是以雅典爲中心的城邦聯合國家，故多元文化是與這種諸多城市分治的政治局面相適應的。古希臘人首先創造了衆神宗教，並把人性從神那裏解放和表現出來，這是歐洲社會文藝復興後，自由主義與人文主義得以產生，自由經濟得以發展的歷史契機。在哲學上，古希臘也是多元論的市場。愛非斯學派創始人，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成是火、氣、水三種物質原本的循環運動，頗似中國的五行循環之說。古希臘哲學集大成者柏拉圖也主張理念和事物二元並立的觀點。古代希臘和羅馬儘管是奴隸社會，但在自由民主的範圍內，大部分時間還是採取多元民主的生活方式的。

中世紀的歐洲由於基督教的高度發展，遂使得一元論思想佔了主導地位，但是並沒有造成東方那麼強大一元政治結局。由於公元五世紀羅馬帝國滅亡時的民族大遷徙，從未像中國和印度那樣，形成統一的帝國局面。皇權與教權又爭持不下，在客觀上形成兩元政治局面。多民族與政教對立並存，使歐洲社會形成了不穩定的封建割據狀態，戰爭頻發。這種多元政

治局面使後來的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的出現成為可能。

經過中世紀宗教統治的經院哲學黑暗時期以後，多元論首先以二元論的形式重新抬頭。先有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物質與精神的二元本體論，後有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提出本體和現象的二元論。中世紀強有力的一統宗教，也在歐洲一分為三，形成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三分天下的局面。而西方中古社會由於諸多民族對羅馬帝國的征服，形成了典型的王海曼·馮·羅德的作品「雅爾塔之門」(一四八一)，顯示了西方政治中宗教勢力的地位。



與貴族並立的封建社會，加上宗教勢力，客觀上造成了多元的政治局面，這也是後來民主社會形成的契機之一。

在政治方面，以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和洛克的「政府論」為主導，影響和產生了現代歐美社會的多黨政治與民主政體。以自由主義為先導的多元思想，在歐美西方文化國家裏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綜上所述，在中、西兩個文化的思想發展

過程中都不難看出這種多元歸聚成一元、又從一元發展成多元的辨證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人類文明發展趨勢的反映：人類由野蠻的本性社會進入文明社會後，出現了一個對自己創造出來的文明不可理解的時期，遂產生了一系列自我異化的現象，而一元論認識和這種集權的異化文明是適應的。多元論認識與本性復歸的現代思潮，正是對這種異化的揚棄。

二、政治學上的多元思想概觀

從社會學的角度講，多元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籠統概念。元是原本的意思，多元即諸多獨立的原本在一個實體內並存。歷史上幾個民族在一個地域中共存是多元；意識形態上幾種思想體系在一個國度裏並存是多元；政治上國家的權力在社會上各個集團之間分配和多黨政治也是多元；經濟上自由經濟與國有經濟混合存在，都是社會的多元現象，是現代民主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由於篇幅所限，現僅就政治層面上的多元概念作一些討論。

一些概念和法則

多元真正成爲一個現實政治的完整概念(POLYARCHY)，乃是很晚近的事情。本世紀初葉，由柯爾(G. COLE)、拉斯基(H. LASKI)等人主張否定國家權力包容一切，維護社會特殊團體的權力與利益，提出教會、勞動組織、地方團體、家族等應有固有的領域，它們的特殊利益不可侵犯。拉斯基曾明確揭示多元的國家和團體的主權。其它學者則強調主權本身是多元的，國家並非利益統一的團體。他們從多數利益均勢的觀點，誘導出利

益共同團體的概念，進而主張國家主權的分權化。

多元主義在英文中叫做(PLURALISM)。西方學者認爲它有兩個規律：

- (1) 商合法則(BROKER RULE)。
- (2) 妥協法則(RULE BY COMPROMISE)。

這兩個法則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多元的意義在於將獨立的各種勢力以協商、聯絡的方式構成和諧之整體。不相關聯的多元存在并無實際意義。而某種鬆散實體中相關存在的多元之達成，需要以相互間的妥協爲必要條件。否則或者重新分裂，或者互相吞併，形成絕對的一元狀態。

談具體些，多元主義包括下述這樣一些內容：(1)由競爭和獨立自治的團體廣泛參與政治過程；(2)結社的多元化；對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問題，應出現廣泛的可行方案可用來參考或選擇；(3)政府的主要作用和功能，在於維護競賽法則(RULE OF THE GAME)，以防止個人不適當的積累權力；反對權力的集中化；(4)團體之間衝突的解決採取妥協與磋商的方式。

三元乃比較為穩定狀態

此外，我們還要特別提到二元與三元(多元)的關係。前面提到，從廣義上講，可以把二元納入多元，要有兩個前提：首先，與一元相對而言，二元可以歸入多元；其次，二元可做爲一元與多元的中間層次。二元狀態是衝突的、對立的、極不穩定的狀態，往往很快演變成一元。從物理學上講，三角形是最穩定的。這個現象在社會學中也不例外，因爲三元中間

如果沒有一個元作為緩衝和牽制的因素存在，必然會出現對立與衝突，最終由強者消解弱者，很難達成穩定關係。在第三者存在的牽制與緩衝作用下，另外兩元才能長期並存。例如：美國的中產階級就是作為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緩衝力量而對社會起到穩定的作用；中國在今天的世界關係中作為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中間的牽制力量，成為國際和平的重要角色。所以說，三元狀態是較為穩定的狀態。

多元與民主——一個座標的兩軸

多元和民主是一對孿生子。有人說多元是手段、民主是目的。筆者不敢苟同這種看法。民主是反映一個社會縱向關係的概念，主張平等、主權在民和權力自下而上；多元是反映社會橫向關係的概念，主張權力分開、政治團體並存等。做個比喻，如果把社會看成一個座標系，民主則是它的縱軸，多元是它的橫軸。民主政治的建立，常常需要多元政治相輔；多元政治的達成，也需要民主政治作為自下而上的依托。

下面我們就政治多元 (POLITICAL PLURALISM) 的概念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政治多元是表示權力在許多利益集團 (INTEREST GROUP) 或壓力集團 (PRESSURE GROUP) 中被分配開來，而不是集中在任何一個集團手中。雖然這些利益集團經常處在互相競爭之中，但他們在做出決定時，總是企圖達成妥協的解決方案。在現代政治的現實中，政治的基礎是權力的競爭，政黨就是為這種競爭而組織起來的不同利益集團。並且，政治系統的穩定是基於許多不同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妥協、包容來促成的。這裏

，競爭與妥協兩個因素是極其重要的。沒有競爭，權力不會分散；沒有妥協，分散的權力在競爭中會重新集中起來。中國的國、共兩黨的競爭關係，就是沒有妥協的最好例子。而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競爭關係，是達成妥協的最好例子。

三、以多元觀念取代中國的一統觀念

中國社會是一個「大一統」傳統佔主流的集權國家。雖然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時間比統一的時間要多，但是由於中國的集權高度結合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和給予了士大夫階層充分的權力機會，使集權獲得了高度的理性色彩，故得以長久維持。

可以毫無愧怍地說，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革命的歷史。但由於受到「大一統」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這些革命普遍具有一元的集權專制色彩，即使客觀形勢造成了分裂多元局面，各方面政治力量也不懂得如何在競爭中謀取妥協，而是一味追求吃掉對方，重新形成以己為正統的大一統局面，造成戰亂與集權專制的惡性循環。從清末北洋軍閥政府到國民黨政府，直至今日的國、共兩黨分立，都以正統自居，不知容納對方。可以說，中國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晚年曾有過在中國建立多元政治的設想和努力，聯合共產黨進行北伐。而後來的中國畢竟是中國，她產生了兩個非常相像而又對立的領袖，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毛澤東。他們都是中國這塊土壤上誕生的，都具有專制獨裁的傳統意識。蔣介石開了一黨獨大的先例，不許中共合法存在。共產黨在戰爭中取得了政權之後，因殘酷戰爭環境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本質，使得共產黨在專制獨裁方面

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共產黨現行的統戰政策，其最大的弊端在於用國家統一的堂皇外表，裝璜其消滅國民黨政治分立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涵。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切悲劇，皆可歸咎於國、共兩黨一黨獨大，不容異己存在的極權政治觀念。有些歷史學家曾經假設：如果國、共兩黨在北伐勝利之後或者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能夠互相包容，共建社稷，中國的局面就會比今天要好得多，強大得多。

多元與民主救中國

中國的現代史是可悲的歷史。「以史為鑑，可知興亡。」中華民族應設法避免重複錯差的歷史，從歷史中獲得可貴的經驗。中國的現實儘管不甚樂觀，但在民族充分自省、認識到多元政治的價值時，中國是會有希望的。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為一元正統的共產黨，在文革浩劫後，已開始認識到自由經濟的必要性，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人心，經濟體制的改革將使中國大陸步入混合經濟的結構。

此外，中國未來政治可能步入多元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契機，就是統一問題。香港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將會給生產效率低下的大陸社會主義經濟，造成巨大的反衝作用。共產黨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得不而且也不希望港、台兩個地區的繁榮經濟垮掉。

中國民聯做為一個政治壓力團體，應把在實現多元政治和經濟做為自己爭取的主要目標之一，應該努力倡導、團結和支持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出現和存在下去，支持大陸與台灣執政黨外的民主力量。我們說，只有多元和民主，才能救中國！（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五一六」之謎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柯奇

「五一六」的全稱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它是文化革命中揭發出來的最大的陰謀集團之一，另一個大的集團是內蒙人民黨，所有蒙族黨員都被打成內人黨。「五一六」據稱是具有全國規模、埋藏很深而又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集團，涉及到許多國家機密，所以報紙上很少披露清查內情。

「五一六」之謎現在已經揭開，但還沒有完全揭開。在鄧小平上台後，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五一六」份子已得到平反，筆者本人作為一名「五一六」分子，亦曾名列平反榜。「五一六」份子已一個個平反了，「五一六」陰謀集團實屬子虛烏有。筆者認為，和歷史上共產黨製造的其它冤獄一樣，「五一六」也是製造出來的，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甚麼「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但「五一六」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在文化革命中反映出甚麼問

題呢？現據本人親身經歷作一個概述和探討。

「五一六」的起源可能是由某個學院的學生用「五一六兵團」之名貼出一張把矛頭針對周恩來的大字報後，保周的一派趁機抓住不放，由這裏追查，越搞越大，終於捏造出一個大反革命陰謀集團來。追查的線索由學校開始，遍及於工廠、機關，最後集中到學部，即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化革命初期，學部的大字報貼滿整個北京市，到學部大院參觀大字報的人絡繹不絕，大有文化革命中心的趨勢。這是由於，當時中央文革小組跟學部有着直接聯繫，個別成員如關鋒，原係學部所屬哲學所研究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哲學所的吳傳啓、林聿時等起來造反，奪了原學部黨委的權。支持黨委的一班人也起來造吳傳啓的反，揭露吳傳啓的三反言行。兩派從學部打到社會，吳傳啓因此名噪一時。吳傳啓支持的

組織叫紅衛兵聯隊，反吳派的組織叫紅衛兵總隊，兩派相持不下，但吳傳啓有靠山，遂採用武力把總隊打垮，一統學部。中央文革見學部統一在造反派一邊，認為可利用，便委以重任。於是，由康生、陳伯達命令學部，由中央文革開介紹信直入保密機構和檔案館抄錄文件，收集有關劉鄧的材料供大批判之用；派學部人員到中央各部奪權，到外省市去煽風點火，寫大批判文章（當時報刊上許多文章以至社論，都出自學部一幫黑秀才之手）。但好景不常，風雲突變，中央文革拋出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傳啓及手下一批悍將便被專政機關逮捕，由此，聯隊分裂，瀕于瓦解，總隊遂復起。「五一六」一案追查至學部，聯隊各級骨幹全被打成「五一六」份子，遭到總隊的搜捕、關押、毒打，學部機關的黨員幹部馮寶歲當場被打死，被逼死或被打致殘的亦有數人。正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宣傳隊進駐學部後，即奉命展開大規模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從北京清查到幹校，又從幹校清查到北京。大略從六十年代後期算起，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宣傳隊撤離學部，清查「五一六」的時間比文化大革命進行的時間短不了幾年。「五一六」份子最後宣佈平反，已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了。「五一六」的罪行，借用宣傳隊的話說：「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這就是說，「五一六」的罪行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歸納起來有如下幾樁：組織陰謀集團，企圖取代共產黨；炮打周總理，分裂黨中央；搶劫國家機密文件，使絕密消息外洩，例如，民族所洪濤等人到統戰部、民委系統奪權，用卡車拉走大批材料，使很多內部檔案失蹤；反軍亂軍，借用「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衝擊各大軍區；最後，也是最嚴重的罪狀，準備反革

命政變，陰謀進入中南海，控制佔領中央首長的重要辦公室，實現全面奪權。

因「五一六」關係到黨的存亡，宣傳隊一開始就採取極嚴密的措施，把「五一六」的骨幹全部關押起來，與外界隔離，由宣傳隊組織人馬，照老一套宣講政策，頑固的「五一六」分子則受到大會、小會的不斷批鬥。學部全體人員下放到信陽「五七」幹校，一邊勞動，一邊揭批「五一六」。大約持續了一年，又突奉上級命令，指出學部是「五一六」的大本營和老巢，案件特別嚴重，要不惜一切代價，以全力進行清查。於是把已經建立的幹校農場全部拋棄，整個學部遷到明港的兵營進行清查。宣傳隊宣佈，斷絕學部人員與外界的一切聯繫，不許請假、外出、通訊，外來的來信一律由宣傳隊拆閱處理；各所人員活動的範圍只限於所在營房前後，要購買香煙和日用品的，由宣傳隊批准派專人去小賣部購買；行動實行軍事化，上食堂吃飯要列隊前往；兩星期有假一次，但「五一六」份子不能享受，其餘要外出走動的人由宣傳隊審批限制人數。除清查「五一六」，加強對「五一六」頑固份子的日夜批鬥外，餘下時間只准學習馬列。結果越清查，「五一六」份子越多。除原來聯隊一派全被打成「五一六」份子外，中間群眾和總隊的一部份人也給戴上「五一六」的帽子，昨天你還在大會上激烈陳詞，向「五一六」開炮，今天你就被當作「五一六」分子揪了出來，低頭受批，你自己不知道是怎麼變成「五一六」的？這叫做「五一六」批「五一六」，據說之所以這樣安排，讓你批「五一六」祇不過是看你表演而已。引用當時學部流行的一句話說：學部是三分之一的牛鬼蛇神，三分之一的「五一六」，三分之一的革命群眾，這最後三分之一的革命群

衆還在分化，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不變成「五一六」。但是防範雖然嚴密，仍有「五一六」份子尋機自殺而死。因鬥爭緊張，人人恐懼，且生活條件惡劣，幾十人擠在一間營房裏無活動餘地，前途渺茫，家庭分離，所以暴病暴死的時有所聞。某研究所的一位工作人員，晚上如常上床，第二天叫不起，揭開被子一看，早已斷氣了，怎樣死的也成了謎。這是名副其實的集中營生活。

「五一六」的罪行雖然嚴重，但首先要清查的仍然是組織，沒有「五一六」反革命陰謀組織，罪行不能成立。因此，清查的重點便放在組織形式和參加「五一六」的人員名單上。筆者曾奉命看守過一名「五一六」份子，大約知道一些「五一六」份子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裏先要解釋一下，筆者是個早已內定的「五一六」份子，宣傳隊怎會信任筆者去看守「五一六」的呢？並不是筆者反戈一擊有功。在文化革命初期，筆者曾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寫過兩張大字報，對造反派表示過同情，因此被打成「五一六」份子。但筆者很快清醒，明哲保身，不再參加任何派系活動，因此無罪行可查，在專案組的材料裏只不過是名小「五一六」。用筆者這樣的「五一六」去看守另一名「五一六」是一箭雙鵰，若筆者鬥爭不力，潛通消息，可隨時揪出批鬥。雙方都心中有數，筆者自不肯輕易上當；借此良機，筆者倒可了解到一些真相。筆者看守的「五一六」，是聯隊的一個小骨幹，有多年黨齡的黨員。宣傳隊突然宣佈對他實行隔離審查，已給他當頭一棒。接着被關起來，失去自由，他開始感到事態嚴重。宣傳隊和專案組每隔三至五小時來宣講政策一次，這叫用政策的威力來瓦解「五一六」。噁的語錄不外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

，它就不倒。」「敵人是會自行消滅的，」等等，有時唸上一整篇「南京政府往何處去」。翻來覆去講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並且恐嚇說，宣傳隊已掌握了他的全部材料，現在是要他自己交代，否則把材料擺出來，就要從嚴處理，影響到家屬，後果不堪設想。老婆也捎信來勸他走坦白的道路。他抗了幾天，眼看抗不下去了，表示願交代。於是宣傳隊來聽他交代的內容，由筆者作記錄。下面是有關的對話。

「我有罪，我對不起黨，參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交代你是怎樣參加『五一六』的。」

「我不知道，×××拉我去參加聯隊，說是為革命，我稀裏糊塗就參加了。」

「胡說，聯隊是群眾組織，『五一六』是陰謀組織，不要扯在一起。」

「對，對，我參加的是『五一六』，他們外頭是聯隊，裏頭是『五一六』。」

「參加有甚麼手續？」

「沒有呀，就是開了個會，×××報告了一下形勢。」

「放老實些，我看你不想交代。參加這麼的組織能沒有手續？『五一六』隨便就把你吸收了？你要入黨時怎樣來着？」

「我想看看。對，要填寫一份申請書，表示自願參加『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你又在胡說。上面要寫着『五一六』反革命陰謀組織，你能參加嗎？」

「我說錯了，寫的是革命組織。我上了當。」

「還有甚麼沒有？」

「申請書交上去，沒幾天×××就通知我說批准了。剛才那個會是宣誓大會。不過我們

都不知道，大概是保密。」

「再有甚麼沒有？」

「再沒有了，我知道的就這些。」

「我看你還不老實，交代一些又保留一些。要竹筒倒豆子，都抖出來，才能得到人民的寬大。」

「我實在不知道了，你就告訴我吧，我都承認。」

「我要告訴你，就不是你自己交代的了。我問你，你參加『五一六』，怎麼知道你是『五一六』？總要給個甚麼東西吧。你入黨後要發給甚麼？」

「是黨證吧？對、對，『五一六』也發了個證明，像是黨證。」

「證明是甚麼樣子？單張還是雙疊？」

「單張」

「不對。」

「是雙疊，跟黨證一個樣。」

「怎樣寫的？」

「……」

宣傳隊感到已基本上達到目的，便結束這場對話。但申請書和「五一六」的證書却沒有找到。根據這個「五一六」的說法，因為風聲緊，都給燒了。宣傳隊最後說，其他單位在清查中已確實看到申請書和證書，現在僅僅是核實一下，並且命令他把所說的寫下來，把他知道的其他「五一六」份子交代出來，還有罪行。

這是逼供誘供的一個例子。可以估計得到，那些被公安部門逮捕的「五一六」，和被總隊禁閉的「五一六」，在包括毒打的酷刑和誘導之下，為求活命，只有照對方的意思交代，而且顧不得他人，把同隊的人都說成是「五一六」。名單越開越多，開完本派的就開對立派的。

的。罪行越描越大，越聳人聽聞。被清查者冀圖由此獲釋，立功贖罪；清查者冀圖由此請功獲獎。筆者試探着打聽申請書和「五一六」黨證，宣傳隊和專案組的人都表示沒有親眼看見，只是別的單位轉來的材料中提到。直到最後也沒有查到一份申請書或證明。

共產黨的專政機構，即公檢法，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很大的衝擊。江青有次抱怨公檢法專替走資派服務，「連我們的材料都整。」她大叫要砸爛公檢法。但追查「五一六」，炮製出一個解放以來最大、最危險、組織最嚴密的反革命集團的却是公安部門的傑作。學部的總隊是在公安部門的授意之下，才能以群眾組織的名義任意抓捕和關押對立派人士的。在公安部門活動的背後，隱約看得見有一隻黑手，他是誰呢？我們有理由推測，這隻黑手正是周恩來。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除打倒劉少奇外，另一個目標是周恩來，這是人所皆知的公開秘密。且不說劉、周的關係，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便是周的人，同屬留法派。周任總理，鄧任副總理，周出國訪問，鄧代總理，周誇獎鄧覺悟比自己高，能力比自己強。劉鄧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周能一身清白嗎？！毛氏的鬥爭策略是，飯要一口口吃，敵人要一個個打倒，先解決了劉鄧，看周恩來的表演再解決。周是老狐狸，黨內多次的路綫鬥爭都混過來了，自然懂得其中奧妙。為保持自己的祿位，避免落得可恥的結局，周在文化革命一開始便表示堅定站在毛的一邊，支持文化大革命。由於有周的支持，劉鄧在黨內鬥爭中告失敗，被清洗出政治局。劉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是周親任劉的專案組組長。周在群眾大會上經常檢討，說自己也犯過錯誤，說過錯話，「如果把

我的講話收集起來，也可以編成一本黑話集。」這樣，毛一時不能對周下手，反過來還要保周，說：「總理抵半邊天。」當越來越多的老幹部被揪鬥，揪軍內一小撮揪到老師頭上時，周本人也成為部份群眾攻擊的對象，這時幾個老帥如陳毅、葉劍英連同譚震林等便在政治局會上跳出來大吵大鬧，反對毛和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掀起所謂「二月逆流」。陳、葉、譚等都是周的人，但周仍站在毛一邊，反擊「二月逆流」，並親到外交部佈置反擊「二月逆流」的任務，拿一批集體上書的副部長開刀。另一方面，周又在暗中庇護一些走資派，企圖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於是，周的兩面手法便得逞於一時。果然，毛受到來自右的壓力，為鬥爭的需要，不惜把中央文革中跳得最高、唱得最響、而且露骨地反周的王關戚作為替罪羔羊拋了出來。周從這個缺口下手，利用他所能控制的專政機構，企圖把中央文革支持的所謂造反派一網打盡，破壞毛的部署，以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但是，宣傳隊對清查「五一六」，態度是有變化的。在文化革命後期，宣傳隊明顯地放鬆了清查，放掉許多「五一六」的骨幹份子，稱他們是造反派。到宣傳隊撤離時，有的一直挨批鬥的「五一六」份子，在沒有宣佈給他們平反時，已經被結合進領導班子。因此遭到總隊一派的強烈反對。宣傳隊的清查工作始終是在上級指示下進行的，後來對清查「五一六」的放鬆，由此或許可看到在涉及「五一六」的所謂罪行方面，上頭有不同的看法，乃至有鬥爭。「五一六」作為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本身是否存在，中共的報紙始終未見澄清，是否事關機密，今天的當權派仍不願作過多的揭示呢？

重新評價四人幫問題

兼論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功過

(法國)
黃毅

「四人幫」被捕十周年了。做爲毛澤東晚年錯誤路線的替罪羊，他們四人在政治上承擔了「十年浩劫」的全部歷史責任。儘管以鄧小平爲代表的現中共領導集團也多次公開承認「……文革也是全黨、全民的責任……」，但誰又知道中共黨的現執政派及其他各派（例如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負了什麼責任？中共黨又負了什麼責任？民族又負了什麼責任？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弄清楚。而「四人幫」究竟錯在哪裏？應負什麼樣的責任？用什麼形式來負這些責任？這也很值得探討，中國傳統的「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觀念似乎不能做爲評判現代政治的標準，別人應負的責任與「四人幫」本身該負的責任應該劃分清楚。

一、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哪裏？

「四人幫」的主要罪行是推動「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但文革的主要發動者是毛澤東，鄧小平不想在目前的形勢下全面公開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當然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教訓歷歷在目，要否定一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具有幾十年歷史的體系，操之過急是不適宜的，這是鄧小平的

聰明之處。

然而，出于同樣的目的，——即現實政治的需要，鄧小平等又提出了「全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但事實上，鄧小平集團既沒有「全盤」否定文革，也不可能徹底否定文革，這是因爲：

(一)「四人幫」與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實屬同一體系；

(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與整個「毛澤東思想」體系又是緊密關聯，密不可分的；

(三)做爲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理論的基本主幹；

由此可見，如果徹底追究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根源，必然會觸及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歷史，以至涉及現在，這就是鄧小平不能在實際上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的原因。

在千災萬禍的文化大革命當中，什麼是錯誤的關鍵呢？

縱觀文革十年，——劃分階級的理論、階級鬥爭的學說、爲追求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不斷革命」；這是貫串文革的理論綱領，「四人幫」的主要錯誤就是沿襲這個錯誤的理論，助長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行動，從而使全中國人民陷入了一場大混戰。

然而，在論述「四人幫」問題時，我們不能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二十年前的政治是非。

應該承認：以階級劃分社會是政治學上的一種理論，「四人幫」的錯誤並不在於在他們在中國社會中重新劃分階級。事實上，張春橋的理論倒是最大膽地揭示了新中國的一個事實，即：新的階級分化和新階級的產生。鄧小平執政後，這種分化則更是清晰可見：從衣食住行，到政治經濟地位，甚至家屬子女的前途命運，都依附著權力的大小而被分成了等級，也就是說：宣揚「平均」和「共產」的共產黨人已經不再抱着那個「共同富裕」的口號「爲人民謀幸福」了，現在他們換成了「首先要使自己富起來」，這個現象在鄧小平執政後不但公開化，而且有日趨合法化的傾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特權法律化」，這種傾向正是毛澤東與「四人幫」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所極力反對的。

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社會政治矛盾的必然產物

和歷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它決不是毛澤東個人心血來潮的產物，也不是數百萬盲目青年推擁的結果，那麼，文革的必然性是什麼呢？

回顧文革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推擁文革風暴的有兩種力量：第一是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第二是人民群眾中的造反力量（包括青年學生），這兩種力量所代表的是當時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

其一是中共黨內兩大政治派別的矛盾（毛——鄧）。

其二是新形成的統治集團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

在這兩個矛盾背後，潛存着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中國農民的「共產主義理想」（即中國農民傳統的「均平」革命思想），文革的思想準備早在五十年代末的中蘇兩黨論戰時就已經開始。回顧中蘇論戰，除去「大國主義」和「大民族主義」的因素，思想上的分歧主要圍繞于共產黨的政治方向問題。在這一問題上，中共着重譴責的是蘇聯社會新貴階級的產生及新的官僚特權階級對人民的壓迫，從「九評」到文革期間，中共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批判蘇聯社會的「變質」。

中蘇兩黨都是按照同一理論、同一革命學說——列寧的「暴力革命學說」建立起來的黨，而且都是通過相似的革命方式建立了國家，這樣的國家運作的結果也必然雷同。從五十年代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份共產黨人就發現，自己的國家裏也有蘇聯社會的傾向，——即一些掌權的幹部逐步成為新特權階級（參閱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各次中共會議上的講話），從黨內反右之後，「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矛頭都是指向黨內的所謂「新生資產階級份子」。建國十七年，共產黨的官僚逐步形成一個獨立的層次——官僚階級（或階層），而這新的「寶塔狀」等級社會又在不斷地成長和鞏固，這種傾向不但為數億中國人民所不滿，也為黨內一部份農民政治理想的代表——包括毛澤東，所反對，于是一場在農民領袖領導下的農民意識形態的革命爆發了。

三、毛澤東——不是皇帝的皇帝

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也許是現代中國政

治中最複雜的一件事，各種人、各種社會集團站在不同的社會角度、生活角度與利益角度上，對毛有着不同的評價。

事實上，毛澤東其人也正和今日的中國社會與時代一樣，具有多重性。分析文革的功過，離不開對毛澤東生平及思想的評價，而一涉及這個問題，又不得不回到中國近代史——毛澤東經歷過的時代，來重新評判幾次重大的歷史事件。

中國共產黨興起的必然性

很多大陸人與海外人有感于台灣今日的繁榮和進步，悔之曰：共產黨不如國民黨，甚至說……還不如當初國民黨在大陸一直統治下去……

但是，對於「國民黨當初在大陸為什麼失敗？」——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是怎樣走上統治地位的？——這些問題，至今尚未深入探索，有人將這種結局歸于「中國民衆意識的愚昧和輕信」，有人將其歸于「共產黨的騙術高明」以及「日本的入侵」、「蘇、美的插手」。當然，上述諸因素不能說沒有，但中共的興起及國民黨的失敗，不能說與當時中國社會所處的時代及社會結構無關。

國民黨的失敗發生在蔣介石統治的時代，共產黨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于這個黨是「官僚地主壟斷資產階級成份」的黨。共產黨的這種評判不無道理。抗日戰爭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不得民心是無須爭議的事實，但這并不是蔣介石個人的責任，而是歷史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爲了反清，成立了國民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若要成功地進行反清革命，無錢無槍是無從談起的，因此，早期的國民

黨便免不了革命家與財閥、軍閥共存，而國民黨這樣複雜的成份就使得它在掌權之後很快陷入利益再分配的爭奪之中，（這幾乎與其後所崛起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情況相同，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政治集團面臨利益再分配，權力再分配，而產生的內部鬥爭），在早期的中國國民黨的成份中，唯獨缺乏的是農民階級利益的代表，而中國又是一個農民的汪洋大海，在這樣的時代中，農民階級必然要求產生自己的政治組織和政治領袖，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正是在這種土壤中應運而生的。

農民的政黨與農民的領袖

在中蘇論戰中，蘇聯一直譴責「中共是農民的政黨」，毛澤東是「農民的領袖」，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農業社會主義」，這種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說沒有道理。

中國共產黨一直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事實上，在中共早期的黨員成份中，工人階級幾乎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中國近代根本沒有充份發展資本主義，因而也就沒有一個像樣的工人階級，毛澤東等人一直是自己把自己硬納入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自己的黨喊成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從中共第一代與第二代構成者的成份來看，這個黨實際上是農民的政黨，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農民傳統「均平」理想的複製品，中共幾十年的政治史甚至今天仍很盛行的「平均主義」思潮及「大鍋飯」的分配方式，正是這種農民思想的產物，而「農運」出身的毛澤東（不是留法派、留蘇派或工運派的領袖）之所以成爲了中共幾十年的領袖，其原因也正在于這個黨是農民成份佔上風

的黨。

但毛澤東又與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領袖有所不同，雖然他留戀權力，獨裁，并被推上了「萬歲萬萬歲」的皇上寶座，但他所生活的時代使他受到了另外兩種思想的影響，一種是馬克思主義、一種是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因而反映在毛澤東政治理想中還有另一種傾向，即簡單的「民主」思想。也許正因為此，他才在文革前期倡導人民群眾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但是，毛澤東的民主觀畢竟沒有超出農民平均主義政治思想的範疇，於是，一場盲目的「爭民主」的文革終於演變成了農民平均主義思潮的大泛濫。

四、文化大革命的功過

想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普羅大眾在自己的精神領袖帶領下，在短時期內便將原旨在「文化」的革命變成了一場席卷中國一切領域的大動盪，這場動盪首先觸及的是社會既有的分配關係，圍繞這個鬥爭，組成社會的人群分成了「造反派」、「保守派」等等，正如魯迅先生比喻過的「曾經得到過的要復古，沒有得到過的要革新，已經得到的要維持現狀……」這才是文革數億人十年派仗恩怨的真實描繪。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失敗呢？

首先，是這場革命的指導者和參與者沒有成熟的理論指導。

中蘇分歧之後，中國認為蘇聯社會的演變不是中國人理想的道路，封建主義的道路已被辛亥革命打倒，資本主義又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而蘇聯的道路又不可取，那麼中國在反封、反資、反修後又該往何處去呢？

顯然，毛澤東想為中國人民尋求一條新的道路，但毛澤東的頭腦裏有什麼新東西呢？除了幾十年中國土地上的戰爭經驗和古籍史書中讀到的教訓，毛的頭腦中再也生不出超然的東西。文革中的政治變化，正像文藝改革中的幾個樣版戲、交響樂奏京劇、芭蕾舞跳秧歌，改來改去依然不是封建的、老資的就是老修的，更遺憾的是文革的雜交未取得各長處，反而搞丟了傳統的優良。

第二、文革的失敗是現存政治體制的結果。由於不滿新官僚階層的日益壯大，毛澤東試圖通過「群眾革命」產生一個新的、理想的政治架構。

但毛澤東本人則是處於舊體系的頂點，他的政治生存是靠舊體系來維繫的，雖然他曾一度鼓勵人民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支撐那舊國家機器的鐵的支柱——軍隊。「造反」一旦危及到毛自身的地位之時，那就不再「有理」了，最先碰壁的是文革初期的青年激進知識份子（如聶元梓、蒯大富等）。以後，經他一手提拔和培養的「文革新派」，即張春橋、江青、王洪文、毛遠新等也敗足于原氣未傷的老官僚軍政體系。文革新政千變萬變，但沒有從根本上變革中國政治制度的理論、模式、架構，沒有產生新的進步理論、制度模式，因此這場革命必然只能是失敗。

但中國的文革真的像一些人所說的「是一場大浩劫」、「百分之百的災難」嗎？

我認為，從下列意義上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作用將在今後的社會發展中逐步顯示出來：

第一，文革否定了蘇聯道路的可行性，它給于當代中國大陸新一代人一個明確的結論——蘇聯的模式對中華民族是不適用的。

第二，文革繼中國近代幾次大的思想革命之後，又一次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束縛民眾思想的糟粕，例如各種保守思想，實行了一次大破壞。為中國社會的「輕裝」前進做了準備（雖然這個破壞也傷及了傳統中的優秀東西，但相信優秀的東西是會很快得到恢復的。）

第三，人民的民主意識有了覺醒，并在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鬥爭失敗後獲得了提高，雖然道路仍不平坦，但新一代大陸人有信心追求一個民主、自由和繁榮的中國。

第四，這場革命埋葬了「革命者」們的意識形態，舊的即去，新的必來，通過這場革命中國人認識到：理想中的平等境界是不現實的，階級的再產生是現階段生產力水平的必然產物，雖然有些人還多少有「清官」的夢幻，但要不了多久，激烈的生存競爭和逐步展現的現實會完全沖垮古老的民眾意識。

五、關於「十年文革」的責任

歷史向我們說明了，「十年文革」的責任主要應由整個中國共產黨來負，做為在這場運動中起過主導作用的各政治人物，則應負擔更多的責任，「四人幫」固然作了許多禍國殃民的事，但像汪東興、鄧小平這樣的人難道就可以潔身如玉？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槍殺阿基諾事件、南朝鮮逮捕金大中事件、巴基斯坦絞殺布托事件都說明了，政治獨裁與鎮壓絞殺反對派結果總是適得其反，中國會怎麼樣？不釋放魏京生、徐文立這些民運戰士，不解決達賴與西藏的問題，海外三千萬華僑與大陸政府的感情以及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都無從談起，因此請共產黨還是三思吧！

關於第三和第六優先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魏中民

問：「中國之春」第三十八期的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專欄中曾提及申請第三優先及第六優先移民問題，但語焉不詳。聽說留學人員謀求居留大凡應申請第三優先移民，能否就這些「優先」作一較為詳細的介紹？

答：美國現行的移民法將移民分為兩大類：一為無限額的移民，另一為有限額的移民。無限額的移民包括：(1)美籍公民的直系親屬 (IMMEDIATE RELATIVE)，亦即已成年的 (年滿二十一歲，下同) 美籍公民的配偶、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或其父母；(2)特殊移民 (SPECIAL IMMIGRANTS)，大致包括曾有永久居留權而申請返回美國的僑民、因某些特殊原因而喪失了美國國籍的前美籍公民、為宗教目的而申請入境的牧師、曾為美國政府工作十五年以上的外籍僱員；(3)難民 (REFUGEES) 及受政治庇護 (POLITICAL ASYLUM) 的外國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為在美國生一個孩子就能取得綠卡或美國國籍的人為數確實不少，但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能在短期內見效的方法 (至少要等上二十一年!)。另外要說明的是，獲得難民及政治庇護的人數，嚴格說來也是有限額的，其總數每年由美國國會與總統商定 (統計數字表明每年約為五千名)，但與下述的有限額的移民的總數無關。有限額的移民，其總數每年不得超過二十七萬，就每個國家而言，其移民的總數有一最高限額，最多不得超過兩萬名 (中國大陸與台灣被視為兩個國家實體，故有相同的最高限額)，祇有屬地地位的地區，最高限額佔其母國的百分之三 (以香港為例，每年的移民總額不

得超過六百名)。申請人所佔用的移民限額，原則上是指其出生國的名額。因此，香港居民如能證明在中國大陸出生，即可用中國大陸的名額。如果申請人的雙親均不在申請人的出生國出生，且在他出生時其雙親亦未具有該國的居留權，申請人即可用其雙親之一的出生國名額。另外，如果配偶的出生國與主要申請人的出生國不同，主要申請人在自己的出生國名額已滿時，可要求其配偶出生國的名額。

總數二十七萬的移民限額，主要並不是按國家分配的，而是按以下六種「優先」(PREFERENCE) 類別來分配的：

第一優先 (FIRST PREFERENCE)：美國公民 (指年滿二十一歲的成年公民；下同) 的年滿二十一歲的未婚子女，名額為總額二十七萬的百分之十。

第二優先 (SECOND PREFERENCE)：有永久居留權 (綠卡) 的僑民的配偶及未婚子女。名額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六及第一優先所未用完的名額。

第三優先 (THIRD PREFERENCE)：各行業專才及在科學藝術方面有特殊才能者。名額為總額的百分之十。

第四優先 (FOURTH PREFERENCE)：美國公民的已婚子女。名額為總額的百分之十及前三類優先所未用完的名額。

第五優先 (FIFTH PREFERENCE)：美國公民的兄弟姊妹。名額為總額的百分之十四及前四類優先所未用完的名額。

第六優先 (SIXTH PREFERENCE)：美國所短缺的技術工人或非技術性工人，名額

為總額的百分之十。

一個移民申請人時可以有不止一種優先類別可供選擇。由於各種優先類別的申請人的數字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審核的速度也有所不同。注意美國國務院每月公佈的下月移民配額，會有助於選擇有利的優先類別，使申請過程縮短。以下即是最近公佈的九月份移民配額：

類別	大陸出生	台灣出生	香港	澳門	門
第一優先	有名額	有名額	80	6	23
第二優先	85	5	22	85	5
第三優先	86	1	1	86	1
第四優先	有名額	有名額	80	2	1
第五優先	80	7	15	81	8
第六優先	84	6	15	84	6

表中列出的日期是九月份可能得到配額的案列的申請日期。舉例來說，某人在去年年底申請移民，如果當時申請的是第三優先，九月份就可能得到配額，如果當時申請的是第二優先，則還需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對於申請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優先的移民來說，上述申請日期是指移民局受理移民申請的日期；對於申請第三及第六優先的移民來說，由於申請勞工卡 (LABOR CERTIFICATION) 是程序的起點，故上述申請日期從勞工局受理勞工卡申請的日期起算。

對於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來說，如果畢業後準備留在美國，比較可行的途徑是申請第三優先移民——先決條件是找到願意僱用的部門和獲得勞工卡。如與已有綠卡的華人結婚，則也可申請第二優先移民。另外，如果從事民主運動而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狀況下 (不少著名的民運人士仍在獄中)，也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請參閱「中國之春」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及第三十八期的有關文章)。

我對民運更加充滿信心

——專訪黃奔先生談回國感受

● 本刊記者 ● (中國大陸留學生) 馬臻燕

編者按：黃奔先生，男，三十七歲，年輕而事業有成的實業家，愛國華僑，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

黃奔先生在七十年代初，積極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保衛釣魚台群島運動（保釣運動），由愛國主義出發，他曾認同中國，甚至認同中共。林彪及四人幫事件後，他和老「保釣」們一起開始反省，有過一段傍徨的歷程。一九八二年底，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起，黃奔先生很快投入，有了新的認同目標。

黃奔先生七歲離開上海，卅年來未返中國大陸。今夏，他懷著火熱的心情訪問了淵別了卅年的故土，感慨萬千。

黃奔先生是身份公開的民聯成員，是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夫婦的老朋友。他這次回國的感受如何？本刊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文中黃代表黃奔先生，記代表本刊記者。

▲記：黃先生，您能不能先向《中國之春》的讀者簡單介紹一下您的簡歷？

□黃：我很高興接受《中國之春》記者的採訪，并藉此機會談一談我這次回國的觀感。我是安徽懷寧人，一九四九年出生于上海，一九五六年到香港，一九七二年到美國。來美國後一開始是讀航空專業

，後來幹起餐館業來。我幹餐館，就努力研究這一行，把握其脈搏和市場的需求，因此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就相繼開起了四家頗具規模的餐館。

心懷祖國 投身民運

▲記：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企業家支持。請問，您是怎樣參加中國民聯的？

□黃：一九八二年底，我從報上看到王炳章博士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便去信聯繫，探討中國自由、民主、法治的前途。一九八三年，王炳章先生來華盛頓，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演講後，我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一致認為中國只有積極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基于這種共同認識，我投入了中國之春運動。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正式成立後，我參加了，未有過絲毫動搖。

▲記：黃先生，您從一九五六年離開中國大陸，到今天已整整三十年了。您這次回國是不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回國？

□黃：是的。三十年來我一直懷念着祖國，我雖然身居海外，但做為中國人，根畢竟還在祖國，親自回國去看一看，一直是

我三十年來的宿願。我們海外華僑儘管與國內的執政者有不同見解，但根本上說都是希望祖國早日強盛，國富民殷，早日進入現代化。打倒「四人幫」，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後，近幾年回國省親的人逐漸地多了起來。于是我決定趁此機會回國去看看，以償我三十年來的思國、思故土之念，看看祖國三十年來的變化，看看我出生的故鄉，看看家鄉的父老兄弟和眾親友。這是我此次回國的第一個動機。

第二是，由于我離開祖國已經三十年了，長時間沒有親自直接了解祖國的機會。在海外，雖然有各種報紙、電台、電視的報導，但眾說紛紜，各說不一。中國現在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很想親自去目睹一下。常言道：百聞不如一見。因此我此行的另一個很強烈的目的就是要親自去看一看中國大陸的現狀，親身體驗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實效，親耳聽一聽中國大陸人民的聲音。再確切一點說，我投身到民運中來，想回去看看民主運動是否是中国今天的需要。我此行的另一個目的是，我希望借此行回國省親之際，考察一下回國投資、幫助祖國四化建設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我就是懷着這樣三個目的回國的。

中國——一隻爛蘋果

▲記：那麼，您回國後，對中國大陸總的印象怎樣呢？

□黃：我這次回國是取道香港回去的，一共有

兩次。第一次先到廣州，第二次是到上海、無錫、南京、合肥等地和老家安徽。總的印象是比我行前想像的要差些。在美國時，我也經常看「人民日報」、「中國建設」等，關心祖國的發展。從中共官方的報導中，我原有一個印象，即：中共雖然以前多次受到錯誤路線的干擾，但現在實行新的政策後，各方面都比較好了。但回去親眼一看，事實却并非如中共官方報導的那樣樂觀。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不要說與世界先進各國相差甚遠，就是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很大。這就使人不由不產生一種看法，即：如果以前是中共指導路線的失誤，那麼現在修正了，為什麼還上不去呢？總不能老是把原因推在「一窮二白」、「底子薄」上吧？從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至今已十年了，雖然有所進步，但差距還是那麼大，問題還是那麼多，而且從前一段的經濟改革看，還不斷在產生新的問題，改革受到重重阻力，推遲艱難。因此，我覺得中國必需打破常規，走一條新的現代化路子，否則，如果仍然保持老的路子、老的步伐，結果將不是在本世紀末實現了現代化，而是將與世界現代之林越差越大，越離越遠。

▲記：您能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一下使您
中國現在有點像莎士比亞的一句名言：一隻爛蘋果。表面上看紅裏透紫，外界人士，包括美國的一些報界，都覺得中國現在情形不錯，但實質怎樣，却是外界人士難以想像的。因此真啃上一口，嚐到了皮裏的肉，就會大失所望。

失望的地方嗎？

黃：譬如說，中國的報紙常宣傳中國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尤其是服務人員更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常常使一些回國的華僑深受感動。但我這次回去，不但沒有體會到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反而有中國人受中國人歧視的感覺。在上海叫出租汽車時，司機對外國人服務倒是很熱心，但對中國人却是冷若冰霜。我在上海時，住在國際飯店，有一次有急事要出門，就是叫不到車。儘管外面停着車，但服務台却說司機不在就等於沒有車。我們到外面一看，司機則在外面睡覺。後來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部車，但是司機就是不出車，我們磨破了嘴，說我們有急事，可以多付錢，幾乎是懇求他，但他就是不肯去。他居然說出一條莫名其妙的理由：「我心情不好，不去就是不去！」這種情況，沒到過中國的人是難以想像的，大家從報上看到的只是在中國可以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件小事也說明，中國在中共現政策的指導下，使人們喪失了敬業樂業的精神，這點小事都不樂意做，又何談為四化而奮鬥呢？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的規章制度極無效力，工作人員想幹就幹，想不幹就不幹，沒有約束力。這在外面的人如無親身經歷也是難以想像的。中國有很多難以想像的怪事，如你想把一箱貨從上海運到北京，當局可能非讓你先把它運到廣州，再送到北京。在這種社會秩序下又如何能把國家搞上去呢？中國雖然進行了經濟改革，但仍缺乏自由競爭，大家不能得到平等的

自由競爭機會。如果有自由競爭，這種現象自然會然會在競爭中被淘汰。

中國人在海外可以把餐館、飯店管理得很好，可是在國內，北京、上海、廣州的一些賓館、飯店非要請洋人來管才能管好。上海賓館是座只有三年新的賓館，當時中共宣傳說這是一座自行設計、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現代化賓館，可是又髒、又亂，準備請洋人來管理。我在中國看到這種現象心裏很難過，不是滋味，難道中國人比洋人的能力低嗎？事實證明完全不是，但在國內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

又譬如，我到無錫後，住在梁溪飯店，吃飯時，我們和當地的中國人吃同樣的飯，但他們付三塊錢可以吃三頓飯，而我們吃一頓飯就要收我們八塊五毛錢，而且還一定要收外匯券。這就使人深感受歧視，心理上大受傷害，為什麼華僑回國會有這樣不平等的待遇？如果中共的官員或國內出來的代表團來美國我的店裏吃飯，我這樣對待他，他會有什麼感覺呢？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錢本身不是問題，華僑回國本來就是要把錢花在中國的土地上，問題是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分兩種價格？中共歷來宣傳要消滅等級差別，為什麼在實際做法上却人為地製造、加大差別？這我實在不理解。我這次回國是把自己的國家當成母親，把國內的人民，不管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在回國的兩週中，很少有人給我過笑臉、問過我一句「你好」。



黃奔先生(左二)在家鄉與親友合影。

中國人缺乏精神支柱

▲記：您這次回國，通過耳聞目睹，親身體驗，對於當前中國大陸人的精神狀態有何感覺？

□黃：我這次回國，有意識地盡可能接觸各階層的人士。通過接觸，我總的感覺是：當前大陸中國人的生活中缺乏精神支柱，缺乏崇高的信仰，普遍對前途感到茫然，信仰危機已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對於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人們普

遍認為那是一種虛幻，一種過時的、根本無法實現的主義。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及共產黨的幹部普遍缺乏信任感。在私下接觸的非公開場合，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對於共產黨及其各層幹部的批評是相當普遍的，甚至指名道姓破口大罵政府當局和中共的領導人物，其激烈程度往往使我都感到詫異。我也接觸了一些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也同樣有這種信仰危機和對共產黨的不信任感。從這種事實我感覺到，雖然目前中國不能有公開的文章表露人民的這種思想狀態，但從接觸交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人的思想已經突破了大一統的狀態，處於高潮前的活躍期。一方面對舊的、但仍存在的馬列主義失去信仰，對共產黨失去信任，一方面正在摸索、探求新的思想。這是可喜的現象。

由于中國人目前普遍失去精神支柱，舊的信仰已經喪失，新的信仰尚未建立，對共產黨失去信心，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尤其是年輕人很多覺得自己的理想抱負無法在中國實現，因此很多人想出國，甚至連幹部和幹部子弟也千方百計謀求出國。我這次回去，幾乎每一個碰到的人都向我打聽出國的途徑。一個黨如果連它自己的幹部、黨員，他們最親近的子孫都想離開中國，那麼它還怎麼能領導人民在中國建設四化，還怎麼能在人民中樹立崇高的威信，給人民以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呢？我認為，一個國家若要有信心，每個家庭就必須要有信心，每個人就必須要有信心。現在，個人都沒有信心，整個國家談何信

心？

人民對改革不抱希望

▲記：那麼，根據您的印象，人民對於共產黨的改革抱什麼態度呢？

□黃：共產黨目前的改革使一部分人得到了利益，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從改革中得到了好處。沒有得到好處的人自然對改革不抱信心，但我的印象是，即使是在目前改革中得到好處的人，也只是抱著「趁機會趕快撈一把」的態度。這種現象可以說明，即使是這些人，對於明天中國四化的實現也缺乏信心，他們對共產黨一貫的政策多變仍有恐懼感。而這種現象的後果，從眼目前來說是造成極大的浪費，如農民只為眼前賺錢，用拖拉機去搞運輸，不顧農田建設；為了賺錢，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旅館飯店業，如我家鄉安徽有一小鎮，叫高河，一個小小的鄉鎮只有一條土公路却一下子建起七家飯店，既無科學規劃也不顧及後果。從長遠來看，這種浪費和無規則性會造成很多後患。中國是個農業國，如果農民都不種地，去賺眼前的錢，那麼如果農業垮掉了，四化還怎麼能成功呢？因此這不是一種紮紮實實的改革。農村現在表面上比以前富裕了，但農民不保養土地，存在着嚴重的竭澤而漁的現象，這樣下去土地的肥力會很快下降，從而使農業基礎崩潰。

這次回國，我還親眼看到，一面是飯店裏用公款請客大吃大喝，飯菜吃到一半就走了，其奢侈浪費在美國都少見

；另一面，我看到有的叫花子到垃圾桶裏去扒尋食物，我心裏十分難過。

我也和知識分子談到過中國目前的改革和未來的四化問題。有一位知識分子向我講到了目前很多中國人都有一種想法，他說：讓他們（指共產黨）去搞是搞不好的，因為他們把權力看得太重。共產黨目前的改革是爲了挽救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爲了整個中國的前途，因此他們時時處處注意的是他們自己的權勢，稍不如此即橫加阻撓、干涉，這樣怎麼能把改革搞好實現四化呢？共產黨不是對香港說五十年制度不變嗎？如果他們自己也能五十年不管中國，讓那些能把國家治理好的人來治理中國，這樣中國的四化還有希望。如果他們真能放棄權力五十年不管中國，我們也保證他們五十年坐享富貴，把他們像日本和英國的皇室那樣養起來，讓那些不爲自己的權力而治國的各行專業人士扎扎实實地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這樣中國的四化才有希望。

從認同中共到認同民運

▲記：黃先生，您通過這次對大陸的訪問，對民主運動有些什麼新的認識呢？

□黃：我一貫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參與者。我像大多數在海外的華僑一樣，有着強烈的愛國心。七十年代初，我和許多熱血沸騰的華僑青年一起，在民族意識的激發下，積極地參加過「保衛釣魚台群島的愛國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心向祖國，從而對中共會寄滿

期望。但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幫」事件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我不得不冷靜下來重新檢討自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大陸現行制度的認識。我尤其回顧了從文化大革命爆發到林彪事件最後到「四人幫」事件這一系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發生的激烈事件，尋求這些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那個時代正是美國發生「水門事件」的年代，我對比了美國的「水門事件」和中國的「林彪事件」。兩者都是醜惡的事件，但「水門事件」是通過和平的自由輿論揭發出來的醜聞，體現的是法治精神，法律高于總統的權力，即使是總統違法，也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而「林彪事件」和「四人幫事件」則是一種陰謀暴力奪權，反映在共產黨國家要想更換政權只有用陰謀暴力的手段，法律只是形同虛設。這說明美國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而中國缺乏的，正是民主與法治。反省終於使我最終轉向了民主運動。

這次大陸訪問回來後，我更加堅定了對民主運動的信念，因爲，中國需要民主運動。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非走民主與法治的道路不可，否則，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甚至危及民族存亡。

與韓敘是好朋友

▲記：您是保釣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這個運動一般被稱爲左傾運動，當時與中國駐美機構有不少聯繫，您是否也與他們聯絡過？

□黃：當然。保釣運動轟轟烈烈開展時，我常與中國駐美聯絡處聯繫，那時中美外交關係還未升格爲大使級。現今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先生，是當時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我和韓敘私交不錯，我覺得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記：現在您還跟韓敘聯繫嗎？

□黃：去年韓敘大使赴美履職，在華盛頓各界僑胞歡迎韓敘夫婦的宴會上，韓敘夫婦認出了我，我們留了影。我還熱情地邀請韓敘夫婦到我的東湖飯店坐客。後來，在另外一次宴會上，我又碰到了韓敘先生，他好像故意迴避我，可能他知道我參加了中國民聯，因爲我的民聯身分是公開的。

中共統戰不能自圓其說

▲記：中共不是主動去統戰國民黨嗎？爲何迴避中國民聯？

□黃：是啊！中共去統戰高喊「消滅共匪」的國民黨，却對提倡幫助大陸進行改革的中立團體——中國民聯予以排斥，說明其統戰缺乏誠意，不能自圓其說。不知道我是民聯成員，就對我好，就接近我；知道了我是民聯成員，就迴避我，這種統戰理論是不通的。在美國結社自由，我參加民聯，總比參加國民黨強得多吧？！中共駐外機構主動去統國民黨員，却迴避我們，打擊中國之春，這等于告訴我們：中共的統戰是虛假的。

在美國，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可以交朋友，這體現了民主。我仍然願意和韓敘夫婦做朋友。當然，我不能責怪韓敘

先生，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對中國民聯採取這般態度，是奉命行事而已，問題在於那個不能容忍異見的專制制度，不在他本人。

▲記：您是中國大使館知道的公開的民聯成員，您回國簽證有沒有遇到什麼障礙？在國內訪問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黃：我是美籍華人，一切都順利。這點應該肯定中國政府，現在畢竟比過去開明多了。但我希望，持中國大陸護照的民聯成員，特別是大陸留學生中的民聯成員，回國後不要受到公安部門的迫害。

對中共的希望和建言

▲記：黃先生，您這次訪問中國大陸，看到許多深刻的問題，您對中共當局有些什麼希望和建言？

□黃：從經濟方面說，我希望中共當局能夠繼續進一步擴大開放，把經濟改革進行到底。在改革中應仔細進行調查研究，預先充分估計到一切可能性，既要估計到某項政策措施的積極後果，也要充分估計到它的副作用，從而盡可能地把副作用減低到最低限度。否則，如果一轟而上，匆匆上馬，按某些個人意志盲目地生拉硬推，其結果一定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的損失。為此我希望中共能試一下公評會的制度，即在某項政策實施前，先交給人民評判一下，多聽聽有關專家的意見，這樣也可在將來實施時減小由於人民不理解而造成的阻力。

要多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就得有言論自由，這就是說要把經濟改革推進行

去，不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是不行的。而在政治方面，徹底實行言論自由則是先決條件。沒有言論自由，聽取群眾意見就是一句空話，廣大人民也就不可能真正參與這場改革運動，改革就仍是少數人的事情，這樣也就很難指望改革會成功。言論自由就要聽不同的意見，既要聽贊同的意見，也要聽反對的意見，把各種意見都擺出來讓大家評論嘛！而大家的意見通過什麼來表現呢？當然是通過報紙、刊物，因此中共應該允許各種觀點的民報、民刊在國內發行，當然要註冊，要有一定的規章制度，但這種規章制度應是保障民報、民刊有秩序地發行，而不是限制、扼殺其發行。

一個國家要有希望，必須組成國家的各基層細胞單位有希望，而一個基層細胞單位要有希望，必須是組成這個單位的個人要有希望。中國應該讓個人有充分自由發展的平等機會，這樣中國人才能有希望。而人有了希望，就會努力工作，充分發揮出他的積極性，去實現他的希望，這樣整個國家就會欣欣向榮。在美國，每個人都可以說我希望將來當總統；在中國如果有人希望將來當黨或國家的領導人物，也許就會被認為是有篡奪權的野心，是反革命份子。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一個人要想當領導，必須取信于民，必須拿出真正造福于民的政績來，這實際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在政體上，立法、司法、行政一定要分開，這樣才能互相制衡，互相促進。沒有分權就沒有監督。現在中國的人

民代表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他們與其說是代表人民不如說是共產黨的一種名譽。人民代表應該真正由人民選舉，代表人民的利益去監督國家，代表人民說話。當然，現在如果一下子讓中國人去直接選舉人民代表也許還不大成熟。如果是這樣，不妨可以先效法香港的立法局，一部分立法局委員是官方指定的，但委員產生後完全獨立，不受任何黨和國家機構的制約，從而使其可以真正起到監督作用，然後逐步走向完全由人民選舉人民代表。現在中共也談政治改革，但提的似乎只是行政改革，而不是分權，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繼續捐款 資助民運

▲記：黃先生，您的這些見解很深刻，希望中共當局能夠認真聽取并考慮您的建言。那麼，您對民主運動又有何新的考慮呢？

□黃：這次回國後，我認識到要想促使中國早日實現現代化，必須支持壯大民主運動，推動國內的改革，推動一個制衡力量的形成。因此我準備再捐獻兩千美元，在「中國之春」資助一次徵文比賽，讓更多的人能有機會自由地把他們的智慧獻給民主運動，獻給祖國的現代化建設。

▲記：非常感謝您對民主運動的大力支持，我們相信，歷史永遠不會忘記您為祖國的現代化做出的貢獻。最後，請允許我代表「中國之春」編輯部和廣大讀者向您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謝。

實行民主，振興中華

與司馬璐先生一席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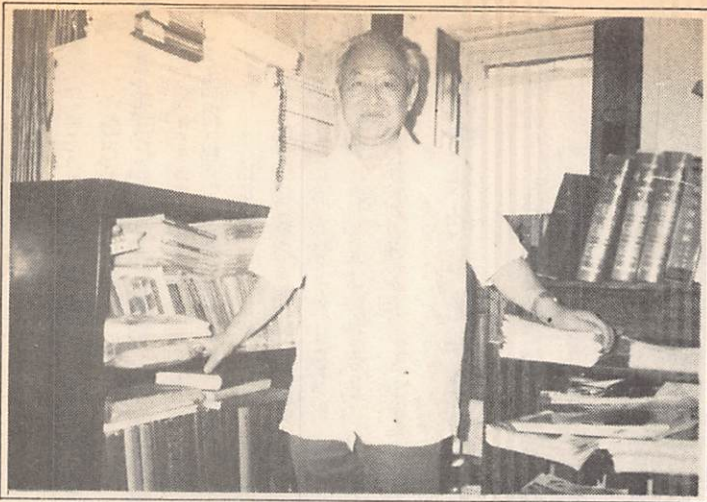
(美國) 李目

馬：我女兒是美籍華人，女婿是美國人。他們早有申請我來美定居的打算。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黨史研究室發行的「黨史研究資料」第九期，刊出一篇題為「司馬璐其人」的文字，簡述我的經歷。光是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中共對我的態度。

我剛來美時，確實過了些閑暇的日子。但開了一陣後，又動起筆來了。在朋友們的不斷鼓勵下，我正在續撰《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第十三冊。主題是《中共與抗戰，第二次國共合作》。多年來，無論環境如何困難，我都始終保持樂觀。我有一個精神：不知道就虛心學，因而也就能夠勇往直前。

李：我們知道，馬先生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的，江青也是。你見到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等人。在林彪的「抗大」學習過，和胡耀邦同過事。你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但後來為什麼又退出，而且與中共持不同政見呢？

馬：我確實見過和聽過中共第一代、第二代人演講，或和他們共過事。一九三七年我入黨後就赴陝北。在雲陽青訓班學習時，胡喬木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近照。

編者按：筆名司馬璐的馬義先生是《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已出十二冊)的編著者。馬先生在香港創辦並主編長達二十五年的《展望》雜誌(一九五八—一九八三)；被中共認為「經常發表反共言論，政治態度反動」(見中共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九期)。由於馬先生所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一書，取材慎重，態度嚴謹，在「文革」後的百廢俱興中，該書在大陸流行。於是，馬先生也就成了考究中共黨史的注目人物。

馬義先生於一九八三年來紐約定居。文中馬代表司馬璐，李代表李目。本文發表前，已經司馬璐先生過目。

李：馬先生，您好。傳言你離開香港來紐約，是和中共八二年九月二十日的一個對你有所定論的資料有關？換言之，你是否因為躲避香港面臨「九七大限」而移居美國？

是教育長。一九三八年，我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大隊學習時，林彪任校長，副校長是羅瑞卿，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我加入共產黨與當時的年齡以及時代背景有關。

一九三七年，我已十八歲。當時中國動亂，內戰連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中國廣大的國土上，一般青年人都很苦悶，而當時中共號召打倒軍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很能吸引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九四三年，我已二十多歲了，思想較成熟，能獨立思考。回顧中共的作為，我漸漸對中共有比較客觀的認識。

例如，我看到中共在中國的發展，與一般老百姓的「窮」字有關。但對照中共的作為，我越來越感到，它不能解決中國的貧窮問題。我到香港的這些年，先後訪問了四十多個國家，其中有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訪問後，我對兩種制度做了冷靜的、深刻的比較，覺得民主政治比社會主義優越，民主政治能真正解決人們的思想苦悶和中國的貧窮問題。我和中共的關係，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由於誤會而發生政治關係；二、是由於自己理解才和它分開。

李：中共在中國大陸得勢三十多年，但如今在海外華人心目中的形象並不高大，你認為主因何在？

馬：共產黨作為政治團體來說，是一個組織最嚴密的黨。在政治鬥爭方面，它比一般散漫的黨佔便宜得多。因為共產黨如同軍隊，能做到一個命令下來，全黨上下都貫徹執行。它有一套怎樣爭取朋友的策略以及滲透、分化、各個擊破等系統的統戰技術。中共一貫把擊敗敵手、組織暴動、組織群眾等作為專門學問來研究。在奪取政權上，中共發揮了獨特的技巧。問題是取得政權後，中共暴露了很多本身的

缺陷和弱點。你說的形象不高大，也就是不得人心。如今的問題所在是中共堅持一黨專政，造成黨群關係的對立。在經濟政策上，共產黨堅持「公有制」，在公有制的禁錮下，人民遲鈍，生產積極性降低。中共用奪取政權的方法去組織經濟是一定要失敗的。

多年來，中共思想僵化，百年前的或列寧時代的發霉的東西他們認為是最重要、最應堅持的原則。而實際上，資本主義在不斷創新，而共產主義還在堅持老的一套。

李：馬先生，近年來中共也在不斷地反省，撥亂反正，你對他們倡言的經濟改革有何看法？

馬：我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僅中共有經濟改革，所有世界共產主義國家都有經濟改革，原因是共產主義在整個世界失敗。他們實行經濟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救他們自己的黨，保持領導層的既得利益。經濟失敗，整個政權就要垮台。但話又得說回來，改革總比頑固僵化好。目前中共強調「鳥籠經濟」，「鳥」不能飛出「鳥籠」的現狀急需打破，光求「鬆綁」是注定要失敗的。

我還認為，政治和經濟分不開。中國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有蓬勃的經濟。以民主精神發揮每個人創造性，能使每個人主動自覺地參與經濟發展，使每個人都能發揮長處。只有打破「四個堅持」，在經濟發展中進行政治改革，中國才會有前途。

李：這樣看來，你對中共目前的經濟改革不怎麼樂觀，那您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有什麼看法呢？

馬：鄧小平提的「一國兩制」，我覺得太麻煩，沒有必要。「一國兩制」是權宜之計。中國實行「一國一制」較合情理。簡言之，中

國需要實行民主的政治制度。為此，中共應做三件事：一、言論自由；二、容納反對黨；三、實行全國大選。總之，只有通過「一國一制」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以民主制建國的「一國一制」是中國長治久安的道路。

李：馬先生您所提的「一國一制」和當前台灣所提的有明顯區別之處。據說你反共反了五十年，你現在是否感到你過去的努力是白費勁呢？你對中共的前途是否樂觀？

馬：我不敢說我反共反了五十年。我出生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讀圖書管理學，參加「左傾」讀書會。一九三五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曾任延安西北青年救國會圖書館主任，抗大圖書館主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西安「秦風日報」主筆，騎二軍「抗戰日報」總編輯，朝鮮義勇隊中文編輯主任，金華「東南日報」圖書館主任等。一九四三年我脫離中共後，創辦「自由東方」雜誌，同期擔任民盟青年部長。我創組過「中國人民黨」，「人民週報」，「中國和平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一年到香港後，組織過「自由作家聯誼會」，並擔任亞洲出版社總編輯，創辦過「聯出版社」、「展望」雜誌。

我的歷程既複雜又不尋常，我的思想過程是曲折和痛苦的。我為追求理想，付出了我的青春，而一旦發現中共制度不對，尤其發現同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也發生在別人身上；昨天或今天，這裏或那裏，這就不是個別幹部的偏差，而是整個黨的路線的錯誤，這時我覺醒了。

我並不認為我走過的道路是白費了！道路的曲折，正好讓我做了歷史的見證人。沒有如此痛苦的摸索，不可能有今天徹底的認識。我早就提出中國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得

救。現在大陸上也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已過時，中國需要政治改革，這不正說明我的道路沒有白走，我的影響，在中國大陸也有同樣呼聲。中共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我的看法是這口號前應加四個字，那就是：「實行民主」。

李：馬先生，這四個字加得好，我想這不僅是你個人的看法，而且是海外華人的心聲。最後，我想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著作。

馬：我共出了二十幾種書，最早，最有爭議的書是「鬥爭十八年」。這本書寫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時的熱情、艱苦、奮鬥以及所遭到的種種打擊。這本書是我思想轉變的歷史，在當時曾譯成多種外國文字。文革時，我最早出版「劉少奇語錄」、「劉少奇選集」。爲此事，我的書店：「自聯出版社」門市部（香港美麗都大廈二樓）被「香港紅衛兵」放過火，當時中外報紙曾頭版、圖片、大標題報導此事件，可以說是極其轟動的大新聞。繼後，我深入學術領域，進行中共黨史的研究。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是我著作中份量最重的。中共自己出版的黨史雖然很多，但加以引用就很麻煩。毛澤東當權就突出毛澤東一幫，劉少奇當權、林彪、鄧小平當權又要突出各自的一伙。我和他們寫的不同，我不突出任何個人，任何派別，我以各種原始資料，對中共歷史作實事求是的回顧並加以我客觀的判斷。我花了很大苦心去寫，從開始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寫到中共成立。我已完成第十二冊。以下是「西安事變」，該事變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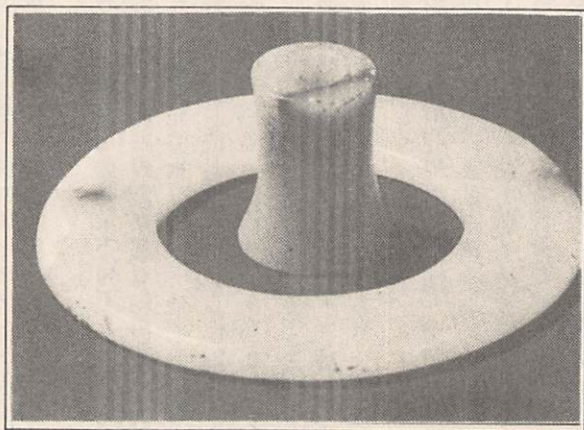
李：馬先生，我相信你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希望你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第十三冊早日問世。我相信你今天的談話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謝謝你！

●文藝園地●

玉之歌（詩一首）

（國內）
余青

當我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你
我的心何等茫然困惑
因我不知你將怎樣待我
也因不會有人到我這裡
試試如何將我心中的秘密窺破



你的手小心翼翼地拆掉了圍牆
在那裡可建造宏偉的居所
你敏銳的目光透過層層霧帳
看到那凝聚着結晶的內核
於是，你奮力地挖掘呵，挖掘
終於，你找到了真正的我——
那僅僅是一塊不成形的璞呵，
而且從來未曾被人雕琢

但你並不因我醜陋而將我丟棄
却更以堅韌的毅力精心照料我
因你深信有那麼一天
我將會是晶瑩剔透，光潔閃爍

終於，我將自己完全袒獻到你面前
就像新生的嬰兒一樣赤裸
面對着這光艷奪目的瑰寶
誰不驚嘆這造物的奇特？

儘管有人這麼說
玉出自璞，僅僅是力和摩擦的效果
儘管有人這麼說

真理的發現，有時與童話也差不多
然而只有我自己深深明白
這一切都源自於你的愛

這愛是何等真切、深沉、擊着
愛，廣於那漫過一切的衆水
愛，超過那吞噬一切的烈火
爲了報答你的愛

我只願終生鑲嵌在你的冠冕上
永永遠遠
爲你唱一曲頌讚的歌



千家駒說：經濟改革已告停頓

(本刊責任編輯)
馳 遠

中國經濟學家、趙紫陽重要的經濟顧問千家駒，最近在香港接受「中報」記者崔少明採訪時，就中國經濟改革中外資、金融、人才、理論突破等一系列問題發表了坦誠的見解，足以說明經濟改革局勢的嚴峻性。

直言「經濟改革實際上已告停頓」

千家駒教授是中國民主人士的元老之一。近年來在政協中經常大膽發表不同意見。在三峽水庫問題上，就是千老首先挺身而出，提出下馬意見。一般認為，千老先生的觀點多數反映了趙紫陽總理改革務實派的觀點，是趙總理在政協的發言人。此次，千老坦言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已告「停頓」，一方面暴露出改革遭遇嚴重瓶頸應當正視，千先生指出「中國發佈的有關外資消息多屬宣傳，真正成功的很少」；另一方面，千老講話的目的，也希望海外應發揮特殊功能，力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克服阻力與屏障，得以繼續。

金融體系與投資環境亟待改善

資本是生產發展與擴大之前提。當被問及中國短期內改善投資環境的可能性時，千先生表示並無所聞，但相信六中全會上會就此提出新的精神。

談到外資的困境，千家駒引用美國駐華大使洛德上月四日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發表

的「中美經濟關係好事多磨」一文。洛德在文中明言：由於外匯管制嚴厲，法令捉摸不定，冗員抬高勞工成本，質量控制不可靠等因素，「中國對外資開放」七年過去了，（外商）沒有得報償，希望已經幻滅。」

就近日中國透露將成為明後年經改重點的金融體制而言，中國的銀行一向是對企業有求必應的放款機器，本身不求經濟收益，農村銀行甚至出現放款利息低於存款利息的經濟現象。千先生認為，近年銀行體系的改革，是「換湯不換藥」。

千家駒指出，在目前的制度下，企業要錢就向專對該行業放款的專業銀行伸手，而支持建設社會主義為首要任務的專業銀行不得拒絕。專業銀行需要資金則向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伸手，後者則靠印鈔票來填這個無底洞。企業萬一無法償債，最終損失的是國庫。

人才外流與勞力市場種種問題

對於近年中國大量高級知識份子外留不歸，千家駒認為不是好事，但強調，問題的根源在於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亦即一個人一旦分配到某單位，即永遠屬於該單位，即使在單位內被開置，別的單位也休想動用，因而形成了這一方面人才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積壓人才的怪現象。

千先生舉例說，毛澤東當年認定早晚要打世界大戰，遂將大量重點工業遷入山區，稱為三線建設，人才自然也隨之進山。今天雖已承

認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這些「深挖洞」式的重點工業停建而不解散，人才也沒有放出山。千家駒認為，至少應該讓部份人才自由流動，但現在還看不出有這個可能性。這位經濟專家指出，輕視腦力勞動的習慣至今仍然存在。目前體力勞動的報酬仍高於腦力勞動，而工人往往以怠工抗議給知識份子加工資。

政治改革，理論突破實為當務之急

千先生認為，要打破這種金融連鎖大鍋飯，首先須使政治和經濟分家，解除銀行按政治需要放款的束縛，讓其根據經濟效益進行業務決策。而在技術上，就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孰優孰劣，千家駒表示，有計劃是好事，西方的大企業都有計劃，但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真正的計劃，水平低，很多統計數字靠不住。以工農業總產值衡量國民經濟成就很不科學，浪費愈多，產值愈大。

就經濟體制今後應進行的改革，千教授認為，市場經濟的部份有待擴大，為了提高經濟效益，集體企業可租予他人經營，而將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管理階層就企業的收益對政府負責。

最後被問及為了加強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競爭，現行的個體所有制部份是否可在不越出社會主義的原則下，適當擴大時，千先生坦言，社會主義制度至今還沒有成功的模式，類似的理論問題均可以探討。

從千先生講話可見，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觸礁，現正處於停滯階段。千家駒先生是否有意代表趙紫陽在海外呼籲援助呢？我們正密切注意着形勢的發展。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權威已死 沙龍興起

中國大陸近二、三年來，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和南京等大城市，出現了很多社會沙龍。這些沙龍的特點是：

一、以老同學、老同事為聚集對象，或以志同道合的本單位朋友為聚集對象，或以有威望的老師及其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為聚集對象，等等。聚會的核心人物較為固定。

二、定期或不定期聚會，除吃喝歌舞的表現形式外，主要是討論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藝等問題，或某些學術問題，組織較好的沙龍還事先佈置好專題，講者分頭準備。

三、一些沙龍有合法組織為外在形式，如民辦公司（貿易、諮詢等）、報刊叢書編輯部、學會、研究會、俱樂部 and 培訓班等。或者，更確實一些說，很多沙龍已成為某些合法組織的外圍實力群；

四、不少沙龍已進入「準團體」狀態。它們有領袖、有核心骨幹、有群眾，有一定的未成文的宗旨。只要在需要時訂下成文章程，便是團體。

五、這些沙龍紛紛設法與海外力量掛鉤。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軍隊中的一些青年軍官也開始有意識地串聯，形成軍事性質的俱樂部 and 沙龍。

有人稱上述情況為：「權威已死、沙龍興起。」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原有及現存的意識形

態、價值體系和信譽體系已經崩潰，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權威的喪失。中共接管政權後，最大的權威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由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信譽基礎已被自己粉碎，其權威性已不復存在。「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對策」的「政令不行」現象，是黨中央權威性喪失的具體體現。

意識形態、價值觀、信譽體系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威喪失之後，社會穩定的基石便告瓦解，社會開始處於不穩定之中。根據社會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在原有社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時，社會人群開始重新組合，與原有社會結構離心的新力量便逐漸形成。中國大陸近年出現並不斷增加的社會沙龍，就是各種新興的社會力量。由於中國大陸沒有結社的自由，缺少明文章程而處於「準團體」狀況的形形色色的沙龍，便應運而生。

社會人群的重新組合及新力量的形成與聚集，是原有社會解體及社會大動盪前期的必然產物。一位社會學工作者指出：「有心施展報負的人似乎都在做準備，都在以沙龍的形式聚集力量，一旦老共產黨人去世後社會出現失控局面，這些沙龍和它們的領導人便可拉起隊伍，稱雄一方。」

一些有志投身到中國社會大變革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也已注意到社會沙龍紛紛出現的情況。有人已決心學成歸國，強化原有的、或組織新的社會沙龍，並利用在海外留學的機遇，與海外力量建立各種關係，以便在社會出現失控局面時，以沙龍為中心，進一步聚集新的

社會力量。

政治改革：中央有意降溫，民主派繼續鼓吹

中共中央八月份北戴河工作會議，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激烈辯論。由於黨內保守派的阻撓與責難，改革派原來設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得不推遲，弄不好，可能是無限期推遲。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自八月底以來，開始在輿論上給政治體制改革降溫。如鄧小平說，政治體制改革要推遲一年進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九月十日則給政治體制改革訂了兩條大框框，他指出：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指領導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社會制度的改革。社會主義制度不能變；二、政治體制的改革目的，是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取消。（見「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中共高層領導對政治體制的輿論降溫，給人民群眾和青年民主派們潑了冷水，原來對政治體制改革寄望過高的海內外知識份子也深有挫折感，多認為中共高層改革派對保守派的讓步妥協太多，並認為，中共高層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在輿論上的一放一收，進一步降低了中共領導的信譽。

國內青年民主派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權力重新分配。所謂領導體制的改善與改革，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強黨的領導，根本稱不上政治體制改革，而只能是行政改革，而行政改革只能是整風和精兵簡政。實踐已經證明，共產黨自己給自己整風是永遠整不好的。

在高層有意降溫的情況下，國內學術界的

民主派人士並不畏壓力，繼續鼓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如九月初，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座談會。該討論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和政治學研究所聯合舉辦，北京的一些學者和理論家參加，會上討論熱烈，所提問題相當尖銳。例如，不少學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一貫提倡的「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大權獨攬、小權分散」、「書記掛帥」等原則，提出公開的質疑和批判。一部份學者主張，政治體制改革須從改革中共的領導體制入手，首先解決黨政不分的狀況；另一部份學者則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應從言論和出版自由起步，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與會學者們一致批評，現在中共黨內不能公開發表不同政見，更沒有黨外輿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和「社會報」九月上旬在上海召開了一次討論會，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上海市社會科學學會會長、「社會報」總編輯曹漫之等，參加了座談會。與會的中青年學者一致提出了中國要實現「八個現代化」的主張，即除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之外，還應加上思想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生活方式現代化。與會者一致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迫切需要做到「法治」、即「有法必依」，以及撤掉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

在這之前，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史研究所主任丁日初，在上海市政協舉辦的「改革與民主」的社會科學沙龍討論會上，指出了如下的鮮明觀點：民主不僅僅是「讓人民講話」，而應該是「人民說了算」。這個社會科學沙龍，由於言論經常突破官方禁區，很受人們注目。

「工人日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曾發表一篇文章，指出：民主、自由、人權、人道主義等口號，是人類追求的偉大目標，不但不應該忌諱，而且應當提倡。

國內基層民主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輿論，估計還會繼續。

我們不禁要問中共高層改革派：難道你們聽不到人民群众的呼聲嗎？你們為什麼往人民群众熱情的潑冷水呢？

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出版 發行、英文版即將出版

中國之春雜誌自創刊以來，受到各國政界、學界和新聞界的注意，被認為是了解中國政情、預估中國未來的一個必要窗口。各界紛紛提出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要求。

日本學術界某些熱心的學者，為了推動中國之春日文版的出刊，組成了中國之春文選日文版編輯委員會和中國民聯後援會。在他們的努力下，日文版終於在九月份推出。九月十六日，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與春日文版編輯委員會在日本橫濱舉行酒會，慶祝春日文版的出版發行（詳見本期的詳細報導）。

中國之春英文版自今年七月份開始即已籌備，從募捐到尋求專業人員，費了相當精力。現在，英文版第一期稿件已全部譯成英文，英文編輯人員正緊張地工作，估計於十一月份之前，可以推出。

中國民聯在世界各地 向大陸外出人員贈送印刷品

中國之春雜誌目前尚不能在大陸合法發行

為了讓大陸人民了解中國民聯的宗旨和中國之春的觀點，中國民聯總部在籌募到一些經費後，決定在美國紐約、舊金山、日本東京、法國巴黎及香港等地，在機場向大陸外出人員散發中國之春雜誌及有關出版物。這些大城市的機場，實際上是中國大陸與外界聯絡的渠道，把握住這些渠道，對擴大中國民聯的國內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中國大陸的外出人員，出國期間人生地不熟，在外遇到不少困難。中國民聯總部外出人員服務部認為，幫助中國大陸外出人員熟悉外國環境，使他們有一個愉快的出國旅行，是應盡的責任。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民聯總部外出人員服務組在紐約肯尼迪機場，向中國民航班機的下機人員贈送資料已達一年多時間，收到良好效果。

為推廣紐約的經驗，自八、九月份起，中國民聯美國舊金山支部、日本分部、法國巴黎支部分別在舊金山、東京、巴黎的機場，向中國大陸外出人員，散發有關資料。這些資料包括：當地城市的地鐵和公共汽車圖；入學常識；當地遊覽圖；如何打電話；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簡介；中國之春月刊等。

中國民聯的此項工作，受到中國官方駐外機構的一些干擾。如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曾派員到機場阻撓中國大陸外出人員接收中國民聯的印刷品。然而，這些阻撓大多無效。有的外出人員說：「我們來到海外，為什麼還受官方的新聞管制？」也有的說：「中共官方為什麼那麼害怕中國民聯？一個政權脆弱到不敢讓人們接觸真實信息的程度，實在太可憐了。」中國民聯的這項活動，已取得一定效果，一些外出人員出國後不久即與中國民聯總部取

得了聯繫。

中國民聯呼籲釋放張曉輝和李裁安

中國民聯總部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九日在紐約散發一項呼籲書，呼籲北京當局釋放因言論而獲「罪」的北大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和李裁安。呼籲書的全文如下：

中共改革派領導人最近一再呼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呼籲言論自由。胡耀邦總書記六月份訪問歐洲時也宣稱，中國不再政治犯。對於中共在輿論上的進展，我們表示欣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中共領導人呼籲和醞釀民主改革的時候，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和李裁安因撰寫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而於四月二日被捕入獄，並受到秘密審判。據北京來源的消息，張李兩位青年學生至今仍被秘密關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來自大陸的人都知道，看守所內的非人待遇比正式監獄更為可怕。

我們在此呼籲：

- (一) 中共當局應公開張曉輝、李裁安的全部案情，不能再搞秘密審判；
- (二) 中國公民享有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張李兩人因言論和政治歧見治罪，必須立即予以釋放；
- (三) 中共當局應該言行一致，民主改革不能僅限於口頭，不能再搞毛澤東、林彪過去「說一套、做一套」的故伎。只有言行一致，才能取信於民。
- (四) 立即釋放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和

一切在押的言論犯和政治犯。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九日

紐約領館毛小金失蹤 中國民聯呼籲各界尋找



失蹤的紐約領事館廚師毛小金

中國民聯總部從內部獲悉：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九日，中國駐紐約領事館一位四川廚師毛小金突然出走（據說是叛逃），至今下落不明，中國民聯呼籲各界協助尋找，幫助這位大陸同胞。毛小金的照片如圖，資料如下：毛小金，男，卅九歲，四川人，操一口四川鄉音，不懂英語，身高約一米六七。

毛小金子身一人不在外，困難重重。現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正全力尋找他。鑒於張政高事件（一位跳樓逃出紐約領事館、要求政治避難，後突然被中共官方尋獲而送回國內的一位官方代表團成員）和張信事件（一位中共官方代表團成員，訪紐約期間在紐約領館內口含古柯鹼上弔自殺）的教訓，毛小金一旦被中共官方尋獲，後果難以預料。

中國民聯呼籲各地同胞向他伸出援手，並

向民聯總部提供線索。

中國民聯總部於九月十二日向紐約新聞界散發了毛小金的資料，華文報刊曾予發表。

紀念九·一八民運一週年 民聯向國內散發紀念傳單

九月十八日，是北京大學及全國高校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一週年紀念日，中國民聯運用組織的力量，向全國各地散發了數千份紀念傳單。傳單的題目是：「不能忘記的呼聲，不能忘記的行動——紀念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一週年」。傳單的全文如下：

親愛的全國高校的老同學們、親愛的同胞們：

你可曾記得去年今天震驚中外的「不忘國耻、振興中華」——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正義呼聲？你可曾記得去年九·一八之後為爭取言論自由而身陷囚牢的愛國青年？

一年前，正是北大、西安、武漢和其它高等院校的青年學生，用實際的行動，吹響了今天政治改革的前奏號角！

在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一週年之際，中國留學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由愛國的留學生和國內民運人士共同發起的民運團體，向北京大學和全國參與去年九·一八活動的高校同學們，致以親切的問候和民主的敬禮！

今年十月，打倒四人幫已屆十年。東亞各地的經濟起飛，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時間。可是，十年了，我國仍在十字路口徘徊。同學們，同胞們，世界各國在突飛猛進，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我們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等待了！我們要行動起來，發揚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的大無畏精神，要求當局釋放因爭取言論自由而無理被捕的兩名北大學學生，爭取大學生畢業分配的自由，爭取尋找職業的自由，爭取出國留學的自由，爭取說真話的自由，爭取結社的自由！只有我們大家團結一致的行動，才能使中國擺脫專制的桎梏，走向自由民主，繁榮昌盛！

年年有個九·一八，可是，一九八五年的九·一八，將永遠激動着我們這一代愛國青年，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奮鬥不息！

紀念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一週年！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釋放被捕的北大學學生！
釋放一切在押的民運人士！
歡迎與我們聯絡，聯絡地址為：

①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②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七九〇
四七號

請傳閱！請翻印！

中國留美、日、歐、澳

部分學生和訪問學者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部份盟員

中國之春 月刊編輯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

王克平、李爽在京要求 舉辦畫展被拒

已旅居法國的星星派藝術家王克平和李爽，八月份回到北京，計劃在北京舉辦展覽。北

京的數家畫廊對他們的展覽計劃均表興趣。然而，文化部長王蒙先生奉命向北京和全國各畫廊發出通告，禁止包括王克平、李爽在內的一批人士舉辦畫展，在通告中，他們被指為離心份子。

王克平、袁運生和黃銳等在海外的大陸畫家、藝術家，曾在去年組織發起「中國海外藝術家聯盟」。從這次王克平、李爽在京舉辦展覽被拒可以看出，「中國海外藝術家聯盟」——這個追求藝術自由的文藝團體，完全不能被中共官方所容納。這無疑使人們對大陸政治體制改革又增加了一分疑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九月十八日，文化部長王蒙在北京文藝界茶會上，向海外文藝界大搞統戰宣傳。他說：「統戰總比大戰好……，統戰的核心就是團結，我們內部的團結，和我們有不同觀點的人團結，包括海外的和我們的政治觀點、世界觀、理論觀點、宗教信仰、民族成份各個方面與我們不同的人團結。」他說：「統戰精神是廣泛團結的精神，是使國家興旺的精神，是振興中華的精神。」

聽聽王蒙的這些「偉大神話」，再看看王蒙對王克平、李爽這些海外赤子的拒絕，你不覺得可笑而可悲嗎？

中國民聯關於留學生政策 問題進行民意調查

中國民聯總部於七月份向數千名中國大陸留美研究生、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寄發了一份民意調查表，就北京官方最近留學生政策的變動，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現在，總部仍在陸續收到少許的回單。這是中國民聯總部進行的第一次規模較大的民意調查，截至目前，回收

率尚屬滿意。總部目前正在對回收單進行統計處理。

從目前結果看，廣大中國大陸研究生、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都認為北京官方的留學政策已經收緊，並對此收緊政策表示強烈不滿。大家都希望留學生政策更趨開放，取消對陪讀、自費出國和讀「博士後」的各種限制。

最後統計結果將於下期中春雜誌公佈。

遇羅錦批駁「光明日報」 的歪曲

在西德尋求政治庇護的大陸作家遇羅錦最近公開批駁國內「光明日報」對她的歪曲報導。「光明日報」九月十六日報導說：「遇羅錦在難民營中，得不到西德人民的同情。」又說：「遇羅錦每月只有四百五十馬克的生活費，日子並不好過。」

遇羅錦向朋友指出，「光明日報」的這項報導是有意歪曲。遇說：她不在難民營中，而是自租了一套很漂亮的住房，月租三百八十馬克，由西德政府支付。此外，西德政府每月還給她補貼三百九十馬克伙食費，看病上學全部免費，每年還發給七百馬克的服裝費、一千六百馬克的傢俱費，並還發給她一張特許購物卡，憑卡購物可減免百分之七十五。遇說，她在西德有很多朋友，生活愉快。她願向各界轉述如下話語：「我在中國大陸的四十年中幾乎什麼滋味都體驗過了，唯獨沒有體會過做一個真正的人的滋味。我到西德的第一天才有真正做人的感覺。」

據報導，遇羅錦的丈夫吳范軍，已獲得批准出國探親。但吳范軍由於恐懼出國後生活不適，尚未成行。

中國之春香港成員在反核風潮中的活動及意見

中國之春(香港)

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的嚴重事故，給歐洲帶來了核輻射，而在香港，則敲響了核威脅的警鐘。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事，驟然間激起廣泛、緊張的關注，接着引發起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的風潮。在這一風潮中，產生了反核「聯席會議」。

「中國之春(香港)」的成員，在這一風潮中，認為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對香港和整個中國的發展都是害多於利。因此，當六月二十八日某勞工團體邀請我們參加聯席會議時，我們即慨然應允，出席了「聯席會議」的第六次會議。當時「聯席會議」的召集人馮智活表示：為加強反核實力，壯大反核聲勢，任何團體只要認同反核，即可參加「聯席會議」。至八月九日第九次「聯席會議」召開，我們才發現「聯席會議」的團體名冊中，「中國之春」竟未被列入。經查詢才知道，原來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向「聯席會議」的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提出動議：為避免「聯席會議」染上過強的政治色彩，必須把中國之春及某些團體排除出去。該動議團體甚至聲明：如不排除，則他們退出「聯席會議」。結果該動議獲執委會通過。當我們質詢馮智活時，馮則表示：運動發展到某一階段，會發現有某種需要，比如排除某些團體。中國之春有過強的政治色彩，故唯有作甄別排除。

事情竟會演變出如此一幕，我們真是感慨良多：

一、衆所周知：「聯席會議」只有一條規章，那就是認同反核，除此之外，並無其它規定。

二、中國之春究竟有什麼過強的政治色彩？我們懇請各界認真查核一下。中國之春的主張及行事，歷來溫和而理性，我們主張和平統一中國，主張理性探討中國的改革，主張中國應該民主，不應該黨主、官主。這一切與反核有什麼抵觸呢？這一切難道是「聯席會議」的參加團體都反對的嗎？

最可悲的是：就算我們上述主張是「聯席會議」中某些團體所反對的，提出把中國之春排除出去也欠缺理由，因為我們參與「聯席會議」以來，一直未宣傳過我們的上述主張，亦未在任何活動中搶風頭。我們只是默默地聽取各種意見，按「聯席會議」的安排去徵集簽名。

三、執委會由「聯席會議」各參與社團選舉產生，就像股東選舉產生董事局，董事局無權開除任何一位股東一樣，執委會也無權開除選舉它的任何社團，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四、「聯席會議」的大旗是：「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這非常恰當，為維繫「聯席會議」的團結及吸納更多的社團，不容許這一大旗染上其它政治色彩，也是正確的。「聯席會議」的執委會應該反對任何參與社團的非反核要求，應該反對任何與反核無關的主張。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要請問執委會：某參與社團

提出的把中國之春排除出「聯席會議」的動議，是不是非反核的要求？是不是以反對政治滲入為名而大搞政治滲入？

五、衆所周知：(一)七月中旬，新華社為緩和反核風潮，安排「聯席會議」代表赴京；(二)中共為防止大陸像台灣一樣出現強大的黨外勢力，出現強大的民主浪潮，曾笨拙地宣佈中國之春為反革命組織，企圖藉此使人民害怕中國之春，以遏止中國之春的發展。

就是在這兩大背景之下，出現把中國之春排除出「聯席會議」的動議。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把中國之春排除出「聯席會議」，絕不是運動發展至某一階段的需要，而是執委會為避免背上反革命包袱而忍痛自割，損傷「聯席會議」的原則，損傷「聯席會議」的團結。

邀請我們參與，旋即又無理排斥，這是對我們的一種侮辱。我們在參加「聯席會議」之初，就絕無爭名爭利之意，而只求達到「聯席會議」的目的。我們無意爭閒氣，我們在此僅表示：我們願繼續為實現聯席會議的目的而貢獻力量。我們希望「聯席會議」以後要堅決抵制任何要求排除某一參與社團的動議，以防「聯席會議」分裂。

中國之春被聯席會議的執委會排斥之後，為大局着想，一直未發表任何聲明，由於這一事件最近已為報界公開，因而我們亦無須再沉默了。我們無須再自我約束，避而不談我們對

大亞灣核電廠的各種意見。

我們認為：一、興建核電廠，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需要，是進步，是國家的大好之事，籠統地反核是錯誤的。事實上，「聯席會議」發動的反核簽名運動，並非籠統地反核，而只是反對在大亞灣搞核電廠。大亞灣太接近香港，稍出問題，香港就會頃刻之間化為烏有，變成死城，而六百萬港人在危險關頭，則無法疏散，以這種原因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我們認為不但正確，而且是偉大的愛國忠忱。

二、假如中國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國家的整個管理體制科學化而不是官僚化，那麼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也未必是錯誤的，香港人民也未必就會百萬簽名反對。問題的關鍵在於：最安全的現代科技，給官僚化的管理體制一管，也變成最不

安全的東西，六百萬香港人民，絕大部分去過大陸，領教過大陸那套官僚化的混亂的管理體制。

三、站在民主的角度，我們認為政府是人民的工具，政府應該而且必須實現人民的願望。基於此，大亞灣核電廠就算百分之百安全，但人民反對興建，那也就百分之百不能興建。

四、事實上，大亞灣核電廠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人們通常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而最近報界披露，依照夏維爾的報告，大亞灣核電廠的意外風險是一百六十六分之一。風險如此之大，我們不予堅決反對，簡直是罪過。

五、有人宣稱：香港人民這一次反核運動，必定徒勞無功。功效也許真的沒有（指阻止不住核電廠在大亞灣興建），但我們堅信這絕不會徒勞。香港人民只要把要求停建核電廠的

行動堅持下去，將可以試出中共政府有百分之幾的民主觀念，其對香港民意有百分之幾的尊重，我們據此亦可判斷中共政府對香港九七年後的承諾有百分之幾的誠意。

六、香港僅六百萬人，與全國十億人相比是極少數，因此我們認為：所有深明大亞灣核電廠的危害性而持堅決反對態度的人或團體，除在香港發動民眾外，還應該在更廣闊的範圍發動民眾，應該把香港地位之重要性及在香港旁邊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危險性，傳示給十億中國人民，以動員海內外一切可動員的力量，投入香港民眾的這一場反核運動。相信在萬流奔襲之下，中流砥柱也會倒塌。我們能做到這一步，則不但大亞灣可風平浪靜，而籠罩於香港九七大限之上的專制陰霾，亦可大大地淡薄。

美國月亮和中國月亮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穆望華

一位名人有過一句名言：

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

好稀奇喲！嫦娥不愛故鄉愛他鄉……

終於有幸來到了新大陸，

真想看看比中國月亮還要圓的美國月亮。

到了陰曆十五，夜空晴朗，

我站在曼哈頓的街頭仰望。

摩天大樓林立街道兩旁，

我看見無數夢幻似的燈火和電光，如千條金蛇亂舞。

好稀奇喲！却看不見我盼望已久的美國月亮……

我升到了帝國大廈之顛。

看見了！我看見了最圓最圓的月亮孤懸在燈海之上。

好稀奇喲！美國月亮竟如此寂寞淒涼，無人欣賞……

長城和西湖上的圓月蒼然在我腦海中浮起：

她是那樣地恬靜秀麗。圓得就像古美人的銅鏡。

巨大的光環高掛在廣闊的夜空，

引起歷代多少詩人的謳歌和遐想……

好稀奇喲，中國的月亮！

● 文藝園地 ●



從具體的政治改革做起

(本刊責任編輯)張森

中國民聯早就預言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國大陸繼續實行經濟改革之後，近幾個月來，政治改革的呼聲也日益高漲。這一方面是由于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必然會遇到與之不相應的舊政治體制的阻力，從而迫使政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廣大人民不滿足于單純的經濟改革，而要求全面改革中國社會的內在壓力所推動。

經濟改革後由于出現勞動力市場滯塞，金融市場混亂，人民幣大幅貶值，國民經濟一度呈現負增長，中層及基層官僚茫然不知如何配合或由于自身的切身利益有意不予配合甚至抵制等嚴重現象，迫使中共當局不得不承認：要使經濟改革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民聯歷來主張全面改革中國社會，改革現今中國社會的一切弊端；并早已預見到單純的經濟改革既不能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也不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而且必然會遇到舊有政治結構的阻碍。

我們試舉幾例：

▲「中國之春」在一九八二年底創辦之日就指出：「造成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最重要的客觀原因是我國現行制度的高度中央集權化，官僚主義化以及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與執行沒有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因此，如果不對現行的經濟計劃體制和管理體制做徹底的改革或改造，反而加強其中中央集權化和官僚主義化，是無助于恢復我國國民經濟的『合理比例』的。」它還指出：「任何國家經濟改革的成功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條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四點：(一)黨內或政府內的上層中力主改革與守舊勢力相比佔據優勢。(二)上層改革力量的改革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受到下層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的支持。上、下彼此相聯繫、相呼應。(三)上層的改革力量要獲得中層的支持。(四)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是成功的經濟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中國之春」創刊號，第十八頁至第廿五頁「中共的經濟調整決策行得通嗎？」)

▲「中國之春」總第五期中指出：「落後的經濟完全是由于落後的政治造成的。」(第二頁「新舊洋務運動」)

▲「中國之春」總第十八期指出：「我們

的一貫看法是：多元經濟的持續發展需有穩定的多元政治來保障，兩者相輔相成，缺一則成跛腳狀態。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派如不在政治體制上相應變革，人民對其經濟改革的前途則難抱樂觀。」(第三十五頁「初評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方案」)

▲「中國之春」總第廿二期指出：「只運用原有權力架構和領導人的權威推行改良，是歷次改良運動失敗的重要教訓。」(第七十四頁「支持趙紫陽，超越趙紫陽」)總第十五期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匹配，必然導致『跛腳』和『蹣跚』狀態」(第卅六頁「跛腳的社會在蹣跚」)

▲「中國之春」總廿四期社論指出：「經濟這條腿使勁向前邁，而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改革跟不上，甚至在某些方面進行收緊：必然會失去平衡」，「只有堅持平衡而協調的改革，改革才有希望。」(第三頁「不是太快，而是不平衡」)……

尤其是在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之後，我們更是時時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單純的經濟改革必然會遇到舊政治體制的阻力並出現種種弊病。民聯二大對中國大陸形勢的公告中指出：「當前改

革政策的搖擺性、不平衡性和不徹底性……往往使人不知所措，建不起信心。改革政策的不平衡性……表現在：經濟改革這條腿向前跨進，而意識形態、法律、政治的改革跟不上去，呈現典型的跛腳狀態。……中國目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經濟犯罪、外匯流失、外貿赤字等一系列失控、混亂局面……正是不平衡改革政策的必然結局。只有進行「經濟、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的協調改革」，這些混亂才能克服。（「中國之春」總卅三期第十四頁至第十八頁，「支持改革，推動改革，批評改革，超越改革」）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聯在倡導、支持經濟改革的同時，一直在倡導和支持政治改革。更準確地說，中國民聯倡導、支持并正在為之努力的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法律、意識形態等在內的總體的配套的、平衡的改革。民聯認為，由於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各社會因素有機交織，只改革某一方面的社會因素幾乎很難指望獨善其身。我們支持改革，因為改總比不改好。即使是最微小的改進也總算是一種新的啓始。同時我們也在一開始就倡導改革現今中國社會的一切弊端，指出單純的經濟改革可能會出現的種種問題和遇到的種種阻力。

大陸經濟改革以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預見幾乎全部言中。大家如果翻一翻歷期的「中國之春」，對照一下同時期的中共各種官方報刊，就可以看到：我們每次都及時指出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及時提出從中國的國家前途、民族利益出發的種種合理建議。但十分遺憾的是，中共歷來置若罔聞，一意孤行。中共如果真能像其自己所標榜的那樣，「認真聽取群眾意見」，考慮我們這些中國公民意見的合理性

，實際上很多事情能夠防患于未然，從而使中國在實現「四化」的道路上少走許多不必要的彎路，使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少受許多不必要的波折。正是由於中共沒有對我們每次的及時建議予以充分的重視，才使在目前經濟改革出現的問題前感到困擾。我們誠懇地希望中共能在這些事實面前有所醒悟，認識到民聯和廣大中國人民合理性建議的價值。

政治改革的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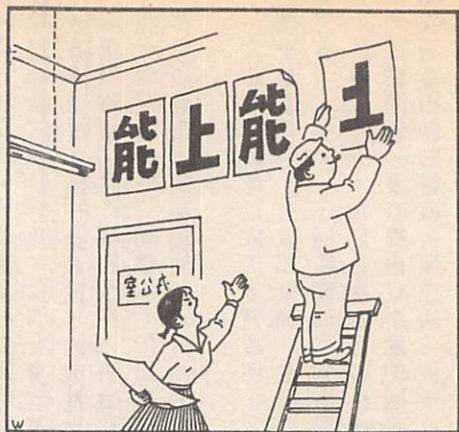
目的和具體原則

中國民聯歷來正視事實。我們在看到鄧小平政權在邁出經濟改革——雖然還不算徹底的改革——的同時，也看到它由於社會客觀的迫切需要，也做出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變革。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逐步嘗試在縣以下實行直接選舉，改革了人民公社，建立了一些刑事和民事法規，在幹部人事制度中結束了幹部的終身制；在領導班子中試行老、中、青三結合。中國民聯對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的這些邁進，首先是表示肯定，肯定其較之「四人幫」時代有所進步，希望其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繼續將政治改革向縱深推進；其次，我們也必須指出中共目前的這些政治變革仍是局部的、膚淺的、不徹底的。也許中共本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它在近兩個月裏才連續幾次召集各方面的專家和理論家舉行「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並計劃在今年內還要舉行幾次這樣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至少說明中共已經意識到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無法進一步深入，甚至已經取得的一些經濟改革的成果也會受到舊政治勢力的威脅；不進行政治改革，改革派的隊伍就得不到充實，甚至還會受到削弱。（

前一階段在經濟改革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大量青年幹部受到削減不正說明這一點嗎？）；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共現政治機制中的家長制、官僚主義、專制作風就得不到抑制，甚至會發展到影響中共政權的生存。中共能夠意識到當前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這是一件好事。但具體怎麼改？改些什麼？却仍是處于朦朧、徬徨、舉棋不定的階段。這就像是一個病人，已知自己有病，而且很嚴重，不治不行，但開刀又怕疼、又怕死。然而這樣耗下去是不行的。

既然肯定了中國大陸現今的政治必需改革這個前提，那麼則是越早改越好。現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起步，如果政治和社會改革能夠相應跟上，就會出現一個協調、平衡發展的局勢，從而使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如果在經濟改革、發展的情況下，政治改革遲遲跟不上，則不僅會由於不相適應的政治體制的阻力而使經濟發展速度減緩甚至停頓，而且可能由於社會整體的不平衡，而出現「塌方」現象。經濟改革的步伐越大，速度越快，如果政治體制不能與之相應的協調，則這種「塌方」到來得越快，越厲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說，如果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必須改革，那麼就越早改越好。

究竟具體應該改些什麼？我們認為中共之所以遲遲說不清這個問題，是與他們不清楚政治改革的目的有關。我們認為，當前舉國上下所呼籲的政治改革，從近期來說，是為了配合、協調已經在展開的經濟改革，從而使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化、發展直至最後的完成，而不使經濟改革已經開始的大好局面中途夭折，半途而廢；從長期來說，是為了使中國最終成爲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會，結束幾千年的封建



了慣習

王大光

及其殘餘，步入世界現代之林，即真正地實現「四化」。政治改革應致力於實現這些目標，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關於改革的具體原則，我們贊成大部分中共理論權威在今年七月北京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上提出的「黨政分家、權力合理分配」的原則；同時我們也建議效法中美建交時中共奉行過的原則，即：把有分歧的地方暫時撇在一邊（如到底是像王兆國等人所提出的通過有計劃、有步驟的政治改革加強黨的領導，還是像廣大改革派提出的通過政治改革在中國實現合理分權的民主、法治制度），先從最迫切的、大家都有共識的改革做起，在改革中學習改革，在具體的改革中探索、前進。沒有開端就永遠不會有進步，就永遠只能是紙上談兵，結果只能是延誤戰機。

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

那麼當前在政治方面可以進行的改革又有
哪些呢？中國民聯認為：

首先，應該開放言論自由。中共雖在憲法中也規定有言論自由的條文，但實際上大家都很清楚，這一條根本沒有真正實行過。言論自由應具體體現在：

1. 對於任何言論，即使是反對當局政策、人物的言論，也不能施以任何政治壓力（如「戴帽子」、「打棍子」等），更不能以鐵窗和手銬來對付持不同政見者。

2. 要允許人民辦報，出版刊物，使用電台、電視台等現代新聞工具，允許人民舉辦有關政治問題的演講會、討論會等。

3. 為保證上述權利的實施，政府應解除對於出版刊物所必需的紙張、印刷的控制，允許人民自由購買紙張、印刷工具；允許人民租用電台、電視台，租用演講、討論所需的場地。

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不必贅述。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集思廣益，真正匯集群眾的智慧，得到最佳的政治改革方案；沒有言論自由，執政者就不能聽到群眾的聲音，行群眾之所想，真正為人民服務；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使群眾監督執政黨的方針、政策及其落實情況，從而純潔黨和國家的肌體，使國家的改革政策在改革過程中及時得到修正，避免問題出了一大堆，嚴重到非動大手術不可時再做為時已晚的急救。總之，沒有言論自由這一條，任何政治改革幾乎很難有樂觀的前景。這一點中國過去改革的歷史和其它國家的改革經驗已做了充分的證明。言論自由是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政治改革的一種具體表現，沒有言論自由，人民便無法

參與政治改革，結果還是拿群眾當「阿斗」。

其次，黨、政必須分家，人民必須參政。黨、政分家是當前中國大陸從上到下的一致呼聲。具體怎麼做？不妨先從基層開始，即從實行「廠長責任制」開始，黨委不能進行任何干涉。基層黨組織的成員只過黨內組織生活，不參與廠內任何的行政、生產、人事等決策。工廠完全交由工人選舉產生或聘用的廠長負責。把工廠從目前的既是生產機構又是行政的一個層次的局面變為純生產機構。黨員在廠內只是一個普通的生產者。

另外，為了加強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基層行政的決策，可以在基層行政層次（注意：不是生產單位）如縣、區，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的行政人員佔三分之一，民主黨派的行政人員佔三分之一，群眾行政人員佔三分之一。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實行過「三三制」，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今天我們再實行「三三制」，相信也仍有其積極意義。當然，在今天基層的這種「三三制」中，各部分應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絕不能使某一部份只做另一部分的花瓶或附庸，那樣就完全失去了意義。

如果我們能先做到上述兩方面，然後逐漸從基層向中、上層推，黨、政就能真正分家。再次，人員流動的滯塞問題，是經濟改革中遇到的一個巨大問題，它造成了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阻礙了很多方面的發展，成了當前中國社會中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中國大陸人員流動困難的阻力具體表現在戶口、檔案和工資指標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的時凍時開，外加下達指標造成了人員流動的嚴重滯塞，不僅生產、科研所需的人員受這三個環節的制約得不到及時的充實，就是正常的夫妻家庭團

聚也因此受到極大的阻碍。戶口制起源于中國封建時代的戶籍制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代的保甲制。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無一實行戶口制。因此中國也應儘快將戶口制改爲身份證制（不是戶口制和發放身份證并存，而是實行科學的單一身份證制），廢棄以戶口限制人員流動的有關規定。

檔案制世界各國都有，但却差別很大。中國的人事檔案是由有正式戶口所在地的單位掌管，檔案隨人員移動，沒有檔案的人就像沒有戶口的人一樣，是一種「黑人」；同時檔案屬於保密材料，每個人不知本人的檔案中記着什麼，也不知別人在自己的檔案中寫進了些什麼。在人員需要流動時，往往由于原單位領導死死攔住檔案不放，而使該人的流動告吹。這種檔案制顯然不適應經濟改革、實現四化的需要。檔案應是某人行爲的真實記錄，因此應是每個人經過一定的手續都能查閱自己的檔案；同時檔案應只是行爲的記錄，而不是領導看法的記錄，任何以人的感覺爲轉移的判斷都不應記入檔案。另一方面，檔案應只在國家一定的部門及某人所經歷的單位保存，不是隨人走，而是人走案留。這樣檔案既起到了記錄某人行爲的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的作用，又不對人員的流動有絲毫的阻力。當然，對於檔案的查閱，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一個黨員隨便拿着封介紹信就可以去看別人的檔案，而必須建立一定的批准手續，通常情況下任何人沒有權利去看別人的檔案。

至于工資指標問題，那是「大鍋飯」的產物，在「大鍋飯」制度下，各單位不計成本，搜羅的人越多，胡傳魁的隊伍越龐大，寧可不用，死也不放，對此惡劣現象中央制定工資總額指標政策是有一定正確性的。但隨之而來的

則是沒有工資指標就休想增人添馬。于是人員要想流動，原單位說：人走行，工資指標不能帶走（這樣他可用此指標另行招人），而進入單位則說：人來行，工資指標自帶。推來拖去，最終使人原地踏步。其實，這個問題最好解決不過，實行獨立成本核算制，各單位就可根據自己的能力需要自行決定究竟進多少人，留多少人。有能力、有需要，就多進人。否則白進人養着沒活幹，自己降低利潤，惡果自吃。這樣讓他多進人他不多進了。

我們希望中共能夠考慮、試行我們的建議。我們相信事實將會表明它們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在全面開放中國人力資源市場前，中共不妨先對高級科技人員和大學生解凍，允許他們自由流動。因爲這兩部分人是我國發展的亟須人材，若由于武斷分配或刻意執留使其學不能所用，不能充分發揮專長，則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實在令人可惜。如果讓他們自由流動，通過市場調節，便能自動使他們在最需要的地方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這才是真正「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任何以強制的辦法把大學生分配到邊遠地區的作法，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既耽誤了本人，也耽誤了國家的建設。中共以前奉行這樣的政策，得到的教訓難道還少嗎？

以上我們提出的僅是一些細小的、但是具體的改革建議，但這決不意味着我們忽視整體改革，而只是因爲現今中共當局只是一味地喊着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但遲遲提不出任何具體的開端方案，我們主張少爭論，早動手。萬事都是從具體的細小的方面先動手，一點點完成整個大廈的。做點具體的改革總比一點不做好。否則整天爭論不休，何時才能完成政治改革？何時才能實現中國的「四化」？

● 文藝園地 ●

書夢的夜訴

（中國大陸詩人·歐洲）嵐之凝

一幢幢建築
在陽光下緊貼一起
無數的廠房、商店、住宅
把空間撒裂成：
大街小巷；汽車奔馳
急促的喇叭像人的脚步
啊！這茫茫的人海
我看不見她的踪影
每一棵清香的樹影裏
風撫奏出的綠色低泣中
沒有她柔軟的頭髮飄忽
遼闊的江面
從哲學家眼睛篩下的星光
苦苦思念的白色三角帆啊
顫動的遲暮深處的鐘聲
我垂下眼帘
躲閃着卯日淒迷的金色
我猶伸出手去
渴望吻一般的溫馨的鮮果



「一黨專政」及其他

——學餘斷思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朱彩萱

改革潮流不可遏止

十年以來，對中國大陸社會弊病的揭露和批評，一直不絕於耳。從官方的「人民日報」到民間和海外的各種報刊，從文學作品到電影戲劇，乃至整個大陸的舟楫斗室、街頭巷尾，可謂俯拾皆是。儘管批評的內容和方式各異，但是，大陸的社會現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却是共同的認識。

各種不同政治色彩的批評，共同的心聲是急切盼望「中華崛起」。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一文背離這一目標。然而，如何進行改革？改革些什麼？却歧見迥然。甚而使得某一方對不同派別，視若仇敵，兵刃相向。像中國這樣有漫長封建專制和閉關自守歷史傳統的國家，在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進行最初討論時，發生此類現象，乃是歷史的必然。

燦爛的文明歷史和自豪感，是支撐民族精神的主柱。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深受災難，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三十餘年間的無休止動亂，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促使十億人對過去的信心反詰自問，這就是構成當前改革潮流的廣泛社會基礎。在許多學科領域內擁有的大量英才（尤其是中青年），以及近十年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信息，對中華民族的沖擊激盪，將

使得這一改革潮流，終成不可遏止之勢。

軍閥與警察專政

在當今世界的一百多個國家中，領導集團多以政黨形式出現。就其功能和執政方式而言，大致可分為「一黨專政」和「多黨競爭」兩類。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共產黨國家和歷史上的國家社會主義如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等）均為一黨專政；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均為多黨競爭；其他的落後貧窮國家和地區，多為一黨專政；而落後國家和地區，一旦經濟上取得長足的進步，社會政治生活中發生的引人注目的現象，便是「多黨參政」的呼聲日益強烈，諸如南韓、台灣等。一黨專政多是建立在封建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在貧窮落後國家是這樣，在共產黨國家也是這樣。一九一七年蘇俄建國前夕，尚處於封建農奴社會，而中國大陸至今尚未脫離農業社會的基本形態。在發達工業社會裏，一黨專政的局面較為罕見，即使發生也是短命的。

凡一黨專政的局面能長期凝固不變的國家和地區，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執政黨實質上是槍桿子黨。黨在執政之前，主要從事軍事活動，依靠武裝奪取政權；執政之後，恃仗槍桿子，維持其一黨專政的局面。無論掌權者的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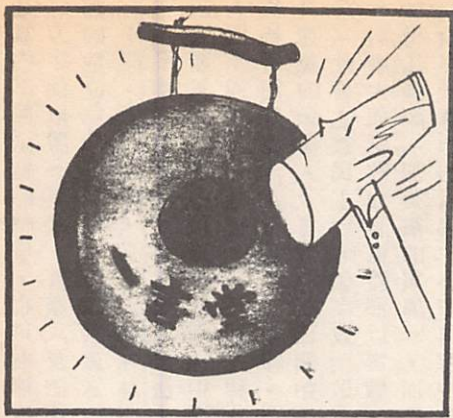
出身如何，他維持政權的主要工具是軍隊和警察。在和政治對手的鬥爭中能否取得勝利，決定因素是能否調動和指揮軍隊及警察，從而壓制和撲滅對方。因此，一黨專政的實質是軍閥與警察治國。

反觀多黨競爭的國家，不同政黨主要依靠其一系列綱領、方針、計劃、措施，甚至給人民以種種許諾，從而爭取人心，擊敗對手。在這類國家，不同政見者能享受到基本的民主權利，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各政黨與軍隊、警察之間，沒有必然的連繫，雙方不須擔心被對方逮捕、囚禁、處決。選民完全依靠個人的判斷來決定取捨。法律限定執政黨不能動用軍隊、警察或其他特務手段來對付發表不同政見的任何一人，除非後者首先使用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如若執政者濫權行事，則要遭受法律的制裁。此時，警察和軍隊的作用是維護法律的正常運作，迫使執政者就範，直至給予嚴肅制裁。

「中國式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成份是農民。在建黨後數十年間，主要工作是以武裝鬥爭為手段，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有許多特徵類同於從陳勝、吳廣以至太平天國式的農民戰爭。我們考察毛澤東一生的實踐活動，從初期的井崗山暴動直至晚年的一人獨尊，其行徑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領袖一脈相承。每一次農民起義，均需要有自己的「圖騰」，從而製造出當時歷史背景下最具感召力的偶像。而且偶像均來自上天或遠方，愈是不可企及，愈具神秘色彩，則愈具有吸引力。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即宣佈要建立一個「物



一錘定音

肖落

質極大豐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烏托邦，這對於千千萬萬終日為生計奔走的升斗小民，以及充滿浪漫理想和獻身精神的知識青年，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對於當代開始進行獨立思考的青年，「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仍是挽救信仰危機、使青年人迴避迷惘現實的一大法寶）。並從遙遠的異邦引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建立烏托邦社會的理論基礎。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大量高級領導人，却從未系統地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在中國國內的翻譯和出版，直至五十年代，還是間斷和不完整的。即使是一小批赴歐勤工儉學的學生，因語言障礙、時間短促、打工及從事串連活動，也無暇作深入細緻的研究，更遑論涉足於其他學派。當然，這些都是當時的情勢使然。無怪乎毛澤東一生對「

馬克思主義精髓」的解釋，忽兒這樣說，忽兒那樣說，隨心所欲，實用主義。

在初期，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對世界上幾種重要的政治學派和制度、經濟學派和制度，進行深入具體的考察和研究比較（或者尚無條件進行，或者採取排斥態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和基本成員絕大多數出身於農民，在完成土地革命後，對於中國的未來，並無科學的策劃。毛澤東本人除提出過「人民民主專政」外，別無其他。因此，「照搬蘇聯」，就成為唯一的填空和解急辦法。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短短七年時間，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農村合作化、軍隊建制、大專院校的專業設置，乃至大中學課本，幾乎全部照搬蘇聯，至今已成為改革的重大障礙。鄧小平近年來取得顯著成就的農村體制改革，主要是從集體化退回到「耕者有其田」，但為此進行了數年的艱苦鬥爭。

筆者絕不認為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低能或不具創造性。一部毛選，鴻文四卷，融匯了孔孟老莊、孫子兵法、連橫合縱、乃至「三國」、「水滸」，數千年中國國粹中的進退迎合、機謀權變。加之毛澤東本人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終於形成了「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遂成帝王大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從大的格局而言，却是步他人後塵，甚或仰人鼻息，僅在個別環節上別出心裁。

蘇聯僵化的集權體制模式，綑縛住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命中注定前途不佳。而毛澤東以蘇聯模式為基礎所發揮的「獨創精神」，終於使中國社會在毛臨終之時，已落伍為世界上最為專制和貧窮的國家。

在經濟領域內，從「集體農莊」發展到建

立「人民公社」，企圖把中國農民千年以來冥想中的烏托邦一朝變為現實，但實際上却動搖了中國這個農業大國的立國之本。從此之後，廣大農村一直掙扎在飢餓線上。另一方面，實行大躍進、大煉鋼鐵等，企圖在短短數年內實現工業化，從而證明「西方資產階級在數百年內所作的事情，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可以在數年之內完成」。然而，最終却使工業生產瀕臨破產。在政治領域內，從「反右運動」、「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使得這個有悠久文明歷史的民族，陷入恐怖和黑暗的深淵。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年間，毛澤東口稱「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不斷地發揮著他的「獨創性」。然而，每一次「獨創」，都伴隨著千萬人人頭落地，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大的災難。

中國當前的執政者，不敢正視這二十年間的嚴酷事實，執拗地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啻是在改革道路上自掘陷阱。毛澤東數十年來慘淡經營，培植了強大的力量。這些人大部分身無所長，祇憑藉毛澤東式的官僚體制而頤指氣使，當前仍把持著從中央到基層的許多領導權。他們在「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幡符下，頑強地抵制改革，堅持毛澤東時代的一系列錯誤政策。他們時刻準備吞嚥「異端」，他們長期以來形成嚴密的網絡，互相呼應，致使許多改革者懷著「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心理，不僅在改革途中披荆斬棘，更要隨時提防背後的暗箭，如履薄冰，艱難備行。

「一黨專政」及民主改革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封建農業社會中產生和發展的政黨，長期以來，又存在於武裝爭雄

駁西德大使館胡參贊

對中國民聯的誹謗

(中國大陸留學生·西德) 林榆瓊

的環境中，其「槍桿子黨」的特徵十分明顯。不僅在和不同政黨的鬥爭中依靠槍桿子，即使是在黨內不同派別的鬥爭中，也只有擁有槍桿子的一方才能取勝。軍隊、警察（及法律）以維護黨的地位為最高原則，中國共產黨對此一直直言不諱。近些年來，又分別將「林彪接班人」和「堅持四項原則」赫然列於憲法。無怪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一再對外宣稱「中國沒有一個人因不同政見而被捕，一切按法律辦事」，因為持不同政見本身就違反了法律。最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及官方報紙已開始承認中國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強調政治改革。這肯定會對龐大而腐敗的官僚體制以震撼。但是，如果仍然強調「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打算改變「槍桿子黨」的面貌，不認真解決黨和軍隊的關係，不使黨本身置於法律監督之下，改革最終會受到專制者的鎮壓而中途夭折。

筆者這樣說絕非聳人聽聞，歷史上已有先例。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不擔任任何國家行政職務，執掌行政大權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經濟發展較為平穩，政治生活較為鬆動。然而短短數年之後，一場文化大革命，劉鄧均被打翻在地。試想：當年毛澤東如若不能指揮解放軍，豈敢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儘管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極為複雜的根源，但是，如若軍權不操縱在黨閥手中，中國的這段歷史應當重寫，這是可以肯定的。目前中國的改革者只強調「黨政分家」、「黨企分家」，而不打算調整黨和軍隊的關係，不使共產黨本身置於法律約束之下，是短視的，難免重蹈覆轍。

如若共產黨不能放棄「黨天下」的心態，則筆者的這些說法，無異與虎謀皮。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只能是有局限的、虛偽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中國駐西德大使館的胡參贊，在西德慕尼黑召開了一次中國留學生會議，在會上及會下大肆抨擊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引起一些留學生的反感。

胡參贊對民聯的抨擊是舊調重彈，他說的大意是：

▲王炳章是文革的造反派頭頭；

▲王炳章在留學期間被國民黨收買搞起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造謠生事，大家不要聽信他們，不要與他們接觸。

這些老調，在我們出國前集中時，都曾聽過。值得提出的是，胡參贊的老調重彈，有些地方却彈走了板。比如，他說什麼王炳章先生曾是河南某市的中學教師，曾留學美國，中國之春雜誌是香港印刷的（以前他說過是台灣印刷的），等等。

胡參贊在留學生會議上特地抨擊中國民聯，顯然是會上級之命而行事，因為他在抨擊民聯時，顯示出言不由衷的樣子，而且錯誤百出。因為，王炳章先生是學醫的，不是教師；他留學加拿大，而不是美國，這些，我們在出國前就聽說了。

最近，中國民聯西德聯絡站活動較為積極

，他們在胡耀邦訪德期間散發了大量呼籲國內開放民主的傳單；他們積極在留學生中傳播民主思想，傳閱中國之春雜誌等。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之春雜誌在中國赴西德的留學生中流傳，而且越來越吸引留學生。這些，無疑引起了北京當局的注意。胡參贊抨擊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是一種代表官方反擊的表示。

胡參贊對中國民聯的誹謗，不值一駁。因為，大使館根本不敢正視中國民聯的政治主張和經濟主張，他們只能用生活上搞臭的老辦法，去污蔑民聯。

中國大使館對民聯的態度，是不能令我信服的。因為，有的使館官員告訴我們要與台灣同學搞好關係。既然要對台灣國民黨統戰，為何對民聯如此仇恨？國民黨要打倒中共，而中國民聯從未提出過打倒中共，他們只是反對中共中的保守派，支持其中的改革派。對民聯都不容，還容得下國民黨嗎？

我未加入中國民聯，但同情他們的事業，中國需要一個監督的力量。我認為，中共阻止中國民聯擴大的最好辦法，是不斷自行政治改革，釋放政治犯，開放言禁。反之，用壓和罵的方法，不但壓不垮民聯，反會使之膨脹。

阿城在紐約「砍大山」

——哥大與阿城談話會記

● 本刊記者 ● 秦俠

阿城，一年中以「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等作品風靡港、台和海外的中國作家，應紐約大學艾爾巴尼分校和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邀請，來到美國，迅即引起一陣阿城熱。阿城一到紐約，哥大中國同學和「華僑日報」文藝副刊便給阿城舉辦了一個談話會，與他一起「砍大山」。同時，台灣的文藝界也舉辦了一個阿城作品討論會。對此海外陣勢，阿城自己談話說：「剛被大陸讀者吊了起來，不想又被海外讀者吊了起來，好難受！」不過，在哥大談話會上，阿城還是痛快地與紐約的文人和學生們砍了一陣大山，阿城那睿智、幽默和外靜內剛的「狀態」，給大家帶來極大的滿足，現將部分內容刊出，以饗讀者。

問：請問在毛時代，中國青年學生都要下鄉插隊，你也去了。不去可以嗎？

阿城：這首先是毛的號召，那時毛的一句話就能形成一種社會氣氛，所以都去了。其中，部分人是真正有理想的，受良知的驅使，想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還有部分人，因待在城市也沒出路，所以就乾脆下去了。

問：我在大陸聽說，知青下鄉時，農民都



阿城自畫像

愛把女知青接到自己家去「落戶」，然後給兒子討媳婦，這樣還能說知青下鄉是良知的驅使嗎？

阿城：毛讓貧下中農「再教育」知青，實際上農民並不歡迎知青。第一、中國的農田有限，分給各公社、大隊也有限，知青一來，等於每份田要多養些人。第二、農民討老婆有兩個心願：一是找個屋裡做飯的；二是傳種接代。像在坐的查小姐這樣，傳種接代可以，做飯幹活就不行。所以農民並不歡迎知青。反過來，有些女知青受不了農村的勞累，隨便找個農民，幫忙糊口的也有。但大部分知青爲了回城

，都不願在農村結婚安家，這也是現在中國城市裡大男大女太多的原因之一。

問：農村插隊生活對您日後的寫作影響很大吧？

阿城：只能說，使我產生了一種寫作狀態。

問：那麼文革前，你一定是個神童了。

阿城：我很感謝文革，因為正好是在我要考試時，文革爆發了，我就不需要參加考試了。否則參加考試一定會留級。

問：鄉下沒有書，您是怎麼解決看書困難問題的？

阿城：民俗有影響，沒有書，知識仍在民間。文革時城市燒書，農村反留下些書。農民老太太剪鞋樣做鞋就用書的紙，一翻炕席，就拿出些殘缺的書來。我就是靠向老鄉要剪鞋樣的書，讀了一些。我讀的書都是沒頭沒尾的。

問：哪本書對您影響最大？

阿城：我生平沒有「最」字，什麼書都看。譬如「雷鋒叔叔的故事」，我也讀得津津有味。我還很喜歡雷鋒，儘管有些假，但雷鋒做好事，體現出一種自我滿足。誰都有滿足自我的心理，不應只要求一種方式。所以我讀雷鋒的日記也心曠神怡。

問：一般認為，雷鋒日記就是爲了讓人知道，好成爲榜樣、英雄。

阿城：從雷鋒談到英雄，自然範疇就不同了。預謀的人成不了英雄。只有在逆境中抗爭、幾經挫折的人，才會被老百姓看成英雄。同樣，無論怎樣被看成英雄，如果吊在上面下來，我認爲就不是英雄了。我發表作品後，也有一種被吊起來的感受，很不痛快。

問：「棋王」的主角王一生好像也很愛面。我看過另一個結尾不同的「棋王」，王一

生後來在知青食堂吃飯，有人問他：「你怎麼不下棋了？」王戴着飯盆說：「還是這裡的飯好吃。」我覺得原來的結尾比現在的好，有一種道家的頓悟味道。不知爲何您把結尾改了。是否爲了出版書，需要這麼改一下？

阿城：這是版本之一，可能還有其它的版本。西遊記、三國演義都有不同的版本，然而都是在作者死後才出現的。我很幸運活着就能看到自己作品的不同版本，不過我想國家出版局出版的，才算是正統版本，我才敢簽名。

問：現在大陸是瓊瑤熱，台灣則有阿城熱，並出版了您的作品集，您對此有何評論？

阿城：我沒去過台灣，不好評論。

問：您寫作的素材是怎麼得到的，是自己的體驗，還是收集得來的？

阿城：都沾邊。譬如說，我寫「棋王」，但我自己並不會下棋，更不懂棋譜，只知道一句「當頭砲，把馬跳」。即使我很會下棋，也精通棋譜，我也不這麼寫。大陸好多作家，寫小說愛寫過程，譬如鋼是怎麼煉出來的，但煉鋼工人卻沒被寫多少。我是以寫人爲主。

問：您的生活情趣一定很豐富吧？

阿城：這是我的最大弱點。我小時候受的是正統家教，譬如說，要愛勞動。我很會幹活，不會娛樂，但這不妨礙我寫小說。老鄉有句話「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我不會跳舞，但愛看跳舞。我上街時常常看人打架，發現圍觀的人比打架的人更有意思，那心態、那臉上的表情豐富極了。

問：我離開中國時，很喜歡「晚霞消失的時候」這部小說，後來這小說被批判了。我聽說現在發表小說不但要過政治審查，還要與編輯有很熟的私人關係，您和編輯拉不拉關係？

阿城：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我不太理會作品怎樣能發表，我的創作是絕對自由的，發表自由那是另一回事了。這方面的事情也非某個人所能改變的，所以我不很介意與編輯的關係。

問：那您的「棋王」是怎麼發表的？

阿城：我寫好「棋王」後，一位朋友拿去，他有一個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朋友，在他家裡看到了手稿，就拿去發表了。我都没來得及表態，手稿的標點符號還沒寫清楚，就給人發了。發了以後就熱鬧起來，我也被人吊起來。

問：聽說「十月」雜誌每月收到一千篇小說，您也在該雜誌發表過小說，是怎麼被選登的？是小說出類拔萃？還是名氣的關係？

阿城：這是編輯的內幕，我不清楚。大陸有個怪現象，就是出名太快。好像黨和國家教會我們識字，誰都能成爲作家。不過國內的編輯還是有眼光的。最高級的「人民文學」每一期第一篇作品，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寫的。這叫出新招，其它雜誌也學着做。所以名氣不是很重要的。

問：從「棋王」中王一生的道家棋可以知曉，您受了些道家的影響。但整個來說，您的書和您本人却又有點儒家味道，您對自己是如何看的？

阿城：說出來的不是禪。文字也是這樣，一些內在的東西，從表面文字看不出來。我認爲作家不應在作品中加入很多東西。我寫作不大靠靈感，而是靠狀態。就像跑百米賽一樣，一聲槍響好像是靈感，但跑的快不快，還要靠運動員的比賽狀態。靈感只能啟動寫作，但成萬字地寫下去，就要看作家的狀態如何。

狀態這東西是一種禪，說不出來。好像聽

音樂，很悲的，而一千個聽衆，根據自己的體驗，會創造出一千種不同的悲來。

問：您的小說不像大陸一般作家，總要觸及一個很大的主題，政治的、社會的、性的或者經濟改革方面的。您只是寫生活瑣事，比較中庸，故被認爲有儒家傾向。

阿城：別人怎麼看我都行。夏教授說我反共，也有人說我反資，我自己感覺是，寫作只是審美活動。但是藝術作品中可能有政治、社會問題，有宇宙中的各種關係，但必須用審美的態度來反映它們，而不是直接的說教。

問：您以前是星星畫家，什麼時候學的畫呢？

阿城：沒學過，我從小喜歡畫，後來自己畫起來，作爲一種謀生手段，還沒達到爲藝術而藝術的境地，也從來沒很專心地畫過。我畫畫、拍電影，主要地是考慮掙些錢。

問：比較起來，您更喜歡那種活動？

阿城：還是畫畫。拍電影有一種欺騙感。愛看電影的人，一定不要去拍電影，否則會有受騙的感覺。演員在鏡頭前哭，都是導演一句話，一說停，立刻笑起來，然後就與同事們談今天到那去買菜等等。

畫是最好的藝術，畫看一眼就行，概覽全貌。小說要看半天，才見分曉，這就是空間藝術比時間藝術好的地方。

問：大陸人民受過很多災難，現在亦存在很多社會問題。知識分子的特性就是敢說話，您的作品不願或者說客觀上沒有觸及社會問題，這樣說得過去嗎？

阿城：我的確沒有使命感。我很佩服像劉賓雁那樣的作家，一腔熱血，捨得一身副。我認爲每個人只是他自己，不是某種模式。有些評論家總愛把作家推向極端，好像一個人能舉

重，別人偏要求他也能長跑。如若不然，總是嘆息說，要是他的腿能像他的手臂一樣有力就好了。這是越界的評論。我只會寫這樣的東西，不想什麼都會。

問：有些海外的人從大陸訪問回來，就變成義務宣傳員：說中國大陸的人不用買房子，婦女和男人一樣平等，從不談問題。有人還寫文章說北京只有十八個蒼蠅，被他打死八個，還剩十個。這種宣傳對大陸有什麼好處呢？

阿城：很多文章我都沒看。我也不知道大陸的全部情況。不過有昆蟲學知識的人，就知道大陸不會只有十八隻蒼蠅。這人說話也許忘記了限定詞。譬如說北京飯店可能只有十八個蒼蠅，或許一隻也進不去。

問：大陸的黨報、評論界很提倡作家的責任感，您沒有責任感，是否會不受黨的歡迎？

阿城：我從不考慮這方面問題，也沒注意到黨對我怎樣看。

問：您的作品是不是一種情感的發洩？

阿城：可能是生理學意義的發洩。我說過我寫作靠狀態，也可以說是氣數，氣盡即擱筆。大家也許沒注意，我寫的三個「王」字數一樣，說明我的氣就這麼多，每次都一洩而盡。

問：在大陸聽說您講過一個羊的故事。說一群羊本來很肥，被人趕着從很遠的地方來到北京，一路走着，膘都沒了，死到臨頭還受這份罪，後來在「東來順」被宰掉，真悽慘，這是否是您自己的某種自嘲？

阿城：我住在北京得勝門。北京人吃的羊都是從口外的張家口一帶來的。這羊被農民一站一站趕，每一程都有專門的人去趕，趕一段，拿一段的錢。這是因為羊走掉了膘，肉才好吃。我家門口是這些羊進京的必經之路，經過西什庫，也經過中共中央所在地中海門口，

最後到了南苑屠宰場才殺掉。那年秋天，我在房裡，突然聽到下雨般的聲音，我想節氣都過了，怎麼還下雨，出門一看是一群羊。我趕緊兒把兒子叫出來看。北京的孩子很可憐，除了貓，什麼動物都沒見過。我兒子愛看得很，即使在睡大覺，一有羊群過，馬上爬起來出去看羊。我當時想，人真是太毒了，本來要殺羊了，還讓羊自己把肉背來，弄個車拉來就行了嘛。後來老農告訴我是為了讓羊掉膘。就這麼產生了這個故事。

問：你是否會懷疑過你自己的價值判斷。譬如說，羊被趕着走了一程路，臨死看看各地的風景，不是也很好嗎？

阿城：羊的故事只是一個隨想，沒什麼價值。也許第二天我又有一種隨想，不過我沒再想，大家可以繼續想。

問：您是星星畫展的參加者。王克平、李爽這次在北京被禁展作品，您有何看法？

阿城：讓不讓是政府的事，我沒官銜，問我沒用。分析也不是我的專長。我個人希望能讓「星星」成員展覽作品。中國重提「雙百方針」，這是一次考驗機會。像過去毛主席說小說能反黨，那也太看不起黨了，實際上，一本小說反不了黨。這反而給一些作家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文藝作品真有如何的威力，可以改造社會，改造世界。有時小說被人誇大，讓作家負責任，這很不公允。譬如國內有些強姦犯，報上說是看了黃色小說的影響，就去犯科了，這是很荒謬的。文學作品是有低俗的，但犯罪行為出現，不能怪小說，那是政府的責任。

問：您的作品能流傳多少年？

阿城：外面有座教堂，可以問問上帝，我預見不到。

問：共產黨不是認為人心可以被改造嗎？

阿城：我還認為人有許多本性的東西是不能被改造的，就像父母望子成龍，可是他們的兒子偏偏要偷東西，父母也沒辦法。有很多事情不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事情自有其律。

問：您的作品上了香港「花花公子」雜誌，香港作家哈公說，這是資產階級色情刊物登無產階級清教徒的生活。香港人為何喜歡您的作品？

阿城：「花花公子」也不是染缸，染不了我的小說，沒什麼可怕。但我了解「花花公子」小說欄是很高雅的一部分。我看不懂香港人為何喜歡我的作品。我沒有分析的訓練，講不出道理來。全世界都用藝術的眼光來看我，那我就受不了了。我有一點狀態。

問：中國大陸現在女強人、女優秀作家很多，這是什麼原因？而且女人嫌男人不夠強，上海一女性說她談了十幾次戀愛，沒發現過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阿城：很多女性選丈夫時，太挑剔，我看最好造個機器人給她，按她的標準編程序，還可以根據需要換程序。不過有些男子漢也想找這種機器人。

問：海外有人說：中國可以沒有我們而存在，我們不能沒有中國而存在，您和土地、人民有什麼感情？

阿城：還是老話，說出來的不是禪。你的舉止坐臥都是中國人的習慣，這就行了。邏輯太強，反不能表達自然、真實的東西。如許多紅衛兵當時很左，他們真的認為毛很偉大，牛鬼蛇神不倒，中國人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現在許多人右了，說明人是在不斷追求的，但不必把以前的封閉起來，過去的都是真的，前後矛盾不怕。人在臨死時，認為自己幹過的一切好、壞事都是真的，這就夠了。

問：您在「九十年代」上談到大陸知識分子的原罪感。海外也有此問題，有些人認為不能回報家國，也是一種原罪感嗎？

阿城：國人原罪感很強。孔夫子規定了君、臣、父、子的道德倫理。但道德是否適合於所有的人呢？顯然不可能。許多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有原罪。古人讀經，就是爲了消除非德的東西。中國解放後，爲何知識分子那麼不行，因爲被劃入資產階級，是屬於新道德中的最其次也。張賢亮的小說反映出大量的原罪感。

前兩年搞的反精神污染，是一次文革小演習，但沒搞起來。儘管如此，中國人在這場考

●台灣專欄●

請維護台灣人的尊嚴

(台灣作家·美國) 劉添財

大約十多年前常常看到台灣鄉土文化工作者張良澤先生在台灣報刊上發表的台灣人反抗日本暴政的文字，心中頗受感動，一直以爲張先生是個有志氣有骨格的台灣人好漢，十分敬佩心儀，阿修伯還把他引爲自己的同志呢。

過了幾年，張先生應日本筑波大學之聘赴日教學，其論調竟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突變，由反日抗日變成親日媚日，真令人大吃一驚。一九八六年二月全美台灣同鄉會發行的「台灣文化」第四期上有張先生的「四十五自述」一文，文中他如此自述：

「某日，我看了日片『青色山脈』，一群天真活潑的高中生穿著水兵服，騎著自行車，唱著『青色山脈』，迎著晨曦

試中只能得三分，還有那麼五分之二的人認爲自己是錯的，責備自己說，我爲什麼就不寫改革呢？爲什麼偏要寫那些不健康的思想呢？但多數人總算有了自己的腦袋。絕不會所有的人都長着同樣的腦袋，知識分子應該有屬於自己的腦袋。

問：請問醜陋的人能否寫出美好的作品？

阿城：這是兩個原則：藝術原則與生活原則，兩者是不同的。天真的人喜歡從小說反過去推論世界和作者，就很發傻。有人看了小說就愛上了作家，一結婚就發現這個作家臥房、廚房都不行，出現很多矛盾。藝術和現實生活

，馳過田野，奔向學校；火車從遠處的山麓駛過。在教室裡，女生們和老師熱烈討論兩性的問題、生育的問題。那麼開放，那麼自由，那麼活潑可愛！而我從小到大，不知讀了多少『千惡的日本鬼子』、『日帝侵華史』、『南京大屠殺』的教材，自己也不知做了多少遍這類壁報文章，但一下子都被這一群日本高中女生吹掉了。

阿修伯雖然是一個反日派，但是對日本文化既不迴避也不排斥。阿修伯一出世就被日本人統治，也學習過一點日文，也看過日本電影、聽過日本歌曲、練過日本柔道，蓋此乃知己知彼的功夫也。話說這個「青色山脈」乃是二

不能等同，應該分開。

問：生活與藝術不能統一嗎？

阿城：可以舉個例子，我寫一個妻子如何勸丈夫不吸煙，寫得非常感動人。但我自己不能因此而不抽煙。

問：您有雄心寫長篇嗎？

阿城：我的氣還不夠，只能寫中篇。

問：您的作品翻譯成其它文字沒有？

阿城：西德正在搞德文版。

問：您的小說發表後可拿多少稿費？

阿城：國家出版局規定每千字十五元錢。但我發表作品那時還是每千字十元。

十多年前的舊片子，阿修伯也看過。張良澤看過了「青」片，受到活潑可愛日本少女的感動而不再相信「萬惡的日本鬼子」。「日帝侵華史」「南京大屠殺」，這算是什麼邏輯？德國少女同樣也活潑可愛，猶太人會因此而不相信希特勒的大屠殺嗎？

張先生做學生編壁報時還沒有看過「青」片，算他年幼無知也就罷了，但在十多年前也已三十餘歲，早就看過「青色山脈」，早就受到「感動」，爲什麼還在大寫特寫反日抗日文章呢？把時間對照一下，就立刻發現張良澤的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以及雙重人格。在中國人面前他假裝是反日抗日的健將，到了日本去吃日本人的飯，他就一變而成爲這個樣子（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台灣公論報」報導——引自日本「朝日新聞」）：

「出生於一九三九年的張先生，其幼年時代的姓名是『清河良澤』，因而被稱爲『良坊』。上日本人的學校，喝味噌湯，居住於榻榻米上面過日。當時在台灣若講台灣話就被老師毆打，其雙親在皇民化

運動中，也都改為日本姓氏，日常因使用日語而被指定為『國語家庭』，被哺育為日本人的張先生，戰後，因為不懂台灣話，而被同學排擠。」

張先生和阿修伯曾有兩面之緣，照阿修伯的法眼看來，張先生和阿修伯一樣像個土裡土氣的台灣人，怎麼看也不像是「被哺育為日本人」那麼徹底皇民化、居然連台灣話都不懂的人。張先生少時家庭窮困，更是不像享受過日本特權待遇特權教養的「高等台人」，根本沒有那個氣質！阿修伯對他這一段自我過癮（或者日本人讓他過癮）的描述甚表懷疑，莫非是為了補償其內心深處的自卑感而如此厚顏攀附日本人？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台灣公論報」有張先生的好友江百顯先生「感謝之餘」一文，文中如此敘述：

「八月二日參加『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之夜』，意外的從楊加猶兄手中，收到張良澤兄編輯的日文寫真集『台灣原住民的風俗』。」

「由於如此巨細無遺的收納，本書應為了解台灣原住民的最佳資料。」

「但在翻到霧社事件、討蕃略年表以及大東亞戰爭與高山族的幾章時，我的心受到一種難言的衝擊。明明歷史已證明日本政府對台灣原住民的殘忍欺凌，這裡却提出一些證件，形容原住民心向日本，以生為日本人為榮（如宮村堅彌所提的潮州某頭目）。至於『大將旗』一文，那就更加叫人啼笑皆非了！」

猜想張兄大概有意保留『史實』，包括杜撰、創造、偽裝的，只要文字所載，便設法保存。也許這樣會對歷史構成更大

的諷刺，就怕怕這麼一來，又憑空帶給原住民另一次的心靈創傷。畢竟他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揭穿日本政府的無理和偽善。」

「我無意鼓動種族仇恨，更沒有種族偏見。我一向認為各民族都有好有壞，有強有弱，有長有短，彼此之間應該平等相處。倘若有一族憑藉某種優勢的條件蓄意壓迫另一民族，這是不可原諒的行為，即使這種事實已成隔日黃花，我們也不能一笑置之。起碼一個文字工作者，有義務指出誰對誰錯。」

張良澤這幾年搖身一變成爲強烈「台灣文化」「台灣意識」「台灣民族」的急先鋒，厭棄中華、貶斥中華不遺餘力。反之，因為「日台傳統友誼」「日台歷史信賴」，他更熱衷於向日本帝國立功，阿修伯曾在「美洲中國時報」爲文「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勸他不要過份諂媚日本人，要以台灣人尊嚴爲重，以生爲台灣人爲榮，這才配稱做真正「台灣文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攻陷南京，屠殺和平居民三十萬人，圖為南京街頭一景，屍橫遍地。日本軍國主義實是害人又自害的人類公敵。

台灣意識」和「台灣民族」啊！想不到他却認定了要做日本人的憨奴才，不但不聽阿修伯之勸反而在「台灣公論報」上以「德州小王炸雞」的名義威脅阿修伯。今天他又昧着良心來編這本「台灣原住民的風俗」，說原住民（高山族）也和他一樣的「以生為日本人為榮」，連台灣同志的江先生都看不過眼而爲文規勸他了，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也。

日本軍國主義是害人又自害的人類公敵，自中曾根首相及藤尾文部省大臣，拜祭戰犯、篡改教科書、否認二次世界大戰對別國的殘害，不以侵略爲羞恥反以戰敗爲屈辱，這樣的心態將再度帶給人類（包括日本人）更大的危難。而王育德（台獨元老）、張良澤等自我屈辱，奉承諂媚日本侵略者，正是對軍國主義的大鼓舞，每一位愛護台灣的人都不能忽視這個大危機呀！

維護台灣人的尊嚴才能促進日本人的反省，保障東亞的和平。

司法真的死了嗎？

(台灣留學生·美國)凌天鳳

台灣黨外精英、現任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在九月三日被台北地方法院以違反台灣的選罷法及誹謗罪名判處了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並褫奪公權三年。這是最近幾個月來台灣黨外人士因違反選罷法或誹謗罪陸續被判刑的案中最轟動台灣社會的司法案件。

現在讓我們追述幾件台灣黨外或反對派人士因選舉或誹謗而與訟判刑較為人矚目的案例：

雷渝齊案——因在其自辦的「雷聲」雜誌上，登載當時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關中接受蔡辰洲（註：蔡為關中亟力推薦由國民黨提名，當選為立法委員，後來因喧騰海內外的十信與國塑冒貸案而判刑入獄）賄賂，為關中控告誹謗判刑，雖經上訴，仍以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二年。

鄭南榕案——一九八五年底，在其自辦的「民主天地」中，以「一億元滅桃計劃」為文，批評當時台北市議員候選人張德銘，被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三

年。

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案——因在「蓬萊島」雜誌刊登有關馮滬祥著作有抄襲之嫌，構成誹謗罪，各被判刑八個月。

顏錦福案——乃因今年初在台灣省苗栗縣為縣議員候選人陳文輝助選時，違反選罷法，為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初審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褫奪公權三年。（註：顏錦福已在九月八日當選為台灣黨外公政會理事長）

周伯倫案——周為現任台北市議員，在今年初台灣鄉鎮縣轄市長選舉時，為人助選觸犯選罷法，全案尚在審理中。

林正杰案——起因為台北市前市議員胡益壽自訴林正杰在一九八五年台北市議員任內，於議會質詢時攻擊他「特權非法貸款」，並發表惡意中傷言論，涉嫌誹謗。另又指控林正杰在其創辦的「前進世界週刊」中刊登文章，惡意攻訐，意圖在他競選市議員期間醜化他，而觸犯誹謗罪及違反選罷法。林正杰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

國民黨與台灣黨外，自從五月十日、廿四日開始了第一、二次溝通以來，始終未有建設性突破。第三次溝通雖有中間人士居間奔走，國民黨也一再表示溝通誠意，但依舊遙遙無期。就在這時黨外公政會舉辦了「行憲與組黨」說明會，又連續發生了「蓬萊島」誹謗案、「民主天地」誹謗案、顏錦福違反選罷法案、林正杰案，以及尚在審理中的周伯倫案。使原本呈膠着狀態的黨內外溝通，不但未能進展，反而背道而馳，且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由於林正杰案判刑關鍵在於，議員在議會中的發言究竟應否受到免責保障，所以，就讓我們先談一談國民黨政府中，地方議員言論的免責權問題。

國民黨憲法有明文規定議員的免責權。但僅適於國會議員，不包括地方議會的議員在內。地方級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則分別規定在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以及各縣市的組織規程內。但是，這些地方組織規程都不屬於法律範疇，而僅屬行政命令。因此，地方級民意代表與中央級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並不完全一樣。國民黨同時又在法官官會議中，就地方議員的免責權作了解釋：凡與議題無關的，不在保障範圍之內。換言之，對地方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僅是相對的免責，不是絕對的免責。因為有了這一解釋，而又常被泛濫引用，地方級議員們在議會內的發言，無形中多了一道枷鎖。發言不當，動輒得咎。林正杰就在這種情形下被判了刑。

其次，我們再談一談國民黨的司法審判主、從刑的問題。我們先看幾個最近審判的案例：

一、關中控告雷渝齊案，雷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從刑長於主刑。
二、張德銘控告鄭南榕案，鄭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從刑長於主刑。

三、顏錦福違反選罷法案，顏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褫奪公權三年。從刑長於主刑。
四、林正杰案，林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從刑長於主刑。

我們再看國民黨刑法的規定，凡宣告褫奪公權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者，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也就是從刑的生效日期是從主刑執行完畢日起算。上述各案受刑人，有一個共同特色，那就是他們的從刑都長於主刑。姑不論他們因各種不同罪名被分別處以不同的刑期是否得當，僅由從刑刑期長於主刑刑期來看，褫奪公權的規定實在已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此，非但違背了憲法中對人民工作權的保障，同時也剝奪了當事人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權益。況且，上述各案受刑人均為黨外政治人物，判刑型態與往昔迥然不同。將他們判決的主刑與從刑合計起來，與他們出獄後的選舉有密切關係。台灣黨外人士對此無不同聲抨擊，黨內外的溝通也因此受到波及。雖然國民黨一再表示純屬法律事件，但台灣社會上上下下疑竇叢生。我們寧信他的判決是一種巧合，也不願相信是一種政治迫害。

林正杰被控妨礙選舉及誹謗判決後，台灣各界咸感意外。對於黨內外溝通之門雖未完全關閉，至少更蒙上一層厚重陰影。林正杰在判決當天鄭重聲明不尋求上訴之途，因為他說：「司法死了！」同時他也了解「上訴」只是再羞辱的開始。悲哉！斯言！一個身為民主鬥士的知識份子，在他遭遇到正義難伸與絕望無奈時，他所能選擇的就只有這條路嗎？

民主政治是以法治為基礎，法治又以司法為中心，因此司法應超越政治獨立殆無疑義。對任何案件的審處都不該在政治衝突扭曲下，使司法威信蒙羞受損，使司法形象遭到淪喪。畢竟司法審判是一切爭訟的最後最高裁決者。現在台灣反對派人士紛紛因案判刑，但他



們却全然不依賴司法的審判，走向街頭，訴諸群眾。前不久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三人在「蓬萊島」誹謗案入獄前，舉辦了數場「坐監惜別會」，造成了社會的不安。現在，林正杰又因誹謗案被判刑，放棄尋求法律的補救，再度走向街頭，由反對派人士中最具「歷史性」

的康寧祥陪同，分赴台灣各地遊行演講。造成嚴重政治對立與衝突。我們不贊成，也不鼓勵以此作為對抗手段，更不可給人一種「自我突出」的假像，或坐牢即可成為「黨外英雄」的口實。不上訴無異默認「司法已淪為政治工具」、「司法已喪失獨立審判原則」。我們應明白表示，我們對法律的尊重，積極擁護司法仍為正義最後的防線。我們支持林正杰尋求上訴，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不但要為自己爭，更要為未來的許多不知名的民主鬥士們力爭。

國民黨應該早已瞭解民主憲政是必然要來臨的，民主憲政的路更是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黨禁不可能永遠不開放，反對派的存在，在民主政治中也是正常的現象。他們的存在也並不代表與國民黨對立就會帶來不良影響。而黨外的人士們，凡事也不可過於激烈，動輒訴諸群眾，而忽略了民衆的情緒一旦高漲，失去理性，那種場面，那種殘局，不是短時間可控制與平息的。為了民主的事業，為了台灣全島人民的福祉，請都能以冷靜的態度來處理近日所發生的諸多爭端。

我們追溯中國的歷史，歷朝歷代，乃至到孫中山先生建立立國，無論今天中國大陸或台灣，無不人治重於法治，這也是我們何以今天仍要大聲疾呼「民主！民主！」，而依舊停留在原地踏步的原因。身為中國人的每一份子，都應該覺醒了。為了我們的民主政治前途，要挺身而出，盡一份力量。我們更要藉林正杰案的發生，以及大陸上許多為爭民主，而遭受政治迫害的鬥士們，向中國大陸以及台灣政府呼籲，「政治的就讓它歸政治，法律的就讓它歸於法律」吧！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得民心，只有這樣你們才能繼續領導政權。請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以及台灣的國民黨，三思而行。

從林正杰到康寧祥

也談林正杰案

(中國之春雜誌經理) 林樵清

看完了凌天鳳先生所寫的「司法真的死了嗎？」一文，有些感觸，不得不發。

首先，我認為林正杰案不是簡單的「冤案」。此案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對黨外來說都是一樁政治性極強的案件。內情錯綜複雜，雙方都想藉此達到其政治的目的。但致使林正杰入獄的直接原因乃是因為他不出庭，不上訴，根本藐視他稱之為國民黨的法庭和國民黨的法律。

訴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人有不平，不訴諸於私下的武力或其他方式解決，而訴諸於法律，是一種「法治」運作方式，而且也是法治的目標，儘管你對司法的「公正性」表示懷疑。因此，每個人在自認不平之後，都有權控告任何人。但控告並不代表就將被告定罪。這是兩碼事，因為中間還要經過法律的程序，包括自辯或請律師代辯等等。最後由法官在審視了兩造的證詞和證據之後才下判決。就是一審被判敗訴，還可以再上訴。控罪並不代表定罪，這是一個基本的法律常識。但無論如何，被告在被控告之後，總得出庭——或請律師代出庭——為自己辯護，如果不出庭抗辯，法庭當然判被告敗訴，這也是一個基本的法律常識。

就像張三在被控強姦罪之後，可以出庭自辯；或者說那個女的認錯了人了，或者提出自己不在場的證據，或者說那個女的是自願的等等。不管怎樣，張三總得出庭為自己辯護才行。張三不能夠在被控強姦罪之後，就大聲呼號「冤枉啊！我當時根本不在場啊！怎麼能控告我啊！」然後法庭傳他，屢傳不到，拒絕了任何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法庭當然判他敗訴。於是在被判罪之後，又大聲呼號：「冤獄啊！民主法治何在啊！」

讓我們看看林正杰案的情形。在胡益壽控告他之後，法庭傳他出庭，他不但不出庭，不請律師，反而抓住機會，大做宣傳：「你看，議員有免責權，我為民請命，他竟然控告我，法治精神何在？冤枉啊！」林正杰這樣做，把國民黨政府的法庭推到進退維谷的境地，法庭屢發傳票，而屢遭藐視，終於引經據典，判他敗訴。林正杰的目的達到了，因為，他藐視國民黨法庭的目的，就是為了坐牢。林正杰抓住機會大開坐監借別會，發動遊行，以謀取對抗國民黨的政治資本。搞得萬人空巷，轟轟烈烈。

有人說：「林正杰拒絕出庭，因為國民黨

的法庭都是在做戲，陳水扁等人的案子就是做戲。」這裏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在你沒有證明國民黨的法庭在做戲以前，你不能說他是在做戲。你就是明知國民黨的法庭在做戲，好歹也要陪他唱一齣，你才能說他是在做戲，讓大家心服口服。今天，法庭還沒有開庭，你就一口咬定他在做戲，拒絕出庭，這樣，就給國民黨抓住把柄，進行反宣傳。

第二，假如以前陳水扁等人的案子是在做戲，並不代表這一次的案子也就是在做戲。只有戲真正的開了場，才能讓觀眾判斷。林正杰如果事先就知道國民黨政府的法庭在做戲，何不利用此機會，在法庭上公開戳穿這齣戲呢？就事論事是法治的精神。李四以前偷了十次錢，這一次錢不見了並不能證明就是李四偷的。老子英雄兒子不一定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子也不一定是混蛋。總要有證據才行，不能自由心證。

還有，林正杰是主張「體制內改革」的，所以他才會去當議員。既然是贊成「體制內改革」，則無論這個體制有多爛，你表面上總要遵守這體制的規章制度，再設法改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如果根本不遵守這體制，那就不是「體制內改革」派，而是推翻體制的革命派。整個林正杰案牽涉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有些黨外人士爭著要去國民黨的牢？坐牢竟然成了取得政治資本的一個手段。國民黨也真該反省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及威權主義在作祟。因為一黨獨大，招致了敢攻擊它就是英雄的心理；因為威權主義，招致了人民對司法制度的獨立性產生了懷疑。要杜絕這些弊端，國民黨只有向更開放，更民主的道路邁進。

而台灣黨外某些激進派人士近年來的做法

調查被控涉違選罷法案 林正杰若再不出庭 法官考慮下令拘提

【台北訊】台北市議員林正杰被控涉違選罷法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林正杰，若其再不出庭，將面臨法律制裁。

林正杰被控涉違選罷法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林正杰，若其再不出庭，將面臨法律制裁。

林正杰被控涉違選罷法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法官考慮下令拘提林正杰，若其再不出庭，將面臨法律制裁。



林正杰在聆聽判決後走上街頭，訴諸民眾。圖為警方人員勸阻其遊行演講鏡頭。

康寧祥「步行」被阻止 與警方衝突挨了拳頭

【台北訊】前立法委員康寧祥，昨(三)日在林正杰官可宣判後的「步行」過程中，被二名警察圍住，胸、腹部被擊打了三拳。他抵達市議會時，胸腹部感到不適，立即前往醫院就醫。休息一會後，已無大礙。

昨天黨外的康寧祥等人行至博愛路、武昌街口時，警方人員攔住走在最前面的康寧祥，康寧祥無意後，警方未再攔阻，轉至漢口街時，突然有二名警員將康寧祥圍住，並出手打了康寧祥三拳，康寧祥未還手，但仍往前衝，繼續帶領步行人羣往市議會方向行進。

圖為：前立法委員康寧祥(白色衣服者)在走至博愛路與武昌路附近，遭到三名警員包圍阻止其繼續前進，而發生衝突。(記者楊永智攝)



康寧祥陪同林正杰遊行演講與警方發生衝突，圖示中間穿白衣者即為康寧祥。台灣自立晚報圖

也使人憂心忡忡。他們有些人不以理性去解決問題，而喜歡把台灣政治推向兩極化，經常訴諸激烈行動，使得國民黨裏的保守派抓住不少把柄。現在，國民黨中的保守派可能已經做好強力反擊黨外的準備。民主政治是一種妥協，兩派不妥協，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再如此下去，海峽對岸的漁人就要來了！就是對岸的漁人不來，國民黨內的極右派也將藉口擡頭（他們早已按捺很久了），以武力將黨外一網打盡，再出一個美麗島事件，使黨外和國民黨都受到傷害。無論是發生那一種情形，都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更令人難過的，則是康寧祥在這次林正杰案件中的表現。他陪同著林正杰參加每一項集會，每一次遊行。康寧祥本來是一個溫和而有理性的政治家，眼光遠大，心胸寬宏。而我們也是一直支持他的。他倡導的「理性民主改革

也是我們認為較符合台灣現狀而又能不動大亂的使台灣走上民主道路的。但這樣的一個理性而溫和的政治家，竟然不能見容於黨外的激進派。三年前，他被選民摒棄於國會殿堂門外，而激進派則大多數當選，致使這幾年來台灣政局向兩極化發展。

三年後的今天，康寧祥捲土重來，竟然常常擺出激進派的姿態，甚至在許多方面表現得比激進派還激進，如搶在激進派前提出「實施民主憲政時間表」，這一下子就使康寧祥走在激進派的前面。康寧祥這樣做，可能是一種很高的政治藝術——與其成為激進派，不如領導激進派。但他在林正杰案中的某些激烈做法，却和他一貫宣揚的溫和、理性背道而馳，真令人搖頭嘆息。我們覺得，他是被趕上「架」的。難道台灣人民還是停留在只能欣賞激進派的階段？難道在中國從事政治真是一種悲哀？

因此，我們寧願相信，康寧祥如此做法只是為了要爭取選民，讓他在今年年底的大選能夠進入國會殿堂，從而領導黨外，再度以溫和理性的態度為台灣爭民主。這次康寧祥不能再失敗了，否則他將可能永遠被摒棄於政治圈外。其孤注一擲的決心可想而知。如果真是這樣，則康寧祥在整個林正杰案中的表現只是一場政治秀，一場以林正杰為犧牲打而讓自己再度登上舞台的表演。事情的經過究竟會怎樣？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真是這樣，則我們不得不問台灣人民：難道一定要成為激進派才能代表你們發言？難道一定要犧牲一些有遠見、有抱負人的見識，才能達到為你們爭民主的目的？

民主的道路何其艱苦？

民主的道路確實艱苦！在中國！

關於台灣民主化的兩個問題

(台灣旅美學界·美國)楊雲

這幾年來，台灣的政治局勢一直是波濤洶湧，變化萬千。黨內外鬥爭激烈，加上海外台灣開始組黨與中共對台統戰，使台灣的政局演變到了一個空前複雜的地步。不但海外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士看得眼花撩亂，就是身在其中的國民黨與黨外人士對未來台灣的走向也未必有十全的把握。筆者認為在搞清楚台灣民主化的發展之前，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具體分析：

第一，什麼是台灣的民主化問題？

第二，黨外是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

首先談談：什麼是台灣的民主化問題？黨外要的民主是政權開放，最好是國民黨下台；國民黨所說的民主是策略，最好是保住當前的政權；海外呢？對這麼一個歷史性深刻的中國問題，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們所宣揚的台灣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是美國式的多黨議會制？是日本的一黨獨大議會制？還是其它類型的民主？

而台灣未來如果真正走上了全民主制，總統以及地方官職都是民選——按照目前台灣黨外所設想的，將很有可能走向一個新興而獨立的國家，取得世界上大多數自由國家的認可而重新進入聯合國，至於於中共不同意或動不動武是另外一個問題。

以黨外「居民自決」與「人民當家作主」的主張來說，在台灣兩千萬人中，大部分是早先來台的閩南、客家人及原住民的山地人，少數是戰後大陸來台的新生代，最少數是目前掌權的大陸來台的所謂外省人。如以投票方式來決定國體，筆者以為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很大，而且這種形式的獨立在理論上對台灣本身不應該造成太大傷害，剩下的只是住民問題。有一點則是：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上的中國人在觀念與生活方式上，這些年來已經有了差異。

台灣自身的民主化最終要和台灣的獨立問題掛鉤，至於反對台灣獨立或贊成台灣獨立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應該看到若非政治上的原因，台灣人由於生活的安逸，要去和大陸上的社會主義做任何一種形式的聯合的動力是很小的。按照這樣的邏輯分析，就會產生以下的幾個不同的子題：「如果台灣的民主化導致分離主義，這樣的民主是不是可以為一般中國人所接受？」「如果繼續國民黨的統治，而有統一的可能，那麼台灣的民主化是不是應該被部分地犧牲？」「有無可能台灣民主，而又實現中國統一？」當然還有其它的可能，如中共的主動或其它第三勢力的影響等等。

台灣的民主問題相當複雜，陶百川先生的

民主和康寧祥先生的民主很可能就差異頗大。大家都說台灣要更好，要更民主，蔣經國先生也常常這樣「昭示」，其他知名人士也經常發表這類演講，大家都說台灣要民主，到底是什麼樣的民主，恐怕因個人的環境、理想不同而各異。中共對台灣的民主化是不表態的，因為中共相當了解台灣民主化問題的矛盾。

如果有人反對筆者這種「台灣民主化排斥中國統一」的分析，他最好去台北或台南的街頭巷尾問問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台灣除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之外，歡迎統一還是極少數的，如果把國民黨強制性的大中國觀念去掉，要人民自由表達，沒有幾個人會要統一。所以筆者提出這個基本的問題：「什麼是台灣的民主化」為台灣今後走向的第一義，是民主重要，還是民族重要？按筆者大膽籠統地分類，丘宏達先生是比較贊成民主重於民族，也就是他的台灣新加坡模式，以後是不是能統一再看發展；國民黨來自大陸，民族重於民主，只能容許有限民主；黨外則是民主一定重於民族。見仁見智，各有看法，但是這個問題不說清楚，台灣的自身民主化前途是不確定的。

再說，黨外是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複雜。從形式上來看



蔣經國：我的臣民，日子不是很好過嗎？

，沒有人能否認黨外這十幾年來的發展有利於台灣的民主；然而就內涵來看，黨外的強勢發展，使台灣的政局產生動盪。這幾年來台灣的社會呈現一種不安定的現象，和黨內外年年的激烈選舉有相當關係，國民黨對黨外鬥爭技巧不甚高明，而判雷渝齊、陳水扁、林正杰的刑，更激起強烈的反國民黨情緒，近日黨外不斷有大規模的集會，使黨內外鬥爭再升高峯，使年底的選舉面臨白熱化。試想在這麼一個最爾小島上，年年月月如此震盪，人民生活會安穩嗎？將來不論誰勝誰負，有辦法離開早早離開，不能離開的也盡早安排後路，這樣的民主會是台灣的前途嗎？

黨外多年對抗國民黨已經產生了一種次文化（SUB-CULTURE），即國民黨沒有一樣是做對的，如果讀讀每月每週的黨外雜誌，可以發覺黨外的觀念只是打倒國民黨，其它都不重要，似乎只要國民黨一垮台，台灣的光明立刻就可以來到。當年大陸上國民黨的處境也相似，共產黨樣樣比國民黨好，只要國民黨垮台一切好說。這緣於國民黨自身的統治缺陷，註定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的悲劇角色。然而就台灣來說，黨外一直沒有提出更深刻的民主化理論與中國未來和台灣的關係，更遑論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黨外人士太忙，一切太匆匆，只要走上街頭，發傳單，唱美麗島，便見悲壯英雄氣息、坐牢也義無反顧。如果有人向黨外人士要求不要太激烈，就會被戴上「放水」、「出賣黨外」等大帽子。因此台灣本地人的仇恨心態是有歷史性的。從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經過五十年皇民教育，再來二二八事件與三十九年國民黨統治，客觀來說，台灣人的命運是很不幸的，今天就是中共來統治，也要出大亂子。台灣人要「當家做主」的要求幾乎是沛然莫之能禦，這已不只是民主的問題，而是歷史的演變。做了近百年的次等公民，他們有一股怨氣要出，這口怨氣，沒有人有道理不讓他們去出。海外台獨不要做中國人，也是一口怨氣。而國民黨的官僚統治對他們却是火上澆油，因為許多國民黨官員不理解也不接受台灣人的怨氣，只是強調「日子不是很好過嗎？」「民國三十八年我們來台灣時，你們吃什麼、穿什麼？今天你們吃什麼、穿什麼？」這種恩賜的心態使台灣人難於接受。如果實在不行，國民黨就搬出對岸的中共來嚇人，台灣人一般對中共不甚了解，但是對三反五反、挑燈夜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耳熟能詳。近年來中共

開放，更證實了國民黨的宣傳，在這種形勢逼促下，台灣人沒有選擇，只有「自己來」。中共宣傳「台灣人民日夜渴望回到祖國懷抱」是無稽之談，想回祖國懷抱的可能只是老一代的外省人。

可以這麼說，黨外若不暫緩目前的群眾運動，只有使台灣真正的民主化更困難。國民黨為了自保，將採取激烈的反應。若非蔣經國一再「昭示」和諧、溝通，黨內的保守派可能早就按捺不住反撲了。林希翎在台灣時說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榜樣，這是不認識台灣人的歷史心態。

如果談到黨外的貢獻，那麼台灣的中國人享有中國有史以來最多的言論自由，從蔣介石的情婦到俞國華的浙江口音都是被詛笑的對象。可是人民需要的遠比這些更多，而黨外已經陷入狂潮而無法提供。

所以要問黨外是否是台灣民主運動主流，答案是兩層。一是肯定，至少有一股為數不少的人反對一黨專政（或說「一黨獨大」），打破人民對統治階級的迷信，強迫統治者考慮修改敏感或不合理的政策；二是否定，沒有理性與思想的前導，真正的民主是無從產生的。從目前黨外的素質來看，打倒了國民黨，可能換上了更不民主的政權。當然，這只是筆者的猜測。

目前，筆者寄望於台灣的，是國民黨和黨外實行真正的、有理性的、眼光遠大的溝通。而且也希望能有真正的第三勢力出來，就是不同於國民黨與黨外的另一股新生的漸漸萌芽的理性力量。這股力量來自民間與學術界，應該是既不反民主，也不反中國，而且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平的。這便和大陸目前的走勢有源頭可以相通，也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需要。



香港的燈火和命運

(香港) 寒山碧

日前陪一位外地友人登上太平山頂，俯望東方之珠的夜景，友人突然說：「香港的燈火好像黯淡，真不知九七年後會怎樣？」我力辯燈光仍然如昔，繁榮尚未改變。但經過他的指指點點連我也發覺似乎有了變化。許多高聳入雲的大廈，亮燈的窗口不足十分之一，真好像黯淡了。友人說，兩三年前他第一次登上

山頂，鳥瞰無際的燈海，曾嘆為觀止，印象深刻。現在再度登臨，雖然仍算可觀，但已是今不如昔。他担心香港的燈火會一天天地淡下去。太平山是我常到的地方，也許是「熟視無睹」吧！反倒沒有友人那麼敏感。

香港衰老的心境

十一年後的香港會變成怎樣？這是誰也說不准的事，但可以預料她的燈火不會更加輝煌，好像一個已跨過青春期的少婦，衰老已悄悄爬上眉梢，濃粧豔抹也難掩飾那逝去的年華。有人說，衰老不是始於皮膚，而是始於心境。香港也是如此。儘管她的血脈仍然暢通，新陳代謝還屬正常，但衰老已入侵她的心靈，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富有活力，富有彈性；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樣高瞻遠望，那樣充滿信心。

香港的衰老，始於居民的心境，始於中產階級的心境。在香港沒有人預測十一年後的事情，沒有人制訂十年大計。更沒有人看「五十年」，也沒有人看十一年，他們只是看五年。正像一個衰敗的老人在自慰：我該還可以再活三五年吧！由於只看五年的衰老心境的影響，香港確實失去往昔的幹勁和活力。投資意願在低落，沒有人願意購買還本期長的機器設備，高級樓宇，工廠大廈只是有價無市。資金過多「水浸銀行」，但「資金」並不投入生產中去，而是拿來炒股票、炒期貨、炒黃金。在出口不振、生產不前的情況下，恆生指數被炒至一千九百多點的歷史新高點，正合廣東人的一句話「塘水滾塘魚」。股市大崩潰是遲早的事。而每一次「大崩潰」，也將像一個衰敗的老人又患上「霍亂」式的大腹瀉一樣，每大瀉一次都會令她元氣大傷，長久無法復原。

有水則溜 無水則留

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的心態，就是「有水則溜，無水則留」。有經濟能力而不考慮移民者，實屬「罕有動物」。而絕大多數上層人物和中產階級，都正在安排或早已安排好溜之後路。持外國護照而在香港賺錢者，自是「高人一籌」。他們大可宣稱「九七問題不是我的問題」。這一批人誠實點的會說自己有先見之明，會承認對中共沒有信心；但另有一些不夠誠實的，却專門說門面話作信心充足狀。可是若叫他們拿錢出來再投資，則會按住荷包不放。

持CI和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中上層人士，安排移民的步伐並沒有減緩，他們大都希望九七年之前能置身事外。即使明知道移民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例如，要重新適應環境、要另外找工作，甚至金錢上要遭受損失，但他們却樂此不倦。因為這種損失是有限度的，是估計中的，這種損失他們負擔得起。如果留下來，損失也可能是無限的，是他們所承擔不起的。所以他們甘願付出代價而冒較小的風險。

現時，六百萬香港市民中，大約有百分之十的人正在積極謀求移民，或者已經移民；而到九七年六月底，能辦成功移民的大約只有百分之五。也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人，任憑風浪起，「我却巋然不動」。然而，能據此而斷定他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充滿信心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們的不動，非不欲也，實不能耳！

沒有親人在外國，沒有豐厚的積蓄，「移民」？談何容易。對於大多數收入低微的人群來說，日子只是「日光日暗」，日出而作，日落而猶未息，辛勤勞動，所得不過恰好夠開

銷。未來的事只好未來再算，人有近憂，則無遠慮。筆者也是屬於「行不得也哥哥！」的行列。許多友人問我面對九七問題，有何打算？我四顧茫然，世界上並沒有塊可供我棲息的樂土。我也就只好以不變應萬變。萬一又來一次「人妖顛倒」，使我活不下去，只好再次「投奔怒海」，管他到那兒去。做難民始終比做移民容易。只穿一條三角褲就可以了，做移民則沒有一百萬也得有幾十萬。這豈是我輩鬻稿者所能積聚的？！

香港問題 談到心煩

「香港前途問題」，照理香港人應該最為關心，可是這個問題大陸人喜歡談，台灣人喜歡談，外籍華人也喜歡談，可是香港人之間却不願意再談了。因為已經談膩了。這個問題談得再多也只是「港人自講」，完全無濟於事。北京早已制訂一套處理香港前途的辦法。不管香港人說什麼，有什麼要求，北京都會按照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參預制訂的既定方針辦，絕不會因為香港人的要求而改變最高決策。

許家屯的「互選就是互相同意選舉結果」（實際是由領導提名，拍掌通過）；魯平的「港人治港不科學」、「港人治港不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行政首長向立法機構負責，就是負有諮詢解釋的義務」；李后的「香港如搞政黨政治，當然不能排斥共產黨」，這一系列的高論，使香港人明白，一切條文對中共都沒有約束力，都可以作任意的解釋。甚至連最普通的，幾乎是人人皆知的「互選」、「負責」這類詞彙，在中共高官心目中的定義，都與港人心目中的定義大不相同。至此方知諮詢無益，「基本法」的條文訂得再冠冕堂皇也沒有用。

。香港能否生存並不賴於「基本法」，而取決於北京的政策。政策讓你生則生，讓你死則死。因而與其為「基本法」的條文而力爭，不如留下點精力賺錢，然後申請移民。

傳媒逐漸轉向 批共聲音漸弱

香港現行的是開明的殖民地政制，缺乏民主。香港人的意願不能通過選舉集中表現出來。因此，所能夠反映出來的意見，只是零星分散的，也是乏力的。一些迎合權貴，迎合北京或港府口味的捧拍之言，往往蓋過和壓倒香港市民的真正意見。

目前，香港人反映意見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傳播媒介。而香港的傳播媒介實際上也肩負起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作用。可是，傳播媒介並不是一塊鐵板，它或許由於股權的轉換，或許由於其大老板思想或商業利益的轉變，它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不偏不倚地反映市民真正的意願。

進入八十年代，特別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之後，香港的輿論，香港的傳播媒介，實際上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久居於此的人或許因逐漸習慣而不以為奇，但那些在八十年代前離開香港的人，一旦重臨舊地，對香港輿論的轉向，無不大表詫異，也無不大感憂慮。六、七十年代，香港有許多打着「中華民國」年號的親台報紙。那時批共的聲音一面倒。可是，進入八十年代，批共的聲音微弱了，婉轉了。原本強烈反共的變得那麼反共了；本來就不大敢批評中共的，現在就更加不願批評了。有的則從立場上做了根本的轉變，從反共變為親共。幸而，做出「立場修正」的僅屬

少數。絕大多數的報紙尚能保持中間偏右的立場，在劇烈競爭的情況下，多少還能反映香港市民的意願。否則恐怕連五年都不能看了。我們相信香港的輿論如果趨於一律，必然加速她的萎謝。

利益集團合流 兩極分化加深

香港傳統上有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親英的，一個是親中共的。還有一些游離於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的既得利益者。

親英利益集團以英資為核心，以外資（美、日為主）為外圍，以香港政府為代言人。這個集團是一個龐然大物，掌握了香港的政治經濟命脈。

親中共的利益集團，以中共官方資本為主，例如代表國家金融的「中國銀行」；代表外貿部的「華潤公司」；代表交通部的「招商局」等，此外還有一些依附於中共官方的華資，例如大陸商品的經銷商、代理商，以新華社為代言人。

此外還有一個游離於英、中兩大集團之間的華資（海外華人資本），他們既親中又親英，時而親中時而親英。視其個人選擇和中英兩大利益集團力量轉化而定。

以前，中英兩大集團的利益是矛盾多於統一；鬥爭多於妥協。親英者屬親中共者為共產黨，親中共者則屬親英者為殖民地的「孤臣孽子」。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卅年來俱是如此。這兩股力量的存在和鬥爭，實際上起了制衡的作用。兩者互相牽制，互相協調，使六百萬市民所受的壓力相對減輕。可是，現在有一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就是中英兩大集團的利益

有漸趨一致的趨勢。一旦中英雙方總體利益統一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會有被出賣的危險。市民所受到的壓力也會逐漸加強。

最近一段時期，特別是港府同意放緩進行政制改革，同意政制改革須徵詢北京之後，中英雙方關係空前良好。親北京的報刊固然再也不責罵「孤臣孽子」；親英的精英對北京的措辭也是備加讚賞，尤其是在「大亞灣核電廠」問題上，中、英、港（府）三方更是口徑一致。而口徑指向的却是一百萬反對「大亞灣核電廠」的簽名者以及他們的親屬。也就是說，現在政治和經濟形勢都起了變化，上層既得利益者將聯手起來對付草根階層和壓力團體。我們認為，兩極分化的現象將隨着中英兩大利益集團的合流而加深，甚至會出現在政治上兩極對立的現象，這絕非香港社會之福。

香港的希望在大陸

明珠蒙塵，美人老去是最煞風景的事，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是否自此失去光彩？多數人都持悲觀之論。香港全然沒有抵抗力，面對着中國這個巨人，一點辦法也沒有。中國要你生未必能生，要你死則必定死。所幸的是沒有人希望香港死，中國尤其是千方百計要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可是由於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由於兩地制度不同，思想和處事方法各異，香港人仍然沒有信心，種種難題皆出於此。而今後香港能否保持安定繁榮？也全賴港人信心是否能夠恢復。關鍵時刻是一九九一和一九九八年。「九一」是大家看五年的第一關；「九一」能守住才有「九八」。「九一」若守不住，則全線崩潰，九八就不必看了。

香港前途雖然危機重重，但也並非全無希

望。但這個希望不是光看香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有希望，香港才有希望，中國大陸沒有希望，香港不可能獨自擁有希望。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把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拴在一隻命運之舟上，共同浮沉。

談起中國大陸，香港無不大表驚懼，尤其是「解放」後未曾在大陸生活過的人。他們拿大陸跟香港跟海外相比，覺得處處都不合心意。筆者可以告訴諸位，大陸儘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存在很嚴重的毛病，但這時的大陸却是「解放」以來最開放最自由的時期，別說「文革」期間想不到，即使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也想不到。現在，大陸人民的自由程度和思想開放程度，已超過一九五三年之前的「解放」初期。

農村改革的成功，實際是農業自由化的成功。城市的改革雖然尚未奏效，並出現不少新問題，但改革的路向沒有改變，鄧、胡、趙仍然堅持改革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實質是從國有化、集體化向自由化轉進（儘管他們絕不肯承認）。筆者認為，只要堅持下去，堅持四、五年，逐漸就會有成績。現在，「企業破產法案」剛剛推出，瀋陽已有第一家國營工廠宣佈破產；今後相信將會有更多的企業單位破產，使經濟運作恢復正常。還是瘀血不除，新血難生。此外，第一間證券交易所已經在大陸境內成立，並立刻開始營業，這種改革是很大膽的嘗試。雖然，目前斷判它是否會成功尚嫌過早，但這種大膽嘗試的本身，就給中國體制改革帶來希望的曙光。

最近，鄧小平、胡耀邦都提到要進行政制改革，雖然政改的藍圖尚未公佈，如何改革未得其詳，但提到政制改革的本身，已經是很大

的進步。以前，共產黨一向認為他們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最進步最理想的制度，任何對共產黨政制的批評，都會視為反革命言論，視為煽動性的顛覆活動。要出動國家機器堅決鎮壓，徹底消滅。現在既然中共最高層自己提出來，至少等於承認，共產黨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身存有缺陷，必須改革以求「自我完善」。

對於大陸的改革，筆者不像一些朋友那樣，表示完全悲觀，筆者認為改革的路向若能夠堅持下去的話，改革是存有一些希望的。不必列舉具體的事例，具體的數字來支持筆者的論點，只提一件事就夠了。這件事就是中共提出了政制改革，這一提法已觸及靈魂，觸及問題的核心。

提出問題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要貫徹完成還需要經過很多的努力。筆者並不是說中共已經提出「政制改革」了，這下子可高枕無憂了。而是認為還有一線希望，還存一線生機，所以並不急於逃避，而要留下來再看五年。現在，在大陸「改革派」與「反改革派」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正處於膠着狀態。我沒有力量打倒你，你也沒有力量打倒我。正因為兩派互相鬥爭，互相牽制，所以在改革的過程中才出現反覆的現象，才會像跳探戈那樣進兩步退一步。儘管「反改革派」或稱「恢復派」勢力仍然龐大，但筆者却看好以鄧、胡、趙為首的「改革派」。隨着歲月的推移，鄧、胡、趙的勢力將會更加鞏固和更加強大。在未來五年內，只要不出現重大的反覆，不發生政變（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改革就會逐漸深化。大陸就會一年比一年更加開放，更加自由。這樣大陸就會有希望，香港自然也會有希望。所以筆者認為撤退佈署不妨先做好，但最好留下再看五年。

中國按人口計算的 平均國民收入

▲一個脫節現象及實地調查▼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 黃有光

一、一個脫節或差異現象

在中國估計國民收入及生活標準時所遇到的困難是衆所週知的，下面的脫節現象尤其引起我的好奇心。根據目前統計，國民收入指數，按不變價格計算，從一九六五年的一九七點五增加到了九七八年的四五三點二；工業、農業總產量，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將近三倍，指數（如以一九五二年為基準）則從一九六五年的二六八點三，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七七九點零，而人口從七億兩千五百三十八萬，增加到九億五千八百零九萬，增加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按人口計算的平均產量，在這十三年期間，其中主要包括：——人所共知，是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一場浩劫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的十年，——是應

該增加一倍以上的。這場浩劫結束後，一九七七年這一期間的微小改進，很難使其能像十三年期間那樣，每人平均產量成倍地增長。

要想完全或主要地用這些不可靠的數字去解釋脫節現象，是不太可能的。中國現在的統計數字要可靠多了，不像大躍進和文革時的任意虛報。再者，工業、農業總產量，又分成若干單獨的項目，如多少噸水果、多少隻手錶等，這顯示了統計人員是在盡力製作名符其實的數據，使得大躍進之前和毛死後這一階段的增長，是始終一貫的。此外，還有一些獨立的調查人員（例如艾克斯坦 BOKSHEIN 在一九八〇年，日人石川在一九八三年），也得出了文革期間增長率高的結論。

我在一九八四年初，在中國停留了幾個星期，利用機會獲得了一些對上述脫節現象進行

解釋的線索。我對家庭收入作了一項非常小規模的調查（內容見下節）。我還訪問了一些親友和見過的人，我還在廣州、上海、北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官員晤談過。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麼廣泛的交談對象中，都異口同聲地說：大約到一九七八—九九年，才恢復到一九六五年的平均生活水準。我自己作的調查也支持這一說法。第三節將對此作一說明。

二、實地調查

共產主義下的中國，是以不願向外國人洩露其情報而著稱的。

在最近的自由化之後，這種情形略為改善。我能用普通話交談當然也為我帶來了莫大的便利。我一共得到了三十一份調查表，主要來自廣州、上海、北京、上海附近一個公社、和廣東的一個農村。在這三十一份調查表的對象中，五名是農民、七名工人、三名亦工亦農、十五名「其他行業」。十四人住在大城市，八人住在城鎮，八人住農村（一人未回答）。因此，這一抽樣雖非十分具有代表性，但也不完全偏頗。因為主要集中於廣東省（按中國的標準說，是富有的）、上海和北京，所得到的平均數字，明顯地高於全國平均數。但是如果我們主要的興趣是在於改變的幅度，或者對不同年度進行比較的話，這些數字雖然不具結論性，但亦起到一些指引作用。這個抽樣當然很小，但許多人在答覆問題時對我說，在同一類的相同職業中，他們的情形是有代表性的。尤其是非農民，他們在全中國的情形大致相似。

回答調查表的農民比例，遠低於農民在全國人口的實際比例，如果使用純粹的平均法，農民將極不具代表性。因此先以農、工、其他



部分農民先富起來了。圖為江蘇農村一農民自建新居。

的個別平均，然後再以這些人在全國人口的實際比例，而非回答調查表的比例，求出全面的平均數。如果在我們的抽樣中農民的人數相當多，這種方法是可以合理接受的。可是在我們的抽樣中，只有五名農民，三名「半」農民，如果使用這種方法的話，這少數幾名的農民隨機抽樣因素，將影響整個平均數。經過一再的考慮，我決定用上述三種團體相等分量的折衷辦法。這使得農民在整個國家人口中的代表性不足，但是在抽樣中的農民，却有了過度的代表性。而「其他」這一類的團體，情形正好相反。這種方法得出的數字列於表一。這份根據不適宜平均抽樣的表格，可向作者索取。

至於調查表對象的性別：男性二十三人，女性五人。年齡的分佈是，二十至二十九歲兩

人；三十至三十九歲三人；四十至四十九歲十二人；五十至五十九歲六人；六十至六十九歲五人。一些年輕的答覆調查表問題時，對早期的情形皆未回答，因為當時他們都還年幼，甚至尚未出生。因此對早期年代的數字（尤其是五〇年代），是少於三十一人的平均數的。

表一第二行的數字，是依據官方物價指數（到一九八二年的數字是取自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三年是根據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所公佈的）。

第三行回答調查表的物價指數，是根據他們對「以現在物價計算的家庭收入」關於一九八三年的家庭實際收入」的回答。

第四行的合併物價指數，是官方與調查表回答者的指數的平均數。從這兩行中可以看出，官方物價指數中的通貨膨脹率，遠低於回答調查表者的指數。

這很可能是個人傾向於誇大物價的上漲，而官方傾向於報低。所以合併的物價指數可能是一個合理的折衷。

本文所用的物價指數，皆以一九六五年的為基準，所有不變價格數字皆指一九六五年的不變價格（人民幣）。另外還需強調的是，所有的收入數字是指金錢與物質（主要是農民的作物）所得，但不包括免費或貼補的政府服務。因此我們所估計的平均國民收入，不能直接與通常用於其它國家的平均國民收入方法比較。它比較適用於和可以自由支配的平均國民收入相比。不過我們主要感興趣的是這些年來的變動情形。

在計算一九八一年和八三年數字時，對農民的收入是用「趨勢」而非實際所得。這是因為在回答的調查表中顯示一些農民在一九八一年有不同尋常的高生產。所以一九七八—一九

八三年的趨勢，在數字上錯誤的成份較少。

檢查表一，顯示了下列種種情形：

(一) 官方物價指數和回答調查表者的，有顯著的出入，已如上述。

(二) 在這些人與作者的閒談中，都異口同聲地證實（第六行），如果使用調查表中的物價指數，生活標準到一九七八年才恢復到一九六五年的。

(三) 不管是採用官方（第五行），或調查表中的物價指數（第六行），從一九五二到五七年，平均國民實際收入大有增加，分別是平均一年百分之七點三二和六點九二五。

(四) 一九七六年毛死後，平均國民的實際收入又有一次大幅的增加，但在採用官方或調查表的指數上，却有很大的出入。使用合併的指數，平均年增長率約為百分之八。

(五) 雖然在大躍進（一九五—一六一）之後的一九六二—六五年，元氣有了迅速的恢復，但是不論採用那一個物價指數，一九六五年的平均國民實際收入都沒有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最高峯。如果採用合併的物價指數，一九五七—一九六五年整個期間的平均年增長率是負零點七五。

(六) 文革也造成了增長率的下降，採用合併的物價指數，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是負二點一二，一九六九—一九七六年實際上沒有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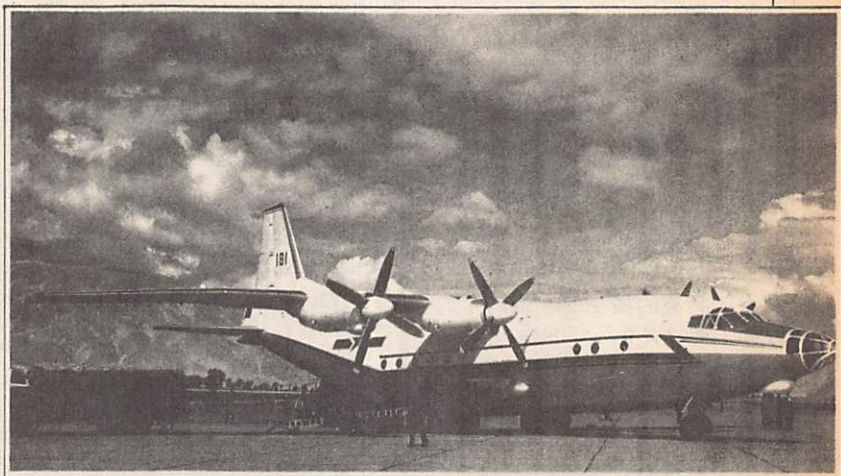
三、對這一差異的說明

我們的實地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根據官方的統計，文革期間的按人口計算的平均產量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相當迅速，但一般人民都認為生活標準沒有改善，兩者有明顯的差異

。這種情形作何解釋？

「北京週報」在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刊出了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的一篇文章，為「一九六七—七六年中國經濟統計」的可靠性辯護。（懂中文的讀者可參閱同一作者——「經濟研究」中更詳細的分析）。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解釋。首先，雖然這十年期間有相當的增長率，但平均增長率略低於非文革的年代。再者，在這十年內有明顯的三次衰退和兩次好轉，每一次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變動息息相關。第二，「十年動亂期間的國家經濟增長，主要可歸功於能源的迅速開發。原油生產從一九六六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五萬噸，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八千七百六十六萬噸。」（第二十三頁）第三，「國家生產的增加，是由於投資增加、運用更多的勞力、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料所獲得的，而非由於提高經濟效率。」（第二十六頁）。

上述的解釋有某些正確性，但還不夠充分。它們對雖然在十年動亂中生產何以仍大量增加的原因所作的解釋，多於對何以生活標準沒有改善的原因（空閒的時間排除在外）所作的解釋。例如在投資增加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很大的波動，但整個期間所累積的國民收入，祇增加了百分之零點三，從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三十點六，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三十點九（第二十五頁）。而且經濟的效率低，也許可以解釋按人口計算的平均產量和實際生活標準的差距，例如水果無法在新鮮時到達消費者的手中，就無助於提高實際的生活標準。不過，除非由於更大程度的沒有效率，造成這一差距本身的擴大，它仍不能解釋何以平均產量大增加，而生活標準沒有提高的原因。爲了說明這一差異，也許可注意下列的事實。



中國的軍工生產發展不慢，圖為「運一八」飛機

第一，文革的十年期間，也是在物質和人力上加強軍援越南的時期，金額高達幾十億美元。（黃文歡，一九八三年）

第二，文革期間，以較具體的措施，執行了工業疏散的政策，作爲國防措施。某些地區，如上海，把工廠拆卸，然後再以極高的代價在西北邊遠地區重新裝配。西北建造了更多的工廠，但其中許多經證實是經濟上不能生存的，不得不閒置在那裏。與這一國防措施有關的，是在許多人口中心建造了地下掩體。這種與國防有關的支出，在十年期間大量地、且越來越多地消耗了國民生產，使得平均產量的增

長，用於改善生活標準的所剩無幾。遺憾的是我無法得到這方面的詳細統計。

另一項有關的是，雖然文革的代價，在減少生產方面很明顯，但它更大的代價却是無辜人民在非物質方面受到的重大損失，例如正常人與人之關係、制度、信仰和動力的破滅，以及對教育、科學的忽視。這種非物質方面的代價，不但在當時是極大的損失，而且還在以後的幾年中造成了物質和非物質的損失，甚至在未來都還可能如此。

附註

本文中表格，承利薩·格羅普（LISA GROPP）女士根據原始資料製成，特此致謝。

(1) 本文中數字係以一九八二年「中國統計年鑑」爲依據，但該年鑑所收集到的年份不全，所以，也祇能根據其僅有數字進行調查，但自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九八三年年鑑以後，可用的數字較多，其中包括「文革」的十年。根據這本最新年鑑，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工業、農業總產量增加了將近一倍（增長百分之九二·五四），國民收入增加百分之六二點一四，也就是年平均累積增長率分別是六點八和四點九——非常可觀的增長率，根據官方數字，這段期間並沒有通貨膨脹。

(2) 造成脫節現象的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在不同的階段，使用的不是同一套價格來求得不變價格的指數的。較早期間使用的一套價格側重於工業品，因而在擴大工業領域的同時，其增長率也隨之而較高，這一現象的發現，應歸功於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戈雷文·周（GREGORY CHOW）先生。

表一：家庭數與國民平均年收入
(三十一戶)

TABLE 1 : ANNUAL AVERAGE (over 31 households) FAMILY AND PER CAPITA INCOMES

家庭(三十一戶)與國民年平均收入	1952	1957	1965	1969	1973	1976	1978	1981	1983		
目前物價下(以1965年百分比為基礎)的家庭收入	473.20 53.51	749.63 84.76	884.40 100.00	898.27 101.57	1009.27 114.12	1054.30 119.21	1409.87 159.42	1839.33 207.98	2350.60 265.79		
官方物價指數(1965=100)	83.06	90.12	100.00	97.92	97.33	98.29	100.97	111.74	115.60		
調查表調查的物價指數(1965=100)	77.62	85.79	100.00	103.64	110.14	114.75	131.56	138.14	153.47		
合併物價指數(1965=100)	80.34	87.96	100.00	100.78	103.73	106.52	116.27	124.94	134.54		
官方不變物價中的家庭收入,與1965年百分比	569.71 64.42	831.81 94.05	884.40 100.00	917.35 103.73	1036.96 117.25	1072.64 121.28	1396.33 157.88	1646.08 186.12	2033.39 229.92		
調查表調查的按不變物價指數的家庭收入,與1965年百分比	609.64 68.93	873.80 98.80	884.40 100.00	866.72 98.00	916.35 103.61	918.78 103.89	1071.66 121.17	1331.50 150.55	1531.64 173.18		
綜合不變物價中的家庭收入與1965年百分比	589.00 66.60	852.24 96.36	884.40 100.00	891.32 100.78	972.98 110.02	989.77 111.91	1212.58 137.12	1472.17 166.46	1747.14 197.55		
家庭人數	3.52	3.61	3.98	4.37	4.61	4.69	4.82	4.72	4.87		
成人	2.36	2.59	2.65	2.80	2.82	3.04	3.24	3.30	3.46		
兒童	1.16	1.02	1.33	1.57	1.79	1.65	1.58	1.42	1.41		
目前物價中平均國民收入,以1965年百分比為準	134.43 60.50	207.65 93.45	222.21 100.00	205.55 92.50	218.93 98.52	224.80 101.17	292.50 131.63	389.69 175.37	482.67 217.21		
官方不變物價的平均國民收入,與1965年的百分比 平均年增長率	161.85 72.84	230.42 103.70	222.21 100.00	209.92 94.47	224.94 101.23	228.71 102.93	289.69 130.37	348.75 156.95	417.54 187.90		
				7.320%	-0.454%	-1.413%	1.743%	0.557%	12.543%	6.380%	9.419%
調查表調查的按不變物價的平均國民收入,與1965年的百分比 平均年增長率	173.19 77.94	242.05 108.93	222.21 100.00	198.33 89.25	198.77 89.45	195.90 88.16	222.33 100.05	282.10 126.95	314.50 141.54		
				6.925%	-1.064%	-2.803%	0.056%	-0.484%	6.530%	8.260%	5.587%
綜合不變物價平均國民收入與1965年百分比 平均年增長率	167.33 75.30	236.07 106.24	222.21 100.00	203.96 91.79	211.06 94.98	211.04 94.97	251.57 113.21	311.90 140.36	358.76 161.45		
				7.127%	-0.754%	-2.119%	0.858%	-0.004%	9.181%	7.428%	7.249%

● 報導 ●

■ 杜克大學舉辦
「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
實踐」討論會 (本刊編輯部)

杜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將於十月卅日
至十一月一日,舉辦了二次討論會,主題為「
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從毛到鄧的
中國式社會主義透視」。討論會的具體籌辦人
是該所的王瑾和阿里夫·狄立克(Arif D. R. I. I. K.)教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被邀
出席這次大型討論會,並以「毛和鄧的知識份
子政策——它的文化背景和它的後果」為題,
發表演說。

本次討論會共邀請廿多位全美各著名學府
的專家與學者分題演講和講評。討論會將分四
方面論題：

- 一、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透視；
 - 二、社會主義和成果；
 - 三、社會關係和政治權力；
 - 四、社會關係及文化。
- 除此討論會外,杜克大學亞洲和太平洋研
究所還特地於十一月二日(星期日)為中國民
聯主席王炳章先生安排一次中文演講,講題為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民主前途」,演講後進
行自由討論。

所有討論會和演講會都將公開,歡迎各界
、尤其是海峽兩岸和香港留學生、訪問學者參
加。討論會聯絡人為：

王瑾 (JING WANG)
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
ITUTE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27706
TEL. (919) 684-2902

在美加旅遊的感觸

(美國華僑) 周立仁

「有什麼樣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國民」。同樣的道理，「什麼樣的國民，造就什麼樣的國家」。筆者全家利用美國國殤日長週末，到尼加拉大瀑布、多倫多、千島玩了一趟，最大的感觸就是這一點。論山川景色，大瀑布和千島固然值得一遊再遊，但中國的自然景觀和文物，每年也吸引了上百萬外國遊客前往。

美國和加拿大是世界先進的民主國家，也是有數的工業大國。良好的民主制度，使她們的人民養成了守法、守秩序的習慣，充份體現了民主和法治是一體的兩面。工業發達，使她們的人民享受了合理的高水準生活。這兩點都是我們中國人長期追求，但迄今仍不能確定何時才能達到的目標。

在美、加的遊樂區，儘管人潮洶湧，但却非常清潔，不斷有人清除食物、飲料的紙杯、紙盒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遊客人人自重，不亂丟垃圾。對中國人來說，美、加所有的遊樂區都沒有小販的糾纏，真是省了不少精神。紀念品商店、餐飲店也沒有敲遊客竹槓的現象。我尤其注意到，任何餐廳、參觀、遊樂的地方，那怕人再多，但是都很安靜。

守秩序這一點，恐怕是我們中國人最欠缺的了。因為大家都排隊，即使隊伍再長，也會很快輪到。提起排隊，我個人有幾點值得供大家參考的經驗。第一，插隊是會受到干涉的。有一次我們一家在新澤西州「大冒險」遊樂場

排隊坐電動車，有兩個女人插隊，後面的人立刻向管理員反映，其他的人也紛紛出面作證，管理員堅持插隊的人退出，否則電動車不開。這時隊伍中群起指責，兩名女人只好狼狽的離開。

第二，有人插隊到你前面，如果你不干涉，別人會指責你為什麼讓人插隊，妨碍大家的權益。我就被人怪罪過。

第三，幾乎任何隊伍都排成一排，而且一定要等叫到「下一位」(NEXT)時才上前。記得我到紐約市車輛管理局換駕駛執照時，一位後來的中國同胞看到一個窗口前面沒有人，立刻快步上前，結果被人叫了回去。

排隊是一件極簡單的事，但是我們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就是沒有做到，可是一到了國外，一個個都會，可見社會環境和制度是多麼重要。

我們在瀑布的加拿大部份，進到水帘洞中時，隧道很窄，所有的人自然而然的靠右邊走成一排，而且到了水帘洞口，只看一會就離開，讓後面的人也有機會上前，使川流不息的隊伍不致阻塞。這種在公共場所顧及他人的權利，也是我們中國人比較欠缺的。

從在風景區照相，最能反映人家的這種態度。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只要看見有人拿起相機，一定會繞道從他背後走過，或等他照完了才走。進出門口，如果後面跟着有人，一定會

用手把門扶着，等後面的人過來接上手再放開，免得打着後面的人。從這些生活上極細微的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注重公德心的社會。

至於一般人的禮貌，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我們在加拿大問路或打聽什麼事情，對方都很熱心的指點。旅館、加油站的職員看我們是紐約的汽車牌照，還問我們在他們國家玩得是否愉快，或希望我們在他們國家能享受愉快的時光。記得十年前我在英國旅行時，倫敦的海關人員在我出境時，也希望我對他的國家有良好的印象。

我們中國人也對外國遊客很好，但却很會侮辱自己的同胞，連香港的海關人員也不例外。我就受過啟德機場海關和移民職員極不禮貌的待遇。到香港之前就有人告訴我，如果你不會廣東話，寧可說英語還會受到較好的待遇。我們同胞的這種心態真是可悲又可憐啊！

至於中國大陸對華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有各種不同的差別待遇，以及不久之前還在報上看到店員對顧客飽以老拳的現象，真令我們這些生活在海外，但時時關心自己國家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定有人會說美國有的是壞事，多的是黑暗面，但就整個社會來說，那究竟是少數，而且這種反面教材也不值得我們經常登在報上，掛在口中，這樣作只是一種阿Q式的心理上、和情緒上的發洩，並不能因此就顯示出我們的社會制度和環境是合理的。

今天十億中國人居住和治理的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生活標準和民主法治程度差別，反映在人民的公德心、守法精神、公共秩序上也有若干程度的差別。我衷心地希望我們中國人要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樣，要「迎頭趕上」。

中鋒在黎明前離去

(續篇)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韓秋霞

夜深了。

他端端然地把一份厚厚的譯稿放在桌上，標題是「淺論高大中鋒在現代足球運動中的作用」。他輕輕捻着一頁頁字迹密密麻麻的稿紙，用旁觀者的挑剔眼光嚴格審閱、仔細斟酌：行了，處處無懈可擊，再也尋不出半點疵漏了。他那眉頭緊蹙的臉龐上飛揚起陶然自得的神采，遂在篇首署上姓名：張方仁。

然而，當目光觸及自己的名字後，他臉上剛剛漾起的喜悅表情便又迅速地黯淡了。於是，他丟開鋼筆，面有愧色地暗自搖頭……

「張方仁」這個名字，一年前在本市臭不可聞。其真實原因乃是——

中鋒在黎明前離去……
那天夜裏，他憤然出走，而且把牛卓父女

罵了個狗血噴頭，可謂淋漓痛快之極！但是生活是嚴峻的：社會自有其定而不移的法則和秩序；黨和國家自有其冷酷而穩定的權力層次結構。以區區一個足球中鋒（何況還得加個「前」字才準確），竟敢貿然對此表示大不敬，那結果自然是招致了穩、準、狠的打擊！

禍事就像一張由老謀深算的漁夫操縱的疏而不漏的巨網，而他則像一尾無能為力的小魚，只得聽任擺佈。

先是牛莉雪提出離婚。她手上了那樣一筆飛來之財，便視這個不吃敬酒吃罰酒的丈夫為多餘之物。再說年紀也大了，哪個女人還能瘋瘋顛顛地戀着足球呢。

方仁接到莉雪的最後通牒後沒了主意：當他那股沖天怒氣隨着惡言詈罵發泄完畢，便像個高熱退去的病夫一樣，虛弱不堪。他是深知牛卓將軍的厲害的。而且，他來自窮街陋巷大

雜院，自幼便把離婚當作人間醜事，覺得若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實在丟不起這個臉呀……

這樣蹉跎了數日，莉雪不耐煩了，提出離婚訴訟，把狀子遞到了法院民事審判庭。裏面增添了許多不實之詞——方仁被說成是一個對妻子非打即罵的虐待狂、活閻王。婦女報在婦聯保護婦女兒童委員會的授意下披露了這一消息，民情沸騰。許多讀者紛紛寫信至報社，要求嚴懲這個無法無天的惡丈夫。其時，又趕上大轟大喻的「法制教育宣傳月」，張方仁不幸被抓成典型，公安機關宣佈以虐待家庭成員罪對其實行收容審查。三個月後，本擬將他釋放，却又因業餘體校方面無人出面接收而不能實現……一拖再拖之後，方仁終被送往天堂農場「勞動教養」一年。在那裏，他才明白了胳膊擰不過大腿的淺顯道理。



身後有響動。他知道這是母親進來了，而

且知道母親準是碰着了放在門邊的那些舊足球、破球鞋什麼的；屋子太小，東西實在擺不開。

「稿子寫得了嗎？」母親滿臉愁雲，擔心地問。

方仁肯定地點點頭，但是一縷頭髮却沮喪地散垂下來，擾亂了他那茫然的視線：「完成了。」

「啥時候交給鄭教授呢？」母親着急地叮着問。

方仁這個三十有五的大漢像個孩子似地仰起臉，嘴唇動了動：「媽……」

母親的老淚猝然湧出，她趕忙用不乾不淨的衣角拭去……。兒子從天堂河回來後，整個人都變了樣兒：臉上有了深一道淺一道的皺紋，顯得蒼黑、衰老。從前他愛說愛笑，現在却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天到晚不肯吭聲。更糟心

的是，教練幹不成了，兒子每天在體校裏掃地擦桌子！一個進過勞改農場的勤雜工，還能再說上媳婦嗎？萬難！就算有個把又老又醜的女人不挑職位，誰又有胆子嚼嚼足球中鋒專打老婆的鐵拳（報紙上是這樣宣傳的）呢？……

方仁望着母親因痛苦和憂思而有些走形的臉孔，心裏刺痛，神情木然。勞教生活雖然僅僅一年，却輕而易舉地摧垮了他的雄心大志和偉岸豐姿，泯滅了他的榮譽感和自尊心，而時時自覺是個猥瑣的、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區區小人。

生活裏不乏好人。業餘體校的周校長就是一個。雖然他有些油滑，却還是很有正義感的。他曾私下告訴方仁，當初是區體委明令業餘體校不得去公安局領人，他實在沒有辦法。（方仁苦笑了一下：牛卓的手腕真個老辣！）今後，他還會相機照顧方仁，千萬不要灰心……（方仁微笑了一下：他心領了。）

誰想，周校長真的給方仁的生活帶來了轉機——

那天早上，方仁照例抱着個將近一人高的大條帚，清掃體校門口那片空地。周校長喜孜孜地招呼他：「小張，我給你攪了一樁美差，你可一定得露一手漂亮的……！」

「周校長，什麼美差？」方仁手裏的條帚停下來，聲音懶洋洋的。從天堂河回來後，他就是這副沒精打采的樣子。

「下午有場足球賽——高校聯隊對外國留學生隊。人家讓咱們出個巡邊員，我看哪，你去挺合適……！」

方仁遲鈍而驚喜地揚了一下眉毛。一股暖意湧遍全身，一個在足球事業上卷土重來的念頭，閃電般地跳閃於腦際……：返回體校以後，他一度處於孤立狀態：人們都了解他的冤屈和

不幸，但是更懼怕造成這冤屈和不幸的幕後大人物，因此最好的辦法便是躲得遠遠的。後來，大家見這位勤雜工幹活兒不怕髒累，更重要的是牛家父女沒有來找新的麻煩，情況便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這樣快便重返綠茵場上，却是方仁做夢也不敢奢望的。

這場水平不高的國際足球友誼賽踢得相當緊張，自始至終爭奪得十分激烈。留學生隊人高馬大，採取歐洲力量型打法，頻頻以長傳吊沖威脅高校聯隊的大門；而在高度上居明顯劣勢的高校聯隊，則是避實就虛，利用對方來自多國、配合默契的弱點，以一記巧妙的「香蕉球」（弧綫球）首開紀錄……然而，留學生隊也絕不白給，橫衝直撞地大腳攻門，很快將比分扳平……

方仁手執小旗，口銜銀笛（假的。巡邊員其實用不着這個），靈活地穿插於雙方隊員之間，總是在最有利的觀察位置上。他臉上一掃平日裏那種屈辱聲色的晦氣，儼若一名剛正不阿的最高法官。呵呵，他天生就是綠茵場上的人，唯有在這裏他才能發現——八十年代膾炙人口的名詞，連初中學生也掛在嘴邊——「自我」！

平局久久未能打破……將近終場時，波瀾又起——高校聯隊の後衛截得球來，大腳開出，不料留學生隊的一名黑人前衛以一個瞎貓碰死耗子的漂亮魚躍將球頂給隊友，幾名隊友快速向禁區滲入，三傳兩遞之後，破門！

幾乎與此同時，主裁判的哨聲響起！方仁手中的小旗也高高舉起！宣告：「越位！此球無效！」

已經狂喜地擁抱在一起，彼此拍肩膀吹口哨的幾名留學生隊員，被迎頭澆來的一瓢冷水激怒了！他們惱恨地衝向主裁判，紛紛舉臂甚至拳抗議……最激動的是那個黑人後衛，他操着不甚準確的漢語質問：「太亂來！……：明珠『走』進了網裏……」

主裁判耐心地同他們說理。可惜，這些洋學生的中文根底尚淺，聽不懂主裁判那一口連國人也會頭痛的四川話；有的高校隊員試圖將主裁判的意見譯成英語和法語，遺憾的是那些涉及足球規則的專用名詞，他們不甚了解，心有餘而力不足……

場內這樣一亂，引得許多觀眾跳下看台，擁擠在主裁判周圍，半是起哄、半是助威地哇哇大叫……他們中間有許多無所事事待業青年，對去年那場震驚中外的「五·一九足球暴亂」記憶猶新，巴不得事態擴大，以便開關起來——又打又砸無疑是天下最有刺激性的事情！

綠茵場上忽然又靜了下來！這是比剛才亂哄哄的角角更具爆炸性的安靜——語言難以溝通，信息無法交流，說話又有何用？具有文革遺風的中國青年和狂放、不拘小節的洋學生們此時想到了一處——用中世紀騎士的決鬥方式見個高低吧！

主裁判那油黑的臉吓得發白了……

一個矮小的高校隊員忽然像撈到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指着附近看台的一位長者大喊：「鄭教授，請您下來翻譯一下，我們說不清……」

眾人把目光投向他——一個瘦得像麻桿兒、臉頰癟癟的、滿頭花髮的老頭子——期望他有所動作，把騷亂制止於未然……可惜，這位鄭教授滿臉驚恐地連連擺手，還下意識地往更

深因而也是更安全的角落挪動身體……

一場拳來腳往的群毆即將觸發！

這時，一直緘默不語的方仁忽然開口了。他操着因怯場而結結巴巴的英語說明，剛才黑人隊員頂球的那一剎那，由於身體向前躍出三米左右，他與對方端綫之間的防守隊員少於兩人，因此實際上處於越位狀態……邊說，邊用小旗在地面上準確地戳點着當時雙方隊員或站立、或跑動的實際位置。方仁的記憶力和對足球規則的透徹理解，使得洋學生們不能心服口服。他們聚起來小聲商議了一陣，覺得鬧下去也無趣，便轉噴為喜地拍拍主裁判的肩膀……

一席話，化干戈為玉帛。當這場比賽以一比一平分秋色後，方仁這位巡邊員竟成了衆人心目中的頭號明星。當一位老球迷終於認出他就是當年威震華夏的足球中鋒張方仁（這委實不易：他現在的形象和精神狀態與往昔判若兩人），並且重提「怒射穿網」的佳話時，熱烈的氣氛達到高潮：大學生們爭先請他簽名留念。方仁自然一一從命，但是心裏溢滿了虎落平陽的憂憤……

在更衣室裏，周校長（鬼知道剛才出事的時他跑到哪兒去了）陪着鄭教授（容光煥發，一反惶恐之態）找到方仁：「鄭教授很欣賞你在場上的表現，他想和你談談……」

鄭教授發出一陣包含着身份、年齡等優越感的大笑：「哈哈……小張同志，你不簡單咧。我雖然搞了幾十年英美文學，若是應付一場足球風波，恐怕也吃力哩！」

周校長說：「鄭老客氣了。方仁，鄭老是新華大學教授，寫的書多了去了（他旋即悟到此言不雅）……著作等身哪。」

哦，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美文學權威

鄭曉冬教授。方仁從前在不止一本精裝著作的書脊上見到他的燙金的名字。

「方仁同志，」這老頭子也是個見面即熟的人，很隨和。「你在哪兒學的英語？」

這一問着實擊中了方仁的痛處！他的身體微晃了一下，鼻尖沁出了細細的汗珠……從前在國家青年隊，由於出國機會多，爲了貫徹執行所謂「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綫」（別忘了，是乒乓球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領導上給他配了一名專職英語教員，規定了必修的英語教材。體育學院函授班也有公共英語課。再就是——奇恥大辱啊——在天堂河農場……

方仁所在那個勞改隊的隊長是個足球迷，久聞足球中鋒的大名，如雷灌耳。於是在伙房裏派給他一個比較輕鬆的差事，不必天天下地，伙食也較一般犯人充足。這就遭到了本隊幾乎全體勞教人員的嫉恨。況且在這種地方，落價的前體面人物總是比前下三濫還不如，「老和尚的木魚——天天挨揍的貨！」

那幫牛鬼蛇神真的動手了。在伙房後面，他們仗着人多、心齊，將方仁痛打了一頓。方仁拚力自衛，却是餓虎不敵群狼，他吃了大虧。

全隊只有一個人沒有跟着打他。這是一個挪用了公款的大學英語教員。他倆成了好朋友——朋友加師生！

……

難道能把這些事情講給一位初相識的年高德劭的老教授聽？方仁漲紅着臉，訥訥地道：「我……在體院學過……後來，自學……我犯過很大的錯誤，哦……是虐待家庭成員罪……」時至今日，再驕傲的人也要把頭低一低啊！

鄭教授凝視着方仁，搖搖頭照搬了一個政治術語：「向前看嘛。」想了想，像是觸動了

靈機似的又說，「我有個學生，現在是《外國體育動態》編輯部的負責人。他常常跑到我這兒來訴苦，說編輯部裏頂用的人奇缺——都想攀更高的枝頭，留不住人。如果你能譯一篇有難度的東西給他，那麼我想……」……

有時候，天上真能落餡餅呀！

經過連續幾宿挑燈夜戰，譯稿總算殺青了。此時，深夜時分，方仁望着一輩自視甚輕、委曲求全的母親，心裏一陣陣緊痛——他能夠在社會上（以另一種方式）為事業重新拼搏嗎？

自卑自賤心理和僥倖一擲的念頭在格鬥！「睡吧。……」方仁用懶洋洋的聲音道，順手熄了燈。

小小的斗室裏一片黑暗。黑暗是必要的——屋子實在太小了，成年母子間理應迴避却又無法迴避的事情，只能在黑暗中進行……

三

鄭曉冬教授的家是在新華大學內被稱為「拉丁區」的一隅。二十九號樓一層。

據說，這裏的一幢幢二層小樓都是用庚子賠款建成的，歷時四分之三世紀以上。雖然外觀已然失色、內部設施也跟不上現代化的步伐，但是單看那環境——法國梧桐濃密的潤葉枝極遮出了一片與世隔絕的蔭涼、縱橫交錯的瀝青路通達各家門口以及戶主中包括若干中國知識界引為驕傲的鴻儒，便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方仁按照約定時間敲響了鄭教授家那黯舊的、仍然氣派十足的門。

開門的是一位中年婦人。她顯然是剛剛出浴，一頭濕漉漉的秀髮隨便地盤卷在頭頂，有

一種楚楚動人的風韻。她當年一定很漂亮。（其實說現在很漂亮也是可以的。只是中國人一向吝于讚美中年女性。）她是那種懂得自己很美却又並不以此自矜，却又暗作努力從而駐顏有術的女人。

方仁第一眼便對她印象良好。

「您是方仁同志吧？鄭教授在等您呢……」

她用如歌的聲音說。

方仁隨她來到客廳。鄭曉冬從涼滑的皮沙發上欠身站起來。他手裏捏着幾份講義樣的打印材料，面前的玻璃茶几上堆着幾摞硬皮書。這客廳顯然兼作書房之用。迎面壁上有一幅已故郭沫若的墨寶——係恭賀鄭君五十初度所作的一首七絕。幾面書櫥裏放滿了林林總總、以外文居多的書籍，使得方仁原已有的敬仰之情又增添了幾分。

「方仁同志，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鄭曉冬開門見山地說，露出書卷氣很足的微笑，「你的譯稿他們看過了，一致同意借調你到編輯部工作——當然囉，借調只是第一步。慢慢來，不要着急……」他因無意中套用了「臨終最高指示」，自己哈哈地笑了。

方仁也跟着笑了——心裏懸着的石頭隨之落地。把譯稿掛號寄出去後，他心裏一直是七上八下的。現在生活的轉機到了！過幾天，世界足球大賽將在墨西哥舉行，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運動將有何新的趨勢？——他拭目以待。

那位中年女人送來兩杯放了檸檬片的熱茶以及義大利三色奶油小餅乾，還有餐紙。這種西方風使方仁略感拘謹。

鄭曉冬順便介紹了一下：「我愛人，于娜。」

愛人？哦，至少相差三十歲的老夫少妻。

（方仁原以為她是鄭教授的女兒或助手）於是方仁重新朝女主人點點頭。禮多人不怪。

于娜還禮後不聲不響地退了回去。落座以後，鄭曉冬不再提起編輯部的事情。他警惕地望于娜走時沒有掩上的那扇通往廚房的門，把聲音壓得又低沉又緩慢：「方仁同志，我還有這樣一件事情，想請你幫一幫忙……我以前的愛人劉靜死在文革期間。哦，是那個……非正常死亡。（鄭曉冬的眼臉低垂，喉嚨哽咽。方仁也代為難過地保持沉默。）她臨終前表示希望身後不要火葬，遺體不要燒掉……我當時答應了她，可還是燒掉了……不得不如此啊。這件事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最近有位鄉親——我下放時的房東——同意我把劉靜的骨灰盒葬在他家自留地裏，立塊碑。我想，你可以幫幫我的忙？……」

「當然可以……」方仁巴不得替教授做些事情。



悄聲叮囑着，「如果于娜知道了，她會發脾氣的。（他不無自豪：有愛必有忌。他的情緒異向地感染了方仁——爲自己那不幸福的婚姻而沮喪。）……」

恰在此時，廚房裏傳來幾聲輕微的鍋勺響動。極輕微的，却已使得老教授噤若寒蟬。

帶着孩子氣的詼諧，鄭曉冬用執茶杯的左手在空中劃出一個小小的問號：「能保密嗎？懷着莊嚴的義務感，方仁用執茶杯的右手在空中劃出一個大大的句號：「能。」

他們默契地相視一笑。
廚房裏的響動消失了。

鄭曉冬又絮聲地自說自話，同時久久地凝睇着窗外那一片非等閒人家所能享有的園林景色。「……劉靜死得很慘。其導火綫竟是一碗餃子，咳，一碗平平常常的餃子，餃子……」這是一個老套子的文革悲劇。這些年來，這樣的故事多如牛毛，作家寫膩了，讀者看膩了，大眾聽膩了。然而，方仁還是懷着極大的同情心聽完鄭曉冬的絮叨。

……新華大學西語系的「牛棚」，將本系十幾名正副教授一網打盡，關押其中。鄭曉冬自然也是一名重點監管對象。

主宰他們命運的是一個綽號爲「牛魔王」的劣等生。

「這是什麼?!」牛魔王咆哮着，指着劉靜送到牛棚裏的一飯盒素餡餃子。「餃子?……這裏面藏着什麼名堂?」

「沒，沒有名堂……」劉靜已然爲自己的多此一舉而後悔了——那天正是鄭曉冬教授五十四歲生日。

牛魔王的腦子神經質地飛轉着，急切地臆造着「階級鬥爭新動向」……忽然，他得勝地叫道：「對囉!『餃』和『絞』同音，你是暗

示他要絞殺我們嘛!滾!……」他把一盒餃子扣在劉靜頭上，還惡作劇地往她脖領子裏塞進了幾個!

歸途中，神志恍惚的劉靜失足跌入兩派爲進行大規模武鬥而掘出的戰壕裏，當即心臟病發作，入夜不治。

……
「依常理而言，大學紅衛兵較之中學生，總該文明一些吧。可是牛鵬飛打人打得兇極了!嘶嘶……」鄭曉冬鬆弛的眼窩裏閃閃光，聲音裏流露出歲月無法磨滅的哀痛，怨而不怒地說道。

方仁差點被熱茶裏的那片檸檬噎住。冤家路窄!怎麼走到哪兒也躲不開牛卓這家人!「牛鵬飛!——牛莉雪的大哥。文革初期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殺人不眨眼的武鬥名將。陳伯達會下手令把他關進衛戍區。打倒四人幫後，這反倒成了他的光榮歷史了。」

鄭曉冬輕輕嘆息着，敦厚的瘦臉上露出冷峻可懼的笑意：「牛鵬飛這樣對待劉靜，我們心中有數……劉靜是他在附中時的班主任。有一回，牛鵬飛偷了音樂教室的手風琴，劉靜給他父親牛卓寫過信……嘖嘖，這就種下了禍因。牛卓，你在報紙上見過這個名字吧——紅得發紫的高級將領。年齡不老，資格很深，又有文化……正符合當今的接班要求!牛鵬飛如今也是官兒，在外地一個英美文學研究所當副所長。哼，世世代代，世世代代……」

眼下，由于高幹子弟接班惹出來的種種非議，早已在社會上各個角落廣爲流傳。有許多話說得相當難聽。方仁基于前車之鑒，從不搭訕。然而今天坐在可親可敬的長者面前，想着這一年的無妄之災，他終于有些把不住自己了

，將滿腹苦水傾倒一空!

「牛卓家的事情，我最知根底!男盜女娼，我一提起這家人就有氣!……」

方仁用特級滇紅沏出的濃茶潤着喉嚨，厲聲數落着牛家的醜聞和穢行，控訴那罪惡的「現代嬪妃制度」……却全然沒有注意到鄭曉冬畏怯地縮身在沙發一角（就像球賽那天縮身在看台一角似的），臉上驟然失去了正常顏色!

三

這以後兩個月一晃而過，借調的事情却像是斷綫的風箏，沒有了下文。

業餘體校的人們風聞方仁將「高升」到意識形態部門（大家固執地認爲：勞心者比勞力者高貴!）裏去而開始對他刮目相看。往日裏因方仁落魄而表示過不敬的那幾個人，如今又表現得格外殷勤。最爲熱心的當推周校長——他急於彌補一下心中的歉疚。「小張，那邊怎麼還沒來人外調?你的組織鑒定我都寫好了，一個勁兒往上邊添好話呢……」

方仁給編輯部打過電話。那邊支吾其詞，先前的熱情到爪哇國去了。從天堂河回來後，他已變得敏感而自重。在沒有搞清楚這種轉變的個中原因之前，他不願再貿然碰釘子了。更費解的是，鄭教授也沒再找他，爲前妻移葬的事情亦不提了……

他爲自己已不進不退的處境暗暗叫苦。
恰在這時，他收到了由于娜代筆的一封信：邀他翌日下午去鄭宅小坐。

方仁與另一名勤雜工——一個連手指頭都數不過來的低智青年——調整了休息日，準時前往。

還是于娜把他引入客廳，擺上同樣的西式

茶點。于娜身着現已不甚見的深碧色絲絨旗袍，氣度慵倦而高貴。

遲遲不見鄭曉冬露面。于娜歉然地說：「鄭教授臨時有事情出去了。他很抱歉——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明天再來一下……」

方仁訕訕地應了一聲。此時，走或不走，似乎都不太妥當。

于娜的表情比上次見面顯得生動一些。但眼神裏却透出一種深沉的、似有不忍的憂思。……鄭教授去辦一件要緊事；讓他前妻劉靜同志的骨灰盒入土為安。臨時有車有人，他只好爽約了……她安詳地道。

方仁覺得納悶：于娜何以知道這「秘密」？鄭教授又何以不要自己幫忙而另求別人？……

于娜很有風度地把一塊小餅乾送入口中，這個動作使她身體的渾然、柔和的優美曲綫得以顯現。「——難道我會為此介意？鄭教授是個老小孩，滿腦子古怪念頭！我是爲了讓他快活才裝做爭風吃醋的……」

這一席披露家庭內幕的體己話，弄得方仁如坐針氈。

于娜却漫不經意地說出了更甚者：「鄭教授需要自欺，也會欺人。你就是一位受害者：……」

方仁幾乎應聲跳了起來——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對此總是敏感乃至過敏的！他緊張地小聲道：「您這話是什麼意思？……」這些天來，在夜裏睡不着覺的時候，他也有過各種各樣的估測！可是一經于娜點穿，他的手心裏還是沁出了兩把汗……

「這意思就是說：編輯部的事情告吹了。」于娜凝視着他，輕輕地說，「你相信了一個不配得到這種信任的人。」



這普普通通的話裏機關深奧。方仁如墮五里雲霧。這時候，于娜信手丟過來一份寫滿蠅頭小字的四百字紅格稿紙，首先映入他眼簾的這樣幾句話——

「……張方仁對中央軍委負責同志牛卓肆意攻擊，公然污蔑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所謂『現代嬭妃制度』的惡毒說法，足見其對黨懷有深刻的階級異己情緒……」

方仁像是被人劈面打了幾記耳光，驚呆了。

于娜用一種傷感的聲音解釋道：「這是草稿。正文，鄭教授用長鋒雞狼毫膽清後交給了人事部門……」

借調？——見鬼去吧！

方仁顫抖着手丟開稿紙。心裏堵得發慌，又因爲被人出賣了而隱隱感到噁心！他幾乎失聲喊起來：人呵人，教授呵教授！真可惜了！

那滿腹的學問！你還是先向豬狗學學吧——學學豬的厚道、學學狗的忠義！……

他頹然地仰靠在沙發上。

于娜轉進轉出地取來扇子和「十滴水」。方仁覺得受了侮辱似地連連擺手，有點搖晃地站起來……却又被于娜溫柔而又友好地挽住了。

「你是我接觸的第一個體育工作者。」迎着方仁那憎惡的目光，這位彷彿心驚八極的、美麗的中年婦人深爲同情地道，「我原以爲你是一個粗人，想不到你還是很很有思想的，可惜太單純了……」

「你說這些幹什麼？……」方仁冷冷地、敵意地反問。

于娜愈益和善地柔聲道：「我想和你推心置腹地談一談——你的生活經歷使你發現了『現代嬭妃制度』；我呢，則發現了『精神太監制度』，你難道不想聽聽嗎？」不等對方回答，她徑自淋漓盡致地發揮着，「先看鄭曉冬這樣一個實例。他是一株隨風倒的牆頭草。文革前，知識界十處打鑼九處有他。到處插一手。連姚文元歪批德彪西(1)他都跟着起哄，在北京晚報上發了個豆腐乾，當然，是用筆名。其實，他對印象派音樂所知甚少。方仁同志(她這樣稱呼他，聲音有些不自然)……喜歡契訶夫的小說嗎？鄭曉冬集普列希別耶夫中士(自願充當文化打手。還打你的小報告!)、變色龍(隨着政治氣候的微小變化而更換保護色)和套中人(思想上的自我禁錮。至於那幾句無關痛癢的牢騷話，恰是維持這種封閉狀態的有益無害的潤滑劑!)三位於一身！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淪落到這般地步，真是一大悲劇！……」

方仁不作聲。臉上重現出這一年多來所慣見的冷漠的、懶洋洋的表情：住在小洋樓裏的

高級知識份子是一大悲劇；與掃帚、拖把爲伍的低級知識份子（他有北京體育學院函授班的正式文憑）又如何呢？……

于娜輕蔑地用嘴角指點着壁上那幅郭沫若的墨迹：「據說，當年話劇《屈原》在重慶上演，飾嫺娟的張瑞芳(2)建議把『宋玉，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這句台詞改成『宋玉，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郭沫若稱其爲『一字之師』……問題是：郭沫若本人的骨氣又如何呢？廣而言之，中國知識份子裏，真正有骨氣的又有多少呢？……」

她的話挺實在。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實。但言與不言，却在於各人的胆量。方仁不急走着走了。他的沮喪情緒，隨着于娜的滔滔言談得到了緩解……

看來，于娜也因為覺得了一位知音而感到慶幸，她的話越來越出格了：「……中國知識份子歷來講究氣節。曰：『士可殺不可辱。』可惜，三十幾年來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把教授、學者、科學家、作家整得俯首貼耳，變成了一群沒有性別、沒有骨氣的現代精神太監。老知識份子如此，年輕一代則是還在混沌未開狀態中便被施行了精神上的閹割手術，成爲現代的「精神太監」……」

奇談怪論！方仁有了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却又渴望聽下去：「現代嬪妃制度」僅僅涉及少數女孩子，而「精神太監制度」則關乎整個民族呢。

「文化大革命即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宦官之亂。」于娜用考究的銀勺徐徐攪動着茶杯底部沒有溶解的方糖，口出驚人之語。「文革——遜位的帝、后登高大呼，億萬現代精神太監群起撲向在位的帝、后！奪權！……太監的命運是可悲的：爲帝王所殘害，而又對帝王

懷有愚忠。噫，列寧是怎麼說的——既能爲主人效力，又不會妨礙主人清夢的奴才……大致是這個意思，原話忘記了。在中國歷史上，宦官屢屢捲入宮庭之爭……文革這場宦官之亂，就其廣泛性和殘酷性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

在當今各種全面否定文革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說法中，這真是罕見、奇兀的一枝獨秀！雖然不夠縝密，却震耳發聵！方仁暫且將煩惱擱在一邊，認真思索起來。

由于贏得了聽衆，于娜嫺媚地微微一笑。微笑中，五官顯得更更有生氣，因而也顯得更年輕了。「……文革集中體現了推行精神太監制度的惡果。當然，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統治階級的思想都是居統治地位的思想。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思想控制和愚民政策搞得登峰造極，無孔不入，造就了億萬精神太監。試想，如若毛澤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衆人聽了以後口應心不應，這文革哪裏搞得起來？！可惜，在當時，這億萬軍民是一群狂熱、偏執、唯命是從的現代精神太監！……」她掩面嘆息。

「文革也有正面意義。」方仁終於開口了。他爲自己思想重新活起來而自鳴得意。虎落平陽被犬欺。從天堂河回來，他整天價——用大雜院裏的話說——「吃飽了混天黑」。嘻嘻，張方仁是這號沒出息的人嗎？！「文革以後，一大批現代精神太監還原成了正常人。無論是誰再想糊弄老百姓，難極了。……」

「是的是的，」于娜頗爲欣賞地輕輕擊掌，「正是文革帶來的思想解放造就了今天的你和我，出現了『現代嬪妃制度』和『精神太監制度』這樣一些對社會的全新看法……」

她停頓了一下，像是有意留出一個小小的空隙，讓方仁回味一下這種男女之間（她和他畢竟年齡相近！）因言語投機而產生的愉悅感。方仁意會了這一點。他彷彿尾隨着于娜登臨了翠綠的小山，又踏進如黛的平地；這裏芳草如錦，是引人入勝之境……

「看過德國大小說家托馬斯·曼的《馬里奧與魔術師》嗎？那裏面有個魔術師愚弄馬里奧的情節，精采！」于娜興致勃勃地說，談鋒矯健，「真像文革前黨對人民的愚弄。現在，找不着理想配偶的姑娘們苦悶地問：『上哪兒去找男子漢？』真的，不單是中國男子，整個中華民族都缺乏陽剛之氣。什麼『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什麼『黨的馴服工具』，無非是兩棲於陰陽之間的精神太監而已！牛卓們需要他們。有了他們，牛卓們才能作惡，才活得好！兩者是互爲因果的。比如鄭曉冬……」

「哦，我該回去了。」方仁恍然打斷她的話。這樣暢談下去，固然很有意思，可是……

「鄭教授快回來了。」

「他們去了順義。一時回不來……」于娜委婉地留他。

這話產生了相反效果。方仁有些呆氣地搖頭，堅決地站起身來……到了門旁，却又戀戀地收住脚步——

「以後，我們不見面了？」于娜的眼睛宛如敞開的窗戶，裏面的期盼和愁緒一覽無遺。

繼續見面肯定會出事情的。他想。於是他一言不發，匆匆地逃也似地離去了……

四

沒走幾步，方仁便又愕然若失地站住了。他生自己的氣——



從天堂河回來，他便不把自己當作一條好漢了。活着。活着。別的都不必去想。鄭曉冬帶來了一道曙光之後又把他拖入更不堪的絕地。但是這絕地卻又出現了于娜，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微曦……

此時，你却掉頭而去！

與莉雪離異以後，他才懂得了「打光棍」的難對人言的苦處。正值民間所謂的「虎狼之年」，那種純然是生理上的要求也逼迫着他，加之因無法投身足球事業而產生的苦悶，使那些漫漫長夜更加難捱……

此時，你却掉頭而去！……

于是方仁重新叩敲了那黯舊的、氣派十足的門。

出現在他面前的是換了裝的、更樸素也更動人的于娜。旗袍沒有了，質地平凡的白色絨

綫衣，緊緊地箍住她那依然窈窕得不讓年輕女子的美好身材……她那深悉世態的神情明智而又安祥。

沒有人無故在白日更衣。方仁感到自己的全部慾念、所有心機都被她算定了、窺破了……

緩緩地，他竟然落下淚來……

恍惚間，他不知怎地已經落入了那火熱而又陌生的情懷！

理性的聲音旋即在他內心深處提出了莊嚴、無力的抗議……但他還是自行其是了。

我們熟知這樣一個歷史故事：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洗雪父仇。其友人申包胥馳書責備他行爲過分，伍子胥回信反駁；漢語因而增添了一個成語：「倒行逆施」。

他倒行逆施了……但這果而不是因。在連番遭到牛卓、鄭曉冬的陽算之後，他再也無法保持聖徒般的「自我」了。他心中那理性的聲音啞了……

他們互相依恃着（說不清是誰支撐着誰）復又回到客廳，如膠如漆地依偎在他們剛才坐過的長沙發上。所不同者，是高談闊論變成了呢喃細語——

「于娜，你怎麼會嫁給鄭曉冬……」方仁的聲音裏帶出毫不掩飾的憤憤不平。真是個標準的情人。

「這是我的苦命，我的不幸……」于娜的頭枕着方仁的臂腕，聲音像潺緩的小溪流水一樣平靜。這裏面包含着對命運的無可奈何的承認。「長話短說吧——文革爆發時，我是新華大學西語系四年級學生，已經着手寫畢業論文了。我在班上年紀最小——我五歲上學。（方仁據此推算她大約比自己大四、五歲）我的未婚夫在班上年齡倒數第二，功課則是正數第一

，高材生。我倆的畢業論文是寫白朗寧夫婦——我寫婦、他寫夫。兩篇文章具有對稱性，珠聯璧合。（方仁臉上陣陣燥熱）你知道，『山雨欲來風滿樓』，文革前夕，不少同學都看出苗頭了，不敢碰洋人死人觸霉頭，只有我倆是一對傻子！人家寫國際歌、巴黎公社詩歌、哈克納斯的平庸之作《城市姑娘》……我倆却寫白朗寧夫婦。真傻！運動一來他就被揪了出來，戴上『小鄧拓』的帽子。他這個人聰明絕頂，寫一手漂亮文章——就像魯迅說的那樣『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稿費源源不斷，我倆三天兩頭去海澱鎮下館子，眾人如何不眼紅？……他受不了凌辱，跳樓了。這時候，我已經有了身孕……」

她徐徐閉上了眼睛，但是那修長的雙睫在顫慄。

方仁靜靜地等待下文。

「……他母親從南方僑鄉趕來收領他的遺物。老人家斯文掃地地跪在我面前，還作揖：『我家就這麼一個兒子，屈死了！求求你，姑娘！別做手術，讓孩子生下來……要不，我這老婆子還有什麼活頭！』她嚎啕大哭。看樣子，斷子絕孫的痛苦，真的會奪去老人的生命！……你說我該怎麼辦？生，還是不生？如若不生，我可以求姑媽——她是婦產醫院的主治大夫——偷偷做人流手術。才第一個月，完全來得及。神不知鬼不覺，我還可以保住自己的名譽——沒有確鑿證據的風言風語早晚會散去……但是我流着熱淚扶起老人家，告訴她我同意把孩子（私生子呵！）生下來！……我的心很軟。況且我愛他，愛他！每個女人都甘願替所愛的人生兒育女！讓世人都來唾我、罵我吧！我不怕！……」

方仁含着醋意欽佩地望着這個不畏人言、

胆量奇大的女人。

「……二十年前社會風氣遠遠不及今天開放。即使在大學生裏，一般人對戀愛和男女關係也抱着『小心火燭』的畏懼態度。可是我公然要替一個『小鄧拓』養下私生子！……我成了『淫穢』這兩個字的同義語。爲了攻擊我，人們把字典裏的難聽字眼都用光了！父母把我趕出了家門——我不恨他們。如果不這樣做，污言惡語和政治壓力會很快吞沒了他們——除了他母親，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肯搭理我。男人怕弄壞了名聲，女人們是怕同流合污。終於，在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凱歌聲中，『小小鄧拓』在藍旗營(3)一間民房裏出世了！正如老人家日夜盼望的那樣，是個男孩！我成爲母親了！……」她把頭驕傲地側轉了一下，使之離開了方仁的臂腕，無意間，兩人的臉頰貼觸了一下。但是雙方都沒有什麼熱情的反應——他們的心思在彼不在此。

「你的孩子……快二十歲了吧？他在哪兒？」方仁明知這樣問話是不得體的，却還是迫不及待。

「我不知道。」聲音裏那狂熱的激情突然消失了，好似擲過來一個個冷冰冰、沉甸甸的鵝卵石。

「不知道?!」

「不知道。孩子一直在他奶奶身邊。在福建仙游。後來中美關係解凍，第一批放出國的移民裏就有他們……當時孩子已有七歲了，又聰明又漂亮，那神氣和他爸爸一模一樣。現在他應該上大學了吧，交沒交女朋友呢？……有時候做夢夢到他——我的兒子，我的『小鄧拓』！……」

「你不給他寫信？……」
于娜凄然一笑：「五十年代有個法國電影

——《沒有留下地址》……」

方仁像是自己受了欺騙似地、氣憤地「啊」了一聲。

原來這個女人那一潭死水般的平靜之中，隱藏着如此深重的痛苦。

「有時候我真想見兒子一面……我就一個人到香山去，隨意抱住一棵小樹，號哭……或者在雷陣雨的曠野中徜徉，讓雨水把自己淋得透濕……」

方仁真想爲她的不幸一哭。

「嫁給鄭曉冬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她的聲音由哀感轉爲自疚，依然是輕輕地。「不是嫌棄他老，而是嫌棄他不是精神上的強者。他的生活目標就是苟活下去。你知道，當這個目標滲透在人生的每時每刻，則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反倒不重要了。牛鵬飛逼死了他的愛妻（沒有用『前妻』一詞。方仁過敏地快慰地發現），讓他表態，他竟然說：『死得好。劉靜活着也是白白糟踏勞動人民的糧食！』這像是人話麼？……至於自輕自賤，更是鄭曉冬的拿手好戲。婚後我才知道，在多次向黨交心的活動中，他乾脆宣佈自己不是人，而是一具活尸首。其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毛主席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我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所以我沒有靈魂。所以我不是人。所以我是一具活尸首。……真是天曉得！由於他自我批判的調子如此嚴苛，那麼別人再說什麼都是替他減罪了。他就在大帽子下面開了小差，滑過去了！……」

不相稱的婚姻。方仁想。一個身心荏弱的偽善的老夫子和一個外表平靜、內秉風雷之性的率真的少婦，能湊合出好結果嗎？

「我要的是一個在精神上旗鼓相當的男人。」她直視着方仁的眼睛，一雙吹氣若蘭的嘴

唇輕輕吐訴衷言。

他心裏湧動着：「捨我其誰」的丈夫氣概和責任感……

他們倒行逆施了……

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二個女人。他是念舊的：牛莉雪縱有千般不是，畢竟是他的（離了婚的）結髮妻子，因而，在那事應該是甜甜蜜蜜的時刻，他却由於眼前閃動着莉雪那粗壯的身影而不合時宜地打了個寒噤……

事情過去之後，她懷着那種折鐵男兒也得爲之低頭的柔情蜜意問他：

「編輯部去不成了。今後打算怎麼辦？……」

倦意上了他的臉孔。他有些灰心地道：「我是從『廟裏廂』(4)出來的人，這輩子算完了！……」

「呵，不是的。」她深思着，「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一切擁有女人的男人和擁有男人的女人都是強大的。我希望——走出這幢房子後，你去做些什麼……」

「做什麼？」方仁肅然了。

「……沒有得到我以前你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

——怪女人呵，真正的女人！

這禪機似的妙語使屋子裏重又歸於沉默。這時，樓下傳來一重兩輕的叩門聲……

「他回來了。」于娜鎮定地說，同時從容地調整衣衫。這種情緒穩住了方仁，他面紅耳赤地調整出一個拘謹呆板的坐姿，彷彿他長時間來一直保持着這個姿勢……

于娜用雙手撫平了皮沙發上那些被兩人體重壓出來的凹處，然後下樓開門。從她周到、裕如的安排中，方仁推想她的愛情生活裏肯定有許多不平凡的細節……

鄭曉冬伴着一串做作的爽朗笑聲走上來。

「……哈哈，現在校領導照顧老教授，給我們小車坐，往司機班打個電話，很方便哪……」他今天身着一套深藍色吐噉中山裝，腳下是圓口布鞋，很像公式化國產故事片裏那些一塵不染的三八式老幹部、永無差錯的老黨員。于娜接上去道：「那也得看看車庫裏有沒有車，司機是否鬧情緒。」

「當然，當然……」在言笑之中，鄭曉冬愈益顯得精神矍鑠。「老教授坐小車——較之牛棚歲月，真不可同日而語矣！」他這才騰出功夫來理會方仁，「小張同志，臨約變卦，有勞你久候，抱歉抱歉……」他顯然已將約會改期的事情忘記了。

方仁很不自然的報以一笑。在鄭曉冬面前，他有一種既鄙夷又愧疚的微妙心理，却又用表面上的恭敬掩飾着。

他們重新坐定。于娜換上了熱茶。又根據鄭曉冬的吩咐，擺上了兩人份的火腿三明治——這位西語系教授的心愛之物，然後悄悄退了出去。

他們默默地吃着權作晚餐的三明治。

鄭曉冬一時間甚至不好意思與方仁對視：畢竟，這位身世不幸的足球中鋒是被他密告了一狀的受害者。這是第一個。以前之所以沒有，也只是因為沒有合適的機會和對象而已。由于難為情，他重複着一個觀之不雅的动作而不自覺——把領口的鈕扣一會兒解開、一會兒繫上……

鄭曉冬有些窘迫地說：「你的事情，人事部門進行了調查，沒能通過……」

他清喉嚨時發出一種痰厥似的聲音。看着這老頭子怪可憐的，於是方仁給對方

搬來個梯子：「我估計是牛卓暗地使壞……」

鄭曉冬果然如釋重負地緣之而上：「有理，有理！牛卓其人神通廣大——你這邊略有風吹草動，他早已得知並且暗暗從中作梗……」方仁把三明治拋在茶几上。心中的悲哀遠甚于氣惱——這位年逾古稀、學貫中西的老教授，自我感覺良好地按照孩童邏輯編造着瞎話……如此精神太監。

鄭曉冬却自以為得計了，語調變得順暢而自然，就像幾個星期以前坐在本校師資科科長面前那樣——他以呈遞國書一般的鄭重和莊嚴，把那份詳載着張方仁反動言論的報告交給優大黑粗的科長，雖然僅僅博得一副笑臉，幾句美言……却也透體陶然，感激莫名。幾十年來，他一向對人事幹部持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而今却可以挺身靠攏組織，哪能坐失良機！人心是複雜難測的。鄭曉冬原本執意要提



携方仁，以便在暮年成爲慧眼相馬的伯樂。近年來，由于國家女排「四連冠」以及奧運會上的金銀銅牌，體育已成爲舉國矚目的大熱門。鄭曉冬在歡欣鼓舞之餘，又有一點遺憾：在國外，體育明星都是大學生，哪像在中國大陸，體育與高等教育兩不搭界！……如若把張方仁培養成有水平的翻譯家，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

想不到，他對亡妻的綿綿哀思引出來張方仁的驚人言論……他畏葸了。腦子裏近乎本能地跳閃出一個連自己也耽于直面的念頭：「主動匯報，是檢舉；慢一步，則是……」他老了，奄然物化之期不遠了，唯恐再發生什麼意外。

於是乎，他只能用「我這樣做也是爲國爲民」這樣一個純正的動機自欺。

三十幾年了，他都是靠着自欺過來的。

毛澤東曰：「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鄭曉冬不知此話是否正確，但他確實知道，是解放軍的槍桿子把馬列主義帶進新華大學課堂的。那時節，僅有少數左派教授熱心宣講馬恩列斯毛，大多數學者只是感到茫然。至于鄭曉冬本人，對此更是毫無興趣。當年在新華外文系求學時，曾有左傾同學把艾思奇「大眾哲學」⁽⁵⁾給他，他總是翻也不翻便老實不客氣地原物奉還。然而，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大自然總是選擇適合于自己的物種。因而，當鄭曉冬教授看到自己的老朋友、老學友們——唯心論者、經學大師、尼采信徒、鴛鴦蝴蝶派詩人、莎士比亞專家等等——一窩蜂似地完成了意識形態上的轉變，一律在口頭上標榜馬列主義時，他又怎能落伍？

在一九五〇年底開始的那場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運動中，鄭曉冬過份積極地寫

了一篇評《約翰·克利斯多夫》的奇文（法國是美國在西歐的主要盟國嘛），將此書罵了個一文不值。他以此表明自己思想改造之主動、徹底。這篇文章發表後，又被收回、銷毀。原

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裏有人發話了：羅曼·羅蘭夫人尚在人世，此文可能造成不良國際影響……云云。雖然開了這麼個笑話，但是鄭曉冬教授可貴的革命熱情還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

這以後接踵而來的幾場政治運動使他吓壞了胆——搞人文科學的人弄頂「反革命」帽子戴戴，真比俯身拾芥還容易！除了各級組織的監視和控制，毛澤東這位雅好文藝的帝王還常常御駕親征地在思想文化領域巡幸，文革之前他甚至廣泛瀏覽各高等院校學報的人文科學版……毛澤東深知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因而從不忽視任何一點異動。

依循着趨利避害的人類本能，鄭曉冬謹小慎微地囿於馬恩列斯毛著作限定的條條框框之中，像一條鑽進巨型奶酪的懶蟲那樣自得其樂。搞文搞成了他最主要的治學方法。他的工作室裏有一箱精工製作的卡片，舉凡上述各位對於希臘神話、古羅馬戲劇、文藝復興等等的定評以及諸如「現實主義不但要求細節的真實，還要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等等經典說法，盡皆錄入。自然，毛澤東的文章、批示乃至片言隻語更是不可或缺的寶貝。……需要時，鄭曉冬儘可以隨手拈來，點染成篇甚至成書，全不費事。他是出版過精裝本論文集和通俗小冊子的。

文革固然使他遭了大罪，不過他的情況還遠遠不能算是最慘的。他活着熬過來了。須知，當你周圍不時發生自殺、他殺、失蹤等慘劇

時，活着即是無上的幸福。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給他的生命注入了新機。不僅恢復了昔日優裕、舒適的生活，而且又可以埋頭擺弄卡片做學問了。甚至，趕上最後一班車而成爲中共黨員（他因爲劉靜那

些複雜的港台關係錯失了一九五六年那班車——當時正值科學的春天，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相當容易）的想法，也已提上了日程……晚境如此，夫復何求？

然而，西方有句名諺：「有凱撒，便有他的布魯塔斯。」（6）這和中國人常說的「凡事有利即有弊」是同樣意思。中國大陸緊閉多年的門戶一開，精神的和物質的舶來品恣意地衝擊着這塊古老的土地……甚至撼及鄭曉冬教授的學術權威寶座！

年輕人——大學生首當其衝——渴望離經叛道，他們要求在馬恩列斯毛的本本之外尋找闡釋世界的答案……而那恰恰是鄭教授不熟悉的、無力把握的範疇！而當系統論、信息論等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之後，更使他那以不變應付萬變的、充其量只是形式邏輯的治學方法顯得稚拙、可笑！

爲了保住自己的學術地位，鄭曉冬教授不得不乞靈於馬列主義——只消推證出那些後起之秀們背離了馬列正道，那些人便站不住腳了。人家沒法跟他較量，就像水滸傳裏身披三木的林冲打不過洪教頭一樣。在「四個堅持」的國度裏，誰人敢在口頭上對馬列不敬呢？

當然，鄭教授也並非得了全勝：在表面上的春風得意之中，鬱鬱之感日益加深、增重。方仁不幸而成爲他發洩這種灰色情緒，並借機向組織上示以忠誠的犧牲品。

……

鄭曉冬冗長的、破綻很多的解釋進入了尾

聲：「……這次借調沒有成功，你千萬不要灰心。也不要放鬆學習。今後，我還是會替你留意其它機會的。……」

方仁似聽非聽，似信非信地點點頭。

他離開鄭家時，夜已深了。

鄭曉冬客氣地送他出來，于娜則沒再露面。

院子裏萬籟俱寂。一輪皎月當空，與小樓相接的藤蘿架上綴滿了月色中呈亮銀色的枝蔓……

方仁迷茫地望着明月，傻裏傻氣地微笑着

……

足球場上有兩個球門——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人家的……

他的生活中有兩個女人——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人家的……

前者（將軍女兒）使他身敗名裂；而後者（教授夫人）却使他得到了重新奮起的力量……

……命運。

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寫於新大陸

註：（1）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法國印象派作曲家。文革前姚文元曾歪批其作品《克羅士先生》。

（2）張瑞芳：中國大陸著名女演員。

（3）藍旗營：北京地名。地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之間。

（4）廟裏廂：黑話。係一切監管、勞改單位的合稱。

（5）艾思奇：中共重要理論家之一。卒於一九六五年。

（6）凱撒（公元前一〇〇——公元前四四）：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公元前三雄之一。死於布魯塔斯之手。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自九月起，新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十二期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二年；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獲贈未來一年及過去六期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閱中春一年。

▲本刊尚缺乏下列中國大陸留學生較多的大學的整套大陸同學通訊錄：耶魯，康乃爾，俄亥俄州大和俄亥俄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西北大學，喬治城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等，這些學校為急徵之列。此外，美國五十個州，各州至少有所重要學府——州大和州立大（如堪薩斯州有堪薩斯大學和堪薩斯州立大學），這些學校的新通訊錄，以及哈佛等各名牌學府的新通訊錄，本刊都非常需要。

▲日本、澳洲、歐洲各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錄，均請寄至中國之春雜誌美洲編輯部。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新同學，您尋求精神的伴侶嗎？

歡迎您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一批新的中國留學生又來到了海外，我們歡迎你們！

在國內時，您大概已經聽說過《中國之春》。您一定好奇，《中國之春》到底講了些什麼？

來到海外，您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愛國。夜深人靜之時，您難免產生憂國思鄉的心情。這時，《中國之春》就成了您最好的精神伴侶，她告訴您家鄉最近發生了什麼，明天可能發生什麼，其他留學生是怎樣想的，她與您共同探討中國的出路，她也會給您送來各地留學生的信息。

承蒙愛國華僑的捐助，我們尚有一些贈閱名額，請各位新同學盡快寫信給我們，申請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編輯部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電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T. P. Lee #3437 34-37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